

没有过不去的坎

中国社会各阶层心理障碍分析

刘宗粤 何苗 刘裔 刘懿 / 著

中国人的头号心理疾病、高级牢骚、虚荣人格、红眼病、笨蛋理论、官场面具、露水夫妻等社会精神错乱现象为什么会产生？病因尽在此书中！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作为国内首部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疾病的著作，本书从心理学、社会文化角度，向我们讲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矫正有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心理障碍”这一主题。处理社会群体事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道德中国、建设幸福中国、实现中国梦，均离不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从心理根源上去防范社会危机，对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信用缺失，高级牢骚，平庸者优势，人情消费，虚荣人格，内耗人格，红眼病，屁股决定脑袋，冷漠情结，金本位PK官本位，欺瞒趋向，返贪热，迷信趋向，缩阳症，诸侯人格，纵欲意向等劣根性在书中暴露无遗。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愿本书带给我们警醒，令我们深思，以求整个中华民族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

本书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掌握中国社会舆情、进行社会综合管理，尤其是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工作、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党委宣传部门、政法部门、群众工作部门、社会综合管理部门的有益参考读物。

上架建议：畅销书·普通心理学读物

ISBN 978-7-5680-0431-2



9 787568 004312 >

定价：48.00元

没有过不去的坎

中国社会各阶层心理障碍分析

刘宗粤 何苗 刘裔 刘懿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过不去的坎 / 刘宗粤, 何苗, 刘裔等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680-0431-2

I. ①没… II. ①刘… ②何… ③刘… III. ①社会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C9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1604号

没有过不去的坎

刘宗粤 何苗 刘裔 刘懿 著

策划编辑: 晋璧东

责任编辑: 沈剑锋 康 艳

封面设计: 舞夺金华

责任校对: 孙 倩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010) 84533149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7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从新编《陋室铭》到阿基米德

当代中国民谣现象透视

一日闲暇，翻阅书报，偶见肖复兴一篇《并非游戏》，读之悚然心惊，现摘其要如下。

儿子问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话出自何处。我从书柜中找了一本《古文观止》，告诉他出自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又找了一本《古代散文选注》，那里面有古文注释，让他自己去读这篇文章。

不一会儿，他便看完了。他的兴趣不在全文，只在开头这两句话。

“爸爸，你随便起个头，我都能照这两句话的形式给你往下编。比如说：爱不在深，有钱则行；人不在大，有权则灵。”

原来，在他这里《陋室铭》是一种游戏。《陋室铭》中文缜约的古文变成了儿歌似的顺口溜。两句古文繁衍成当代世风民情的晴雨表。

不过，我不相信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将世俗的一切包括在刘禹锡的这两句话中，便随口说了句：“货不怕假。”

儿子无须考虑便爽快答道：“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钱不在多，美元就行。”

我又说：“饭不怕贵。”

儿子依然对答如流，似乎水到渠成：“饭不怕贵，公款就行；酒不怕醉，请客就灵。”

“路不在远。”

“路不在远，有车则行；钱不在多，报销就灵。”

“调动不怕难，送礼就行；奖状不在大，发钱就灵。”

“厕所不在大，收费就行；旅馆不在高，有星就灵。”

“分不在高，后门就行；学不在深，有爹就灵。”

.....

游戏像对口词。我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爱情沦陷于金银窟中；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公款请客一年耗费上千亿人民币；公费旅游“万水千山只等闲”；后门成风，行贿受贿明目张胆；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厕所收费花样翻新，宾馆加冕星级如云，服务档次仍然故我……哪一点儿子说得不对？哪一点不在刘禹锡这变种的两句话中？

总想难住儿子，其实是想求得心理平衡，生活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也并非真如他所说的一切弊端都能囊括进他这两句话中。我便又问了一句“店不在大……”，而且要求做一句两吃的答案。

儿子嘴角一弯，嘲笑于我：“爸爸，我再白饶你一分，说三种答案怎么样？”

第一：“店不在大，有货则行；货不怕多，便宜就灵。”

第二：“店不在大，合资就行；货不怕贵，名牌则灵。”

第三：“店不在大，有主儿就行；货不怕假，有托儿就灵。”

看来，什么也瞒不过儿子。刘禹锡若在天有灵，知道自己《陋室铭》开头两句被儿子肆无忌惮地改造成如此模样，将作何感想？

在上文中，刘禹锡的《陋室铭》颠来倒去，竟可作万花筒，折射出当今社会诸多畸形现象。游戏否？确非游戏，或曰：“不可游戏。”然而，沉重的是，连孩子都深谙游戏的个中三昧，怎不令我等父辈头热涔涔？

时下流行民谣，仿《陋室铭》格律的亦不少。信手拈来几首，大多烘托“官场假相”（以别于培根的“剧场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

本事不高，应付则行；学问不深，奉承则灵。斯是科室，唯吾聪明。庸俗岂有趣，流言作新闻，谈笑无边际，往来有后门。可以打毛线、练气功，无民声之乱耳，无国忧之劳神。调资不落後，级别按时升。不才云：乐在其中。

家不在大，有凳则行；人不在多，有头则灵。八点钟开会，九点半进行。谈笑任自由，往来无拘谨。可以织毛线、抽香烟、嗑瓜子、侃大山。材料三四本，内容只一文；台上照着念，台下信手翻；茶水几大桶，厕所四五十。开头“同志们”，接着“一、二、三”。众人云：“有完没完。”

才不在高，有官则行；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斯是衙门，唯吾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搞特权、结帮亲。无忠言之逆耳，唯颂扬之妙音。青云直上，威风精神。在任一日，快哉过瘾！

中国人善用民谣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如以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但更多的则是对社会消极现象的讽刺、针砭。如20世纪

60年代初，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物资凭票供应，就有了一首诙谐的民谣：“百货公司一枝花，食品公司双下巴。”对“文革”中文艺界百花凋零的情景则描绘道：“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苏联电影搂搂抱抱。”

民谣，“民口也，明镜也”。汉惠帝曾设“乐府令”集民谣，以观风俗民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年撰“策林”，其中一个主张就是“采民诗（谣）以补察时政”；清朝杜文澜辑的“古谣谚”达100多卷。民谣也触动了当今中国领导人。1993年1月，江汉平原正值寒风料峭、大地凝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就来到这块三国演义的古战场体察民情。他走一路问一路，行至荆州，当地群众一句“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兄弟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的顺口溜，深深触动了他。几天下来，他那个非同寻常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一首又一首既普通又真实的民谣。这些民谣道出了群众内心的呼声，也寄托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期望。

时下流行民谣。作者手中亦收集了一大摞（有的散见于本书章节），非为采风，实为研究社会心理障碍所需。时至今日，如何革除诸多社会消极现象，进一步深入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对此，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心理学家则往往将目光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社会心理问题。

让我们把问题谈得更深入一些……

阿基米德：移动地球的支点

文化论者认为，任何一种社会都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一种是由社会权力机构或具有权威性的团体通过各种传媒规定和提倡的标准文化（亦可称为符号化的文化指令）；一种是人们在实际社会关系中心照不宣地领悟出来的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标的世俗文化（亦可称为心理性的文化指令）。世俗文化发展的后果往往是神圣意义的丧失，个人崇拜的消失，意识形态的淡化；社会趋于功利化、实用化；金钱标准成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基础；在科学中，实证分析代替价值判断，等等。

随着社会的演进，原来有序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不断分化、重新组合，这是正常的，对我国目前出现的世俗文化也不能做简单的是非判断。但是，困惑及忧虑也不是无根据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是非颠倒的价值判断，以诚实为傻气，以刻苦为寒酸，以奢侈为荣耀，以善良为无能，社会出现了缺乏善恶感、是非感、内疚感的现象，其核心是人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道德心态，显现了道德真空的裂痕。

在分析经济为何缺乏活力的时候，我们总是将原因归结为：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市场疲软。然而，现在发掘出来的观点是，解决经济缺乏活力的出路在于推进改

革，而推动改革的难点在于精神疲软。某地方曾有民谣曰：

中央忙改革，省市忙出国，地县忙升格，乡镇忙请客。

十七十八，披肩长发；二十七八，怀抱娃娃；三十七八，等候提拔；四十七八，拖拖沓沓；五十七八，退休回家；六十七八，养鱼种花；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亦曾有民谣“都市十八怪”流行于民间：

第一怪，老人跌倒没人来；第二怪，夜半歌声传天外；第三怪，摊开麻将把客待；第四怪，铁门铁锁铁阳台；第五怪，猪肉牛肉加水卖；第六怪，“珍稀”作为下酒菜；第七怪，众人争把猫狗爱；第八怪，染起头发充老外；第九怪，污言秽语随口带；第十怪，杂物废纸胡乱甩；第十一怪，下水道口缺少盖；第十二怪，小摊小贩占道摆；第十三怪，算命先生站成排；第十四怪，好人偏去充乞丐；第十五怪，小偷扒窃好自在；第十六怪，旅店拉客死活拽；第十七怪，锻炼只有老太太；第十八怪，雷锋叔叔没人爱。

毋庸讳言，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精神疲软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是极不相称的，甚至相悖！

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罗伯特·华德为首的经济学者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政治学者则指出现代化应是“政治现代化”；至于英克尔斯，则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更进一步的观点则是由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阐述的。在国际性的“发展与选择”研讨会上，他回顾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并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统计数字，落后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作者赞同“人的现代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最终标志）是人类是否真正地了解并把握自己。社会心理学对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是把现代化看作一种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换言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

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莫过于国民素质包括观念落后的问题。意大利著名记者奥莉亚娜·法拉齐曾表达了她对现代社会的状态和对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目标时的担心：“总之，生活得更好并不意味着有钱。在西方社会，道德沦丧、文化衰退，常使我感觉又退回到了中世纪。除了增加电脑和飞向空中的航天器，看不出有

什么大的变化。我担心中国人正在朝这条路上走。我这几天接触的中国人，他们穿着西方的时髦服装，谈论的都是钱。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应理解为现代化革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统筹法、优选法的原则，就应该选择一个首要的、适宜的切入点，比如国民的心理素质与心理状况。在实施全方位改革的今天，这个问题尤为重要。让我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言论为佐证：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历代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奠定安邦治国的社会心理基础。春秋战国时的《管子·心术上》提出了“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的观点。孟子也认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技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

如何开启我国的现代化系统工程？学者、专家提出了经济杠杆说、政治杠杆说、文化杠杆说等。然而，杠杆是需要支点的。适当的支点才能使杠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遥望太空，发出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的呐喊。今天，我们的支点是什么？仍然是国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这是永恒的主题。离开了这个主题，人类一切有组织的活动都显得孱弱无力！

中国，你不能没有精神的现代化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看一下，现代化的人应该具备何种心理特征。综合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归结为十个方面：

一、准备并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敢于向传统挑战。

二、崇尚实干、积极进取、讲究公平、维护法制。

三、作风民主，尊重并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勇于修正自己。

四、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办事讲究效率，且有长远规划。

五、独立人格，较少的社会依附性。

六、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受，对人和社 会的能力充满信心。

七、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理解自身的社会价值。

八、尊重科学、知识、技术，强调计划性。

九、重视人的作用，了解并把握自身的心理特征；重视精神功能，不以物欲为唯一需要。

十、有环境意识，包括保护自然环境，重视社会环境。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凡是不符合上述特征的，均可称为现代社会的心理障碍（有别于个体的、具有临床意义的心理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有的社会心理障碍正逐渐得到矫正，如由依赖趋向独立，由被动趋向主动，由退缩趋向进取，由压抑趋向表现，由自馁趋向自信，由僵化趋向灵活，等等，不一而足，但现实的问题依然严重，令人不能回避、低估。当今民谣折射出了相应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经历亦有“实证”。一些热爱中国的友好人士也直言不讳。琼尼·肯特在《人民日报》撰文，坦率谈道：“在外表的现代化上，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现在极度缺乏思想精神方面的现代化。”他同时真挚地呼喊：“中国，你不能没有精神的现代化！”

不用沮丧，须知，社会心理障碍是跨文化而随时变化的，并非我国独有。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以社会心理作为切入点、支点，去除沉痾、治愈新疾，这可以说是我国能否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信之否？

一谈到国情，人们总是习惯于“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往往仅仅注意了资金、资源、技术水平及利益格局等，而恰恰忽略了应该作为重要国情的因素——我国国民普遍的心理素质及心理状态。可以这样说，如果现有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将在后面逐一阐述）得不到有效矫正，心理杠杆还未有效启动，那么，所谓的政治杠杆、经济杠杆、文化杠杆也落不到实处，中国现代化步伐仍然可能蹒跚、滞后。

基于责任感，因《并非游戏》的触动，萌发了作者写作此书。其目的无非是鲁迅先生当年抱定的宗旨——“揭出痛苦，引起疗效注意”。望勿误会，祈盼匡正。

是以序。

刘宗粤

2014年7月

注：本书所引诸多案例均出自各地报刊，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请作者、读者见谅。如有争议，作者负全部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目 录

01 基尼系数与古典公平观——公平偏差	1
均等偏差：抽肥补瘦	1
倾斜偏差：带路人不是领路人	3
忽略偏差：漏桶原理	6
02 “红太阳现象”带来的思考——失落情结	9
“报告文学之父”徐迟之死	10
美国西点军校的雷锋像	14
老百姓，捂紧自己的钱包	18
03 “幸好警察不是假的！”——信度偏差	27
全国首届十佳律师遁入空门	27
我给“黑哨”送红包	32
契约精神与汕头市危机	37
04 道德晕眩的“厄尔尼诺”现象——矛盾趋向	40
道德观念冲突日益加剧	42
白衣天使与黄色书刊	45
骇人听闻的“黑色逻辑”	48
05 “干吗不扔第二只靴子！”——完形趋向	52
韦思博士的“完全公正论”	53
坐车的不开车的	55
一位士兵的奇特遭遇	59
06 鸦雀无声与庶人议政——“奈尔”趋向	63
泄气中心与鼓气学校	63

低级牢骚与高级牢骚	66
恐怖的印度掷石节	69
07 耐用的雨伞卖不掉——定势偏差	72
北大教授坠楼之谜	73
平庸者的五大优势	74
一亿男光棍的潜在威胁	77
08 父子兵、夫妻店、亲家村——悖理情结	81
“破三铁”为何戛然而止	81
“家族化现象”的背后	83
人情消费——健康社会的流感	85
09 中国人的头号心理疾病——人际趋向	88
“做人”与“做事”孰重？	88
河北某地的“哥们互联网”	90
十个图章抵不过一个老乡	93
从人际敏感到人际障碍	95
10 海南：逃婚者的天堂——虚荣人格	98
脸面与“喜鹊文化”	98
贫困学生内心隐痛	100
斗富不可取	101
11 “集体主义”葬送了诺贝尔奖——内耗人格	103
内耗简析	103
外贸行业的煮豆燃萁	106
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107
“红眼病”与女劳模之死	110
12 自行车比汽车更污染？——自利趋向	113
屁股决定脑袋	113
什么钱最不值钱？	115
中国刮起“审计风暴”	117
13 卫星上找不到的城市——缺损人格	119
街头电话亭何罪？	119

环境污染与良知缺损	120
集体利益之殇	125
14 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冷漠情结	128
冷漠泛滥	128
纽约凶杀案在中国重演	130
数百村民在围观什么？	132
15 “帝王情结”与“圣贤期待”——权威人格	135
帝王情结与权威人格	135
大学需要“明星”撑场面	138
学术权威的恶果	140
神医开出的“官场妙方”	143
16 权力拜物教的衍生物——官位情结	145
班干部“索贿受贿”现象	145
中国特色的“处级和尚”	148
官太太争夺战的缘由	151
17 五粮鸡尾酒与茅台威士忌——非我偏差	154
马克中国奇遇记	154
外国使馆区的“女黄牛”	159
进军中国的“野鸡大学”	162
18 惊心动魄的锦西“假兵案”——物化偏差	166
钱、钱、钱，命相连	166
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	170
金本位PK官本位	173
19 南京大街博士行乞——怠惰趋向	177
胡适考证：明朝亡于麻将	177
手术刀下的阴影	181
轮子·盘子·骰子·裙子	182
20 境外赌城兵临北中国——投机情结	186
读托尔斯泰能找到工作吗？	186
凯恩斯炒股炒出的笨蛋理论	190
科技界的“七宗罪”	193

21 中国人都是哲学家——欺瞒趋向.....	197
神秘的434工程	197
渭南抗洪一线的怪现状	202
“官出数字”缘由“数字出官”	206
22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依附人格.....	209
时下流行上岸热、返贫热	209
当“独一代”遇到“独二代”	212
丫头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218
23 中国人何时成了“中性人”？——恐惧情结	222
老鼠过街的时代特色	222
咄咄怪事：失主不敢领失物	227
“神勇基金”诱发怪异动机	230
24 从唐骏的“学历门”说起——素质偏差	235
“野鸡大学”应运而生	235
徐力的榔头砸向母亲	240
英文字母有多少画？	244
中日学生的较量	249
25 中国大地的“羊群效应”——模仿趋向	256
明年还种大蒜否？	256
形形色色的“跳楼秀”	260
小腐败：日益滚大的雪球	264
26 “反腐明星”吸毒嫖娼——矛盾人格	269
费氏理论：一半魔鬼一半天使	269
看不懂的中国人	273
看不懂的“官场面具”	279
27 南岳衡山的第一炷香——迷信趋向.....	284
租美国卫星看风水	284
“缩阳症”酿成的惨剧	289
升官桥·粮神殿·镇妖塔	293
28 民告官，天下第一难——诸侯人格.....	298
四菜一汤，曾记否？	298

虚假报告骗总理.....	302
土皇帝亳州阅兵记	309
29 总统套房“吓”住法国总统——纵欲趋势	315
“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315
大学校园里的“露水夫妻”	319
荒唐的官场情色游戏	324

后 记 · 329

01

基尼系数与古典公平观——公平偏差

均等偏差：抽肥补瘦

在讨论社会心理障碍时，公平问题及由此而导致人们在公平方面的认识偏差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命题。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公平一般可作三种解释：起点平等、标准平等、结果平等。起点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谋求其利益。标准平等是指社会要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社会成员的绩效，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结果平等是指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一般来讲，这三种公平的采用方向是非同向的。起点及标准公平有利于激发人的活力包括创造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它们是效率的源泉和动力。结果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却是非效率的，表现为收入的均等化，有平均主义倾向，也称为古典公平观。这种心理倾向对社会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可以通过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来做进一步说明。

如果说，衡量国家富裕程度可用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学界则把意大利学者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作为度量收入差别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所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均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分配上的平等主义严重，生产效率低；基尼系数过高，表明分配差别悬殊，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什么样的基尼系数才是合理的，要由每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时期而定。一般地说，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在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改革阶段，基尼系数应该高一些，因为在这一阶段，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贫富差别，而是古典的平均主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以后，基尼系数应逐渐下降，到那个时

候，才有条件强调全社会的共同繁荣，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调查表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配制度的调整 and 变化，商品市场的出现和繁荣，以“大锅饭”“铁饭碗”为特征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受到冲击，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现象。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以及苏联及东欧地区各国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截至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达到0.476。这是令人吃惊的。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居警戒线0.4以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贫富悬殊已“位列”世界前茅。

从社会发展的自身动力看，贫富差距是绝对合理的。如果把贫富差距和公平与否简单画等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公平并非等于平均。

改革的初衷之一，是要改变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给我们的社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

“分配不合理”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对平均主义在目前某些方面的加剧很少论及，而对于在少数人之间出现的贫富差别却沸沸扬扬，激昂慷慨，愤愤然！有的人甚至对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潸然泪下，对着毛主席纪念堂发呆，这种舆论上的倾斜和价值判断上的失衡，对改革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以致目前的某些决策不得不对这种压力进行妥协。

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公平，最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莫过于“杀富济贫”，一律拉平。这也正是我国古典公平观的核心。自从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以后，历代的正人君子几乎都在“均贫富”上做文章，“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杜甫），“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韩愈），“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苏洵），“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杨万里），人们一方面对贫富不均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又天天在做着“均贫富”的美梦，希望早一天实现“世界大同”，这实质上是阶级社会里人们对原始公社的思想回归，事实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然，这种古典的公平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口头议论，还表现在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东汉的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都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唐代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索性以“平均”二字为口号；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均贫富”作口号；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作号召；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刘福通、韩山童，更是以“均田免粮”作旗帜。集农民起义之大成的太平天国运动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平分土地，建立圣库制度，

废除私有财产。这些平均主义的空想虽不可能实现，但却有极大的号召力，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平均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古典公平观的局限性在于它为了实现平均主义这个美好愿望，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减法，就是除法，要么“抽肥补瘦”“杀富济贫”，要么“打乱平分”“大锅吃饭”，这种办法和由这种办法所产生的观念，对发展商品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困扰，目前人们对于所谓“分配不公”的激烈反映，除了一部分是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抨击之外，主要是改革引起的变化，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了的社会分配与人们头脑中的古典平均观相抵触。人们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甚至以为这些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多年来，人们对“共同贫困”心安理得，而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洪水猛兽。这种心态，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各项改革的实现，都是极大的心理障碍和困扰。

剖析我国的古典公平观，其与我国国民心理的“趋同化倾向”不无联系。人们既要求自己与别人相同，也希望别人与自己相同，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大一统心态。于是，便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便有“才高于众，人必非之”，便有“枪打出头鸟”，还有“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这种趋同化倾向的特点有：一、趋同的范围极广，几乎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如“随大流”，体现在分配方面则是平均主义倾向；二、趋同的是等级之间，按荀子的说法叫做“维齐非齐”。中国人有严重的平均主义观念，但很少是全社会的平均主义，而主要是等级平均主义；三、趋同的是结果相同，而非起点与标准相同；四、趋同不容存异，尤其在人际关系上是党同伐异。很明显，这种趋同化倾向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心态如得不到有效矫正，还将严重影响今后几代人。

倾斜偏差：带路人不是领路人

我国公众在社会认知方面的公平偏差既表现为“均等偏差”，又表现为“倾斜偏差”。典型的心理障碍则是“这个社会不公平，也不可能公平”。如果说，“均等偏差”的根源与心理趋同和古典公平观有关的话，那么，倾斜偏差则与心理失衡和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不公平状况有关。

“分配不合理”起码有两种，一是前述的平均主义，单纯强调结果均等；二是因为起点和标准的不公平而形成的不均等。例如，不是因为“勤劳”“科技”“守法”等原因致富，而是依靠权力致富、权力寻租等，包括灰色收入（体制外收入，如行业垄断）和黑色收入（法制外收入，如贪污受贿）。因这些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公众当然不满，由此形成“倾斜偏差”的认知障碍。有一种说法：先富起来的“带路人”并不是老百姓的“领路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在《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指

出，暴富群体原始积累的途径和方式大约有12种：一、在合法经营外衣的掩盖下，以劣充优、以假充真；二、走私贩私屡禁不止；三、利用同类商品的价差，低进高出，或者专司黑市市场；四、买卖票证和批文；五、靠造假贩假暴富；六、招工、搞培训时收取高额报名费、培训费，上岗时收取高额风险抵押金，录用后克扣员工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不提供劳动保护和必要的生活服务，雇用童工等办法；七、签订承包合同时，用各种办法压低承包基数，凭设备超负荷运转，或转手充当中间商，利用公有资产捞取巨额利润；八、证券市场开放之初，乘供求失衡、法制不完善、监管不力之机牟取暴利；九、利用房地产投机；十、一些文化投机商买卖文凭、学位，某些影视明星偷税漏税，有些文人墨客受雇于人，为其充当“广告”或推销员，从中捞取酬金，还有些技术人员在商战中“携宝跳槽”捞取巨额酬金；十一、以高利率为诱饵，非法集资；十二、在招商引资的旗帜下，收受外商贿赂，为外商的非法行为大开绿灯，或者为不法外商效力，损害国家利益。

暴富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这是因为，暴富群体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暴富群体既不愿意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愿意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经济运行多轨制、市场无序，恰恰是他们赖以滋生的主要条件。如果任暴富群体发展，他们必然会进一步蜕变为新生的官僚、买办、封建性质的阶级。那时，他们就不会仅仅满足于通过非法途径牟取暴利，而要夺取政权来巩固、维护和发展他们的既得利益。

“分配不公”也反映在税收上，个人所得税本是作为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而开征的一个税种。时至今日人们发现，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没有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相反，征收上存在着“逆向调节”的怪现象：低收入人群反倒成了纳税的主体，而高收入群体的纳税贡献竟低得可怜。

南京市地税局对旅游业的专项检查发现，南京市秦淮区注册的8家专职旅游公司，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竟然为0；4家较大规模的旅游公司，近100名导游收入竟无一人达到个税起征点，因为账面反映的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实际上，仅中等水平的专职导游，月平均工资就有3 000多元。调查显示，我国的高收入群体如律师、经纪人、股评人等，纳税者寥寥无几。2009年，我国800多亿元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的纳税主体，其中广东省全省个人所得税总额90亿元，高收入者仅占2.3%。

就工资分配而言，不可避免的是垄断行业的“垄断工资”。金融、电信、电力、工商、税务等行业的工资与其他部门相比，高得令人咋舌。这不等于他们中的员工做出的贡献就一定比别人大。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垄断和特权带来的分配不公。

据《组织人事报》2009年8月6日的报道，有统计资料表明，垄断行业高额利润

已转化为职工高收入、高福利。在广东，移动通信公司的普通员工每月工资收入超过10 000元；在天津，海洋石油公司的一名下岗分流女工可享受每月2 600元的“分流补贴”。烟草行业，一个小职员月薪则可达万元，而杭州市烟草中层干部年收入可达几十万元。垄断行业地位很容易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通过各种形式转化成为行业自身小利益。对此，专家建议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应归国家财政。

一些专家指出，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应当归国家财政，有关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标准应当进行审核，严格控制，凡是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的部门和行业都应当尽快放开；少数非垄断不可的行业和企业，要比照机关公务人员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建立相应的工资分配制度。

诚然，公平状况并非仅仅限于分配，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机会均等”，这也是起点和标准公平的直接反映。在这方面，社会公众呼声最高的当属高考录取分数线线的地区差异。

几十年来，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录取线一直实行差别对待。

以北京大学为例，2009年，北京大学在重庆市录取新生76名，其中理科最低分672分，文科最低分595分，而北京市本地录取理科生272人，文科生132人，录取分数理科为622分，文科为577分。两地都是直辖市，而且北京市人口还不到重庆市人口的一半，招生名额却是重庆的5倍多。

高考招生的地区歧视，给人以这样的困惑：个人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奋斗，而取决于户口在什么地方。可否这样说：籍贯就是命运？重庆人要672分才能上北大，而北京只需622分。显然是高考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高考招生的问题。

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原本不该出现这样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式，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但是，现实跟法律大相径庭，我们的高等教育并未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2010年北京市文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65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重点本科为528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第一批为535分，最高相差70分；北京大学理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76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理科重点本科为535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第一批为559分，最高相差83分。这种差别对待的背后，凸显了中国地区之间的制度性壁垒和以邻为壑的户籍意识。

那么，在中国，是不是可以通过司法渠道来挑战现行的高考制度呢？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可以的，但实践起来却不那么容易。2010年8月23日，山东青岛3名高中应届毕业生曾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教育权。这一年北京的文科重点控制分数线是454分，而山东是580分，相差126分；北京的理科重点控制分数线是488分，而山东是607分，相差119分。提起诉讼的3名学生的分数分别是522分（理科）、457分（文科）、506分（文科）。以这样的成绩，在北京可以考上重点院校，而在青岛，其中两个人只能读高职或者电大，而另一个人则完全没有希望。结局是，这样的高考招生制度依然如故。

忽略偏差：漏桶原理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他们分别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分给他们同样多的粥。东部的富人人数少，粥相对来说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富人就倒了喂小狗小猫，浪费了很多；西部穷人那边呢，人很多，粥根本不够喝，很多人饿着，穷人们嚷嚷着说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分出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公平现象。政府的这种愿望和做法很美好，但美中不足的是，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增加很多开支，比如要买装粥的桶，要雇挑桶的人。有时更不幸的是，用的那个桶还是个漏桶，下面破了个洞。这样，等粥送到穷人那里，一路上稀稀拉拉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很多开支，甚至还漏掉了粥，这些都是效率的损失，而损失的多少取决于开支增加的多少和桶的漏洞大小。

其实这个故事要说的意思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政府用征税的办法，从富人那里征税，把税收转移给穷人，但结果，穷人实际上得到的却比富人失去的少。差额在转移的过程中消耗掉了——一部分被必要的开支用掉了，另一部分有可能因税收转移方法不严密而漏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像漏桶一样，为了追求公平损失了效率。

于是，奥肯说了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这里蛋糕变小，也是说效率的损失。

一方面，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富人们得到的收入有不少进了国库，富人们就不在想怎么投资赚钱了，蛋糕又变小了。另一方面，征税也影响穷人。例如，一个下岗工人终于找到了一份勉强糊口的新工作，但工资不高，却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补贴。这样，他就不再工作专门等着吃国家救济，蛋糕再次变小。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结果就像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似的，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

“漏桶原理”意味着，公平与效率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实上，在我国理论界也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要么牺牲公平以取得效率，要么牺牲效率以求得公平。比较折中或者说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请注意“兼顾”二字，这实际上是将公平摆在次要的或者说可有可无的地位上，这种认识倾向可以称之为“忽略偏差”。

把“漏桶原理”奉为经典的理论家们其实并未发现，这个理论阐述的其实只是一个“平均”的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而平均并不等于公平，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些理论家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套用了西方社会的理论而忽略了国情的差异：一是体制的差异；二是社会心理的差异。这些差异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试问，美国一家私人公司的老板将自己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提拔为总经理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将自己的同样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提拔为财务处长，反应会是同样的吗？

“公平”是抽象的，有具体效用的是人们的“公平感”。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产生的公平感往往不是来源于其行为结果的绝对值，而是来源于与他人相比的相对值。当人们觉察到他的结果（工资、奖金、地位、赞誉等）与投入（资历、技能、职务、绩效等）的比率，与他人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相等时，就会感到公平，反之，就会感到不公平。亚当斯还认为，这里的“他人”既可指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也可指自己以前的状况（以前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尽管亚当斯的论述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描述色彩，但其理论不乏合理性，合理性在于它肯定了公平感作为一种态度体验是建立在社会比较之基础上的，而社会比较的参考体也包括自己以前的状况。

与公平感有关的参照物除了亚当斯所指的他人（包括自己以前的状况）外，实际上还包括自己的主观期望。应该明确，公平感的产生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一种主观的反映。这种反映也并非与客观现实一一对应。比如，当个体的自我估计过高（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的投入估计过高）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错觉。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的公式来表述，即：态度的情绪指数=期望实现值/主观期望值。根据这个公式，在期望实现值不变的情况下，主观期望值的大小与态度的情绪指数成反比，主观期望值越高，态度的情绪指数就越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公平感的产生与期望实现值和主观期望值的比率有关。

通过社会比较而形成的公平感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公平感包括两种状况：公平和不公平。当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等于他人时，人们就会产生公平的态度体验，并获得相应的激励，这可视为一种正强化。当然，条件是自我的主观期望值必须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当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不等于他人时，则会产生不公平的态度体验。不公平包括两种情况：（1）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即自

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大于他人；（2）不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小于他人。任何一种不公平的感觉都会使人处于一种心理不平衡的状态。

海德的认识平衡理论与费斯廷格的认识失调论一致认为：人们普遍存在着维持内心平衡的倾向，当出现不平衡因素时，人们总是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以恢复心理平衡状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公平感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刺激，其刺激强度与不公平的程序成正比。为了恢复内心的平衡，在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采取补偿办法，即增加投入或主动减少结果以消除内疚感。但研究表明，更多的常用的途径却是采取文饰作用，如自我排解，认为自己的投入实际上更多，或者改变参考体（找一个更为“幸运”的人），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公平感。这就是说，即使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一般也不能使个体获得相应激励。

至于不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则会使人明显地获得相反激励（负强化）。诚然，为了改变不公平感所带来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采取文饰途径，如甜柠檬和酸葡萄机制，或采取升华的方法，从更高层次认识自我的价值以及社会责任等。但更为直接的和普遍的法则要求增加结果或减少投入，包括减少投入的数量及降低投入的质量。除此以外，还有宣泄，如发牢骚、煽动不满情绪、有意损坏公物等；迁移，如要求改换工作或调动单位；代偿，如从第二职业取得报酬。格罗斯等人对超级市场的调查表明，不公平感往往导致员工营私舞弊；仿效，如模仿比较对象（参照体）的行为，包括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以增加结果。

上述阐述可以简单归结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恰恰应该倒过来，即在现代社会，公平与否往往还是效率的前提，因为公众是需要“公平”作为激励力量的。美国哲学家劳尔斯的假想实验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生活。每个人对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还是富。现在，让他们协商，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结果会如何呢？可想而知，大家选择了公平。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如何，如果支持效率，就可能承担忍饥挨饿的风险。因此结论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公平优先。

02

“红太阳现象”带来的思考——失落情结

在某次国际田径锦标赛举行时，法国《体育画刊》的一位记者拍了100多幅运动员流泪的场面，他剔除掉那些因为获胜喜极而泣的运动员的相片，把失败者的相片发回了国内。一位叫阿穆·沃尔森的编辑在编排这些照片时，突发奇想，何不把他们狂欢时的照片一并刊发呢？于是他从网上检索出这些运动员在国内夺冠时的照片，把它们剪辑在一起，标上时间和成绩印了出来。

反复比照之后，他发现这些运动员为之哭泣的成绩竟然比在国内夺冠时的成绩高。同一个比赛项目，斯蒂文森在法国以3分46秒43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次他跑出了3分45秒56的好成绩，仅以0.32秒的微弱差距屈居亚军，他本应该高兴，可是照片上的他非常沮丧。格拉齐亚妮是有名的跳高选手，这一次她跳出了个人历史最好成绩，只因0.5厘米的差距低于墨西哥选手屈居第二名，她哭得竟是如此伤心。这到底是为什么？

阿穆·沃尔森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次他听到13岁的女儿抱怨说：“我老了，彻底地老了！”他才突然明白，那些选手之所以哭泣，并不是他们跑慢了，而是别人跑在了他们的前面。

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有些人之所以觉得职位低，之所以觉得贫困，同样的道理，不是因他们的职位真的低下，物质生活真的贫穷，而是因为有人比自己的职位高，比自己更富有。也正是这个原因，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在说自己生活得很累。

当今社会心理障碍，存在着明显的“失落情结”，其表征就是通俗所说的“失落感”，包括“地位失落”“精神失落”“安全失落”等。这些失落感的形成，一般均需通过社会比较。前章所述的“公平感”也是在社会比较的基础上才形成的。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态度”。比较有纵向比（时间差）及横向比

（空间差），人们的失落情绪均可由这两类对比而形成。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部分都市人亟待“心理扶贫”，也是缘于此。

当前，在我国特别是大都市里的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被专家称之为“心理贫困”的“疾病”。其主要“症状”表现为：自己并不贫困，却时时抱怨“太穷了，收入水平太低”。因此，一些生活早已步入小康或富裕的人们，反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很不满足。

北京商情咨询公司曾对500户居民进行了一次收入与自我评价的调查。结果是低收入阶层对自己的生活较为满足，而高收入阶层最无满足感。一位收入较低的工人这样对记者说：“真穷的人并不怎么叫穷，而一些收入高的人却常常在喊穷。”

一位学者认为“心理贫困症”的成因是盲目攀比和期望值过高。他说：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其交际范围很广，信息流通很快，人们往往只与比自己生活条件好的人比较，而不与那些比自己生活条件差的人比。有些人 and “大款”们接触太多，就是自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也会感觉很穷。

在某些舆论宣传中，现代大都市一片花团锦簇，欣欣向荣，更有权威“专家”指导如何“超前消费”。人们越是向往富裕，就越容易遗忘真正的贫穷，同时又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仍很贫穷。

既然存在着“心理贫困”的现象，就应该进行“心理扶贫”。首先，要通过国情教育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有数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其次，应该让人们懂得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效率优先的原则必然带来贫富差别；再次，要使人们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待生活，克服盲目攀比的思想；最后，新闻宣传部门应该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崇尚简朴的传统美德，抵制不符合国情、民情的高消费、超前消费。

现今的失落感亦非虚构，也并不是为道，从大街小巷曾经流行过，现今也仍然存在的“红太阳现象”或可透视出这种因对比而形成的失落情结。

不管归于何种分析，现今的这种失落情绪的背后确实存在怀旧心理。为什么要怀旧？人们唱起了几十年前的“老歌”，这些歌现在重新火热，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给人似曾相识的感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难道人们真的怀念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吗？非也。毋庸讳言，实因有失落感，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失落感。

“报告文学之父”徐迟之死

自198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为契机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大多数企业中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租赁责任制。承包租赁责任制的行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通过契约合同的方式规定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

责、权、利关系，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些改革曾一度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充分调动了经营主体企业代表——厂长、经理的积极性。但是，由于责任制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使厂长、经理的权限出现了无限膨胀的趋势。

在一些企业中，厂长、经理不仅是握有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而且掌有利益分配的决定权、人事调动任免权等权力。这样，原来本是一体化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方是掌握诸多权力的厂长、经理，一方是被动服从的职工群众。职工群众客观上完全被排斥在企业管理之外，事实上已丧失了企业主人的地位。与此同时，舆论导向也发生严重的倾斜，过分宣传厂长、经理的地位和作用，一些“企业家”“优秀企业家”“明星企业家”应运而生，而对广大职工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却缺乏应有的肯定和充分的文化评价。

事实上，一些企业效益的好坏，并不真正取决于厂长、经理的经营能力，而是与企业的行业性质、产品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一些所谓的“企业家”是以“垒大户”的办法树起的“典型”，更不用说，企业的运行离不开奋战在各个岗位，尤其是生产第一线的职工群众的努力。职工群众主体地位的丧失和舆论导向的倾斜，与工人阶级是企业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传统观念产生极大的落差，从而使职工群众普遍产生主人翁地位丧失的感觉，管理参与性和政治参与性普遍降低，“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责任感明显淡化。笔者在对辽宁省1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职工并不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仅仅是普通劳动者，笔者根据调查，还发现企业内部的浪费现象和怠工现象普遍存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企业改革推进，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下岗分流及企业兼并的进一步实施，企业内部人事制度发生了变化。

某钢管厂的劳务市场成立大会，没有鞭炮声，没有奏乐，甚至也没有掌声，倒是有低低的哭声从墙的一隅传过来。除了主持会议的领导，与会的50多人都是刚从劳动组合中“挤”出来的。其中有工人、干部、技术员、共产党员，甚至大学生。

30多岁的女技术员小江，在部队受过高等教育，回地方后专业不对口，不得已改了行进了这个钢管厂。有阶段她又害了一场大病，不能顶岗，这次组合落聘了，进了劳务市场，每个月只拿120元的生活费。她为此失声痛哭：“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让我怎么去见人？”

李春英，一个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分到这个厂后，她满以为可以大显身手干一场。不想毕业一年就失业了。她拒绝参加这次劳务市场成立大会，以此来表示强烈的抗议！

最受震动的要算8名落聘干部。46岁的赵玉升，原是该厂二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落聘后，他到车队当了一名年龄最大的装卸工。他当过兵，打过仗，是个打断

胳膊不落泪的硬汉子。这次他哭了。他说：“20多年来都是党安排我的工作。党叫干啥，我就干啥。到了劳务市场，我没有任何专长，只好当装卸工……”

和赵玉升有着近似经历的李科长，在这次优化组合中比赵玉升跌得更惨。他之前在部队服役，转业到地方是正营干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级分他抓政治思想教育，转业到地方之后，他又当政工科长，还是这套耍嘴皮子的事。他没有想过学技术这件事。

厂里开始搞优化组合，开宗明义，从干部的铁交椅下刀子。为了精简机构，厂里决定撤销政工科，把政工科的工作并入厂办和党办，连窝都端了，这个官还能当下去吗？这一轮，他失去了铁交椅。

他只好下车间。没想到工人组合时也没人要他。一些工人说：“他会做什么？哪怕他只会一样，我们都收他！”可不，这还真点到了穴位上。党和军队培养了他，造就的只是他的一张嘴，既然嘴的功能失灵了，他还有什么呢？第二轮，他又失去了“铁饭碗”。“落魄凤凰不如鸡”，失业科长在家里也威风丧尽，爱人又是闹，又是哭，又是要离婚。爱人跺起脚来数落他：“你一天到晚就会吹！吹到现在把饭碗也吹丢了。你拿什么来养家糊口，你要你婆娘伢崽怎么去见人啊？”李科长又痛苦，又委屈。他固然是没有技术，但是，这能全怪他吗？

有位年过半百的女士，劳动模范的桂冠一戴就是20多年。她勤恳、忘我地工作，从普通员工成为某国营副食店主任。她领导的商店服务优良，多年被评为先进店。鲜花、锦旗摆满了她办公室，也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改革开放，商业、服务业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老劳模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承包经营时，她投标未中，老主任没能成为新经理。商店承包到组，实行优化组合，老劳模竟然没人要，她被安排“内退”回家。几十年拼命工作，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但同时也带给她无穷的乐趣，工作时她时时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突然间，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巨大的失落感使她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过了极限，老劳模病倒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批劳模退出了工作岗位，有的已是耄耋老人。如今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在《上海老年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老劳模们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盼望得到组织的关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论是加工资还是分房子，这批老劳模总是带头，工资先加给别人，分到手的房子也放弃。他们认为，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了。谁知，这一等就是几十年。有位老劳模，年已古稀，全家6口住房仅18平方米。两个儿子结婚将18平方米房子分割完，老夫妇俩只好自搭阁楼。因年岁大，行动不便，老大爷从阁楼上摔下，断了两根肋骨。老两口到厂里多次反映，总是得不到解决。一次在座谈会上，他流着泪说，我目前的处境，连子女也不谅解。一气之下，他将精心保存多年的30多张奖状付之一炬。

作家历来是受人尊敬的群体，而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大作家徐迟却因“落差情结”不能化解，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当文学投机分子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被盗版和约稿搞得焦头烂额时，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作家如徐迟却在为无力出版那可怜的文集终日发愁。“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与“文学贵族”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大的落差就连徐迟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无法承受。

决定社会地位的“最经常”的因素总是经济收入。“传统”作家地位被请下神坛也与之有关。一位著名作家最初是怀着习惯的就业优越感被人请到一家夜总会的，但节目未完便快快逃离。下面是他的描述：

夜总会位于虹桥开发新区，在五星级涉外饭店虹桥宾馆侧……在经过多日采访极端疲惫之后，主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到夜总会听音乐的活动。

大门外有穿旗袍的小姐迎候自不必说，大厅里的广告则是一位半裸的马来西亚歌星，今晚她将为客人表演。入座费比我想象的便宜，每人500元，水果拼盘300元，一杯果汁80元。

其实这个名气很大的嘎登夜总会跟成都的锦江、岷山、新大陆舞厅也差不多，只是更大些，面积相当于一座中型剧场，舞台和舞池约占一半，大厅里音乐低徊，舞台上的音乐喷泉在灯光中变幻出摇曳多姿的色彩。据自称老资格“发烧友”的作家李先生鉴定，该夜总会的灯光和音响设备效果极佳，属国内一流水平。我则更欣赏音乐喷泉的无穷组合和奇妙变化。夜总会服务时间为晚上9时半至次日凌晨2时半，是标准的夜生活时间。

室内灯光很暗，茶几上点着蜡烛，沙发很软、很低，引导小姐是上海人，看上去相当年轻，最多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超短裙，身姿轻盈地穿行在幽暗的灯光下。

服务小姐也是上海人，看上去像高中生，很苗条可爱的样子。她走到我们桌前，非常自然地矮下身来，单腿跪下，递上酒水单，并轻声问先生需要什么。

这种服务姿势使我们这群作家很不自在，作家都是很有人道精神的人，怎么会让一个可爱的弱女子下跪呢？但是如果扶她起来，无疑又破坏了夜总会的规矩，砸了小姐的饭碗，这就是人道主义害人的地方。左右为难之后，只好听其自然。

领班张小姐来包间陪我们，张小姐是大学本科毕业，当时刚23岁。

“张小姐请不要见怪，我们都是作家，有些问题请不要回避。”我先发制人，单刀直入地问她，“请问这些服务小姐月薪多少？还有哪些额外收入？她们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服务小姐最低月薪2 000元，红包（奖金）另算，客人小费也不在内。她们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

对大多数女孩子来说，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报酬无疑都是理想的和优厚的，难怪

一有类似招工机会，年轻女孩子个个趋之若鹜。

“夜总会的客源主要是哪些人？平均消费多少？”

“客人主要以内宾为主，每人每晚消费不等，一般为一两千元。”

“……再问个问题，请问张小姐你的收入是多少？”我知道她们都很忌讳回答这种问题，可是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恰恰就藏在忌讳后面。

“……我实在很难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张小姐毕竟是有文化的人，不计较我提问的冒昧，“实话实说吧，我的年金是50万港币，红包（奖金）及小费不包括在内。”

我们全体沉默，好长一阵子没人说话，也没兴趣再待下去。说句良心话，在座的作家们的收入很难与这位张小姐相比，而她仅23岁，刚刚大学毕业，职务仅仅是个领班。

美国西点军校的雷锋像

金钱崇拜在我国目前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有关内容在“拜物情结”中具体介绍）。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念念有词地宣扬他的理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向钱看，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还好，他还没有大胆地吼上一句：“一切向钱看。”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相当一部分人所信奉的行为准则，物质观念似乎已成为价值观念的核心。那么，精神呢？遗憾得很，“人是要有精神的”——这话今天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

据1995年3月份某期《羊城晚报》报道，当那个拒不向外资老板下跪而被开除的孙天帅受到人们赞扬时，有的大学生却认为：“只要有钱，跪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广州某大学给外语系学生布置作文，以“孙天帅罢跪事件”为素材写评论文。学生们消极的看法不少，如“下跪并非向何人下跪，只是向现实金钱下跪，可悲但不可耻。那些下跪的可能比孙天帅更勇敢，需要更多的勇气。”“个人暂时屈辱，可以换得一家温饱。”“难道要用死去的躯壳来发扬民族自尊吗？”“孙天帅是否教育电影看多了，一时间英雄主义冲上头脑？”老师对上述价值取向痛心忧虑，讲课时，在黑板上抄录了上述观点，想不到立即有几位学生举手同意这些观点。

精神失落正是一些人沉沦的诱因。

杜仕昆，原云南财贸学院的工会干部，一个受人尊敬的老牌教育工作者。

自从年轻的杜仕昆首次走进义务献血的行列，坚持献血长达25年，从他身上抽出的血竟多达11 400毫升。杜仕昆成为我国义务献血（包括无偿献血）最多的人，被人们誉为“中国的献血大王”。

杜仕昆被昆明市人民政府评选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好市民，获奖金1 000元；又荣获国家级“无偿献血金杯奖”。在北京领奖时，他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他表示，只要不发生异常反应，他准备在往后的几年里，再献18次血，让献血总量超过12 000毫升，成为中国献血最多的人，同时也为医学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誉满春城、名贯中华的献血大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钱迷心窍，竟偷偷地干起了伪造和贩卖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毕业证书的罪恶勾当。杜仕昆从辉煌的顶峰坠入罪恶的深渊，大名鼎鼎的献血大王，转瞬间成了臭名昭著的阶下囚。

世俗的偏见使有些人往往把占有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一个人人身价值的标志，一向视奉献为生命价值的杜仕昆渐渐地也开始怀疑以前所追求的东西了，认为用血换来的那些荣誉算不了什么，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徒有虚名。只有钱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才能给人带来实惠，为了捞钱，他变了。

一天中午，两位学生的家长找到杜仕昆说：“孩子想当兵，能不能帮忙买个高中毕业证书？”

杜仕昆正愁没门道赚钱，这一来正中下怀，很快他就构想出了伪造高中毕业证书的黑色方案。他找来一份现成的高中毕业证书，依葫芦画瓢，私下找人偷刻了某某中学的公章，某某校长私章，还有某某教委的验讫章，把这些印章一个个加盖在复印好的毕业证书上。结果，两个初中生拿着杜仕昆伪造的高中毕业证书，骗过招兵干部，参军去了西藏。两个学生的家长为酬谢杜仕昆，共送给他2500元。尝到甜头之后，杜仕昆接着又给几个想参军、提干、参加工作的青年们伪造高中毕业证书，从中捞取不义之财。

既然高中毕业证书能够伪造，能够捞钱，那么比高中毕业证书更加吃香更加走俏的大学本科、专科以及各种证书为何不能伪造？

后来据杜仕昆交代，他从一开始就大量伪造云南财贸学院本科、专科毕业证书和其他各种证书。在这期间，仿刻财贸学院的各种圆形公章（包括学院的钢印）共12枚，还非法仿刻了学院院长、书记的印章以及各系室种类繁多的纹章、条章。这些非法的印章都是杜仕昆暗地里找人私刻的。与此同时，他还非法印制了各种类型的毕业证书。开始伪造出来的几本证书只卖给亲朋好友。后来，求购者纷至沓来，一批批“假货”由昆明蔓延到全省，从云南行销到广东、四川……

时下，鄙薄一切价值的风气十分流行，人们以一种近乎褻渎的方式对待着神圣的事物，任何高尚的价值观都不能幸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鄙薄社会榜样。比如同单位的张三嘲笑李四的勤快，便说：“真把自己当雷锋了。”回头再加两个字：“傻帽！”某某钱被贼偷了，回家一见老婆的面，一句：“妈的，今天当了回雷锋。”他老婆立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鄙薄口吻遍及街头巷尾，不用太留意便可溜进你的耳朵，稍不小心甚至

就能从你的嘴里蹦出几句来。前不久一位朋友辞职后，兴冲冲打来电话，开头就一句：“我他妈的不当那雷锋了。”再细问，原来是嫌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

精神榜样就这样悲哀地成为一些人茶余饭后鄙薄的对象。值得深思的是，当“雷锋”成为引人讥笑的对象时，美国西点军校却悬挂雷锋像，尊雷锋为楷模。此事现已经核实无误。从国家性质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军队性质来说，西点军校是美国资产阶级军队干部的摇篮。其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英雄为榜样，说明雷锋精神超越国界和民族。倘若没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精神支柱，整个社会也难以前进。既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也需要曾在中国大地上影响了一代的雷锋精神，我们为什么要把雷锋精神置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用“进口高档物质，出口高档精神”这样的戏言来贬低雷锋精神呢？这种贬低典型地显现了国人的一种精神失落。

“人总是要一点精神的”，既然一种精神失落，就要寻找替代物，按法国哲学家、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那就是：“如果没有上帝，人们也必须再造一个。”社会中曾一度流行的“基督教热”即是一例。

一位卓有成就的医学老教授信奉了基督教，十分虔诚地接受了洗礼，还立下遗嘱，在她死后把一切财产都捐献给教会。

这件事引起了不少人议论。信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这位70多岁的女教授如此虔诚地信教甚是令人奇怪。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前半生一直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曾想在占稀之年突然变成一个虔诚的教徒了。

其实，近年来，一股信仰基督教的热潮在中国迅速兴起。1985年，全国基督徒有300多万人；1989年超过了400万；2011年超过800万。这股信教热潮刚刚掀起时，信教者大多是老人，而且其中多数是文盲。笔者做过一项调查，在上海近几年新入教的2万名基督徒中，中青年知识分子约占四分之一，其中有不少大学教授、医生、作家、工程师以及在校大学生，妇女要占三分之二以上；沈阳市1万多名基督徒中，青年人约占26%。

这股基督教热还由东部沿海逐步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扩展，目前我国的苗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基督教教徒越来越少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列主义不提倡信奉宗教。那么，改革开放的今天却掀起了这么一股“基督教热”，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么多善男信女如此虔诚地拜在“上帝”脚下呢？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基督教热”悄然兴起的背后我们能发现什么呢？

一位工程师说：“我曾被错划为‘右派’，沉冤20年，平反后重新分配工作，本来想施展一番抱负，可是和领导合不来，许多事情想做而没法做。现在，一晃快20年了，我年近80，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他生未卜此生休’，我还是皈依天

主，修修来世吧！”

一位女干部说：“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相互利用、搞实用主义，倒是在教堂里人和人的关系比较纯洁，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天父的儿女，无私地相互帮助，所以我愿意投入到这个大家庭去。”

一位乡办中学的女教师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说：“基督教教人们要行善，要诚实，做好人。我希望我自己，也希望大家都做好人，所以我就信教了。”

有位青年医生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实在令人厌恨和烦恼，只有当我走进教堂，听着‘圣哉圣哉’的赞美诗时，我的心灵才如被净化了一样，感到清新和平静。我相信，这是神和圣洁的天国在向我召唤。”

有个富人在答复别人关于为什么要信教的询问时说：“我信教，是因为天主保佑我，让我这几年一下子富起来了。要想继续过好日子，就要信奉天主。”别人对他说：“你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日子，是因为党的领导好，是因为开放政策好。”他却固执地说：“党的领导和政策对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别人没富而我富了呢？可见还是天主特别保佑我。”

有位主妇在答复这个问题时伤心落泪了：“你问我为什么要信教？那是因为天主救了我。我和我的丈夫结婚快20年了，可是想不到他偷偷在外面乱搞两性关系，而且千方百计地隐瞒了一年多。如果被人发现了真不得了，不但他身败名裂，我们一家也完了。可是，这件事鬼使神差地被我发现了，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全家。现在他决心悔改。我真感谢天主啊！如果不是天主的指点，我很难发现这件事。天主保佑我们一家，保佑他改邪归正，保佑我们全家驱灾免祸！”

笔者在调查中，常常听到和看到信教群众热心为社会服务的故事。

安徽泗县刘圩镇三自爱国小组听说镇里想在一片河洼地上开拓一条新路，就主动请求承包施工任务。他们组织了200多名信徒，自带工具和干粮，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条长500米、宽50米的高质量砂石路面。镇里要付给他们的报酬，教徒们一致谢绝。这个镇的三自爱国小组负责人还曾专程找镇长，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说：“这是咱兄弟姐妹们奉献的钱，请镇里转寄给前线的战士。这钱虽少，却是我们的真情实意！”

河南平顶山市一位基督教徒，从机关退休后，看到市里没有聋哑学校，一些聋哑儿童无处上学。于是她开办了一个家庭聋哑学校，并自己掏钱买来14套课桌椅，收了14名聋哑儿童，不仅分文不取，还每天早晚亲自接送学生。

对于信教群众来说，最使他们感到敬畏的莫过于《摩西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财物……这些诫命，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们的头上。据说，谁要是违背了这些戒规，全知、全能的上帝随时随地都将给予他们无情的惩罚，这些人死后也不能进“天国”。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信教群众一般都比较遵纪守法。

当然，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加之少数别有用心之徒利用宗教乘机捣乱，也会形成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基督教热”？一些宗教问题的专家们认为，宗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定要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它的消极因素而采取“堵”的措施，也不应忽视实际问题的存在而掉以轻心，听之任之。正确的态度和措施应当是：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有群众基础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对宗教活动要依法加强管理，使之与我们的社会相协调。

老百姓，捂紧自己的钱包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一部分大学生对自身的前途产生迷茫，特别是那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怀着种种不安，甚至不满情绪。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个人与社会、欲望与道德、实际困难与准备不足，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使人产生的无能为力与自卑感，竞争及压力的加剧等，这一切主客观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引发他们的危机感包括安全失落感。根据调查，20%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焦虑症。

安全感的失落首当其冲的是“铁饭碗”危机。实行毕业分配制时，学生们一到就业年龄，基本上就进入了终生的职业保险箱。后来，稳稳当当的“铁饭碗”不那么稳当了，人们失去职业“安全感”。于是，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承受力和承受方式接受现实，但大多数人可以说目前仍不适应这种状况及这种感受，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有劳动即就业的权利。这就是说，能否充分保证劳动者享有就业的权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失业容易导致社会公平感的丧失，极易引发失业人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认为自己被排除社会主流外。此外，失业也容易导致贫困，极易引发严重的心理失衡行为。大量的失业者陷入贫困之中，由此会衍生出一系列消极后果。特别是在城市长期聚集起一大批贫困人口，则可能出现两种严重的心态平衡行为选择，或是迫于生计的犯罪，或是同样迫于生计的群体驱动。失业或担心失业的社会心理障碍总的说来可归为消极的社会焦虑情绪。

所谓社会焦虑情绪，是指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恐惧的心理状态。它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真实的社会心理现象，它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效应是很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社会机体的同心力与凝聚力，容易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社会的不满，并导致某有害的群体行为的发生。

21世纪以来，许多著名心理学、社会学家在关注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时，探讨现代人的“社会焦虑”。而在今天，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因“安全失落”而导致的

焦虑感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明显“外溢”出来，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的角色地位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职业心理被打破了。尽管如今机会与选择一直存在，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会把很多人甩到被淘汰的边缘。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想到改革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而现在呢？它和“下岗”“打工”“炒鱿鱼”等流行词语联系在一起。生存的危机感像一片时隐时现的雾气弥漫在社会大众心理中。不仅弱势群体，如没有城市户口的民工、下岗工人、城乡贫困家庭等都能感受到生存的艰难，即使是工薪阶层也因住房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拖进为自己或子女的未来生存进行投资的焦虑中。据江苏省曾对2 200户居民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70%的人为将来的医药费没有着落而担心；53%的家长表示为了应付越来越高的学费、赞助费不得不多攒钱；47%的人担心失业和下岗……

焦虑并非是来自直接的贫困感。以前，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传统的生活是靠信仰来支撑的，幸福是与人们内心深处信仰的力量相联系的。在今天，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在发生变化。幸福越来越和物质消费符号相联系，如名牌、流行、档次，并以货币的拥有量为标志。幸福便开始远离平凡、远离信仰世界的平衡，成为一种物化的生活标准，一种不断上升的欲望满足。与新的幸福追求相伴随的欲望焦虑便出现了。一位社会学者在对南京市白下区、鼓楼区、建邺区、玄武区的600名不同职业的工薪阶层所做的问卷抽样调查中发现：有49.31%人赞成“无处不在的生活广告总是让我们向往新潮富贵的生活方式”；同时，有46.23%的人强烈或很强烈感受到“在这个时代，我常有钱太少的焦虑”。这个数字表明了人们新的期待与焦虑意识。这一切都是一种新的生活感受，正如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新的灾难与欢乐，在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

在当今，由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收入分化、道德失范、生活中不稳定事件的增多、结构性失业人口的增加，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大。社会焦虑感的积聚迅速产生着一种计划经济时代所没有的浮躁、怨恨、怀疑、失落。

不少人急急忙忙地抓住现实中的实惠“过把瘾”。“不捞白不捞”成为流行语。同时人们又有一种难以排解的、莫名的“怨恨”，总觉得自己没有别人过得好，应该得到的本应更多。对社会改革原有的预期、对社会主义公平理念的期待，现实中相对贫困化现象的扩大，都会成为人们失落情绪积聚的社会因素。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心理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缓解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是防范、化解突发性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缓解宏观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它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整体的社会心理环境的改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下岗工人的合理安置，社会

底层结构或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社会风尚的净化、积极，健康的人生信念理想的重建等。

除了职业安全感失落外，人们的安全失落感还包括更多的方面，包括对预期所产生的焦虑甚至恐惧。某些经济学家和官员，一提起市场销售不景气和银行货币储量上升问题，总先从老百姓身上找原因，说现在的老百姓都不愿花钱，把钱存到银行里。

但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也不是无钱消费。出于某种考虑，老百姓不敢消费。这其中最使百姓产生危机感的就是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的问题，这三座大山是：住房、医疗和孩子上学。

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昂楼价；得一次大病足以使人倾家荡产的医疗费用；令人惶惶不安的来自学校的各种付款通知。这些使得本来就没有足够积蓄的居民顿时捂紧了自己的钱包。必须消费的，也精打细算起来，可消费可不消费的自然就被推到了遥远的未来。

老百姓不敢消费，再加上一个预期焦虑，即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焦虑，那谁还敢轻易动用积蓄呢？那么，银行里那几乎与国内生产总值持平的20万亿存款，其80%为少数“大户”所有，“大户”人数至多占储户总数的20%，估计是该消费的已经消费了，还有的不必消费，能把责任推到群众头上，打老百姓钱包的主意吗？

在我们的经济学家那里存在着一个视角盲区，这就是他们往往偏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观察分析问题，建议政府采取某些对策，而忽视了从民众角度、从消费角度来研究问题。抽掉经济学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分配问题，避开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而形成的贫富尖锐对立，避开销售不畅的根本症结在于不需要花钱的少数人拥有银行多数货币等实质问题，却用老百姓不愿花钱去解释现实。改革要群众不断接包袱，但决策者几乎没有分清，哪些包袱是政府可以不背或少背的，哪些包袱是必须背的，是不可以随便甩的。

除上述列举外，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安全失落感。

居不上锁，夜不闭户，却终日平安无事，这是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社会治安状况，它让今天的国人听了如同神话一般不可思议。因为作为现代人，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如今过日子，安全太重要了！

某全国性大报曾在其近百万读者中开展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民意调查：“如今过日子，你最担心的是什么？”随报印制的调查表中列出11个选择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假冒伪劣、菜篮子、煤气水电、工资、失业、住房、子女升学、升官发财、安全等。短短一个月，组委会便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答卷124 209份，选择“安全”项的竟然有69 750份，高达56.2%。而与其相比，位居其次的“住房”却只占了24.4%。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在报上一公开，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禁不住要问：“如今过日子，我们安全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人对防盗门尚无所知。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安装了防盗门。防盗门的异军突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人“安全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全已成关注的社会问题。

然而，装了防盗门是否就能确保安全？真相是无情的。某市市委宿舍楼，家家防盗门齐全，楼梯口还有大铁门“把关”，但失窃的事却时有发生。一天上午，某局长家来了一群青年男女，大摇大摆地将局长家值钱的家具搬了个精光，平时互不来往的对门邻居以为这群人在帮局长搬家，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一伙人开车离去。等主人中午回家，才发现遭窃。由此可见，安装防盗门不管是亡羊补牢或是未雨绸缪，都只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长期以来，枪在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非常神圣的，只有军人、干警和其他特殊身份的人才持有持枪的资格，其他任何人不能存枪。然而，据公安部公布的一项统计数字披露：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已收缴民众非法持有的各类枪支57.6万支，其中军用枪支10 890万支，其他多为猎枪、小口径枪和钢珠枪、火药枪等。私人枪械作为一种事实在我国出现，最圆满的解释是“防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固然不会因为害怕千余斤稻谷被偷而花上千元去购买私枪防盗，但那些歌星、影星，那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那些抛头露面的厂长经理们，那些经常独自载客送货跑长途的司机们，却要时时刻刻为人身安全着想，雇保镖自然时髦，但却并不十分安全，自己买枪，这才是上选。于是，他们手中便有了高价走私买来的各种枪械，如果说这些人置枪的初衷确实是用来自卫，但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这枪永远不出问题。

交通事故的数量近些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中央电视台曾以“车祸猛于虎”为题，用广告之形式警示民众：全国目前每3~4分钟要发生一起车祸，每1.8分钟就有一人因车祸或死或伤。随着交通运输政策的陆续放开，私人客车成为普遍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当前公路上行驶的各种车辆中，69%以上属于私人客车，而私人客车已占现行客车总量的85%以上，成为陆上交通事故的最大隐患。驾驶技术不过关、无证驾驶、酒后驾车、廉价购买公家报废的旧车用于载客营业等为交通事故多发的最直接原因。

医院，应该是神圣的地方，病人可以在这里恢复健康。医院象征着救命，象征着安全。因此，以往人们一旦染病，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快送医院”，然而，如今的人们对是否要“送医院”已渐渐产生了疑惑。去医院就安全吗？请看一组报道：

4岁的小男孩徐氏和5岁的刘氏一起进某医学院等待手术，病历上清楚记录着两个患儿的各种情况，然而手术过后人们惊呆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徐氏做了扁桃体手术，而应该做扁桃体手术的刘氏却被平白无故地剖开了胸膛……

某市中医院陆续出生的26名新生儿中有4名死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交叉感染。事后查明原因，系医院卫生条件太差所致。

沈阳曾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新生儿死亡事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沈阳新生儿连续死亡原因初步查清》，披露了这起国内罕见的重大责任医疗事故。据调查，49名感染了“柯萨奇”病毒的婴儿，至少死亡15名。此稿一发，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每每读到这类的“新闻”，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难受：医生们的职业道德哪里去了？为了亲人的生命安全，为了亲人在医院少吃苦头，“送红包”风靡各地医院，大手术要送，小手术也要送。然而，送了红包的就安全了吗？你送我送大家都送，医疗事故照样层出不穷！

.....

下面我们引用谢维和于1992年第1期《社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模糊恐惧》，来从另一个角度对“安全失落”作理论方面的阐述。

该文所谓的模糊恐惧，指的是人们置身于某种极不明确的社会关系时所产生的的一种包括恐惧、忧虑和焦虑等事情的内在不安全感，以及由此导致的某些社会异常行为，甚至是越轨行为的社会病态心理。人们在正常社会文化形态中比较明确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可能达到什么结果，以及自己行为权利和义务，包括自己的界限等；而模糊恐惧则主要是出于上述社会认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害怕受到伤害和惩罚的一种病态心理。换言之，正常社会心理所反映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人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在此陷入了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状态，以至于人们因无法正常地调整上述关系而感到不安和惶恐。简单地说，这种模糊恐惧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种模糊恐惧并非实体性的恐惧，即它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的害怕，如对恶人、蛇虫、水火及某些自然现象的害怕。它属于一种人事上的惧怕，更多地出现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

第二，这种具有社会文化形态的模糊恐惧常常表现出无名的、无具体对象的特点。例如，它并不是对某一特定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恐惧，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的不安；它并不是对某一特定情境的害怕，而是对整个生活存在的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模糊恐惧在对象上又具有抽象性。

第三，这种模糊恐惧又具有内在性。这种恐惧更多地出于自身的不确定性。这既不同于对具体实物的害怕，也并非对这种恐惧有清清楚楚的认识，而常常是由于对自己本身缺乏自信而使然。前一种害怕自己本身的认识是清楚的，担心的是受到误解或各种外在力量的压力，而后一种恐惧则更多的是出于自己本身的茫然。它不仅仅在于害怕别人的非议和社会的指责，还出于自己本身的无把握和失去依靠。

第四，这种模糊恐惧还具有一种现代性。换言之，它反映和体现了一种对生存意义的焦虑。在这种恐惧中，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存在，而是如何生存得更有

意义；人们担心的不仅仅是如何适应社会，而是如何把个人追求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形成这种模糊恐惧的原因，不仅有社会及文化的变迁和改革，也有个人社会地位和权限的变化，包括在自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之后对自己行为及其责任的忧虑。

显然，这样的一种模糊恐惧必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它妨碍个人与社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个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使人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状态，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陷入这种模糊恐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将失去明确的行为动机和目的。由于对自己本身在一定社会环境和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不甚明了，人们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干些什么，有时对自己行为的原因也稀里糊涂，不知所以然。出于对做错了事而遭到惩罚的担心和害怕，或者是什么也不想做，或者是随大流，接受暗示，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表现出一种极其明显的从众心理和行为。这也常常是各种集体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时，模糊恐惧使人们以一种似是而非和无所谓的态度从事某项社会活动，因而常常表现出各种摇摆和不稳定的行为特征。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当代西方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对自由的恐惧》（又译为《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人们社会心理的分析。在他看来，稳定的社会结构虽然严格地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但同时也给予个人一定的保障和安全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情感的表达、宗教的信仰、政治的经济、个人发展方面获得较大自由之后，由于必要的社会秩序未能建立，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失去保障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产生了各种惶恐不安、孤独、怀疑和焦虑。

其次，具有这种模糊恐惧的人们也常常缺乏明确的行为方式。他们即使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定的行为动机，但对于怎样去做却常常陷入困惑，对于如何实现自身的良好愿望感到为难，包括在行为过程中如何表现自己，如何与其他人正常交往，共同协作，以及如何面对及处理行为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等，他们很容易在行为过程中出现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患得患失的现象。

再次，出于对行为后果的无法预计，人们常常会产生某种社会异常行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于实质性结局的不清楚，由于复杂的社会条件，事情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后果和结局；二是对社会评价的不明确，尽管得到了预期的实质性结果，却会招致种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评价，包括赞赏和指责、颂扬与批评，或者是得不到任何反应等。本文所谓的模糊恐惧，更多地与后一种情况相反。由于害怕卷入某些令人生畏的是非功过之争，以至于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参与行为及能力。

最后，模糊恐惧最大的社会侵蚀力是挫伤了人们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和勇气。试想，在本身对社会各种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的是非界限都不甚明

了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去正视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种种纷至沓来的引诱和刺激？又怎能去分辨他们之间的优劣和正误呢？进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又怎能在这扑朔迷离的人生中去做出慎重和果敢的选择？又怎能有正确的理论和标准与各种歪风邪气进行斗争呢？

坦率地说，上述模糊恐惧及其特征和危害，在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也逐渐成为人们所感到但却尚未普遍自觉的一种社会心态和现象。这里，只需简单地列举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片断，便可略见一斑：

一是眼下人们的口头禅“说不清楚”。无论是闲聊，还是讨论问题；不管是朋友相聚，还是故人的邂逅；或者是谈及对某些现象的看法，到头来常常是以一句“说不清楚”而终了。如果说这其中有回避问题的因素，那么，这种回避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起因于对社会现象的“说不清楚”。

二是当前社会中普遍的现实功利主义倾向。虽然经济工作是社会的中心，但这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却包含了一种将利益原则取代社会道德，而成为人们言行的依据和尺度的倾向。尽管其中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人们为了避免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用利益准则来维系生活的平衡，不能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模糊恐惧的心态。

三是当前社会示范效应的变化和减弱。这些年来，各种英雄模范和典型人物的产生和推出可谓层出不穷，但他们的社会示范作用却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人们对一系列社会要求的整体认识的模糊性，以致人们无法在心灵和行为上对这些典型、模范人物达到认同。

至于当前在人们心态中普遍存在的种种困惑和失落感，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异常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模糊恐惧心态。

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性来自何处？或者说，过去为人们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是非界限和行为规范到如今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呢？从理论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不难发现：

原因之一，社会大文化背景的变化常常引起人们的模糊恐惧。这种大文化背景的变化通常包括社会制度的变化和调整，社会阶级、阶层的重新分组和组合，社会重大方针政策的改革，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引发的知识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变更，等等。它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社会关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变更。这种变化必然在已经习惯和认同以往文化背景的人们中产生强烈的震荡和冲击，特别是当这种变化正在进行，它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经常使人们在反差和对比中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并导致适应上的恐惧。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已经完成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中都曾经或正在出现着，并多少引起过社会的不安定。自不待言，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变化。

原因之二，社会变革时期经常出现的“失落”现象也容易导致人们的模糊恐惧。显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更为复杂，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必然会由于作为其基础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展，而失去其应有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新的社会关系时，在进行人际交往时，在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分辨各种是非曲直时，必然会陷入一种无章可循、无矩可蹈的失落状态，特别是由于社会变化后对原有一整套行为规范的挑战，更使得人们往往会由于失去凭借而感到困惑。这种状况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也反映得比较突出，包括对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例如，究竟应该做小草、普通士兵，还是当大树、将军呢？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竞争，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它必然会给人们带来社会行为取向的模糊认识，并由此导致种种异常行为。

原因之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包括社会要求的复杂性，也非常容易促成人们的模糊恐惧。首先，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现实系统和社会观念的不同步，很可能在价值观念上出现差异。其次，社会的差异，包括各种利益集团、阶层，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和对社会的要求，也容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各种力量的交错和冲突局面。而这些差异，这些相互交错的冲突的力量，往往使置身于社会发展漩涡和回流中的人们失去重心，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因而产生模糊恐惧。应该承认，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也多多少少具有这种特点。由于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经济制度的同时存在，不仅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而且在一地区也产生了不同利益阶层的差别。它们的不同要求常常使人们处于一种难以适从，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以至于形成一种十分模糊的社会认识，并在社会行为中产生不安和异常行为。

上述对模糊恐惧的形式、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的分析，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消除这种社会病态心理，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差异，并由此来克服模糊恐惧。而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也不可简单化，进行有机整合时，至少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社会分化的同时，迅速建立全新的社会规范系统，使人们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言之有理，行之有据。这里，我们不仅需要一般性的要求和普遍性的原则，而且需要有比较详尽、具体的准则和规范。这样，才能真正使这种规范系统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这种社会整合必须具有一定的前趋性。换言之，它必须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是以社会变革中最积极、最富有生命力，也最有价值的部分作为这种有机配合的基点，特别是在由于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分化中，这种社会整合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判断便更有意义。

第三，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决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种形式并举。其中，可以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也可以有文化的、民族的，还可以有科学的、哲学的，不仅应有全国性的，还可以有地方性的。更重要的是，它不应该是简单的同一性，而应该是具体的同一性，是包含差异的整合，是把差异有机统一起来的整合。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差异和整合的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而模糊恐惧正是这类问题之一。因此，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消除人们的模糊恐惧，对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03

“幸好警察不是假的！”——信度偏差

先贤说过：民无信不立。

做人要讲信义，要有信仰；经商要讲信誉、信用；治理国家更要讲取信于民。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做生意不讲信誉，“上帝”们上了一回当就不会再光顾了；治国安邦缺乏信度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中国历来注重诚信。

《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准备推行新法时，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先在秦国都城南门竖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并许诺谁能将木杆移到北门去，便奖给十金。老百姓感到很稀罕，却没人肯去尝试。商鞅又宣布“能徙者，予五十金”。最终，有个人把木杆移到了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那人五十金，以示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然后才正式颁布新法。

汉代范巨卿和张劭是要好的同学，分手时相约两年后到张家相聚。到了相聚那天，张劭请母亲杀鸡煮黍，迎接范巨卿的到来，张母认为这不过是两年前的一句话，怀疑范巨卿能否按时前来，张劭却坚信自己的朋友不会失约。后来，范巨卿果然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赶来，留下了“一诺千金”的佳话。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信度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如果缺乏信度支撑，人们就无法沟通、交往、互助、团结，也就可能出现“狼来了”的相悖行为，群体应有的结构甚至还会解体。由此，社会信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遗憾的是，当今社会现存的心理障碍之一正是“信度偏差”，这种信度的缺失还不主要是信仰缺失，如前章所述的“精神失落”，而主要体现在信心、信任以及信用方面。

全国首届十佳律师遁入空门

当前的信心缺失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社会风气，对腐败行为难以遏制的失望。

荫荫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工人，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反映他所在单位领导的贪污问题，可检举信却一封又一封地落到那位领导手中。实行承包制后，这位领导中标了，他的第一项决定就是将荫荫父亲停职反省。

荫荫气愤地下了决心，要写一部小说，来抨击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收集材料、和上访的人谈话……严重的不正之风，大量的尔虞我诈，使荫荫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失望了。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怎么这么难受，我的血好像已经枯竭，叫我无法忍受。”

终于，他选择了自杀，以逃避这“恶毒、虚伪”的社会，到那“公平快乐”的天堂里去了。

武汉大学一名女学生自杀获救后，人们问她为什么折磨自己。她瞪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大声叫道：“你们年轻时还有种信仰，我们这一代人却什么都不相信。我看尼采，看叔本华，看老庄，看来看去，看懂的只有两个字：‘虚空’。你说，人生到头来不就是个‘馒头庵’。”

湖北郧阳医学院男生杨树国去上厕所，却发现门被死死反锁，门下地面渗出汨汨鲜血，他不顾一切撞开厕所门，只见一男生横躺在血泊之中。这人手中紧握着半片玻璃，左、右手及颈部动脉均被割断。死者胡志勇，是学校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他的死因，直到人们发现他的遗书后才弄清。

胡志勇是一名实习医生，在某医院值夜班，在他值班的病房，有一位肺心病患者连续咯血，恳求他找值班医生救助，他先后三次找值班医生解决，都被怒斥一顿，让他别操闲心。他想替病人处理，却没有处置权，看到病人每天咯血四五次，医生又麻木不仁，只开一些价格昂贵却毫无价值的药品应付患者，他心里十分难受，遂起轻生之念。

胡志勇的父亲胡扬春回忆胡志勇曾打来电话，说：“现在社会风气败坏，医生见死不救，学到的知识没用，理想被玷污。”胡扬春以为儿子在发牢骚，就随便说了一句：“看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挂了电话。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次电话竟成了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通话。

据郧阳医学院领导介绍，胡志勇在校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生命诚可贵，理想价更高”。胡志勇的同寝室同学刘长进告诉笔者，胡在校生活朴素，却常常慷慨解囊帮助同学，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有一天能穿着袈裟走上法庭，为当事人辩护，这是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最

大的愿望之一。因为，对现实失望的他已在北京正式皈依佛教。

王海云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他怀着当作家的梦想报考了吉林大学中文系，但却被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18年的律师生涯，他不知为多少人解了不白之冤。最终，王海云当选为全国首届十佳律师。

王海云是个性格非常豪爽的人，可是，在近几年的工作中，司法腐败现象却使他逐渐沉默，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在漩涡中奋力抗争。

王海云说，他干了18年律师，对司法腐败体会较深，他认为司法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应引起足够重视。对于“司法腐败”问题，他列举了以下几种情况。

一、权力部门利益驱动，使一些司法腐败披上“合理”的外衣。例如，公检法机关盖大楼、搞福利，采取很多措施敛钱，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造成社会的悲哀。

二、司法部门的人事腐败，造成司法队伍素质较低，这是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仍然存在。王海云说，一个案子立案后，往往会出现“立体性”走后门现象，上下左右都想干扰审判。

四、个别律师成为司法腐败的“中间人”，加剧了司法腐败现象。有的律师为了生存，就利用腐败的手段腐蚀拉拢法官。

五、错判、误判是更严重的一种司法腐败。

王海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做一个好律师实在是太难了。近年来，王海云时常有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说现在自己有三忧：一忧我国的司法腐败之风目前还没有彻底刹住；二忧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受阻；三忧依法治国太慢，这与他理想中的法治社会有很大的差距。身心的疲惫，使他逐步产生皈依佛教的想法。经过三位朋友的引荐，王海云在一所寺庙里结识了陕西长安县牛头寺的主持、100岁的释果林（号一了）大师。两人一见如故，王海云拜释果林为师，释果林大师为他举办了正式的皈依仪式，并为他颁发了皈依证书。因王海云原为律师，故赐他法名“法通”。

每当从媒体上看到又揪出一个“张子善、刘青山”，“又破获一起受贿索贿大案”时，老百姓确有大快人心之感。然而，接下来案子一个比一个大，“蛀虫”一个比一个肥，人们原有的兴奋感一次比一次低，以至于麻木不仁！贪官就像孙悟空的头，愈砍愈长。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好稀罕的了，新闻总是如此这般，还有什么新鲜？

学者们终于又发现，症结在于“监督机制不完善”，于是，一时间，天南地北的大小报刊都来大谈如何健全监督机制的问题，提供对策ABC，林林总总……

但是，比起10年、20年前，现在的监督机制应该说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党内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行政部门有各种监察机构；司法部门有检察院；从上到下有审计系统；后来又成立了反贪局、廉政办等；有关惩腐的党纪国法不断出台；举报信箱

就挂在马路边，举报电话随时可以拨通，若举报属实破案之后，另有重奖……党、国家和纳税人在监督的机制上所花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可称为“算术级数的增长”。可惜腐败现象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于某些反腐反贪部门的官员竟也“倒戈”加入腐败者队伍。看来我们得换个思路，研究研究腐败的“生产机制”的问题了！

想当年，“伯乐”之说颇为盛行，似乎只要找到若干“伯乐”，就有了无数“千里马”，“四化”就指日可待了。谁料，有些“伯乐”垂老矣，又因工作繁忙经常看走眼，接连选出了几匹“害群之马”，闹出腐败不断的新闻。

于是，后来又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说，这一抖擞，满地尽是“伯乐”与“千里马”，有些人一旦权在手，就把钱来抓。腐败成了更严重的问题，百姓在无可奈何之中继续听新闻，而监督方直喊“警力”不足。

所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些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然而要是把国家的前途仅仅押在这种“所幸”之上，我们还将不断地产生不幸。

有一句顺口溜曾经相当流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在很少有人提了。足以体现，老百姓对于腐败见怪不怪了。

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甚至在《杂文报》上发表了《不再做反腐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引人深思：

不再做反腐文章，是我不再做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贪污与反贪污》，至今已整整十年。把这十年来我写的有关反贪污、反腐败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约也够编成一本书了。可是有什么用呢？秀才人情纸半张，书生不过空议论。从有关数据看来，贪污腐败的案件连年直线上升，这还是限于已经立案查处的部分。贪腐案件数量呈累进递加之势，花样更与日翻新，法人犯法，集团犯罪，窝案串案，不胜枚举。撇开所谓大案要案不说，磕头碰脑听说的，动辄是天文数字。还有无头公案，如国有资产流失，则只见数字不见人。经济犯罪和政治腐败互为表里，个人性腐败和体制性腐败彼此依存。纪检部门的文书，百令千申，法律道德的宣传，如风过耳。只见扬汤止沸，不闻釜底抽薪。真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后来，谁家是魔，谁家是道，竟也好像分不清楚了。

回头看我的这些文字，卑之无甚高论，十年来喋喋不休者，说的就是一个意思：“不反贪污，共产党没有希望。”就在《论贪污与反贪污》中我说：“全党以至全民面临的挑战，来自形成一定社会政治势力的贪官污吏——一批通过贪赃枉法、侵夺人民财产破坏改革同时也在破坏共产党领导权的大小官僚。”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为，这些贪官污吏之所以能够为贪官污吏，端在于已先

成为各地各部门各级官吏，而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官吏又必然多有党员的身份。这就使他们得以利用党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变为贪污受贿的手段和护身符。他们不仅从经济上掏国库的墙洞，挖国家的墙脚，而且败坏共产党的政治信誉，毁坏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干扰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执行，以至于异化共产党的组织、机制直到性质！从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来，明里暗里违反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两条——最力者，始终就是这些官仓硕鼠式的贪官污吏！

谁在拆共产党的台？谁会颠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反人民反国家？首先是这些贪官污吏，是以他们为骨干结成的腐败势力团伙。面对贪官污吏，为什么民愤甚大？正因为人民群众包括并非贪官污吏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已认识到所谓“亡党亡国”就是亡于贪官污吏也。

以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只是形势更加严峻，腐败更加露骨，“顶风作案”的越来越多，腐败的行动愈发猖狂，这些腐化官员不但依仗手中的权力，甚至勾结黑社会，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基层，贪官污吏及其庇荫的社会渣滓已经占了上风，反贪局贪赃，公检法枉法，一角一角的“江山”已经变成黑色！

此时此地，写一些苍白无力的反腐败文字，无奈成为自我讽刺，并为贪污腐败分子所笑乎？

我敢说，像我写的这类反腐败的文字，在今天的中国没人需要。首先是老百姓，他们有切肤之痛，看得比你深邃，说得比你到位，务虚如尖锐的檄文，务实有缜密的检举，他们干吗看你空空洞洞、吞吞吐吐的东西？他们不需要。那么，官员需要吗？你讲的道理，他们心里早明白，有的他们也说过，而具体的张三李四，谁清谁贪，贪污多少，他们心里自有一本账甚至是明细账。他们按兵不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或是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也，又哪有用得着听你的啰唆？

如果民不需要而官需要，还可以勉强成为“新基调杂文”；官不需要而民也不需要，也就只能在文场所谓“多样化”中聊备一格，装点升平而已，岂不悲乎？

我说我不再做反腐文章了，就是这个缘故。一可节约自己的精力，哪怕什么都不写，好好读读历史，读读现实，力求活得再明白一点；二可节约读者精力，少看些废话空话，把钢用在刀刃上，包括切实反腐败的实际行动。

我不再做反腐的文章，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是主张大家都不做。有责任应做反腐败文章，不但应该做，且要真做而非假做，大做而非小做，常做而非偶做；不是做在书面通知口头，而是做在实处，不做表面文章，官样文章，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也才是中国共产党之幸！

这样的话，也说过不止一次，今后不想再说了。

对于以腐败现象为首的社会不正之风党和国家下了大决心、大力气，包括一批高官受贿案的侦破，预示着更为严厉的行动正在逐渐展开，问题总有真正解决的时候。事实上，邵燕祥老先生的文章也并非完全表明“信心丧失”，只是对表面文章不屑而已。

我给“黑哨”送红包

比“信心缺失”更为明显的是普遍的“信任缺失”。曾经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信仰危机，只存在信任危机。笔者认为此话是有内涵的。一股普遍的不信任的空气正弥漫这个社会，弥漫在我们四周。试看诗人北岛《回答》中的诗句：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我就算第一千零一名。

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信任缺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人们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

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我们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开会的时候，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我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

下午去医院看病，不相信专家门诊，因为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专家的职称，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

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新鲜，跟服务小姐去核准。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

丰乳、减肥、保健品口服液广告，谁也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人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求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我依旧不愿相信那是假的，那孩子可怜的样子，那对夫妇真诚的眼神。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

过马路的时候绿灯亮了，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因为我已经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据媒体报道，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才过马路，结果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轧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

是，它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层出不穷。

据媒体披露我国持大专以上的假文凭的人有几十万。

在一个国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件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我国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水。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消除怀疑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用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就连本该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也深受信任危机的影响。小学生写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很可能他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哎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还有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试卷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答得好好。他们现在谁也不信谁。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个A什么的。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全国埋单。各个领域都在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成灾的现象，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费时间和金钱。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代价、承担责任。

笔者一天在报刊上读到一篇被拐学童的故事，遂讲给女儿听。当讲到该学童发现被拐后，机智地摆脱人贩子，找到警察叔叔请求帮助时，女儿竟紧张地瞪大眼睛，直到得知该学童已被警察叔叔送回家，小女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说：“幸好警察不是假的！”警察也可能是假的？孩子天真的心灵怎么会蒙上这样的阴影？

环顾四周，“假”字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假酒、假烟、假糖、假饮料、假“纯棉”、假“真皮”，到假货币、假公章、假证件、假合同、假文凭……几乎应有尽有。“作假”之祸水甚至蔓延到了神圣的课堂，如各类竞赛中的假分数、事先排练好的假公开课，都使孩子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

孩子们不仅从书本上，更多的是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生活经验的。在一个欺骗盛

行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对所有的陌生人都充满敌意。

孩子与大人不同，他们还不能完全区分“真情”和“假意”，“轻信”和“信任”。他们还很弱小，无力与恶势力抗争。为了自保，他们只好把警惕性提得高高的。问题在于，儿时的经验会影响人的一生。这些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把这种“不信任感”移植到未来的生活中，使其社会交往发生困难。正常的社会交往必须以互信为基础，信任感的丧失会使他们因失去彼此沟通、协调、相互合作的条件而形成自我封闭。一些孩子还可能因此滋生反社会情绪，他们可能会出于自我防御的本能而改变正常的行为方式，发生越轨行为。

不仅仅是孩子对陌生人不信任，不敢回答陌生人的提问，就连成人对陌生人也心存怀疑。据《重庆晚报》2001年7月21日报道，自“中华重庆巾帼志愿者优质服务进万家”活动开展以后，记者在随机调查中发现，无一居民接受志愿者上门服务这一形式，其原因主要是居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几乎为零。如果你一个人提着大件行李走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有人主动提出为你帮忙，你敢把行李交给他吗？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们在谈论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时，曾提出了这样简单而又让人深思的问题：如果大家什么都不相信，凭什么“团结一致搞四化”呢？凭什么来构建和谐社会呢？

1995年8月8日，我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部法规明确提出：要在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

新世纪伊始，治污大限已过的淮河治理究竟成果如何，自然成了亿万群众关注的焦点。但接下来两篇报道，却着实让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001年1月18日，《工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以《治污大限已过，淮河仍未变清》为题，报道了淮河流域不少河流污染仍较严重，治理现状距国务院确定的“2000年实现水体变清”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2000年全淮河流域水质为Ⅴ类、超Ⅴ类的河段仍占62.4%。

正当人们对那些不自觉的企业愤愤不平时，2001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却又以《千里淮河现清流》为题发表了与《工人日报》截然不同的观点。报道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监测数据表明，淮河基本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2000年达标目标……经过沿淮四省的艰苦努力，淮河变清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看罢报道，笔者陷入迷惑与深思，媒体间信息的不对称，造成民众的困惑，到底谁说的对？老百姓该相信谁？

老百姓该相信谁？长期以来，我们相信领导，相信干部，他们代表党、代表组织，是我们群众的贴心人。现在呢？这种信任可说是大相径庭，在一项调查中，要

求对象回答“遇到问题时，首先和谁商量”这一问题。调查结果表明，选项为“上级领导”的人数最少。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单位、企业的员工都称领导为“老板”，自称为“丘二”（帮工），这实在是令人担忧的心理障碍。这种病态的干群关系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

即使在体育界，信件危机也同样严重。

笔者为铁杆球迷，一直对“假球”“黑哨”之类的消息半信半疑。我无法相信，当我们在看台上顶着烈日，满眶热泪，声嘶力竭地为足球运动员们呐喊助威，心系每一个进球，心系每一场比赛胜负时，胜负包括进球数量却在前一天的酒宴上已经“计划”好了！但读了2001年10月17日《足球》报一位王先生写的文章《我给“黑哨”送红包》后，我相信了，我相信我今后再也不会对那些威风凛凛的表情严肃的“黑衣法官”完全相信了！

随着反腐的深入，中国足协对足坛假球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其实，“假球”与“黑哨”是在中国足球的黑幕下同时出生的一对邪恶的双胞胎，打假必须扫黑，扫黑也必须打假。现在中国足协已迈出了打假的第一步，我们在等其迈出打假的第二步。在某甲A俱乐部任职多年的王先生可以说是“黑哨”方面的权威。他曾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与裁判们打过两年的交道，他的现身说法可以帮我们从一个侧面对“黑哨”现象及其丑恶嘴脸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以下为王先生的自述。

当时俱乐部的每个人都没有“收买裁判”方面的经验，在足球圈内也没有可靠的内线关系，所以我只能“硬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接近裁判。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裁判的接待工作均由比赛地的足球协会负责。因为向裁判“行贿”甚至提一些额外的要求，都属于俱乐部极度“隐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绕开地方足协而单独工作。

比赛前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我悄悄来到了地方足协指定的接待裁判的某度假中心。裁判员加上官员一共来了四人，当时还未确定第二天的主裁判到底是谁，但我还是凭着经验确定其中的一名国际裁判一定会是明天比赛的主哨。趁着他用完餐刚从餐厅走出之机，我贸然地向他表明了身份并将事先打听好的价码（吹胜一场，主裁判两万元，边裁一万元，平局则减半的原则）告诉了他。当时他对我的“冒失”略感惊讶，随后环顾四周，只低声地对我说：“大连队很强啊！到时候再看，我住在某某房间。”从酒店出来，我非常忐忑，他的态度让我难以琢磨。也许一切真的要到比赛的时候才能分辨出来。比赛的主裁判果然是他！在大连队如潮的攻势面前，我们队只能极力死守。而我只能在暗暗祷告自己球队的同时，期盼着只有我才明白的那一刻尽早到来。上半场二十多分钟，他吹给我们队一个点球！看台上沸腾了。我身边的球迷在激动地议论：这是我们队今年主场的第一个点球。好

像有了点球，他们心爱的球队就有了保级的希望。可最终的结果还是我们队以1比4惨败。既然失利了，原先的承诺也就失去了兑现的依据。但是为了这一记难得的点球，特别是通过这记点球，让我们看到了“禁果”的甜头，我还是将一套价值不菲的“阿迪”运动服送到了他的房间里。

总结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我对以后工作的步骤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大概是在对上海申花队比赛前，由于地方足协的接待用车发生了故障，所以俱乐部临时抽调一台车帮助足协接送裁判。由于我当时刚到俱乐部工作不久，足协的人员对我并不熟悉，所以我就冒充了驾驶员，这样我就可以全方位地去接触我的“对象”。

为了让裁判们了解我们的诚意，同时遵循必要的“视结果付钱”的圈内原则，我事先给裁判们每个人一个装有两千块钱的红包，价码也向上提高到胜一场，主裁判四万，其他裁判两万，平局减半的条件。可没想到，正是这个红包，却惹来了不必要的猜疑。

比赛前一天的晚上，那个与我已算熟悉的边裁打电话给我，说第四裁判认为其他人拿的红包比他的要厚，虽经过他们之间的解释和协调，但该人坚持说不是其他裁判在红包上做了手脚，就是我在“厚此薄彼”，并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后由于我们队的失利，他们也只能空手而归了。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北方城市。我们队的保级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面对其他赛场近乎疯狂的“假球”“黑哨”，我们每个人当时心里都十分清楚：除了球队的实力，外力已经举足轻重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足球圈已经被完全颠倒了。

接触裁判多了，也算是有了几个熟人。得知他要执法这场比赛，我拎着钱就与球队一同到了赛场。赛前赶到裁判们下榻的酒店，在大堂里见到他，只一个眼神，一切就都“尽在不言中”了。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倒不是说风险有多大，关键是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有驾驭局势的信心。你做“工作”，对手就不做吗？你做“工作”的力度有对方大吗？

谢天谢地！1比1的结果已经让我满意了。对于我们队追平的那个球，我专门问过队里的几个队员，他们都认为这个进球是个好球，不像对手和当地球迷认为的是个越位球。吃过晚饭，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已经在赶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电话里，他除了向我们队祝贺外，还一再强调我方的进球完全在可吹可不吹的范围内……我向他表示，这次没有机会见他，等他以后来我们主场，我再和他好好“聊聊”。

试问，如此的体育赛场，老百姓还敢信任吗？还愿意信任吗？现阶段，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如此严重，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挽救我们的信任已经刻不容缓。

契约精神与汕头市危机

在现在的经济交往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甲方坚持“货到付款”，而乙方则坚持“款到发货”。原因很简单，双方互不信任，如此这般，生意只好告吹。

“信用”与“信任”不同，两者并不是一个概念，信用发生在实际的行为交往中，对后续行为有强化或衰减的作用，如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等，与信誉的树立有直接关系。此外，信用总是指对某一社会实体的信任程度，而信任的外延显得更广泛一些。政府也是社会实体，由此，政府的信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家董辅初指出，现阶段某些地方政府信用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些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一套，明天又是另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

董辅初认为，政府信用问题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引导作用，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建设应当首先从政府做起。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永珍则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提出，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源于信用缺乏，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张永珍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债是信用的低级形式，股则是信用的高级形式，像股权、期权等都是以信用关系为前提的。市场信用的下降，是信息的不透明或信息失真造成的，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中小投资者，而这将直接导致他们投资萎缩。投机、行贿、腐败都是经济没有活力的表现，首要原因是信用问题。老百姓感到信用不足时，便不愿投资或做扭曲投资，要么是投机，要么就是行贿。正因为市场机会太少，盈利空间狭小，投机者才把大量资本注入房地产和股市。亚洲金融危机已证明：一个以投机心态支持的系统，集体信心崩溃之日，就是整个系统崩溃之时。当市场缺乏公平时，市场还不如赌场，赌场尚有游戏规则。社会公信下降，信息不对称性和信息失真，会致使社会安全性下降，导致社会波动幅度加大。

信用缺失，这些在建设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面对这样一个脆弱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了

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幼儿，甚至可能是一个口号。

据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在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据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

据专家估计，欺诈案件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30%。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更让人吃惊，仅2006年，全国就有68.4%的消费者受到了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

经济信用、社会信用、国际信用、政府信用，这些信用都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经济信用丧失，必然导致整体社会信用的下降，进而必然导致国际信用的下降，中国企业在向外争取投资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最普通的信用危机出现在债务纠纷上。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但“贷款不如不还”却在近年来悄然兴起，被多数人引以为“识时务”。大肆逃避银行债务在中国“蔚为壮观”。

曾被誉为“希望的热土”的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大规模的逃税骗税、制假售假以及六合彩泛滥的阴影笼罩。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本地企业人心思迁，由于信用危机，汕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位于汕头所辖的潮阳市谷饶镇的中国桂光集团董事长张桂溪，在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曾声名大噪。然而，他却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7.9亿元。在小小的谷饶镇，这次牵涉到骗税案的就多达14家企业，都是镇领导说的“有头有脸”的大企业。

一旦信用丧失，市场的反击是迅速而残酷的。光潮阳市虚开增值税发票就涉及13个省，被有关领导认为“影响了半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向下属企业发了通知，提出不和汕头、潮阳市做生意。

由于人心思迁，汕头迁走的企业一度多达1200家，某一年就搬迁了450多家。

鉴于信用危机使汕头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困难，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表示，要重建汕头信用。原汕头市委书记李统书则在各种场合强调：信用是资本、信用是效率、信用是生产力。

重建信用，矫正“信用缺失”的社会心理障碍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参照发达国家经验，信用卡乃至“信用局”的设立则能对社会心理起到有益的调节及制衡作用，从而使表现为信用观念的“契约精神”成为涉及日常工作及生活的一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笔者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天上午，我到迈阿密城区购物。在街头等公共汽车回校时，我看见一位金发碧眼、婀娜多姿的姑娘开着一辆白色小轿车，在路边有停车计时器的地方走走停停地抄着，并不时地撕下一张巴

掌大的黄纸条，扯去不干胶条，往停车计时器前停放的车辆前窗上一贴，然后走开。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她在干什么。她笑着告诉我她是稽查员，在检查停车超时情况。

“你怎么知道这车超时了？”我不解地问。

“你看这停车计时器，上端显示红牌的，就是超时了。”

“停车超时了有什么关系？”我对此表示不理解。

稽查小姐笑容可掬地向我解释，这一带是迈阿密有名的黄金海岸线，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游客停车时经常找不到车位。为了大家办事方便，政府在政府机构办公区和大商社前街道路边设有临时停车点，安装有停车投币计时器。计时器上设定的最长停车时间为两小时，超时罚款。有的人图方便，把车停在街边；有的人怕超时罚款，便采用变通的方法，每两小时回来投一次币；但也有不少人因游兴大发或办事拖延了时间，停车计时器自然毫不客气地亮出红牌。“游客和办事时间长的人，应找停车场停车。如果大家都乱停车，就谁也办不成事。”稽查小姐一本正经地说。

“你又没有当面抓到这些人，就把罚款单贴在人家的车窗前，人家不认账，不缴罚款，你也无可奈何。”

“没关系，”稽查小姐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我记了他的车号和罚款金额。第一次他不去缴罚金，我权当风刮跑了罚款单，原谅他；第二次他不缴，我仍当他没有看见，不是故意不缴；第三次他还是不缴，对不起，事不过三，我将把这三次违规不缴罚金的记录寄到信用局（Reputation Bureau），信用局将此行为记录在案，此人的信誉就有污点了，而信用局的电脑记录资料是对社会各界公开的。从此，他要享受分期付款时，商家一查信用局的记录，便会拒绝他；他想找个好工作，用人单位一查记录，便会觉得此人不可信赖；他要找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一查记录，也会断然拒绝。总之，他要想在这个社会过上等人的体面生活就没门了。”

好一个信用局，好一个记录在案！我不得不佩服。有了这种机制，任何有良知、想过体面生活的人都不敢胆大妄为，而必须遵守规矩。

这或许能为我国信用机制的建立提供一些启发。事实上，我国也一直在为此努力着。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法制经济，更是诚信经济。离开了人类的诚实本性，不讲道德信用，市场经济的大厦就宛如建立在失去了坚实基石的沙滩上，任何风吹潮涨，都会使大厦顷刻崩塌。重建国民的诚信，已经迫在眉睫。

04

道德晕眩的“厄尔尼诺”现象——矛盾趋向

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经常提到的词语是“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空白性”，即前述的失落心理（落差情结）；二是“不对称性”，表现为“观念冲突”及“行为两难”等，也称“或者矛盾性”。人们通常所说的“困惑心理”，我们称之为“矛盾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十大方面。

1. 理想意识与实惠主义的冲突。民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往往带有浪漫色彩，他们甚至愿为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奉献生命。在改革的浪潮席卷下，重视实用，强调实惠之风愈刮愈盛，内心深处的理想意识和外显行为的趋利倾向形成了明显的冲突。

2. 发展意识与安全需求的冲突。民众在改革之时不仅强化了生存意识，而且丰富了享受意识，萌发了发展意识，这与民众最基本的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安全需求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要么背水一战，要么平平庸庸，何去何从，实难决断，这苦煞了既求发展又求安全的当代民众。

3. 创造意识与保守主义的冲突。民众的创造性在改革的磨砺下不时显现。创新需要对新事物保持敏感的头脑，改革创造了新现象，改革也触发了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感受能力，提高了认识能力。但顽固的保守、苟安、惜旧、恋旧之情也时常如一股暗流涌出，两者激烈冲突。

4. 民主意识与独断主义的冲突。中国民众在缺乏民主精神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曾一度蒙昧，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时期，民众不仅认清了自我的义务，而且民主意识逐渐强烈。改革深化之时，也就是民主意识深化之时，也就是民主意识与独断主义的冲突解决之时。

5. 竞争意识与平均主义的冲突。民众在改革中懂得竞争既非生物的本能，也非资本主义特产，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民众的竞争意识与自然经济的产物——平均

主义的冲突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6. 参与意识与无为主义的冲突。中国民众被不同程度卷入改革的旋流之中，民众认识到改革和自己是同命运，共存亡，参与管理，参与改革也就是在行使自身民主权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语被赋予新时代的含义。但这种参与意识常常遭到因封建社会“顺应天命”而沉淀的“无为”观念的阻击。

7. 平等意识与特权崇拜的冲突。民众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领悟到平等的珍贵。强烈的平等意识加上隐含的优越欲念，刺激了特权主义的萌芽。用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实现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不得不利用自己所厌恶的东西获得利益，是实实在在的民众心态。

8. 开放意识与闭关自守的冲突。民众在改革中大开眼界，聪明才智进一步发挥，而文化的本性是超国界、超民族的，人们要重新进行自我评价。理智告诫人们开放是大趋势，而闭关自守中滋生的虚荣却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9. 多元意识与大一统思想的冲突。中国民众正在树立起一种多元分析、立体洞察、全方位思想的品质，人们把多种观点、多种做法、多种形式逐渐视为像生物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分那样自然。多与乱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怕乱求稳的心理，使人又萌发怀旧之情。统一的口号使人兴奋，统一的步伐使人胆怯，统一的模式使人清闲，统一的体制使人悦目，等等，大一统的愿望死灰复燃，正像古人面临着多元意识与大一统思想的取舍冲突。

10. 自然意识与攀附欲望的冲突。中国民众自力更生、自我完善、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现实生活中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学却鼓励人们去攀龙附凤，无须自力便可获得成功。

造成这些心理冲突、导致人们产生困惑心理和矛盾趋向的原因则还需要从现实环境中找答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便是理论本身的摇摆性和后倾性所致。

例如，什么是新时代的价值观念？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价值观念？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理论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各种思潮观念仍然纠缠不清，莫衷一是，民众极易产生困惑。理论的摇摆性常常导致这样一种局面：甲可以信手找出一个观念来打倒乙；乙也可以拿出一个观念来打倒甲，而且这两个人用的“武器”都是正统的、能够拿到台面来的。

理论的后倾性主要因为我们缺少那些预示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论。我们的许多新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总结或一种注释，缺乏前瞻性。因此，当新事物出现时，民众往往因为理论的暂时性空白而出现困惑心理乃至矛盾趋向。

矛盾趋向主要表现为观念冲突（特别是道德观念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行为意向的困惑，即“行为两难”，下面分别介绍。

道德观念冲突日益加剧

当今观念冲突首推道德观念冲突，道德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的观念之首。一则故事这样叙述道：一次，各国学者相聚一堂，拟以大象为题当场作文。结果，德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爱情》，俄罗斯人写的是《论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是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伦理纲常》。

道德观念冲突随处可见，甚至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已出现让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矛盾困惑的“道德晕眩”。

尽管道德观念冲突表现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错位：

先进和落后的错位。现在，在许多人眼里，落后并不可耻，先进并不光荣。先进人物难当，先进事不好做，先进话不好说。有些人做了好事自己还要瞒起来，怕被别人冷嘲热讽。20世纪60年代，有谁捡到钱包交还失主，会赢得大家尊敬，今天再有谁这样做，就会被人骂为“傻瓜”。20世纪60年代“活雷锋”是尊称，如今在许多场合成了贬称。如有谁不计报酬做了点有助公益的事，便有人会讽刺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雷锋啊？”言毕是冷笑。“活雷锋”成了呆傻愚笨痴和不会赚钱、不善利己者的代称。恰恰那些锱铢必较、得寸进尺的人，反而被大家视为能干、有本领、有经济头脑。

文明与愚昧的错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随地吐痰，明明是不文明的行为，对其加强监督管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车站、商场、影剧院、街头，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因随地吐痰和乱吸烟而被管理人员教育和罚款的人，现场舆论往往对管理者不利，而对不服从管理者给予同情和支持。开车的违章闯红灯、不系安全带、不按指定地点停车，对其罚款、教育也是理所当然，但现场舆论又总是偏护违章者，而贬称警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些人，对长辈生不奉养，死却厚葬，多少财物，付之一炬，甚至把人民币烧化祭祖，其行为已是愚昧至极，却被许多人视为恪尽孝道……

勤俭与奢侈的错位。勤俭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时下几乎成了“小农经济思想”的代名词。奢侈却被公认为有派头、有气魄。乃至舆论工具也带着几分欣赏宣传起“黄金宴”“贵族学校”，以及大款、大腕的消费方式。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宣传农村大好形势就是谈农民如何相互比富，象征农民富裕的标准就是“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宣传以高消费启动市场、刺激经济发展。而对“勤俭节约是美德”的提法，老百姓差不多已经忘记。由“穷可耻，富光荣”的观念派生出俭朴无能、奢侈风光的信条。所以，有些人即使债台高筑，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与他人比吃、比穿、比用。当官的则比轿车、比住房……

诚实与虚伪的错位。由于客观存在着“鞭打快牛”的社会现象，有些地方官员带头瞒产值、瞒利税，宁可长期戴着“倒挂县”之类的帽子，向上要补贴。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倒挂县”的官员成了“青天”，摘掉“倒挂县”帽子的领导反成了“卖县求荣”者。又由于要“论功行赏”，便有不少人虚报产值，把未生的鸡蛋都算成鸡来匡算农民的收入，把积压在仓库里永远销不出的废品也统计成当年的产值。然后分到了奖金，戴上了官帽。待到发生人事变更，一查，资不抵债，国有企业成了空壳子。假商品、假发票、假文凭、假职称……甚至连灾情也会根据政府需要被随意夸大或缩小。人们在这样作假的时候，已经脸不变色心不慌，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老老实实，一钱不值；撒谎撂屁，年年得奖。”

守法与违法的错位。在经济活动中，有些地方提倡“用足、用活政策”，继而升格为“敢于闯红灯”，“敢于打擦边球”的口号，并作为经验推广。违法逃税是可耻的，而现在许多人反以逃税为荣，以至于法人逃税现象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如挂假“三资”企业的牌子，挂假“残疾人福利企业”的牌子，享受减免税政策。偷漏税者被查处后，说情者不断。竟有不少地方官公开倡导把走私作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甚至还有武装保护走私的。用自家的武装，对付自家的海关，供不法外商长驱直入自家的国门，正应着一句成语“开门揖盗”。如此可耻之举，却被有些人视为壮举，直至被撸掉乌纱还深感委屈，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廉洁与腐败的错位。现在盛行的请客送礼之风，还被公认为是必要的“感情投资”。送礼行贿明明是腐败行为，但大家认为，自己不下口袋便是廉洁；大吃大喝明明是腐败行为，却被说成“只吃不带，政法挂帅”；收受回扣明明是腐败行为，但早已被世人普遍接受。如果回扣公用，还会受到嘉奖。于是，完全廉洁的形象，已经变成呆板、僵化、保守的形象，而许多腐败行为，却成了敢闯、敢冒、敢于开拓的范例。

正义与邪恶的错位。近年来，新闻媒介屡屡报道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强奸、抢劫，而且愈是人多的地方歹徒的胆子愈大，周围的人愈多，被害者愈是孤立无援。见人落水，众多人站在旁边观望，直至落水者溺毙而无人救助。主持正义者引火烧身，结果连被救的对象也撒手不管。世人何以如此麻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成了“傻帽”，而路见不平拔腿而逃者却成了“聪明”，多么荒唐的错位。为此，不少地方相继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旨在呼唤人们正义感的回归。

重才与重财的错位。“君子用财，取之有道”应该还是合理的。但现在已不讲究有道无道，而是唯财是取。对“才”却并不看得多重，脑体倒挂已成旧闻。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不起书，失学现象严重。一个文化断代层正悄悄滋生，有教无类的观念已被视为陈腐。无才不要紧，有财就有一切，有钱就可以买到象征才学的文凭。

我们多年高喊尊重人才，收效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无财力作后盾。

道德的“错位”现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前进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传统道德为代价的。这是真理。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大发展，同时，传统道德也做出了大牺牲。其中，有些牺牲是值得的，应该的，如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士不理财，文不经商”的经济观，等等。但也有些牺牲却是很不应该的，比如荣辱观念的大错位，已经到了危及全民族道德体系生存的程度，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势必带来人们在观念及行为方面的矛盾趋向。分析其原因，有人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所谓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借用了一个地质气象学中的名词术语，来说明市场经济给道德建设带来的种种巨大的冲击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困惑、矛盾的连锁反应。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精神世界本身的范畴，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震荡，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找出其特点和规律。

由道德领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困惑构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及其连锁反应，波及面很广。正如地质气象上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必然存在着一个初始的爆发点和原动力。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双重效应，有人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二律背反”，即市场经济既给道德建设带来积极的效应，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 在增强人的自主意识的同时滋生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员首先必须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能够自觉地发挥主体性作用，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而自主经济必然会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改变计划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关系，这无疑属于道德观念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会使人依附于物，受物的主宰，产生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

2. 在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价值取向的混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由故步自封和保守僵化转向开放与自由，由单一性转向多元化。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们逐步形成了自主观念、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竞争观念、商品观念等一系列崭新的价值观念，打破了思想禁锢，获得了理性判断能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在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存在着性质互不相同的多种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时候某些错误的价值观念甚至泛滥成灾，造成了价值取

向的无序和混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正常运动。

3. 在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害怕冒险、不敢出头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逐步打破了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惰性心理，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为社会成员充分发掘创造潜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使人们不断地用各种创造性的方式拓展新的生活领域。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容易诱发某些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这些人片面强调自我利益和自我奋斗，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只要自由不要纪律，为了一己之私利，堂而皇之地慷集体和国家之慨，甚至不惜采用违法犯罪手段达到谋取钱财的目的。

4. 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淡化了精神价值的追求。市场经济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它要借助利益激励机制来实现。市场经济充分肯定了社会成员谋求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根本改变了安贫乐道、轻视物质利益的旧价值观念，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强调物质利益的同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巨手又容易牵引人们专注于经济效益，容易导致物质利益追求与精神价值追求的不平衡。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威胁着我国精神遗产中优秀的和合理的成分，滋生了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金钱万能等错误的价值观念。

对现阶段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目前国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悲观主义者认为我国现有的道德规范已处于无序和崩溃之边缘，并且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在哭泣”；乐观主义者则过于盲目地强调现阶段道德进步的一面，用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在向上爬坡”。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都不能客观地、正确地估价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

应该看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风尚，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建设就会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样，如果不重视道德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结果必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正确处理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要将两者高度统一起来而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只有努力开拓道德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新途径，才是目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抉择。

白衣天使与黄色书刊

观念特别是道德观念方面的矛盾趋向表现出来，就是人们在行为、意识方面的“两难”。这种矛盾冲突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显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系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强调提高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医护行为方面则产生了明显的两难。道德观念要求医生悬壶济世，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但现实的成本核算、费用提成等，使医护人员陷入角色矛盾中。

助人为乐，本是好事，但现在也要注意别被人讥笑，别被人误会，甚至倒打一耙，脱不了干系。哈尔滨市就曾出现了救人先请写保证的咄咄怪事。

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行驶至公滨路朝鲜族一中附近时，见一老太太坐在马路中央。他见老太太试了几次都没站起来，便把车停在人行道旁，下车跑了过去。

张师傅问：“大娘，你怎么啦？”老太太抬起头痛苦地说：“刚才有个缺德的摩托车司机，从我身前开车过去，吓得我腿就不好使了。”张师傅要上前去扶，突然想起有位老司机讲过，救人的时候最好先找两个证人，免得被“赖”上。他左右看看，只见很远的公交站台有个人，距离太远不太可能作证。他灵机一动，跑回车上拿来纸和笔，对老太说：“大娘，我送你回家，但你得先给我写个‘保证书’，证明不是我把你撞了。”老太太哭着说：“我不会写字，就会写个名。”于是张师傅代老太写了个保证书，让老太签字，老太光写了个姓，就哭着说忘了后面怎么写。张师傅又跑回车上，拿来一张复写纸，让老太按了个手印儿。

忙完了这一切，老太已快冻僵了。张师傅将“保证书”收好，把车开过来，扶她上车，送到街对面居民楼老太家中。

在担负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食粮的出版行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冲突尤为激烈，出版物质量的低下，其实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眼下出版物品质不高问题仍未真正解决。如果把图书质量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出版发行人员包括作者追逐铜臭、道德低下，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也似乎是不公正的。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听听他们的声音，有助于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些，更透彻些。

某出版社编辑H：出版黄色书刊，就是错误的，其弊害我并非不知道。问题是，为什么明知不对还要出版？

出版社改制，实行承包制，社里对总社承包，编辑室对社里承包，各个编辑身上也落实了指标。干与不干不一样了，赚与不赚不一样了。承包对不对？方向无疑是对的。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国家补贴，而且还上交了利润，个人所得也提高了。大家积极性高涨，都在开动脑筋拿好稿子，千方百计缩短出版周期，同时也注意研究市场，研究读者需要了。

问题也接踵而至。经济效益是硬指标，社会效益难衡量。说二者是一致的，但怎么一致？那些社会效益好的书，比如科技著作，绝大多数赔钱，有的一本就赔十几万。不出一点不行，那会砸牌子。可是出了赔本谁给补贴？只能以书养书。靠什么来养？就是抓畅销书。什么书畅销？就是那些迎合普通读者口味的书。普通读者

是什么口味？言情、隐秘，还有其他如生活类的。社会效益还怎么保证？如此，自然是出些格调不高却能赚钱的书。

现在做出版，难啊！什么都涨价，纸价猛涨，印刷费猛涨，油墨价猛涨，订数又大幅度萎缩。不信你去瞧瞧，我们书库里，几十万码洋的书卖不出去，就那么堆着！我们能不着急？死抱操守吗？那吃什么，喝什么？又不情愿堕落。唉，左右为难！

某发行公司经理Q：有人说，你们就不能只发好书，不发坏书？这话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什么叫坏书，本身就是个模糊的概念。马列主义著作好，研究太阳黑子的书好，研究微循环的书好，问题是，发得动吗？发不动，赚不了钱，我们喝西北风？当然是发老百姓喜欢的书。

某省专业作家H：现在当作家难，当一个正派的、严肃的作家，尤其难。

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命运，很可悲。有人危言耸听：“严肃小说是一种过时的艺术，是濒临绝迹的品种。”这种说法有赖于时间的验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商品大潮的冲击，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中国严肃文学熙熙攘攘的局面。

我自己内心很矛盾。我很希望写几部严肃的、对社会有深沉思考、对人民有深刻启迪的作品。但客观情况是，这样的书出不了，出了卖不动，卖了也没有什么人看。写书是给人看的，没人看，写它作甚！想给广大的人群看，就不能不研究市场，从市场看读者的需求。但一看市场，便困惑、烦恼。

作家在分化。一部分作家仍然执着于自己文学理想的追求，安于贫寒的爬格子生涯；另一部分作家随着“企业文化”的兴起，改弦易辙，与企业家相互依存；还有一部分，干脆去适应“地摊文学”，不惜违心地写通俗小说，甚至是黄色小说。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不识时务地要出一部中篇小说集，全是严肃的作品。这有点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劲头。果然，我到处碰壁。把书稿拿给出版社，编辑摇摇头，说卖不出去。好说歹说，终于有一家同意出版，但排好版，征订的数字只有600册，远远不及人家规定的、开机的低印数。

不得已，我托一个个体书商代办邮购。人家索要内容简介，我卖力地三易其稿，人家都说不可取。熟人提醒我：“那个渠道发行的书，都是那样的……”言外之意很明白了。于是，我比写小说更费精力地写了一个简介：“……她会弃夫逃走吗？……是否有第三者介入？……”好了，不提它了，提起来脸红。在这份广告里，我着意渲染的并非我器重的文学品格，卖弄的恰在此时是地摊文学吸引读者的功夫。即使这样，仍然没能吸引来多少订户。

从这件小事，可以想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却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作品，却恰恰在社会上流行。

骇人听闻的“黑色逻辑”

“矛盾趋向”目前最为明显，最为直接，也最为普遍的表现就是关于“老实人”的困惑。什么是“老实人”？什么是“不老实人”？这些看来似乎简单的问题今天回答也成了难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困惑。下面的阐述仅供参考：

何谓老实人？就是靠劳动吃饭、靠本事挣钱，以自己向社会的奉献显示自身真实价值的人。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做的是老实事，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言必行，行必果，不偷奸，不要滑，不讨好卖乖，不趋炎附势，不占公家和他人便宜。老实人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手里就怎么做，决不口是心非，不搞两面三刀，不会见风使舵，不要阴谋诡计，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不文过饰非，不嫁祸于人，自己树上种的哪怕是酸果子、苦果子，也默默地独自吃掉。

不老实人则不一样。不老实人总是要手段，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他们做事凭小聪明，爱走捷径，鄙视苦干实干，从不艰苦奋斗，轱辘轱辘转动眼睛，削尖脑壳，见缝插针地钻空子。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只是利用对方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已，从无真情实感可言。用上你了揽在怀里，用不上了推向崖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你在台上，他阿谀奉承，鞍前马后为你效劳；一旦你下台了，他翻脸不人，视同路人，甚至落井下石。当面好话说尽，背后坏事做绝。他们待人如此，处事也这般。原则是见利就上，见害就躲，唯利是图，无本取利。他们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不是靠诚实劳动，不是凭真才实学，不是建功立业，靠的是投机钻营，钻制度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钻政策的空子，钻人际关系的空子，钻一切可以利用的、于他有利可图的空子。

社会的伦理道德从来都是提倡人要老实话，做老实人。但社会的现实又往往提醒人们：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总是免不了吃亏。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这更是一个敏感然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社会活动的秩序包括“游戏规则”。

上海曾发生过一起杀人留名的恶性案件。这个杀人敢留名的罪犯是15岁的中学生方武军。

那天，方武军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外出，不慎将一位老太太撞倒。他连忙拦了一辆黄鱼车，将老太太送到了医院，挂号、验伤。又通知远在郊区工作的父母来沪，嘱咐父母多买些鸡蛋给老太太补养身子，并且每天都去医院看望老太太……

方武军肇事后的一连串表现，使周围的人们赞叹不已——

交通民警说：“这中学生真不错！”

医生说：“我开始还以为他是老太太的儿子呢！”

老太太的老伴也感动得想认他为过房儿子。

一切多么美好!

然而——

半个月后，张老太的老伴遭人杀害，仇杀！还是谋财害命？现场勘察表明，室内没有被撬窃的痕迹，也没有遗失什么。最终，破案人员在方桌上发现酒杯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杀人者我方武军。

方武军？就是那个将张老太急送医院、受到人们称赞的方武军？是的。

为什么？前后两个方武军为什么判若两人？

这里固然有各种原因，包括中学生自身的偏激。然而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张老太和老伴本来也通情达理，但在周围亲戚的鼓动下，竟接受了“趁机敲一笔，不敲白不敲”的意见，在调解时突然提出赔偿医药费、营养费800元的不合理要求。方家父母愿意赔偿400元作为营养费，医药费可以请张家单位公款报销。交警大队也同意这个方案。可张家坚持不让步，甚至扬言，如果调解不成，就要对簿公堂。结果，弄得方武军又是怕，又是悔，又是怒，又是恼。他怕被判刑，他恨张家不通情达理，趁机敲诈要挟……他在恼怒之中，萌生了一种荒唐的报复欲望。他杀了人，蓦然想起要留下姓名才是光明磊落。于是，他就匆匆写上一张纸条，写道：“杀人者我方武军。”

杀人者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

方武军所在的全班同学，就方武军杀人一案进行了一次讨论。老师希望大家吸取方武军的教训，增强法制观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却在讨论会上如此这般地分析：“怪只怪方武军太老实、太傻。现在的社会，老实人是要吃亏的。方武军肇事后，他至少有三次逃跑的机会。喏，第一次，他将老太太送到医院；第二次，趁挂号之机，也完全可以溜之大吉的，可他又自找麻烦；第三次，医生在检查时，他完全已尽到了责任，但他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验伤结果，还……唉，你看他是不是太老实，太傻？结果怎样？好心不得好报，麻烦不是自己找到了头上？老实人不是最终又吃了亏吗？……”

全班40几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都反映了这样的现象：救人者反倒被诬。梁平县回龙镇三角村村民陈容碧不计得失，千辛万苦地将一同上山砍柴受伤的伙伴背回来。伤者后来反诬是因为她碰落石头才砸伤了脚，并向她索要赔偿。县法院法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决她赔偿全部医药费，判决的理由是根据一个骇人听闻的“黑色逻辑”：不是你砸伤的，你怎么会救人？难怪上文中那位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在救人前要对方先写保证书。

河南安阳市一起经法院判决的行贿买官案曾引起当地群众普遍关注。原安阳市

滑县优秀后备干部、城关镇党委书记郑佩尧因行贿6.3万元买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县级）官位一事败露，被法院判刑3年，缓刑5年。

郑佩尧22岁时被任命为滑县老店团委副书记，不久即担任副乡长，后被任命为滑县慈周寨乡党委书记。此间，曾被评为安阳市十佳青年，被组织部门定为县级后备干部，曾被评为优秀后备干部。

调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后，据了解，他的“工作成绩在同等地区中还是比较突出”。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一些与他经历相似，工作成绩与能力相比较差者迈上了副县级的坎，对郑佩尧刺激很大。”正如郑佩尧自己所言：“组织上对我长期备而不用，对我的思想造成很大压力。”

恰在此时，王新康来到滑县任县委书记。为了寻找政治靠山，郑佩尧千方百计讨好这位新书记。郑动用公款，多次向王新康行贿，仅王新康生病住院，郑就“孝敬”了一万元。

由此，郑佩尧被任命为中共安阳市铁西区常委、组织部部长，郑佩尧买个“副县级”先后动用公款6.3万元。在郑佩尧看来，老老实实做官，还不如花钱“疏通”升得快。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现今社会，竟无人敢继续老实下去了。

老实人不再吃香，周宝生是某单位出了名的老实人，当了十几年的先进典型。但是，现任领导认为，老周老实本分，是全厂上下一致公认的，但由老实带来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以及缺乏竞争意识，则是致命的弱点，已经起不到先进典型的表率 and 示范作用了。

小吴为某名牌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之内，他一连洽谈了五六家单位，却都被拒之门外，结论竟惊人地相似：书生一个，太老实……

一位招聘人才的厂长直言不讳：“搞商品经济，不怕‘狂’人，就怕老实人。谨小慎微、四平八稳的人难以适应时代潮流。”一位民营企业老板更是毫不掩饰地说：“老实人只配做仓库保管员。”

大家明白，不忍心在老酒、酱油里兑水，不敢进假酒假烟，不敢偷税漏税，那怎么和别的假店竞争。诚如一位店老板说，如今到处是店，如果不在假货、发票之类上做点手脚，靠正儿八经地做生意能赚到钱吗？

曾经有一位初中生投稿《新民晚报》，诉说他的心里话。他的爸爸是个老实人，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建材店。他做的是老实生意，他一向看不起那些靠投机倒把而暴发的“奸商”。但这样的一个老实人，却被一个曾经他十分信任的生意上的伙伴骗走了几万元钱，还蒙受了不白之冤。幸好法律是公平的，为他解脱了冤屈，可是那个骗子却依然逍遥法外。

自从这件事后，他整个人变了，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了。他甚至打算以次充好，把劣等货色充好货卖给顾客。大家纷纷批评他，可他却若无其事地说：“现在这社会老实人吃亏，只许别人骗我，难道不许我骗别人……”

10年前，笔者见到不少人愤愤不平地将下面一句格言塞进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需要老实人。

老实人不是呆板，更不是思想僵化的人。老实人是指那些思想活跃、能力强、勤勤恳恳，而又不谋取私利的人。他们是人民的牛，是公仆。老实人吃亏，是指老实人做好事而又得不到好报，甚至连起码应该得到的尊重都没得到。譬如，不干事的人得到升级加工资，做了许多事的老实人反而未加薪。聪明人治服老实人是有办法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知道老实人不会起来反抗。即或有一个老实人因觉得太不公平嘟哝几句，聪明人就会用“你是孺子牛嘛，何必计较”，甚至不惜滥用“高风格”“高姿态”一类的反讽之词来堵住嘟哝的嘴巴。

老实人自然不会因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而怠工。因为他的确是老实人。

但这样隐藏着危险。

——老实人老是吃亏，就有可能变得不老实。

——倘不老实的人得好报形成了今日之社会风气，习以为常，老实人继续吃亏无终日，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了……

10年后，笔者又见到许多人往玻璃板下塞下面这样的“守则”。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
东混西混，一帆风顺。
任劳任怨，永难如愿；
会捧会献，杰出贡献。
负责尽责，必遭指难；
推托栽赃，宏图大展；
全力以赴，升迁耽误；
会赞会溜，考绩特优。
频频建功，打入冷宫；
互踢皮球，前途加油。
奉公守法，做牛做马；
逢迎拍马，升官发达。

05

“干吗不扔第二只靴子！”——完形趋向

爱听相声的读者大概都还记得《脱靴》这段妙趣横生的单口相声。该段相声的情节很简单：一位楼上的住户夜半回家后总是脱下靴子重重地扔在地板上，发出轰然两声巨响，另一位楼下的住户屡屡从梦中惊醒，对此举深恶痛绝。但是，有一天楼上那位住户酒醉回家后只扔了一只靴就睡着了，楼下那位照例被一声巨响惊醒，就眼巴巴地等着另一声巨响，以便重返梦乡。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弄得他辗转难眠，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竟然上楼责问为什么不把第二只靴子扔下来！说到这里，听众都会发出会心的大笑。

其实这个故事看似荒谬，却有其心理成因。楼下住户深知楼上住户的“德行”，在备受惊扰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种完形心理，即扔靴之声必有两响。一旦听不到那第二声“巨响”，楼下住户就觉得事情还“没完”，应激状态也就无法了结，难怪他会憋得火冒三丈，上楼问罪。实际上，这种完形心理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是经常出现的。

完形心理又称心理的“完形趋向”，指人脑神经系统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功能。据提出该理论的格式塔学派心病学家解释道：“只要已具备了主要的条件，心理的组织作用总是力图趋于完善。”举例来说，当十几个点排列成圆形的时候，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圆，而不是十几个点。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总带有“完善”的倾向模型。比如举世闻名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不知激发起多少人的惋惜之心。许多人绞尽脑汁，想象维纳斯原先两臂的优美姿势，甚至还有不少人制作了各种姿势的“玉臂”，试图让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完美无缺。这种心理上或行动上的“接臂”举动，正是完形心理的自然流露。再比如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对千百万“红楼梦迷”来说也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诱惑”，他们各自想象完整的《红楼梦》。仅见于文字的，就有数十种的“续梦”“后梦”和“补梦”，

其中让宝、黛当场大团圆者有之；让钗、黛合而为一者有之，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然而无论何种结尾法，都反映出广大读者对不朽名作《红楼梦》所持的完形心理。

完形心理在人们生活中往往表现为“完成欲”“至善欲”。如果这种心理缺乏变通，则容易形成心理障碍。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完美无缺”的人或其他事物。对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事物的看法也应该是“凡事总是有缺憾的”。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曾经说过：“凡是尽善尽美的规划，就是工作衰退的征兆。”“没有糊涂，就没有创新。”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研究表明，强迫自己追求完美无缺往往导致能力下降、情绪失常，甚至健康受损。

“至善论”者的特点是不能容忍“一般”“尚好”这样的字眼，这个愿望固然不错，但若想事事达于完美，不啻给自己设下陷阱。由此，美国管理专家大卫·伯恩斯有句名言：“目标是成功，而不是完美至极。”

与其他种族相比，中国人的“面面俱到”尤甚。现实生活中的“十景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我见过“十菜一汤”，而没有“九菜一汤”；我们评选出来的“十大新闻”也永远不会是“九大新闻”；评选出来的“十大优秀青年”也是如此。这种完形趋向在普遍的社会生活中，往往伴随着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

韦思博士的“完全公正论”

我们将再一次涉及“公平”“公正”之类的话题。在这里，笔者将引用美国心理卫生专家韦思博士在《你的误区》书中的精彩分析。当然，他的分析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确有启发意义，值得一读：

我们都习惯于在生活中寻求公道和正义，一旦感到失去了公正就会愤怒、忧虑或者失望。然而，寻求公道同寻求长生不老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知更鸟吃虫子，对于虫子来说是不公正的；蜘蛛吃苍蝇，对于苍蝇来说也是不公正的；美洲狮吃小狼，小狼吃獾，獾吃老鼠，老鼠吃蟑螂，蟑螂……只要环顾一下大自然，就不难看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公道可言。实际上，完全公道的概念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处在不公道理之中。你可以高兴，或者不高兴，然而这与你周围的不公道现象依然毫无关联。

我们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犬儒哲学，而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完全公道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概念，在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中，尤其如此。然而，许多人认为正义感在人际关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常常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不这样做，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做”或者“我会这样对待你吗”。人们渴望公道，在没有公道时就会不愉快。寻求公道并不是什么误区行为，但是如果你一味追求正义和公

道，未能如愿便消极处世，这种自我挫败行为并不是指寻求公道行为本身，而是指由于不公道的现实存在而产生的惰性。

我们的社会宣称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政治家们在每一篇竞选讲话中都说：“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贫困、战争、瘟疫、犯罪、卖淫、吸毒和谋杀等各种社会弊病一代代地延续着。事实上，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些现象从未消失过。

不公道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然而你可以努力不使自己因此而陷入惰性，也可以用智慧进行积极的斗争。首先争取从精神上不为这种现象所压垮，然后努力在现实中消除这些现象。

渴望公正的心理可能会体现在你与他人的关系中，妨碍你与他人的积极交往。“这太不公平！”——这是一种比较常见但又十分消极的抱怨。当你感到某件事不太公平时，必然会把自己同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进行比较，你可能会想：“既然他们能做，我也能做。”“你比我得到的多，这就不公平。”“我没有那样做，你为什么可以那样做？”不难看出，你是根据别人的行为确定自己的得失。支配你情感的，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如果你未能做别人所做的事情，并因此而烦恼，你就是在让别人摆布你。每当你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时，你就是在玩“不公平”的游戏，这样你采取的就是着眼于他人的外界控制型思维方法。

要求公正是一种注重外界环境的表现，也是一种避而掌管自己生活的办法。你可确定自己的切实目标，着手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具体步骤，不必顾忌不公平的现象，也无需考虑其他人的行为和思想。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总是有所不同。别人的境遇如果比你好，那你无论怎样抱怨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境遇。你应该避免总是提及别人，不要总是拿望远镜瞄着别人。有些人工作不多，报酬却很高；有些人能力不如你强，却因受宠而得到晋升；不管你怎样不愿意，你的家人依然会以不同于你的方式行事。然而，只要你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不去同别人比来比去，你就不会因周围的不平等现象而烦恼。各种误区性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将别人的行为看得更为重要。如果你总是说：“他能做，我也可以做”，那你就是在根据别人的标准生活，你永远不可能开创自己的生活。

在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渴求平等”行为。你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现许多这种行为的缩影。下面是一些较为常见的例子。

- 抱怨别人的工作和你一样，但工资却拿得比你多。
- 认为那些著名歌星收入之高实在不公平，并因此感到恼火。
- 认为别人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总是逍遥法外，而你却一次也溜不掉，因此感

到十分不平。无论司机超速行车还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都要求做出公正处理。

——总是说：“我会这样对待你吗？”其实就是希望别人都同你一模一样。

——总要报答别人的友善行为，你要是请我吃饭，我也应该回请你，或者至少送你一瓶酒。人们常常认为这样做才是懂礼貌、有教养。然而，这实际上仅仅是保持公平对等的一种做法。

——有爱人对你表示亲热之后，总要回吻，要不就是说“我也爱你”，而不会自己选择表达感情的时间、方式和场所。这说明在你看来，接受了别人的亲吻或“我爱你”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就是不公平的。

——即使自己不愿意，也会出于义务去做爱，因为没有一点合作精神太不近情理。这样，你就不是根据自己在具体情况下的意愿，而是根据公平对等的原则而生活。

——对任何事情都要求前后一致，始终如一。

爱默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味愚蠢地要求始终如一，是心胸狭隘者的癖病之一。倘若你坚持始终如一地以“正确”方式做事，就很可能属于心胸狭隘的一类人。

坐车的不开车的

在如今进入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完形趋向”不仅表现对“完全公正”的追求，也表现在我国民众对事对人期望的诸多方面。

奥地利作家梅依克写过一篇童话：癞蛤蟆问蜈蚣，当你向前伸出第一条腿时，你还有哪几条腿同时伸出，当你弯下第14和第19条腿的时候，你那第17条腿的腿掌在做什么。在癞蛤蟆提出这类问题之前，蜈蚣的40条腿相互配合得很好，听了这样的提问后，蜈蚣认真思索起来，结果再也无法走动了。

我国有句名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句名言也可作“面面俱到”的注解。但实际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人们的计划、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顾虑太多，则一事无成，就很可能像那条蜈蚣，一动也不能动。如果我们动辄考虑“万一”，那么，我们就无法在大街行走，因为“万一”车祸殃及自身怎么办？我们甚至也不敢待在家里，因为任何人也不敢肯定不会出事，“万一”房屋垮塌了怎么办？我们当然也不敢坐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了，这些“万一”的机会更大得多！话虽然夸张，但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完形趋向”并不是虚拟的，它也表现在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对人物及事物的“完形趋向”。比如，人们对政府，对改革的期望过于“完形”，如果政府的管理、改革的进程出了一点问题，人们便攻击一点不顾其余，把事情看成漆黑一团。这种社会心理障碍就是与期望值过于完形有关。

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对政府容易产生一种“坐车”心理，他们只想让车开得再

快一点，稳一点，至于车本身能不能承受，一般人是考虑不多的。所以，即使车子开到了目的地，司机也难免挨乘客的骂。比如，政府严格管控了枪支，中国警察基本不用荷枪实弹，请问在哪个西方“文明”国家做得到？但一旦出现了某些个别状况，就会招来老百姓的一大堆埋怨。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是对立统一的，在许多情况下，主观上意识到的东西与客观存在可能有很大偏差。这就需要多换几个视角看看，多加分析。

“完形趋向”也与人们的角色期望有关。例如，有人认为教师既然“为人师表”，就不应该闹待遇、提要求，不应该烫时髦的发型，不应该离婚，不应该争论，就不应该还手，就不应该……如果是先进人物、劳模什么的，这种趋向则更为突出。

一位劳动模范10年干了20多年的活，可他每月的奖金和工资报酬并不比其他人多。他付出了几倍于他人的劳动却无相应的物质报酬回报。他有了许多荣誉称号。一位曾获全国“合理化建议先进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纺织厂基层干部，他的一项建议使本厂一年节省30多万元资金，若将这项工艺在全市同行业推广，一年可节约近300万元，若在全国推广，效益可想而知。然而，这位同志却分文奖励未得。不是说他们应该在这些事上锱铢必计，相反，当报社记者的提问涉及此事时，他们都说，这是应该干的。但是，这件事的影响远比表现上表面出来的要深刻、复杂得多。

在“劳模”“先进”身上该不该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从理念上讲，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们“享受”这一原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他们身上罩上了这么一道荣誉的光环，似乎他们因此与奖励无缘了。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人产生了错觉，好像劳动模范和生产先进是多劳多得甚至“发财”致富的天敌。那么，国家所号召的“劳动致富”又面向何人？是什么因素作怪，使工矿企业中勤勉劳作的同志不能“名利”双收？是什么意识阻碍着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在他身上兑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

这确定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令人忧虑的是这又是一个多年的老话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观念不摆正，于我们所从事的伟大而宏伟的事业贻害甚重。

下面则是媒体披露的一位女劳模的奇特婚姻经历：

我原本是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农家女，一年夏天，我进了市里的一家大型纺织厂，被分配到织布车间当挡车工。入厂半年后，厂团委在新入厂的青工中组织了一场技术比武赛，我获得了全能第二名。参加表彰会那天，胸戴大红花的我站在领奖台上，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别样的念头：站在台上受人瞩目的感觉真好，我要好好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存在。从此，每天交班后，我仍留在车间，不是跟下一班

组的师傅学技术，就是躲在角落里练接头等基本功。不久，我被选为车间团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团干部，后来，我又被评为工厂劳动模范。

工厂接到一批出口任务，为此，全厂开展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厂团委书记胡某叮嘱我给全厂青工做榜样。可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有三台织机突然同时出现故障。机修组组长让机修工温某应急替我维修。以后，温某总是围着我的机台转，一有故障，他就抢着帮我修好。我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出口任务，受到了工厂的嘉奖。年末，我又被团市委评为“青年标兵”。

我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对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正巧，厂团委在全厂青工中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胡书记指名要我帮助温某，对于上级的任务，我自然不敢怠慢。不久，胡书记对温某的“浪子回头”大为赞赏，认为是她的“一帮一，一对红”工程结出的硕果。于是，她派人来车间整理我和温某的典型材料，在全厂总结大会上作了介绍和表彰。一时间，我和温某成了全厂的新闻人物。我对温某说，我的任务已经完了，以后你不要老跟着我了，我们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吧。温某却说：“你是红花，我是绿叶，没有绿叶衬，哪有红花红。你功成名就了，想甩下我，天下好事哪能全让你一个人占了？”

我突然感到恐惧，便有意躲避温某。不想，他却向胡书记“汇报思想”，绕弯子告了我的状。胡书记打电话把我叫到团委，让我对温某一帮到底，直至他彻底改变。不久，我病倒了，胡书记带一些团干部来宿舍看我，还把温某也带来了，嘱咐他照顾好我。我不敢拒绝，因为这是团组织的安排啊。

病好后，胡书记把我领到一家饭店，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她说：“经我多方努力，终于让厂里答应在市区给你解决两室一厅的一套住房，条件是你必须和温某结婚，因为他是一个典型，一个浪子回头的典型，但他没有你的帮助，是树立不长久的，这就要求你果断地决定，来完成这一使命。再说，温某对你还是蛮有意思的嘛。至于你，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这样，25岁的我和28岁的温某举行了婚礼。结婚的录像也是胡书记一手安排的，她把录像带做了备份，说是作为资料保存。

婚后最初的一段日子，温某对我比较温情友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某散漫、自私、霸道的本性一天天显露出来。不久，胡主席找到我（她已经提升为全厂工会主席），让我回去做好丈夫的思想工作。不想，温某把眼一瞪，冲我嚷道：“我娶你这个劳模本来是想沾你的光，结果你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怪我让你背黑锅。再说，没有我这个典型，你怎能红得发紫？我是你们当劳模、当官的梯子你知不知道？现在你不领我的情，还敢说我的不是？”温某借着酒劲，挥拳冲我打来，打得我鼻青脸肿。

从那以后，温某隔三岔五就对我动武。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结束这场婚姻。在当时，夫妻离婚必须要双方单位出具介绍信。厂女工调解委员会主任章大姐一听

说我要离婚，吃了一惊，继而便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她说：“你是劳模，是青年人的表率，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那将会给你的前途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章大姐又将我要离婚的事向她的上司胡主席作了汇报。胡主席找到我，将我批评了一顿。此后，我几次提出离婚，都被胡主席和章大姐“火”一样的热情燃烧殆尽。

年末，工厂照例要评选两年一届的劳动模范。车间评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我为本届“劳模”。我赶紧声明我不当“劳模”了，我红着眼睛向大家讲述了我的遭遇，我的苦恼以及我婚姻的不幸。

我已想好，不当劳模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温某离婚，彻底摆脱这桩无爱的婚姻。然而，我又一次想错了，工厂在讨论各车间“劳模”人选时，胡主席发现了没有我的名字，便气恼地找到我车间的领导。当听说是我主动让出“劳模”时，她更加恼怒了：“鞠××(我本人)是连续四届的‘劳模’，是组织培养多年的骨干，她怎么能个人意气用事呢？拿回去，重选！”结果，我还是戴上了“劳模”的桂冠。

不久，因为温的关系，我和女儿遭遇了一场车祸。女儿惨死，我受了伤。我伤好回到工厂办理和温某离婚的有关手续，才知道由于企业效益下滑，胡主席已经调到别的单位去了，章大姐也提前退休回家了。组织上告诉我，工厂的女工调解委员会已经解散，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和温某离婚。没想到，温某竟然在车间出了事故，他被掉落的机轴砸中了头部，成了植物人，由此我们无从再谈去法院离婚的事。温某没有父母，唯一的一个姐姐由于对他的积怨太深也不肯沾边，我仍是他的法定妻子，只好回去伺候他。

我尽心伺候温某，因为我想让他快点康复。他如果真的康复了，那么我也许就有希望了。

“定形趋向”也涉及对人才的评价。人们对人才的评价却存在误区。在这个完型中，不能没有文凭，如硕士、博士，也不能没有职称，如教授、高级工程师；还不能没有著述、课题，等等。至于能力、性格、气质等方面，人们的要求也是近乎苛刻，似乎人才必须是顶尖的人才，人才便是全才。在企业、单位的人才招聘会上，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这种误区，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心理障碍。笔者曾经询问多家公司老总，“明智的管理者应该在身边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这句话对不对？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对！”似乎我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句话是错误的，优秀人才不一定适用，我们需要的是适用的人才。

日本松下公司对某一岗位的人员选择，或对某一项产品开发人才的选择，都是取中等的，可以打70分的人才。为什么不选顶尖人才呢？松下公司认为，有些顶尖人才比较自负，他们容易抱怨环境影响自己的发挥，抱怨职务、待遇与自己的才能

不相称。有这种心态的人，一般说来会缺乏责任心和工作热忱，干起工作来未必会出色，他有才能，但心理因素影响了其充分发挥。而聘用能力仅为70%的人才，他们没有一流人才的傲气，不自视甚高，也容易满足，甚至有一股子偏要与“一流”人才较较劲、比一比谁干得好的劲头。他们重视公司给予的职位，会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漂亮一些。这正如一辆100马力的汽车却能正常全速开动的道理一样。松下公司认为：“公司能雇用到70分的中等人才，说不定反而是公司的福气，何必非找100分的人才不可呢？”

现代人才学甚至提出“拥抱缺憾”的主张。美国管理专家波特夫人曾请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对其手下员工进行考察并将他们分为四种：①热情的人；②爱吹毛求疵的人；③直来直去，领导叫怎么干便怎么干的线性思维人；④看问题全面，能迅速抓住问题的要害，决定自我行为的系统思维。她据此综合而对人事做了重新安排：①线性思维而又热情者，让其做技术培训教师，其好为人师亦善于表达；②线性思维而又挑毛病者，喜欢多管闲事，让其当警察；③系统思维又热情者，让其当领导、顾问，他定能高瞻远瞩又埋头苦干；④系统思维而又爱挑毛病者，请他当工头，他定能全面了解下属并严加管理。显然，此举有益于各得其所、各尽所长，这可谓“巧用人知”之典型范例。

一位士兵的奇特遭遇

某日上午，驻闽雷达某团政治处蒋主任接到了军部的电话，说是该团一林姓战士，在上海公共汽车上与地方群众为坐一个位子发生了争吵，最后还动了手，致使一名青年受伤，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现在已被地方派出所扣留，请团里速派一位领导去把人领回。同时，弄清情况，妥善解决，消除影响。

事关军民关系，团长、政委高度重视，听完蒋主任的汇报，便商量决定由蒋主任去上海一趟。

简直就像第二宇宙速度似的，在团里接到军部的电话的同一时刻，消息已经传到了这个战士所在单位——高山八连。

“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是搞错了人！”

“我敢和你打赌，要真是他，我就……”

不信，从新兵到老兵，从战士到干部，谁都不信，因为全连的干部战士对他太熟悉了，太了解了。喏，这就是他——

白白的脸上除了微笑，还是微笑。说起话来，就像姑娘似的细声细气。连里的老兵可以作证，他入伍五年来，从来也没有和哪位战友红过脸，连里只要评比“文明礼貌先进个人”，总是少不了他。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三天前，这位战士确实启程经上海回江苏江阴探亲去

了。于是，大家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准是他忍无可忍了。

五天后，这位战士跟着蒋主任回来了。

早从连队赶来的八连指导员，根据团里的意思，把这位林姓战士叫到团招待所自己住的房间，请他详细谈谈事情的经过。

小林所在的八连在福建境内离永安还有300多公里的一个高山顶上，小林离开连队的那天，是搭乘团里到永安火车站去拉被装的卡车。车上连顶篷都没有，呼啸的寒风刮在身上本来就够受的，而车又上坡下坡颠个不停，仅穿了两件毛衣的小林，只好缩在车角落里。他又冷又难受，终于忍不住了，伸直脖子猛吐起来。

车子开到永安供站招待所，已是晚上11点多了，小林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快站不起来了。他实在太累了，倒在床上和衣睡了一宿。

他醒过来后，他一看时间还赶得上当夜的火车，便不顾疲劳，买了一张永安至无锡的联票，爬上了北去的列车。

正值春节前夕，火车上拥挤不堪。小林一上车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了烧开水的锅炉旁，而且被卡在了那里，动也不能动。他就这样站了一整天，连饭也没能吃上。

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小林越来越觉得不对劲，额头很烫，身上直冒冷汗。心里闷得透不过气。过了没多久，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到第二早晨快下车时，要不是旁边的人把他叫醒，恐怕他还要睡下去。

到了上海，困顿不堪的小林惦记着给几年不见的父母买些上海风味的食品，便硬撑着挤上了公交车，恰巧他还坐上了位子。

奔波了一天一夜，这会儿他一坐到位子上，就像上了床一样，又打起了盹。

他的这一举动，若要是换了一个不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群众，恐怕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人看不惯，更不会有人说三道四，问题就在于他是一名军人，当然成了众矢之的。

具体情况，车上的群众自然一概不知，汽车刚开动，有些群众就冲着他议论开了：

“喂，看这个当兵的，还真好意思坐着！”

“嘿，这当兵的，倒蛮聪明，还假装困觉。”

“这哪像是雷锋呵。”

……

指责、贬低、埋怨，什么都有。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你是当兵的，就是当年的雷锋，就应该主动让座。可你倒好，不但不让座，还装模作样假装睡觉，这像话吗？

迷迷糊糊的小林，对群众的纷纷议论自然是没有听清楚，只是感到耳朵边有人

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那“当兵的”几个字却钻进了他的耳朵。

小林最忌别人称军人为“当兵的”，只要一听到这话，他那军人特有的荣誉感就像是受到了污辱似的。什么当兵的，难道这就是军人的称呼吗？每逢有人这样称他时，他总要去责问对方，毫不让步。

这又仅仅是为一个称呼吗？

如今社会上总有那样一些人，看起军人来总是斜着一只眼睛，左一个“当兵的”，右一个“当兵的”，好像如今的军人是多余的。这样的事，别说听别人讲的，就小林亲身遇到的也不下几十回。

而现在，当小林又听到有人有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你说他能忍受得了吗？于是，他想回敬几句。可还没等他张嘴，就有人嚷开了：

“这当兵的，脸皮也真厚，还不想动！”

“喂，我说当兵的，坐得够惬意了吧，也该让位子助人为乐嘛！”

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立刻就想站起来，可惜他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浑身乏力，站都站不起来。

那几个乘客见他还没有让位子，就愈发火了，其中有个小青年还叫喊着：“这臭当兵的，再勿起来，就把伊拉起来！”

“对，拉伊起来！”有人在跟着起哄。

小林本来想向大家解释一下，讲明情况，求得大家谅解。可一听这些话，一股在心里憋了好久的怒气一下子冲出了口：“当兵的，当兵的怎么的？当兵的就不是人，就不该坐吗？”

好家伙，小林这句话犹如一颗手榴弹投在了公共汽车上，车厢里顿时炸开了。

那个喊着要拉人的小青年说了一句：“看我的，看伊让勿让！”说着便从车后挤到了小林身旁，一只手当胸抓住了小林的衣服，另一只手指着小林的鼻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穷当兵的，今朝老子看依起来不起来！”

车内顿时安静下来，双方形势剑拔弩张。目睹着这样的场面，满满地一车人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人站出来劝阻，或者说几句公道话。

小林也深深感到今天事情要闹大了，自己是个军人，在这样的场合与群众争吵，不管自己有多大的理由，都将造成不好的影响，有损军人的形象。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但他毕竟年轻，血气方刚，他想：不错，作为军人，应该发扬风格让个座，自己过去不都是这样做的吗？可今天，自己是实在没有办法呀！要是身体顶得住，能不让吗？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军人就不是人？就一定要受人欺？

揪住他胸口的手在使劲了。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老子要看看依这当兵的有多大能耐。”那小青年简直像是发了疯似

的，拳头猛地向着小林砸来，说时迟那时快，小林只是本能地用手去挡。挡是挡住了，可手背却碰到了对方的鼻子上，而且竟碰出了血。

“哎哟，打起来了，快来看呵，当兵的打人啦！”边上的几个乘客乱吼道。

车上乱成一团。但依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混乱中，小林一下子挨了十几拳。有人在浑水摸鱼！可小林始终没有还手，只是用手抵挡着。

驾驶员一看事情闹大了，便把车子一直开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门口停了下来。

那几个动手打了小林的小青年，一进派出所，便恶人先告状，硬说是小林先动手，说得是有鼻子有眼的。然而没有一人站出来为小林说话。小林真是有口难辩。

民警也没仔细问清缘由，只对几个小青年教育了一番，就让他们走了。民警回过头来却训起了小林：“你是一个军人，今天你的行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请你在这里待几天吧！”

在剖析当代“完形趋向”的诸多方面时，我们发现，民众的角色期待往往并没有固定的角色规范，而常常与主观愿望或参照角色相对照。战士小林的真实遭遇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06

鸦雀无声与庶人议政——“奈尔”趋向

法国社会学家保罗·奈尔在其著作《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中叙述了这样一例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某面包坊主不满雇工们在上班时插科打诨开玩笑，认为这样做影响了干活的效率，于是规定上班时不能交谈，违者将被扣工资。规定宣布后头几天问题还不大，但随后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反而下降了，雇工们都铁青着脸，闷闷不乐地干活，月终发工资后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最终将作坊内的用具捣毁殆尽，有人还放了一把火，火势迅速扩大，殃及了整个街区。社会学家便把这种现象称为“奈尔”趋向，特指两种与“宣泄”有关的行为意向，即“压抑趋向”与“极端趋向”。这两种趋向放大后都可称为社会心理障碍中的意向障碍。

泄气中心与鼓气学校

在日本的某些企业中，工人往往与管理者关系紧张，屡屡发生“暴力攻击”事件。在心理学家的建议下，一些企业如松下电器公司等设立“特种员工室”，里面有经理、车间主管等人的偶像（用塑胶或沙袋制成）。工人可以对特定的偶像任意地拳打脚踢，发泄情绪。“特种员工室”设立后，这些企业当中的暴力事件明显减少了。

美国也有了一个奇怪的行业泄气中心。到泄气中心来的人可进入一个房间，关上门发泄。他们往往在房间内暴跳如雷，把室内的摆设打得稀烂，直到闷气泄尽，得到满足。泄气中心的收费很高，但许多顾客毫不在乎。因为，如不这样，他们就可能因为忍耐不住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如因与老板争吵而失业，与配偶发生口角而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因忍耐不住而发生过激的侵犯行为。

西欧一些国家近年来也设立了一种泄气电话。顾客只需付少量的费用，就可以拨通一个特定的电话，然后对着话筒尽量宣泄心中的积怨、压抑，甚至大声辱骂对

方而不必担心法律的干预。对方的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倾听，或者表示同情，间或也劝慰几句。

一些国家的心理咨询中心还采取了一种新式的心理治疗方法——喊叫疗法。例如，在一间紧闭的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姑娘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面对墙壁狂喊道：“你！你让我绝望了！你使我十分痛苦！我不准你进我的房间！你破坏了我的生活，我要把你扔到窗外，把你撕成碎片……”这位姑娘并非精神病患者，她咒骂的“你”也不一定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思想或情感上积累的压抑。

上述发泄机构是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宣泄理论为基础的，宣泄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一个人感到极度挫折，干一件侵犯性活动就会减少情感压抑的强度，由此也会使他今后大为减少侵犯的倾向。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有一个本能侵犯能量的“储存器”，而象征性的侵犯行为可以减少压抑情感的储存。一些心理学家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他们有意让一些被试者受到实验者同伙侮辱，被侮辱激怒了的被试者们血压升高了。然后给一部分被试者以电击实验者同伙的机会，另一部分被试者没有这种机会。结果前一部分被试者的血压明显降低。一些实验还证明了通过语言的表现方式也可以得到宣泄。

按照宣泄理论，如果我们要减少侵犯性行为，就应该把心中的许多痛苦、积怨宣泄出来。另外，社会也要设计和提供让人宣泄的情境和场所，如让人们观看游侠、武打等侵犯性的电影，参加或观看激烈的比赛如足球比赛和拳击比赛等。

弗洛伊德的宣泄理论有不少的缺陷。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致表明：极端愤怒的人表现了象征性的宣泄后会减少侵犯行为，但一些人也会因此而表现更有侵犯性。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关暴力、色情的书刊影视实际上已经助长了侵犯行为的产生。

心理学家们同时也发现，若一个人心中有情绪，只要发泄一通，便可使身心轻松，若得不到发泄，会导致不少疾病如胃溃疡、结肠炎、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颈肩神经炎等，但过度发怒却又会增加患病的危险，促使植物神经发生紊乱。而习惯发怒的心脏病人和高血压患者的死亡率比发怒少的高出5倍。

尽管宣泄理论有不少的缺陷，但作为一种心理疏通的方法，宣泄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都可能遭受各种挫折，而社会环境又要求我们控制自己，压抑消极的情绪，使之不表现出来，但长期的压抑又会影响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状况。如何解决上述矛盾呢？途径之一，就是寻找宣泄的方法。

心理学家认为，喊叫疗法通过急促的、强烈的、粗犷的、无拘无束的喊叫，可以将内心的郁积宣泄出来，使人回到童年时代，享受那无忧无虑年华中的温馨和幸福，从而取得心理状态的平衡。喊叫疗法也有助于培养自信心，消除自卑感。一

位女教员由于性格软弱，对班上粗鲁蛮横的学生畏首畏尾，不敢管理。接受喊叫疗法后，她的性格坚强了，人也果断得多。日本甚至还有一所鼓气学校，接受不同类型的学生。其主课之一就是让学生到闹市中心去喊：“我一定能成功！我一定要成功！”

喊叫吧！如果你觉得自己心中郁闷，不吐不快，干吗不喊叫呢？当然，喊叫也要注意场合，如果环境允许，也可以高声歌唱。如果唱歌不在行，演奏乐器怎么样？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写道：

假如有人欺骗了你，
你却要更加忠诚。
如果你感到万分愁闷，
快拿起你的七弦琴，
——弹一曲，
充满烈焰的英雄歌，
你的怒气就会消失，
你的热血也会痛快地长流。

演奏乐器也不行？那么看体育比赛去吧，随着那些如醉如痴的球迷喊叫，你就会发现，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心颤的喜悦又回到了你的身上，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你还可以到空旷的原野中，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向大自然母亲尽量宣泄心中的痛苦、怨恨、困惑、烦恼，暂时地，由一个“社会人”回归到“自然人”。

你想哭吗？如果非哭不可的话，就尽情哭吧，不要放不下“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哭泣是人类代代遗传下去并巩固起来的一种保护性本能。现代生物学认为，因哭泣而带来的泪水能排泄出人体内多种有毒的元素，而哭泣引起的呼吸变化也能解除胸部的郁闷不畅。一位战士倒在了沙场，战友们将他的尸体带到了他的妻子面前。妻子一见丈夫的尸体就惊呆了，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一位聪明的人说：“她必须哭，否则她会死去。”但没有办法使她哭。幸亏孩子的奶娘将她的孩子带来，才使她放声大哭，并说：“亲爱的孩子，我将为你活着。”这时的恸哭使她惊呆了的机体从麻木状态中解放出来，神志也才恢复了常态。

当然，过度的哭泣会伤身心，但这毕竟是人们的经验之谈——哭吧！哭出来就会爽快些。

也许你根本就用不着喊叫，也用不着哭泣——只要有一个人认真地听你谈话就行。

你以为心理医生有什么神奇的秘方吗？其实，他们往往只是“扮演”一个认真的倾听者，他们采取的宣泄疗法往往就是使对方充分地倾诉苦衷，发泄郁火。当

然，他们也不时地插一些话或表示某些同感，但目的也只是要对方明白，“我正在认真听你倾诉苦衷，我对你的话很有兴趣”，从而引发对方进一步将情绪宣泄干净。通过对方的诉说，心理医生们观察到，不同类型的病人其诉说的内容也不同，经济破产者满口账目，失恋者谈感情问题，事业上失意的人则满腹牢骚。通过谈话，心理医生也便于找到症结所在，进一步开导对方。

上述内容是我们对于宣泄的理解，概括起来说，宣泄是一种十分必要的但应有限制的本能需要。下面，具体分析社会心理障碍中的压抑趋向。

低级牢骚与高级牢骚

“奈尔”趋向在我国社会心理障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便是对于“宣泄”的消极评价，包括对“牢骚”这种语言宣泄方式的不正确理解及压制。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牢骚现象，发现牢骚具有明显的外显性、感染性等特点，此外，牢骚具有不同的层次性，社会评价的双重性等内容。外显性和感染性表现了牢骚的表层结构，而层次性、双重性则表现了牢骚的深层结构。

牢骚具有外显性。牢骚是通过个人的言语、行为来体现的，因此，在人们交往活动中，它集中反映为用自己的言行、表情、动作、体态等来表示对某项政策、方针、社会现象等的不满情绪。牢骚者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压抑在心头，他们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场合，千方百计地把牢骚诉诸他人，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他人的共鸣和同情。同时，对牢骚者来说，也是“一吐而快”，从而使自己的心理恢复平衡。因此，凡是牢骚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牢骚具有感染性。心理学研究表明，群体归属和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人们通过这个过程，引起情绪共鸣，减轻内心的心理负担。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开放度、公开性进一步增加，信息网络的密度和交叉度提高，使得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因此，情感交流成为人们交往的纽带，但有时人不免成为情感的俘虏，特别是在群体活动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在牢骚场合大发牢骚，回到家后又感到后悔莫及），使无个性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而盲目跟着他人评头论足，在一个个牢骚怪圈内不能自拔。有的人则是潜移默化地接受牢骚氛围的影响，几次下来，形成了一种习惯，使发牢骚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两个朋友见面，一支香烟一杯茶，就开始摆“龙门阵”、发牢骚，而牢骚话往往会相互感染，使周围的旁观者也不自觉进入这个怪圈，从而形成了连锁式的心理反应。

要分析牢骚这一社会现象，还必须深入分析牢骚的类别、层次，其类别是依据动机水平来划分。

初级牢骚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生理及安全的需要方面，如工资、奖金、住房等物质条件的不足等。中级牢骚的主要内容则体现在人际交往包括尊重、理解及爱方

面，实际上，中级牢骚是一种个人的心理需要。高级牢骚主要表现为价值感、成就感、责任感等方面，也主要出于心理需要，但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心理需要，也包括对个人社会价值的认可，对个人社会成就、社会责任的认可，不满足也会产生相应的牢骚。

牢骚的层次性也决定了社会评价的双重性，即我们不能把牢骚都归结为消极现象。例如，出于忧国忧民而发的牢骚则为高级牢骚，它体现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感受、成就感、责任感，这种不满足不是物质条件和生理需要而能代替的。诸如社会上广受批评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便值得深思。实际上，它很可能体现出了一种积极参与的焦虑情绪，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对整个社会来说，有许多社会牢骚起着民意载体的作用。社会牢骚既然是一种社会不满，不是凭空而发，有许多牢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因此作为执政者来说，认真地、科学地分析社会牢骚，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此外，社会牢骚太多，也正是说明了在我们社会运行的机制中，还有许多不畅通的地方。如果公民们的意思、愿望都能及时的、有效的、畅通无阻地传递，并经常地表现在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带有“自下而上”的民间色彩了。

毛泽东昔日有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总要霸王别姬。又道，工人学生闹事无非两条，一是领导官僚主义；二是少数坏人挑动。他就闹事原因首先归于官僚主义，是真知灼见，盖无官僚主义之喜，少数坏人如何挑得起莘莘学子与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一贯鼓励解放思想，说中国“鸦雀无声不好”，此真知灼见，唯有道者能言之、行之。

古人云：“邦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是唯君主思想是尚。若以社会主义民主而言，则邦有道，则庶人议政；邦无道，则不敢议矣！古时姬发（周武王）伐商纣，派探子到纣王都城朝歌打听民情，探子回报朝歌城内军民怨声载道，庶人议政，乱无日矣。姬发大喜，以为天予我时，想兴兵伐纣。姜子牙说，不可，庶人议政是商之臣民寄望于纣，若伐之，臣民必将外御其侮。姬发命探子再探。又数月后探子回报，朝歌城鸦雀无声，路人垂首而立，侧目而视。姜子牙大喜，知商之臣民绝望了，姬发乃大令诸侯直捣朝歌。商国奴隶纷纷倒戈，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纣王只好登台自焚，姬发立国号周。

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利益格局的调整，加上诸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干群关系并不融洽甚至紧张。广东东莞市石龙镇镇政府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开设了城镇论坛。据《半月谈》介绍，该镇的城镇论坛设在繁华地段的中山公园，每次举办前，由镇有线电视台播出预告，群众都可以自由参与发言，而每期的选题都由主办

者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政府和百姓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如环境卫生、交通管理、计划生育、城镇规划等。开办之初，不少人担心出现失控现象，甚至担心论坛会成为泄私愤的场所，也有人担心批评过火，领导下不了台。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相反，每期场面热烈，群众发言踊跃，秩序井然。有人将此称为高级信访工作，更直接具体同时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也推动了镇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政府专门设立了督查领导小组，对每期信息分类归档并跟踪落实。

还有一则报道也说明了牢骚的作用。

如何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之地——浙江省温岭市推行的“民主恳谈会”，创造了干部和群众面对面地对话与交流，让群众直接参与讨论和决策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新形式，从而实践着最广泛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学习时报》2002年3月11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浙江温岭创建“民主恳谈会”的过程。

据了解，温岭市镇一级“民主恳谈会”着眼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淋川镇有一火灾受灾户报批建房手续，该镇一位经办的干部长期拖着不办，且态度恶劣，引起群众的不满。该户村民在恳谈会上提出后，在镇党委、人大的督促下，建房手续很快办妥。

松门镇礁山冷藏厂职工徐安井在恳谈会上对液化气换瓶站乱收费提出意见，政府马上组织人员调查，发现确实存在不规范收费的问题，随后立即落实整改措施。村民陆素娥对卖自产蔬菜无执照被工商所罚款200元不满，在恳谈会上工商所解释了这一处罚的法规依据，会后他们针对农村自产自销蔬菜瓜果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做出了可不办营业执照，只收取适当的市场管理费的变通措施的决定。

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起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及《瞭望》报刊等对“民主恳谈”的成功经验进行了重点报道，《人民日报》还发表《干群之间多恳谈》的社论。

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温岭市“民主恳谈”活动正向纵深发展。基本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答。

事实证明，即使是低级牢骚，也不全是消极的；即使是消极牢骚，也应该疏导而不应该一味压抑。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试验者动员了2万人次发牢骚，不管正确与否，主持人均不得批评、阻止、结果，霍桑工厂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深圳某日资企业让工人干高强度的活儿，工人们很气愤，合起来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日本人开始听了很生气，后来意识到这样能使工人怒气得到发泄，提高生产效率，就干脆组织工人每天早晨唱完这首歌再干活儿。

任何社会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们总会有不满情绪，什么伊甸乐园，什么西天乐土，什么极乐世界，这只是一种想象，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有理由对

各种不满意的现象加以埋怨，进行鞭挞。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该认识牢骚的社会功能，正确引导牢骚，而不能一概斥之，加以压制。《召公谏厉王止谤》中，厉王暴虐，用卫巫监谤，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厉王不听，过了三年就被老百姓放逐了。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尚且看到对老百姓的牢骚，应该使之宣泄，从中获取教益。我们今天更应采取正确的对策，提高牢骚的质量，利用牢骚的有益成分。

恐怖的印度掷石节

前面谈到，宣泄是一种十分必要但也应该有所限制的心理疏通方式。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压抑趋向”已经有所衰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极端趋向”日渐显现，甚至有快速发展的苗头，这是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

人们是需要宣泄的，但宣泄过度则会造成恶果，如印度的“掷石节”。印度历法雨月新日，这一天。“当贾姆河畔战鼓敲响之时，疯狂的时候就开始了”。几分钟内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潘多尔人加入掷石节。他们的年龄是6岁到60岁，其中许多人身上带有往年参加掷石节时留下的伤疤。人们分成两组，在河两岸堆起大量的石块。他们将在随后的6个半小时里试图尽可能多地击毙、击伤和击残河对岸的人们。有目击者说：“我亲眼看见许多人被打死，非常希望停止这种疯狂之举。”可实际上，“他们一年到头都盼着这一天”。对这样的节日和这样的疯狂庆祝方式，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释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潘多尔人，要求宣泄一下情绪的愿望一定万分强烈，他们能从这种宣泄中，从死亡和鲜血里找到快感。

在我国“极端趋向”最常见的例子是，球迷的过度宣泄而导致的球迷骚动。诚然，引发球迷骚动有其特殊的诱因，如球员表现欠佳、裁判不公、对比赛结果不如意等，但其中间接或直接的宣泄动机却是明显存在的。按许多球迷的看法，足球的最大魅力其实不是看球，而是“喊球”，只有到足球场才能感受到这种气氛。这无可非议，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足球场应该具备心理宣泄场的功能，但必须严防“极端趋向”的群体宣泄。

个体宣泄的“极端趋向”则更多地表现为因个人挫折而导致的“反社会行为”。

1987年4月22日，由双鸭山开往齐齐哈尔的98次特快列车，运行至松花江大桥时，第14号车厢突然发生爆炸，共死亡12人，伤44人。

案件发生后，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立即进行侦破，凶手是双鸭市精神病院合同制工人刘长山。

他为什么要带炸药毁车、炸桥呢？他的反社会心理是怎样形成的呢？

悲观厌世是反社会心理形成的心理基础。刘长山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兄弟五

人，还有两个妹妹。后来，生父死于事故，母亲改嫁。由于从小缺少家庭的温暖，感情上造成一定的创伤，他逐渐形成孤僻、冷漠、粗暴、内向性格。

刘长山因学习成绩不好，考大学没有指望，幻想成名的愿望破灭以后，情绪低落，他的信仰发生危机，并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抑郁不振的困惑心理是他走向厌世自绝的心理因素，也是他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主观条件。

欲求得不到满足，刺激和强化了他的反社会心理的形成。欲求是个人对一定客观事物需要的心理反应。刘长山反社会心理形成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欲求得不到满足。刘长山辍学以后，对自己三个做工的哥哥都瞧不起，自己曾下决心：“终生不做劳动粗活！”他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通过走后门，进入双鸭市精神病院做合同工，当时院领导答应有机会给他转正式职工，但事与愿违，不久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他不但没有转为正式工，反而被解雇。严重的心理失衡使他产生不满情绪，开始怨恨社会。

刘长山被解雇后不久，经商失败。他歪曲地认为自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是社会造成的，把失败的责任强加给社会，产生对社会制度不满的敌对情绪。

刘长山在爱情问题上也与工作情况相同，他在精神病院工作时，追求本院的一位女护士H，被拒绝。他认为：“工作的解雇，经商的失败，爱情的破灭，他所追求的一切都变成了泡影，是社会与他作对。”这种变态心理成为内部驱动力量，刺激和强化了他的反社会心理。为了发泄这种社会情绪，他产生了反社会的报复动机。

仔细剖析发生的诸多刑事案件，由“极端趋向”为诱因的不在少数——

在唐山干了一系列杀人越货勾当的蒙面大盗“三剑客”刘汉佐、王新诚、雷云海都是破碎家庭的弃儿，都因“犯事”被劳动教养，都因立志悔罪而遭歧视，求业受阻，慢慢地形成一致的思维定势：“用极端方法来报复社会，享乐人生。”

震惊全国的郑州投毒大案涉及788名受害者，投毒者则是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女大学生。其投毒的动机竟是失恋。

曾被评为“中华十大先锋诗人”之一的阿橹，其作品先后被国内外70多家报刊刊载，并被译成英、法、德、日、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就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因看不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溜须拍马或凭借某种靠山而被提拔重用的人，从而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强烈的犯罪心理。其选定的杀人对象都是他认定“有钱的”，而“这些人的钱也未必是干净的”。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快速期，各种矛盾开始显露，心理和行为失常不断增加，导致属于“极端趋向”的宣泄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专家撰文指出，应制定“社会风险”早期警报指数，从而准确评估这种社会风险，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这种指数体系包括：

1. 痛苦指数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率、收入增长率与失业率等3个指数。通货膨胀率与收入增长率反映民众实际生活受影响的程度；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以正百分比评分，收入增长率以负百分比评分。痛苦指数反映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痛苦”的程度，也是评价政府领导人实绩的重要系数。

2. 腐败指数体系。包括受惩干部的人数、职位、渎职方式等3个指数。

3. 贫富指数体系。包括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比例、贫困线下人口的比重、富裕者致富方式与消费方式等5个指数。

4. 不安指数体系。包括政策变动、激进言论、牢骚、谣传，怠工与骚动等6个指数。政策变动指数包括废弃政策的比重频率。

根据社会风险计量分值，社会可分为六级。当风险分值达到B级（一般风险）时，该系统即开始发出警报，此时，社会必须为不满情绪提供多种发泄渠道，创造宽松的社会心理环境，及时疏导人们的怒气，即是社会学所倡导的“安全阀”功能。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

将“极端趋向”作为一种当前存在的社会心理障碍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这种宣泄趋向已经有扩大的趋势，涉及政府机关、公共场所甚至医院。

继柳州、三亚、沈阳等地发生的患者对医院进行报复、宣泄不满的极端行为后，2004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重庆发生的医院爆炸案即是一典型的案例。

案发当时，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五楼眼科服务台发生爆炸。巨大的火球和冲击波让楼台坍塌，10扇窗户玻璃悉数被炸飞。病房马路对面的居民住宅，离病房约100米远的新门诊大楼的8扇玻璃窗也被炸坏。

5人当场死亡，35人受伤住院。爆炸点的地板和旁边墙上被炸出两个直径2.3米的大洞。

是什么引发了这样大的爆炸？是安全事故？是人为破坏？形侦人员在案发后一小时，就确定了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针对性极强的爆炸案。

经专案组民警调查，爆炸系四川省邻水县城北镇双井村村民包季厚所为。包季厚因右眼视网膜脱落，在该医院住院治疗，因对治疗效果不满，与主治医生李明肃产生矛盾，多次扬言要报复。

专案组在包家中搜出与现场同样的细金属丝、起爆器说明书与一封遗书，遗书明显表现出对李明肃的不满，并称害其终生残疾，无法容忍，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与李明肃打官司。

越来越多的案件表明“极端趋向”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已经严重地渗透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这种宣泄趋向扩大化，极大地危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

公安部一位反犯罪专家曾说：“今后，我们将付出极大精力来对付这类带有强烈宣泄欲望发报复社会的犯罪类型。”

07

耐用的雨伞卖不掉——定势偏差

定势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同类的心理活动会影响后继的心理活动的程度和趋势。它包括感觉定势、思维定势、态度定势等。已有的心理定势会使人们的心理状态“固着”不易变通，而当前我国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就是因为观念定势而形成的认识偏差，如对于现存的腐败的“固着认知”。

这种“固着认知”体现出“乌鸦黑”心态——天下乌鸦一般黑，黑是铁律，不黑就是假的，装出来的，不黑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另类”。这种心态虽然出自不完全归纳，但却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大多数人只见过黑乌鸦（事实上乌鸦也有其他颜色的）。

当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意识时，其危害性就是显而易见的——黑成了乌鸦的宿命，黑就会成为乌鸦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它们只能按黑的思维安身立命；黑也会成为集体无意识，任何想白起来的乌鸦都必将受到群体的孤立甚至是攻击，最后要么被染黑要么被驱逐出乌鸦的圈子。

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譬如，官员提拔，“乌鸦黑”心态就是，一些官员提拔都是靠跑、靠送，俗话说：“不跑不送，原地踏步；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往上挪动。”在群众眼里，当官没有不是跑出来、送出来的，因此没有不是马屁精，没有不贪回“投资”的官，官员再怎么关心、贴近群众都是假的。

仔细观察，这种“黑乌鸦”心态涉及甚远，甚至连夫妻关系有时也会有它的影子——男子想：大家认为男人都是好色的，自己也是男人，有什么理由不好色呢？即使不好色，人家也不信，不如……女人想：老公对自己不好，肯定是外面有了相好的；对自己太好，也是在外面做了亏心事，回来争取表现作补偿。

再回到文首的廉政话题，“乌鸦黑”心态“日久成精”形成一种大众的“贪渎

文化”，这比贪渎本身更可怕。

因观念定势而形成的认知偏差有多种表现形式，下面即是几例。

北大教授坠楼之谜

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也得“与时俱进”才行，不然就显得僵化了。过去讲“干一行，爱一行”，要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人们讲在竞争中实现自我价值，跳槽已不再是贬义词。以前，人们一味强调艰苦朴素，现在则考虑的是如何刺激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观念的嬗变，有正常的，也有非正常的。如果不能正常地合乎逻辑地进行改变，肯定要影响人们的有效活动乃至于社会的进步。

安贫乐道是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它曾经辉煌过，但已是明日黄花了。自力更生无疑是一种民族气节，可是今天如果不加分析地搬用就是傻帽了。“质量第一”也应该有所分析，否则就容易形成“质量过剩”，即高质量的产品只有部分性能被有效地利用了，少部分性能，许多质量指标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了质量浪费。一家雨伞生产企业的雨伞出口就很说明问题。这家企业精心生产了一批高质量的雨伞，向西方一些国家出口，却屡屡受挫。而某国出口的雨伞在我们看来与伪劣产品差不多，却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很受欢迎。原来在国内，一把雨伞用上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很正常的，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却把雨伞作为一次性使用工具，这样的雨伞就不讲究坚固耐用，能使用一次也就符合要求了。我们做工精细、坚固耐用的雨伞，卖不掉就是很正常的了。

有多少贪官是出于“老实人吃亏”“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偏差而失足的？有多少婚姻悲剧是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不事二夫”这些传统观念而造成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仍然存着众多的观念偏差，阻碍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北大教授坠楼之谜则反映出观念偏差的重大危害。

据1993年1月2日《华夏周末》报道，1992年10月13日凌晨，一个身影从北京大学校园内第四教学楼五层一间教室的窗口急坠而下，重重地摔在了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死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解万英。他怎么从这楼上摔下来的呢？

据公安机关调查得出：“无搏斗痕迹”“高坠致亡”，解教授是自杀。

对于解教授为何“自杀”的问题，虽然人们一般持审慎态度，不愿多说，但却有一种“定势”在悄然地蔓延着：解教授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知识

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的中年教授历来观点不一。

认识解万英的人都知道，解老师爱认“死理”，甚至有些近乎于木讷。可他性格直爽、为人耿直、有话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他并不“内向”。对待工作，他一贯认真负责。

解万英的家庭责任感极强，无论出门办什么事，即便是如同理发、买菜、打油之类的小事，如家里无人，他必定都要事先留条，以免家人惦念。对如何教育孩子，解万英更是十分重视，经常与妻子一起为此大费脑筋。他为了给孩子以勉励，喜欢不时给孩子写点以名言警句为主要内容的赠言。

由于多年来主要是从事资料分析和整理工作，解万英的学术成果不是很突出，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却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所学并形成定势的思想具有那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加之他的性格特点，从而造成他独特的学术思想。他相信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了解不多，在平时的言谈中，他对几位系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著名教授所持的一些观点有些看法，而这些观念上的冲突无疑加重了解万英的心理障碍，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时至今日，像解万英那样抱有极端观念的人可以说并不多，但姓“资”还是姓“社”的观念影响并未真正解决。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之初，列宁就提出过一个惊人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个公式实际上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对立物，可是现在我们还能听到许多争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现实的社会心理障碍吧？

平庸者的五大优势

讨论一下我们现行的许多“人才观”是不无裨益的。

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中，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些有显著功绩，同时也有这样那样缺点的干部，往往争论不休，一年两载还做不出结论，而对那些既无功又无过的平庸之人，则往往顺利通过，平步青云。

平庸者竟得“优势”，这是当前干部任用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平庸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一、社交优势。大凡平庸之人，既不会想大事，做大事，也不会劳筋苦骨。他有充裕的时间，上班串串办公室，与其他人聊聊天、谈谈心，互通有无，互相帮助，融洽感情；下班后，更有钓友、牌友、谈友、酒肉友，时不时还到领导家中走走，带点礼物，汇报汇报思想，必然给领导留下好感。

二、“无嫉”优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平庸之人这些都轮不上，他们既不“秀”，也不“出”，自然就不会有

“摧”“烂”“打”之苦了。还有领导们最放心的一点，是提拔平庸者，他永远不会超过自己，不会出现“失位危机”。

三、“渔翁”优势。两人竞争，或两人才智相差不远，提拔其中一人，会引起另一人的不服，带有思想情绪，于是就来个“丢马适驴”，息事宁人，让第三人获渔翁之喜。

四、平衡优势。时下，资历在用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平庸者虽无政绩业绩可言，但他们有的磨了不少年头，资历长，在职级上平衡时，往往能引起人们的一种同情感。“人家搞了几十年还是个科长，应该提一下了，年轻人时间还长，以后再考虑吧。”

五、选票优势。工作做得越少的人，过失越少，更不会得罪人，过失少，人缘好，自然选票越多。

如果归纳一下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无非是“不想管”“不敢管”“不会管”，其中，“不敢管”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则与上述平庸者的“五大优势”有关，也与根据个人印象给出的“最高分”与“最低分”有关。个中奥秘，相信读者也能明了。

某单位，A先生饱食终日，遇人“好好好”，遇事“研究研究”，干部测评时信任票竟在95%以上，大会小会受表扬，提职晋级接踵而至。然则，熟悉此君者莫不知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密切联系领导”，给某些领导留下了“办事稳妥”“为人干练”“群众关系好”的印象，“最高分”就这样留下了。B君则因为敢于抵制和批评不良现象，眼睛里难容“沙子”，泼泼辣辣地得罪过一些人，测评时信任票却只有80%左右。于是乎“要注意工作方法”“坚持原则还须掌握灵活性”“处理好群众关系”等“忠告”，便来自于足以决定其命运的那些人口里。显而易见，“最低分”也便这样留下了。

要克服上述观念偏差，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要把有主见误认为是骄傲自大。“敢试敢闯”的年轻干部，一般都善于钻研问题，比较有主见，因此容易被人误认为“骄傲自大”。对这类干部的主见，只要注意同“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人划清界限，认识问题不难解决。

第二，不要把勇于创新看成不稳重老练。应该说，大胆试、大胆闯，这正是—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一番新的事业。创新者在前进中的失误，本身就孕育着成功的因素。通过这种反复的实践和认识，创新者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最终总会成功的。如果不求进取，只会按照陈规旧习办事，是永远打不开新局面的。

第三，不要把大刀阔斧混同于鲁莽蛮干。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纷繁复

杂，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敢于负责，对碰到的许多棘手问题，要迅速而慎重地做出决策，用“快刀斩乱麻”的果敢手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这种大刀阔斧的作风，显然同脱离实际、一厢情愿、轻举妄动的“鲁莽家”是大相径庭的。

第四，不要把坚持原则混淆为爱出风头。现实生活中，那些对正确的敢于坚持，对错误的敢于抵制和反对，对违法乱纪的敢于纠正的干部，难免要得罪一些人，招来一些非议。有了这些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出头鸟”，正是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希望所在。这样的干部理应受到保护和支持。

毋庸讳言，目前，以所谓的生产力标准作为考察干部的标准也是较为突出的观念偏差。

首先，生产力标准同德才兼备的标准各有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这段话，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产力标准。很明显，这是用来判断一个政党政策成功的标准，是用来判断全局工作的标准，而绝不能作为选拔干部的具体尺度。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群体活动的结果，同一个干部的工作有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所以说，生产力标准与德才兼备标准是两个不同概念，有两个不同的适用范围。每个干部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有的是在物质生产部门，有的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工作，非物质的工作成果就难以直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出来。比如，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纪检部门的工作，就不能直接反映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这些部门的干部按生产力标准选拔，怎么选拔呢？最后，就是同时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干部，由于工作环境和原有工作基础的不同，也不能用统一的生产力指标去衡量一个干部工作的好坏。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把生产力标准单一化，单纯看产值利润，把它与生产力完全等同起来。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以生产力标准来作为选拔、判断干部工作好坏的标准，会助长干部不顾长远利益只顾追求近期利益的短期行为，也会助长干部不顾全局利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行为，还会诱发那些一心往上爬的干部去搞违法乱纪的勾当。可以说，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考察选拔干部的标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同样，“人才私有观”也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心理障碍。

《重庆日报》刊出重庆市级机关干部补员招考的消息后，社会反应十分热烈。可报名时，却有个“奇怪”的现象：几乎百分之百的考生都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和单位名称。不少人参加考试时像做贼一样，偷偷地去，偷偷地回，生怕被同事或熟人瞧见。试问，他们在如此沉重的思想包袱下怎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考生怕自己难在众多的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落榜被人讥笑；二是怕单位得知自己“不安心本职工作”而给“小鞋”穿。

上述顾虑并非偶然，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着实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某厂有位青年干部，就因参加了高级机关招干考试事后“出事”了，不仅丢了“官”不说，还遭领导白眼。这种事虽纯属个别现象，但在整个社会“大人才观”还未形成，人才正常流动和干部管理体制尚未配套健全的今天，在不少领导心目中，只要谁想调走，便是不安心本职工作。他们根本不问其用是否所学、其干是否所长，更有甚者，竟将这种努力上进视作心术不正，是想拼命往上爬，等等，他们把下级部门应向上级部门输送人才的义务忘得精光。

如此本位主义，既束缚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使上级机关难见真正所需的人才，于党、于国、于人、于己皆不利，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念偏差”。因此，我们在呼唤人才流动渠道畅通的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够树立一个“大人才观”。

一亿男光棍的潜在威胁

一个更为普遍的观念偏差是人们的“生育观”。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问题在城市目前并不突出，但在广大农村却没有真正被解决。虽然计划生育工作已成为党政部门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然而，“超生”现象却屡屡发生。

一、为了“香火”，不要公职。在某地农村集镇兽医站工作的小汪，由于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热情的服务态度，深得农民群众的喜欢。然而，事业、家庭与生儿育女并没有构成“三点一线”。结婚快10年的小汪，因为第三胎超生，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小汪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尽管她们聪明伶俐，但没有儿子，怎么能传宗接代呢？加上父母的压力，小汪夫妇又悄悄地怀了第三胎。每当他看到妻子一天一天隆起的腹部，心中便忐忑不安，万一单位的同志知道了怎么办？计生办的同志知道了怎么办？他不得不让妻子深居简出。几个月后，站领导确知小汪的妻子怀孕后，严肃地批评了小汪，希望他们终止怀孕。但在父母的压力下，小汪心中的天平终于倾斜到了要儿子的一方。孩子终于出世了，小汪则被开除了公职。父母欣喜的是终于有了个孙子，汪家的“香火”又可以不灭地燃烧下去……

二、生了六名千金，仍不罢休。当笔者来到地处江汉平原的卞某家时，女主人接待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她上身的旧军服上约有10个补丁，一双旧胶鞋已包不住双脚，脚趾露出了鞋面。从她那消瘦的面庞可以判断出她已过不惑之年。空荡的屋内与邻居的“将军楼”相比，显得十分寒酸。她丈夫卞某是个精明能干的男子汉，要是只有一两个孩子，也许能挤进“万元户”的行列。可如今，由于家大口多，加上超生的罚款，他难以养家糊口。他有6个女儿，老大18岁，最小的2岁，有4个孩子是入学年龄，可在校读书的只有2个。由于家庭贫困，老二、老三不得不中途

辍学（小学没毕业）。在交谈中，卞某流露出没有儿子的悲叹心态。他感叹地对我们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女儿再多，是别家的人。在我们农村，没有儿子，出门都低人一等啊！”

三、“超生游击队”的苦与乐。王某夫妻俩的生活，真有点像电视小品《超生游击队》那样“浪漫”。原来，他以种地为生，可自生了3个女儿后，“计生办”一次又一次地催缴超生罚款，他们干脆过上了“游击队”生活。夫妇俩带着3个孩子，舍弃了农田，外出做生意。尽管生活艰难，可生儿子的念头从未打消。他们先后流浪到了几个县市的集镇，又生育了2胎，可还是千金。后来，他们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多年的“夙愿”实现了，王某兴奋异常！

四、亲生父亲毒杀三岁女。一个幼小的生命在鄂南某县的石印村诞生了，喜庆之日，身为人妻的小朱心里并不高兴，眼眶里挂着酸楚的泪花。因为她最了解丈夫小徐的心思。随着小牡丹的降生，爱情的火焰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丈夫对妻子的不满。而由于小牡丹无法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所以时常遭到生父的虐待。生父用烟头烫皮肤，打断胳膊……这给小牡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母亲小朱为了保护女儿，也时常被毒打，最后被迫离开了徐家。小朱走后，小牡丹更被生父虐待，先后两次遭遗弃均被人送回。最后，生父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即用农药毒死了这年仅3岁的幼小生命……徐某求儿弃女的变态心理，真是天理难容。

五、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叫秋菊，乌黑的秀发被抓得凌散蓬乱，蜡黄的脸庞污垢满面，呆滞的双眸失去了昔日含情的水灵。三个多月前，秋菊生下了一个女婴。怀着喜悦心情等待抱孙子的公公，听到女孩的消息，脸上顿时结了一层冰霜。秋菊的丈夫，意识到祖辈的香火将要断在自己的手里，也怒不可遏。秋菊忍着满脸的委屈，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双膝跪在丈夫的脚下，乞求宽恕。狠心的丈夫推倒妻子：“我娶老婆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哐”的一声门响，扬长而去……一句如刀似箭的语言，刺痛了善良女人的心灵。她跌倒在冰冷的地上，痛楚的泪水从心泉里涌出……

她望着幼小的生命，含着辛酸的泪水，忍受着恶言冷语。

然而，秋菊忍气吞声的乞求换来的却是丈夫更加恶毒的诅咒和雨点般落在身上的拳头……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秋菊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一张“反映性精神病”的诊断证明书，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的铁窗中……

六、超声波扫描仪的功能。四川某地所辖的36个乡、镇卫生所中，有32个卫生所几乎都曾用过超声波扫描仪为孕妇诊断腹中的胎儿性别，甚至一些卫生所把它当成发财的“摇钱树”，测定一个孕妇收费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测定是男婴的孕妇高高兴兴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家静候儿子的到来，若测定出为女婴的孕妇则毫不犹豫

地走上手术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产医生告诉记者，近年来经她手术引产的胎儿，98%以上都是女婴，许多女人为了能完成续上“香火”、传宗接代的使命，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刮宫、引产，摧残身体，直到生下儿子为止。

我国的超生现象实际上主要集中在“求子”观念，以农村尤盛。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一方面是人口膨胀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男女比例失调可能形成的社会危害。

我国人口统计，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2003年达到118.5比100，这就意味着，到适婚年龄，平均每118.5个男人中，就有18个人找不到老婆。

到2007年，新生婴儿男女比例的差距则扩大为121.3比100，也就是说，再过20~30年，121.3个男人中将有21个人找不到老婆。如果人口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不到世纪末，我国将产生近一亿男光棍。用不着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有人曾经幽默地预测，要阻止男光棍大军的社会“暴乱”，只有从外国引进女人。

人们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求子观”，有着其独特的背景。

多生“密码”之一：根深蒂固的求子意识。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生育文化。“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济”“男尊女卑”“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这种生育文化的集中体现。这种强烈的求子意识，使男性认为没有子嗣便是断了自家的香火，女性认为没有生儿子就是愧对夫家，当绝子户与掘祖坟一样是农民最难接受的事情。这种潜在的生育文化，驱使农民非生儿子不可。

多生“密码”之二：历史形成的求“安”思想。农民生了儿子，却担心保不住，于是想通过多生的手段来达到增加子女数量、增加安全系数的目的，这就是农民要多生的原因。对子女安全系数的顾虑是历史上形成的。旧社会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形成“生一窝，死一坡”现象。农民难于接受少生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头脑中仍然有旧社会婴幼儿高死亡率的阴影。

多生“密码”之三：日益增强的实惠动机。我国农村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家庭的经济职能突出了，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迫切了。由于男性劳动力更适应农村目前的产业结构，农民家庭想获得较高的经济实惠，就需要增加身强力壮的男性劳动力。这是农民求子的直接原因。

多生“密码”之四：旗帜鲜明的求养目的。农村现在还没有普遍实行养老保险制度，靠儿养老自然是农民的主要养老方式。农民追求儿子的重要原因为了解决几十年后自身的养老保障问题，故旗帜鲜明地坚持养儿防老的主张。如果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没有较大的发展，农民势必还是把自己的养老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支配农民多生行为的“四求”意识的揭示，无形中又挖掘出了一个处于深层次

的核心机密，即农民的家庭利益机制的问题。农民家庭利益机制指农民家庭利益构成及家庭利益实现的途径。现阶段，农民家庭利益是由生产利益、消费利益、生育利益、生态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精神利益构成的。由于家庭利益是通过子女服务的途径实现的，故农民常把家庭利益构成和家庭利益实现的途径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子女在农民家庭生存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才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子女服务体系。

我们尊重农民的利益，就需要认真研究农民家庭的利益构成和农民家庭利益实现的途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农民从哪种途径来获得家庭利益：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替代机制，即建立农村人口综合社会化服务机制。它是农民家庭利益实现的新途径，也是很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08

父子兵、夫妻店、亲家村——悖理情结

从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世间，最为美好的东西不外乎人类的情感了。然而，人的情感还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情感的善良与高尚只有通过理性的检验，才真正可靠，才真正有益。”情感与理性总是统一的，但也总是相互障碍的，即两者之间既存在协调性也存在矛盾性。一般来说，情感应服从理性，否则，“悖理情结”容易构成心理障碍，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成为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障碍。

“破三铁”为何戛然而止

中国人由“情感泛化”包括“移情”等所形成的“情感中心”较之其他民族是更为显著的。钱钟书先生曾把《诗经·郑风·叔于田》中的第一节作为例证。为便于说明，现将全诗录出，并把现代汉语的译文列于右边：

叔于田，	叔出外放牧了，
巷无居人。	街巷好像没有人。
岂无居人？	难道真的没有人？
不如叔也。	不是的，是这些人。
洵美且仁。	比不上叔那样英俊温存呵。

叔于狩，	叔出外打猎了，
巷无饮酒。	街巷好像没有喝酒人。
岂无饮酒？	难道真的没有喝酒的人？
不如叔也，	不是的，是这些人。

洵美且好。 比不上叔那样英俊海量呵。

叔适野，	叔到野外去了，
巷无服马。	街巷没有骑马的人。
岂无服马？	难道真的没有骑马的人？
不如叔也，	不是的，是这些人。
洵美且武。	比不叔那样英俊威武呵。

这首诗中的“叔”实际上是敬语和爱称。我们不妨把诗意解释为女子对自己心中男性偶像的爱慕之情。在她眼中除了被自己的感情投射所理想化了的偶像之外，周围其他人都好像不存在了。类似的“情感泛化”“移情”及“情感中心”的描写，在我国文学中的表现比任何一国文学都多得多。鲁迅先生就曾经风趣地指出：“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有如乳酪。”我们民族真是一个“善感”的民族。

实际上，“悖理情结”主要表现为理性服从于感情。如果把它具体化，那就是“应该不应该”总是被“喜欢不喜欢”所代替，而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本来首先是要服从“应该不应该的”。

另外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东方式的人情味较浓，我们民族的理性成分较弱，这也要求我们要警惕“理性麻痹症”。

在中国文化里，情与理往往联系在一起，理则离不开情，说某人不近情，往往也包含不近理，而不近情又远比不近理更为重要。儒家坚持爱由亲始的等差之爱，就是因为这种爱最近情。我们现在也经常听到“国法不外人情”的理论，以及“人情大于王法”的案例。在这种特别重情的伦理氛围中，我们民族实际上丧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动之以情”而坚持“说之以理”，那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对中国人，特别要注意，“情在理先”“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等。

“悖理情结”所牵涉的还有更多的方面，如宽容、忠恕之道的极端化。在某些有“良知”的道学家看来，被装进口袋里的恶狼和掉进河里的疯狗则不应在被打之列，在他们眼里，东郭先生虽属愚钝，但不失谦谦君子，而鲁迅先生则未免不近人情。

许多“悖理情结”在现实生活中是被理想化、人道化的了，因而被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例如，评聘职称论资排辈公开的理由是，老同志快退休了，照顾一下人之常情，谁将来也是要老的吧？人家辛苦了一辈子。在这样“大道理”的笼罩下，谁还好再说三道四呢？

人们称颂知人善任者为“伯乐”，但为了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彻底废除干部终身制，还要提倡“知人善免”，避免“悖理情结”的出现。现实中，有的领

导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例如，明知某人已经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但一味照顾个人情绪，不忍让其退位；明知其人尸位素餐，碌碌无为，是一个既不挑水又不撞钟的懒和尚，但就是不敢劝其让贤；在其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就采取“下跳棋”的办法，让其易地“继续革命”。这种不任不免、敢任不免的做法委实是眼下实现干部“四化”的一大障碍。该下的下不来，该上的就上不去，造成人才的埋没和浪费。所以，领导者不仅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还要有知人善免的勇气。只有如此，才能疏通上下渠道，保证干部队伍的强干、高效。

在实际操作中，“免”比“任”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免”意味着一些人既得利益的丧失，执行起来阻力当然是难免的。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必须有所牺牲。北宋时，官僚机构臃肿，参知政事范仲淹以整顿吏治为突破口，把不称职的人员从官员簿上统统勾掉，从而留下了“一家哭一路笑”的历史佳话。但是，如果让一个不称职的官吏继续留任，那就要害及一“路”，让这一“路”的百姓哭。范仲淹“宁让一家哭，不让一路哭”的勇气和明智之举，确实值得称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者更要大公无私，抛开个人利益，在知人善任的同时又敢于知人善免，顺利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破三铁”在前些年沸沸扬扬了一阵子，突然戛然而止、寂然无声。其缘由据说是一位权威人士撰文指出，“破三铁”需要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而这有违党的宗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家族化现象”的背后

“重人情”是我们一向引为自豪的，也是某些为传统文化高唱赞歌者引以为荣的。但实际上，说中国人注重情感、人情味浓，不如说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亲情、友情。如“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土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为朋友两肋插刀”“咱哥们，没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不一而足。较为典型的则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类。

亲情、友情固然重要，然而“悖理”则可归为社会心理障碍。

中国人动辄讲究战友、同乡、老俵、哥们，表面上看，人情味浓，无可厚非，但从社会人际网络的结构看，却明显有“排他性”，如在干部考核中，便不能做到“一视同仁”。最经常的例子是，某某领导干部在打招呼的同时，特别强调的那一句话“请在同等条件下，予以照顾”，于是事情便顺理成章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情风”对升迁考核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传导辐射型。通过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战友的战友、老乡的老乡、同事的同事，血缘关系无限扩大，友情纽带无限延伸，关系网圈子越来越大。

二是上级干预型。有些人虽然职位卑微，却有“通天”的本事，既能请动“顶头上司”为之说情，又能策动大小“同僚”出面说情。其中，有的是“钦点”式，越级领导亲自提名，名曰“推荐干部”；有的是暗示式，半藏半露，其意不言而喻；有的是开脱式，希望网开一面，“笔下留情”。

三是利益交换型。有的是“投桃报李”，我曾为你小孩入学、分配住房帮过大忙，也求你为我表弟的“升迁”出力；有的则是“讨价还价”，你求我办此事，我则请你办彼事，你能把我的事情办成，我也会把你的事情落实。

这种“人情风”，导致干部考察失实，用人失当，严重地破坏了干部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助长了不正之风，败坏了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对整个党的事业危害极大。

由于“父子兵、夫妻店、亲家村”的客观存在，一些单位领导包括厂长、经理等普遍反映，处理人际关系的“三难”境况十分严重。

一是用人难。用谁，用在哪，都要颇费一番思量，稍有不慎便会得罪一批人。二是处理问题难。职工违反了厂纪，理应受到处理，这原属工厂正常管理。然而上至父母、配偶，下至子女、兄弟姐妹，几十口人说情闹骂，处理一人，影响一批，着实为难。三是决策难。对于决策者来说，外界对其的影响力，由于感情亲疏的原因，家庭成员对决策内容的好恶影响较之其他成员更深刻，因而决策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如若不然，便会招来一些决策之外的麻烦。

与关系网相联系，家庭观念使少数作风不正的企业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唯亲是举、唯亲是用，招致了其他职工的不满，给维护企业稳定造成了障碍。这些障碍表现为：

——人员流向不合理，人才浪费严重。一家企业一年之中从外地调入5名大学生，这原本是件好事，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既不对口，为何调入？理由很简单，为了照顾亲属关系。还有一名纺织厂的女劳模，在单位各方面都很出色，但她却情愿放弃一切，调入父母所在的企业当一名自己所不熟悉的钳工。家庭观念的束缚，使一些人可以不要专业，不顾专长，投向家庭圈子。一方面急需专业人才的企业留不住、招不进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却又要进入专业不对口的企业，这种不正常的人才流向给双方企业增加了负担。另外，由于人才交流机制尚不健全，从一而终仍是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手段，一些随父母对口安排就业的自学成才者施才无门，只能浪费青春。

——厂系家庭、兴衰相随。企业成员“家庭化”组合的直接后果，就是缺乏自我调节手段。企业经营正常，经济状况良好，矛盾还不突出；一旦企业发生动荡，效益低下，或待工停产，对“家庭”的影响则会是根本性的。这一群体内部的失衡必然要波及社会，给社会以压力，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旦企业经济结构失衡，

效益滑坡，使一些企业受到影响，不少家庭会为此收入骤减。由于全家人同在一个企业，有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给政府的压力很大。尽管政府采取一定的救济措施，但这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给社会造成了隐患。

——“家庭”矛盾衍化变异，干扰企业正常秩序。大凡家庭都会有矛盾，然而处于同一企业内部的“家族”如若发生了矛盾，除了一般家庭矛盾的结局外，还极易发生衍变。比如因子女矛盾而引发的亲家之间的矛盾，或因亲家之间的矛盾引发子女之间的不和，或他方其他家庭成员与己方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引发配偶之间、双方父母之间、双方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其他有姻亲、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等矛盾，这些矛盾所波及的范围除“家庭”内部外，还会波及企业的科研、生产、经营及其他工作，造成相互拆台，甚至各种人身伤害等干扰企业正常秩序的局面。

“家庭”矛盾的衍变性，不像一般家庭矛盾那样易解，它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有的甚至会延续到下一代，成为企业发展的隐性障碍。

人情消费——健康社会的流感

中国人向来推崇“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义重”。

商品经济活跃后，人情这个蕴含着情谊的字眼，便也多多少少打上了商品的印记。亲朋好友之间，送点人情之礼，乃感情使然，无可非议。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人情，好像被“孔方兄”全方位“承包”了。

“红”与“白”是人情消费的“种子选手”，总少不了亲朋好友的全力“赞助”。总有数不完的吃喝队伍浩浩荡荡地拥挤于婚宴、丧宴之中，这就叫“送人情，吃人情”。

“人情消费”的领域从传统的生死嫁娶、逢年过节，发展到参军开学、学生毕业、拜师收徒、职务升迁、晋升工资、乔迁新居、出国留学等；涉及对象从共产党员到普通群众，从领导干部到莘莘学子（包括小学生）；场合从家庭居所到办公场地，从招待所到旅店，等等。任何事由都可以用来发动“人情攻势”，进行“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的“行情”也看涨：“一百难出手，二百三百绕道走，五百一千还凑合！”

“人情风”，如果用统计学来表述，那就变得可怕了……

有人做过统计，全国城乡的人情消费不下1 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吃被大吃大喝之类消耗掉的。

的确，而今的人情往来，名目越来越多了。我们从一些人的“送礼单”上看到，送的43次礼中，有结婚礼5次，嫁女礼3次，建房、上梁、搬家礼各5次，孩子

做“三朝”礼3次，周岁礼2次，十岁礼1次，二十岁礼3次，三十岁礼1次，六十岁礼1次，七十岁礼2次，丧事礼2次，分家礼2次，接生礼3次。从时间上看，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4份请柬，一家三口忙不过来，还请一个已分家的儿子“帮吃”。如此繁多的人情往来，使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古人曾说：“事无美恶，过则为灾。”适当而正常的人情往来，体现了人與人之间的亲密友爱，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而过度的、变异的人情，必然泛着金钱之光，漫着铜臭之味，使人们苦不堪言。下面是一则由肖赛亮先生撰写的《“人情债”告示》，颇为深刻。

本债务乃当今盛行于世之特殊债种。缘于本债名不幸被已出版发行和各种版本的《辞海》《百科全书》漏编之故，为防以讹传讹，特将本“债”条规择选后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一、本债务也谓“债”，但与公众意识中所理喻的“债”的含义有别，切不可混同视之。其主要特征在于本债不受《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和《贷款通则》约束，逍遥法外。

二、本债务发生手续简便，发放无须签约，偿还不必立据，更不存在所谓“经济担保”“公证”“责任人”之说，全凭天地良心，认则有，不认则无。社会各界，不论尊卑贵贱、男女老少、有无文化均可通用。

三、本债债权人与债务人，只可意会，不可言明，其概念愈含蓄、愈模糊、愈朦胧则愈高妙。

四、投放本“债”，回报不一，或半斤八两，投桃报李；或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或烧去纸多，惹来鬼多；或竹篮打水、水中捞月一场空，等等，风险与利益不成比例，决不一概均沾。

五、本债务一经发生，债权人往往羞于启齿明索硬讨，否则有患“不明智症”之嫌，招人嗤鼻。本“债”实属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者不喊累，挨者莫叫痛。不过据查，本“债”自创立以来，尚无一例犯规越矩。

六、本债或为钱，或为物，巨细多少，厚薄如何，上不封顶下不限底，可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然大势呈股票“牛市”上扬之态，多多益善，油多不坏菜。

七、本债务发生最佳时间为红白喜事、生娃做寿、招工转干、入学入党、分房乔迁、提职晋级、拜师收徒、留洋出国、开张剪彩、佳节假日、攀亲寻故，亦不妨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借题发挥、小喜大贺，且寒暑不拘，四季无忌。

八、投放本债时莫忘以下专用术语有：“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孝敬你老人家”“敬请笑纳”等，收受此债者可一言不发、一声不吭、装聋作哑、心领神

会、依眼色行事，也可一句“你真客气”而笑纳之。

九、缘于介入本债务所导致的经济拮据、求借告贷、友情断绝、兄弟反目、夫妻毆斗、家庭破裂、违纪违法、落马下水、蹲牢入狱等问题，皆咎由自取，本“债”概不负责。

十、纯洁可贵的友情馈赠不属本债范畴之列，诸位请勿混淆。

附记：文章编至此时，惊闻《中国妇女》报道，湖北省某县一位家境贫寒的农村妇女，因实在无钱去给办喜事的村长家送人情之礼，只好在两个空酒瓶中盛入清水冒充。事情败露后，农妇自觉无颜见父老乡亲，竟服农药自杀了。

09

中国人的头号心理疾病——人际趋向

与“悖理情结”相关联的社会心理障碍为“人际趋向”。由于国人较为看重情感，较富人情味，其传统文化则以协调人际、修身养性为核心，首先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由此，国人亲和动机大于成就动机。现实的“人际趋向”既表现为八面玲珑，争做“老好人”（不是“老实人”），也表现为人情交换的功利趋向，以及因关系网而形成的人际障碍，进而发展到社会的人际不适以及“社交恐惧症”。

“做人”与“做事”孰重？

这是一首现今流行的“老好人歌”，与前述第五章的“老实人守则”一样，被许多人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作为座右铭。

人人都说好人好，我说好人当不了。
 好人不如老好人，“老”字中间有奥妙。
 老好人，脾气好，鞠躬尽瘁和事佬。
 笑口常开有雅量，胸中城府深难找。
 老好人，心眼好，大肚能容是非少。
 小偷面前闭双眼，碰上强梁绕道跑。
 老好人，人缘好，你好我好他也好。
 随你清，任你浊，我装糊涂谁知晓。
 老好人，官运好，乌纱帽，丢不了。
 任你东西南北风，“改朝换代”扳不倒。
 马屁精，群众恼，炮筒子，领导恼。

唯有好人加个老，保你一世乐逍遥。

人有善做事而不会“做人”者，亦有精“做人”而不乐做事者。前者肯干能干事却不精“做人”之道；后者能力平平，干事不中却颇通处世哲学。

于是便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现象：工作由“做事者”干，利益却由“做人者”得。

缘何出现如此黑白颠倒的境况？原因不外乎：做事者，往往一门心思干事业，没和领导套近乎、没与四邻拉关系的闲暇工夫及兴致，待人接物难免有情不到、礼不周之处。再者，干得事多，必招惹的人多，你的能干就是对别人混日子的威胁，又焉能讨人喜欢？而做人者，却在复杂的人际网中“游刃有余”。他们生成三寸善吹的巧舌，练就一双会拉、会扯、会捧、又会拍的“多面手”，直把个别领导弄得飘飘然，也把有些“群众”哄得团团转。如此一来，他不但为自己捞利得心应手，而且暗里给做事者使个绊子，进几句谗言也常能如愿以偿。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推进，党风和社会风气正在日益纯化，改革给做事者以应得的褒奖，同时也正使做人者不得不重新掂量：究竟是全心全意地“做人”好呢？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做事好？

实际上，“老好人趋向”尽管较为普遍，然而要做到一个真正的老好人，还必须强调一个“老”字，即要人情练达，又要八面玲珑、见风转舵，绝非仅一个“好”字说得清楚的。

“做人”及“做事”孰重？老实人与老好人如何区分？有篇名为《机关》的文章则道出了个中奥妙。

坐机关的人们，最爱谈论社会。社会好像就是机关外面那些天天看得见、听得着的事情。人们很少注意到机关。机关太平淡啦，它仿佛是一个缺少色彩、最平稳、最不起眼的社会角落。但一个人如果在机关里待久了，就会隐隐察觉到，机关里其实大有奥妙。机关里隐藏着最重要的社会真相。

表面看去，机关是平静的，单调的。早上来上班，下午回家去。每个人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秩序井然。同事之间和和气气，说说笑笑，亲和得宛如一家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机关像一台永远在平稳转动的老水磨。

然而机关人员的和气、微笑、打招呼、串门，都极有讲究，含有很深的“机关”。对什么人话里话外都得透着点敬畏、恭顺、奉承与无知，对什么人只需点点头，对什么人连点头都不用点，对什么人可以悄悄说点私房话，对什么人则须严加防备、守口如瓶，都是有讲究的。机关是最能体现说话艺术的地方。还有，哪位领导与哪位领导面和心不和；哪位领导掌实权，站队应当站在哪一边；哪位领导即将失势或退休，哪位领导有可能上升，如何适度地既应付前者，又暗渡陈仓，向未来的希望之星暗送秋波，也大有学问。这些讲究与学问没有谁会给你传授，得靠自己

去慢慢品味、领会。世事洞察皆学问嘛。

有那么一种一心只做公家活儿，两耳不闻室外事的懵懂之人，始终不知道留心这些隐蔽的东西，一门心思地以为只要自己有才能、干好业务，领导就会明察秋毫，该有的都会自动落在头上——那可就太书生气、太天真啦。一些年过去，你就会发现，这种从不知道密切联系领导、与同事打成一片的人，多半会原地踏步。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大头干事、一线医生、干活编辑什么的。职务升迁、职称晋升多半没他们的份儿，房子是顶楼小套，工资是远落在同事的后面，年终工作考核常常是勉强及格。大半辈子过去，他由当年那位有理想、有热情、有才干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土灰包小职员。同事们不会同情这种人，人们管这叫“混得不清楚”。

再看那些不太在乎业务，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却很懂得关系的人，善于观察动静、窥测方向的机灵鬼，平时东门进、西门出，与同事说笑拍打，上上下下都维持得一团和气、一派亲热，与领导适度地开开玩笑，见缝插针地递上两句奉承话，逢年过节走走人情，帮领导跑跑腿，办点领导不便亲自出面的私人小事，适时地在领导耳边点两句同事的毛病，等等。这些事做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极为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些年过去，他们多半成了前者们的领导，业务主持人，高级职称拥有者。房子、薪水、名望什么的，全上去啦，这就叫“人情练达即文章”。

有人总结出机关生活的一点诀窍，叫做“三分工作，七分关系”。你还不必对此面露鄙夷之色，仔细想想，确有几分道理，它抓住了人性的一点奥妙。机关里对一个人的评价，以及与此相关的任用、利益分配等，决定权主要握在领导手里，而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感情倾向。他不像电脑那么精确，也不像包公那么公正。他对一个人的印象、判断，常受私人感情的影响。你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做了长期的感情投资和临场表演，领导对你有好感，他对你的能力、品格的印象也就随之提升：“我看那个小X同志不错嘛！”而那些永远躲在办公室里埋头业务的人，从不在领导面前露面，不汇报，不恳谈，不请示，平日也不屑于搞感情投资，领导就对他缺少印象。倘若这人再中点书毒，讲究点人格尊严，来点绝不趋炎附势、弯腰低眉事权贵什么的，时不时还跟领导论论道理，叫叫板，得，那可就离倒霉不远啦。起码，领导觉得你这人刺儿头，有点恃才自傲，不知高低，不太听话，哪个领导愿意要不听话的人做下属？于是，他就成为一个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偏僻角落啦。须知，只要有人，都有爱听奉承话、讨厌批评者的天性。

河北某地的“哥们互联网”

现实社会讲究人情如果仅仅理解为重情、人情味浓那就错了。中国人的人情味

往往带有人情交换的功利趋向。费孝通先生这样剖析道：

亲密社群的团结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的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的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情，也最怕“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互相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①

不送礼就办不成事，这是人们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的“社会潜规则”。尽管物质上的人情往来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和难免的，但巨大的人情费支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浪费。更严重的是，在这数额如此庞大非正常消费的背后，又有多少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的现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曼斯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认为“社会行为是一种商品交换，这不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是诸如赞许或声望符号之类的非物质商品的交换……人类总是通过指明他们的行为能使他们获得什么和牺牲什么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从社会交换的观点出发，霍曼斯又提出了“公正原则”的概念，即：

“存在着一种制约社会交往的普遍规范，人们指望他们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代价和投资成比例……所以，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概念并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如果我们得到的一份报酬多于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感到内疚和局促不安。”

美国心理学家里甘对所谓“公正原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和实验，他认为：“某人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就打乱了我们的心理平衡。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事，我们还没有为他做些什么，我们欠了他的人情。为了恢复平等，我们必须帮他一个忙。如果他提出一项要求，我们就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去帮助他，甚至他要我们用一件比他在帮助我们时还要尽力的事，我们发现拒绝他也是很困难的。”

为论证上述论点，里甘还做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实验。实验是让一对一对的大学生接受检验，其中之一有个是同谋。一种情况是，在休息时同谋者出去后拿回两瓶可口可乐，给被试者一瓶；另一种情况是实验主持人带回两瓶，给他俩一人一瓶；在第三种情况下只给同谋不给被试者。然后在接着实验的间隙让同谋者求被试者买有奖售货的票券，每张票价25美分，如果中彩的话，可得一个巡航模型。实验结果如下：

①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页。

条件	买票的百分数
1. 同谋者给被试可口可乐	86.5%
2. 实验者给被试可口可乐	54%
3. 不给被试可口可乐	46%

注：以上引文和实验见弗里德曼、西尔斯、卡尔史密斯合著的《社会心理学》

该实验证明对善意行为进行回报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很普遍的。

“人情交换”是人之常情，并非我国独有。美国心理学界便有“凡事佐以可口可乐”及“弯曲胳膊，瞄准的刀叉”之说。区别在于，我国民众在人情交换方面的功利性趋向较为隐晦但也更为强烈，所谓“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站在人情的立场上嘲笑商品的社会原则，未免显得滑稽，因为“人情化”的交换不如商品化的交换公平。商品交换是所有者之间平等、自愿而且公开的交易，与第三者无涉；而“人情化”的交换由于不公平，往往就有第三者倒霉。道理很简单，倘若某人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某物，他就无须托人情、拉关系；既然需要托人情、拉关系，那就意味着他要“巧取”不该属于他拥有的东西，而剥夺了别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当有人为了“人情”从法庭上保释了某一罪犯时，他就伤害了受害人；当有人为“人情”为其朋友分得一套分外的住房时，他就伤害了缺房户。这样的“人情”其实是“无情”。

人情交换必然发展为人情网络，近而发展到关系网络。

通过拉帮结派建立关系网，以扩大自己势力的做法，也是古已有之。赵国的相国大成午到韩国看他的朋友申不害，对他说：“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申不害让韩王在赵王面前推荐大成午，大成午当上了赵国的相国，又到韩国来向韩王推荐申不害。要命的是这个大成午想到的不是投桃报李，而是一石二鸟，他要将权力“翻一番”：他们俩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韩国也是我的，我的赵国也是你的；你拥有相当于两个韩国的权力，而我有了相当于两个赵国的权力。“哥们互联网”后，赵国大成午的事就是韩国申不害的事，当然，韩国申不害的事也是赵国大成午的事。

河北省曾出过一桩丑闻，一个县的18个干部结拜兄弟。这18个干部分散在那个县的十几个系统里，而且都是有一定权力的人。他们结拜的目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担”，也就是要织出一张无所不通的网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还要尽可能地获取新的利益。这种民间的结义方式出现在当今公仆队伍中，引起了社会的震惊，有识之士对此大加挞伐。

有些地方的组织部实际成了“织网部”。推荐选择干部，也搞投桃报以李，织出一张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哥们互联网”。

因为客观上有“路子”的存在，在一张网上来去自如的“路路通”者就成为社

会的宠儿。今之所谓“公关”，几乎包容一切通路子的活计，所以武运长久。“路路通”盛行，其历史作用，当然也不是为饥民求大桥、为冤者告御状，“路路通”只有周旋于官场，才最为“神气”。一张“联络图”四通八达，别人眼中的扑朔迷离、盘根错节及山重水复，他可以一目了然，熟门熟径，让他八面来风，访侯门似如厕，玩缙绅于股掌之中。有人说他那个单位有个新来的处长想“动动”手下的小科长，结果一星期内接到从市府到省府的四五十个电话，尽管这些上司谈话的内容无一句威胁恫吓，处长终于懂得自己进了“雷区”，从此熄了那念头。而那胸有“朝阳”的小科长装作若无其事，除了恭谦地每日问安，依旧寡言少语，见了那副神态，你难道不觉得可怕？

某个晚上，你可能在一张酒桌上发现来自不同“部、委、局、办”的主要干部在一起逍遥——他们并非同一系统，不是为研究工作，但是没有法律限制他们“横向联系”，他们能经常地坐在一起，或者因为是同乡，是同学，是某人的袍泽，是姻亲，是某个时代的旧识，等等，这些都可以不计，问题是他们坐在一起能干些什么？那无非是把一张“哥们网”织得更密一些。

十个图章抵不过一个老乡

由于人情网、关系网越织越密，不在网内的人很可能就丧失机会或分不到自己应得的蛋糕。——不找关系办不成事，尽管这是夸大了的现象，但现实的存在确实让人觉得“没有关系不行”。这就形成了实际的人际障碍。由“亲和动机”发展到“人际障碍”，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或者说，是一种人情的“异化”。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情网、关系网也逐渐渗入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当中。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被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搞得又累又烦的王先生，两年前毅然辞职下海办起一家广告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远离穷于应付的各种关系，换一种活法，活得清清爽爽、自自然然……有个性地做人”。

谁知下海不久，王先生就后悔不迭，显而易见，生意场上的“人情”更多，各种“网络”层次更丰富，更难以把握。然而，此时广告生意已是欲罢不能，为避免自己的公司触礁遇浪翻船破产，王先生不得不“忍”字当头，尽最大地努力与各种人打交道。两年过去了，虽然内心里还保留着对“原子式的独立无羁，无依无靠的自我”的向往，但王先生也已开始承认“做生意30%讲技巧，70%讲人和”“生意场上的人际关系够人学一辈子”这类哲学了。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公关形象之于商业往来，人际关系之于生意运作，其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当你进入现代商界，也就等于进入了一个公共关系的时代。你必须在很多方面能够协调各种关系，因为很多人和你的生意有关。“关系不

是万能的，但没有关系是万万不能的”，想要获得利益，你得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尊重他们，做到人际关系的水乳交融。

一位久经商海风浪的人士不无夸张地总结道：生意场上，生意的功用其实就是关系的运作，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拥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就等于拥有了信息的交流渠道，拥有疏解症结的渠道、增进相互利益的渠道。人际关系甚至还可以作资金与资源的替代。

人际关系不仅有好坏高低之分，更有范围大小、质量优劣、时间长短的区别。俗话说，人际关系是张网，这张网可能把你罩住、捆住、牵扯住，让你挣不开，跑不脱，为心力交瘁。但利用关系网也可能使你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四通八达，左右逢源，比别人活得更自由更潇洒，生意做得比别人更得心应手。

所以假如你的人际关系范围大，质量高，而且线路畅通，你不仅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拥有许多选择，而且还可能传递出去很多于你有利的言论，使你的公众形象更加灿烂夺目。

然而编织人际网又实在太累，太耗神，太屈就人格——应酬纷纷、联谊不断、作揖打躬、觥筹交错、微笑外交等一切，成为这个经济时代的人生“特产”。过去，一个人的生存只要在一个方面或很少范围内维持好人际关系就行了，而进入生意场却要在很多方面，很大范围内协调各种关系，要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公关，要对各方赔上自己的感情和笑脸。

正如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做生意本身就累，如果不搞好人际关系，或者想搞好而搞不好人际关系，你的生意就会做得更累。”

“什么叫经济？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个图章抵不过一个老乡。”一位镇长边说边翻开他那珍贵的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地址、姓名。“这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财富。什么管理，科技，信息，人才，统统都是扯淡，最大的效益就是关系！如果让我讲经济，我就专门讲关系效益学。”

因人情网、关系网而形成的人际障碍当然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现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一位家住边远省城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了在省城找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拐弯抹角地托人、送礼，最后终于用不少钱与一家单位签订了录用协议书。

一位重点大学的学生，为了寻找接收单位，联系了八家单位，送了八次礼，最后才如愿以偿。

为什么过去常被人视为清高、疾恶如仇的大学生，现在也加入了送礼的行列呢？

一是社会风气不正迫使他们求职时不得不随波逐流。有大学生反映，现在社会上不送礼，不拉关系就很难办事。送礼，给求职的大学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名在求职中送了重礼的学生说：“父母供养我上大学已经不容易，想不到求

职时又给他们增加负担，我很愧疚。送礼，与我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相悖，我的良心很不安。”

二是求职过程中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许多大学生认为，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办法我们欢迎，但是目前许多用人单位没有严格的录用考核制度，随意性很大，这给了不正之风可乘之机。有的大学生气愤地说：“什么能力、专业，还是钱和关系管用！”

三是人才引进制度缺乏透明度，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大学生反映，在双向选择中，供需双方因为诸多因素限制，使不少学生处于盲目选择中。他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杜绝大学生求职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真正做到凭才能、知识进行公平竞争。

《中国劳动报》刊登文章说，某企业两名40来岁身体健康、具有本科学历的职工，在优化劳动组合中成为富余职工，他俩愤愤不平地说：“如果按照正当的择优组合，在我们这个大学生仅占3.7%的企业，还轮不到我们失业，我们是人际关系的‘牺牲品’。”据该市145家实行劳动组合企业的2 665名富余职工的问卷调查中，持上述心态的有1 894人，约占富余职工总数的7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当前劳动组合中的人际关系已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有些企业劳动组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严重地影响并制约了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湖南常德某2 000多人的纺织企业，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企业靠贷款过日子，不少职工在家待业，而400多名临时工却始终在岗作业或在厂“待业”，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临时工的关系深得很，这个“堡垒”至今仍未能攻破。

被誉为“象牙之塔”的学术界现今也被各种各样的网网入其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学派，只有宗派。到处都有井水不犯河水，甚至针锋相对的不同学者群。他们不以学说为分野，而以人情网、关系网为界线。学术界排他性和互不宽容的风气正在玷污科学神殿的荣誉。

从人际敏感到人际障碍

从人际敏感（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到人际障碍（没有关系处处受害）也可表现为临床的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病患。

在导致心病疾患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人格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直接。实际上，每一种神经症或精神病都对应着特定的人格障碍，而具有人格缺陷或人格弱点的个体则易患精神方面的疾病。

人际敏感是中国人突出的人格弱点，其根源在于中国人具有他制他律的他人取向，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主要是取决于他人对己的评价，而自我感觉的良好与否则完全依赖于人际交往的结果。这种人格既限制了人们的创造、竞争、冒险精神，又

使那些不从众的少数人物备受冷遇、嘲讽甚至打击与迫害。中国人的这种他律人格是从小培养的，每一个体都从早期的家庭社会化中，从父母、师长的训导中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行为是做给别人看的，使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则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为了在他人心目中保持形象，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察言观色的能力，同时伴随而来的人际敏感及相应而生的焦虑症和社会恐怖症就极为普遍了。

对人际关系的注重，对获得他人好感的追求，使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对来自他人指责的恐惧，好像人的一生就是为别人生活，为别人而存在。这种他律人格与焦虑情绪密切相关，如许多人在公众场合怕说错话、办错事，对自己的言行表现严加控制，这是“表现焦虑”；而在别人面前总要刻意修饰，生怕暴露缺点，这是“缺点暴露焦虑”；有的人一面对父母、师长、上级就不自在、不坦然，这是“地位焦虑”。

他制他律的人格特征不仅易于产生焦虑与社交恐怖症，还易于导致强迫型人格障碍。因为他人取向使个体在敏感于他人态度的同时，也不断地审查自己的过失。为了获得他人的好评与赞誉，个体将不可避免地极端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必将谨小慎微、顾虑多、生怕犯错误。人际敏感使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全民族性的锐意进取、大胆改革的精神。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人际依赖和人际制约。所以，人们的苦恼多来自人际关系，个人的心理问题也牵扯到各种社会关系。难怪有人说，美国心理咨询师面对的是求询者个人，而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则要面对求询者的整个社会环境。这种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极易导致社交活动恐怖感，或人际不适症。

人际关系是中国人社会生活里最重要的内容，每个人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是被消耗在人际关系的调和之中，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有着极为复杂的交往准则，如报大于施、礼尚往来；内外有别、亲疏有间；和合为贵、避免冲突；防人之心、不可轻信他人，等等。正是这种复杂性，使不少个体对人际交往充满畏惧乃至恐惧。中国人的社交恐怖症，其实质是畏于为人难，处世难。为人难，是难在抵制自我欲望以达到文化设置的理想规范上；处世难，是难在人际关系的调和和处理上。

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过四个方面的训练：依赖、求同、自抑、忍让，这些训练内容与社交恐怖症倾向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首先，依赖性强是中国人的一大性格特征，其根源在于早期的依赖性训练。依赖训练是出于父代将子代视为己身的延续，故不希望代际间出现断裂，为此要训练子代对父代的服从与依附。过度的依赖性使个体因适应能力低、自立性差而在面临困难时极易出现社交恐怖症。

其次，忍让训练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中国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忍让是保持人际和谐不可少的能力，是一种强大的自制力，自古

有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而如何掌握忍让的尺度，以便在维护人际关系的和合性与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产生心理冲突及心理失调的一个重要的困扰源。据调查表明，中国人普遍受到来自人际关系及人际交往的心理困扰。

能忍则安，“忍”的目的是为了“安”。中国人对安全的需求，包括了身体安全与心理安全。珍视既得利益，不轻易冒险，是为了保证“身”的安全；重视人际关系的和合性则是为了保证“心”的安全。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自我压缩，将个人需要减少到最小限度，是为了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以获得心理的安宁以及他人的认同。有的人为了心安而不惜躲避人群，减少人际接触，以便达到减少人际摩擦和人际矛盾的目的。如此陷入孤独中的个体，往往因既要回避疏远他人，又非常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焦虑以及难以缓解的内心苦闷。因此，求安的性格特征易使个体出现心理自卑、行为退缩以及对人世的回避态度，故极易患社交恐怖症。

10

海南：逃婚者的天堂——虚荣人格

传统文化形成的人际敏感除了使国人的亲和动机过于强烈外，同时也使相应的社会赞许动机过于强烈，因而也就更重视社会形象整饰。说得通俗点，就是更为顾全面子。

脸面与“喜鹊文化”

对面子下定义很困难，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活的人们却可以心照不宣地理解其含义。中国人的脸面意识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但“脸”与“面”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道德需要；后者属于心理需要。这种需要发展为行为的固有化，实际上就形成了虚荣人格。这也是荣辱心的一种表现。荣辱之心，人皆有之，同某种是非观念结合在一起而形成荣辱观念，是极其普遍的。中国人的“面子”，其特殊之处在于重形式胜于重内容，重外表胜于重内里，重外在评价胜于重行为后果。在中国，“要面子”往往不是贬义，“不要脸”，却是最厉害的道德贬斥。难怪鲁迅曾经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面子意识（虚荣人格）的主要表现为：

一、表现的客套

客套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面子精神无所不在。比如做生意，本来为了盈利，可是谈判桌上提到钱却期期艾艾、羞羞答答，甚至张口闭口“钱的事情好说”。又如选先进工作者，选了谁，倘若本人在场，总得来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

在其他场合，类似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一群熟人同上饭馆，本可各付各的钱，但是碍于面子，谁都说不出口，末了，总是争当慷慨者。一位留英学生曾经讲起这么一件事：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同几个外国同学到伦敦游览，上火车前，她依照中国

人的习惯随口说了一句，“我来买票吧！”没想到那外国人并不懂这是客套话，高兴地由她“请客”了。这一来，花去了她一周的伙食费，回宿舍后她难过了半天。

二、打肿脸来充胖子

鲁迅当年就曾指出过两个事实：一是清朝廷的保“面子”术，谈判桌上明明输给了洋人，赔款割地，却不以为然，只要让洋人代表从侧门出进，便自以为捡了便宜；二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外国代表和记者的参观，专门投资兴建了几所模范监狱，用以证明中国监狱制度是何等人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历来提倡求实精神，但是很遗憾，传统的陋习并未终止作祟。直到今天，一些人也仍有专挑好东西给人看的陋习，诸如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的养鸡场、设施最完备的幼儿园等（至今仍有不少城市设有专门供人参观的“外事幼儿园”）明知人家会做手脚，自己也要当“眼不见为净”。至于被检查单位，领导们以即将接受检查来作为“做表面文章”的动员令，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三、文过饰非、死不认错

一旦出了过错，唯恐有损自己的形象、地位，总是百般辩解，采用“合理化反应”。

四、心理代偿

作为一种社会人格，中国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造了一个“中国精神文明第一”的神话。鸦片战争以前，清廷鄙夷地把外族称为“番邦”“夷族”；后来，在洋枪洋炮的硝烟中，好歹承认了自己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人了，又只好用中国“道德第一”来聊以自慰，认为物质文明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雕虫小技。典型的表达方式就是洋务派领袖们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一百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人们还“别看他们物质生活丰裕，可他们精神空虚！”

马克思就曾正确地指出过古老的中华帝国所患有的虚荣人格：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居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五、社会比较

比较作为态度形成的基础，对于虚荣人格的表现有直接作用。实际上，我们有

无面子也是通过社会比较才显现出来的。

某大学数学系的讲师，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学毕业生，他性格内向，平时与人不太交往。在评定职称的过程中，由于他不善活动，平时也没有建立一定的关系网，所以两次都落空了，眼看同一个教研室里那些比较灵活的20世纪90年代毕业的同事们都评上了高级职称，而自己却一次次地被“筛”，他深感压抑，难以抬头。

有不少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穷人一个，但实际上主要是供比较的参照体不同，由此产生的面子意识相异。这种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心理扶贫”。

既然中国人以顾全面子作为一种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已经源远流长，那么，它也将社会管理的事务中体现出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赶超英美”，自然灾害时期的浮夸风，等等，就是在为“面子”贴金。一段时期，新闻导向是报喜不报忧，俗称“喜鹊文化”。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强盛是要通过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赢得。为面子而去争面子，结果，除了露出面子里面的败絮外，一无所得。

贫困学生内心隐痛

2006年福建漳州地区破获了一起特大强奸案，案犯为一铁工厂的工人。数年来，他采取跟踪、入室、守候等方式，专门对上夜班的女工下手。据他交代，受害人至少20人。当刑侦部门对受害人进行调查时，许多人吞吞吐吐、讳莫如深，甚至干脆否认。调查发现，受害人事后均未报案，几乎一致的理由是：“咱丢不起那人！”

在公安人员侦破的诸多案件中，因被强奸而主动报案的数量最少，仅一个“丢脸”的问题，就使更多人遭受蹂躏。其实，不报案的还有更多的类型，如遭遇抢劫或盗窃等，受害人不报案的理由之一便是“丢人”，所以宁愿牙齿打碎了往肚里吞也要顾全脸面。

还有一个典型的表现隐藏在离婚的纠纷中。调查发生，很多离婚之所以难，一个重要然而被隐去的原因就是“丢人”——被抛弃了。为了顾全脸面，死活不愿离婚，从而导致了分居、暴力等后果。

就业问题近年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尽管政府在这方面下了大力气，但仍然有许多人的就业尚未解决，其中原因之一便是许多人挑挑拣拣，许多工作不愿干，认为有失脸面。重庆市一位负责再就业的同志曾经表示：只要不挑不拣，保证人人有工作。在人人都喊工作不好找的今天，莫非工作岗位也真的过剩了吗？事情远非表面上这样简单，许多人仍在抱怨找不到好工作。什么原因呢？说穿了，这些工作岗位大多是少肉的“骨头”，如清洁工、操作工、服务员等，城里人碍于“脸面”不愿干。

政府扶持“弱势群体”有许多具体举措，但这些举措却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

原因仍在于面子问题。广东汕头市曾针对凡持有特困证的特困职工子女就读小学、初中者，推出减免学费待遇。这对于特困家庭及其在学子女来说，本是一个福音。然而新学期开学后，一些特困职工子女宁可让父母借钱交学费，也不肯暴露其家庭“特困”的真相。

一位特困职工的孩子坦率地说：“我宁死也撕不下这张脸。”他说那天班会上，班主任在全班60多名学生面前大声宣布：“谁家的生活不好过，父母属特困职工的，现在先举手……”结果全班鸦雀无声，没有一人举手报名。该同学沉重地说，那一刻我的心好像被谁扎了一针。他说，实在受不了个别老师和同学在谈论“特困”时流露出来的鄙视和嘲弄。

一旦“贫困”两字压在学生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社会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斗富不可取

有个东北人到了深圳，想了解一下深圳人的家居生活，走了几家之后，他不无诧异地说：“每家都摆放着又厚又重的真皮沙发，坐上去又热又不舒服。我真不明白，深圳人为啥要花那么多钱，买这种不实用的东西？”

有这么一个家庭，夫妻两人皆是工人，并不喜爱音乐，客厅里却放了一台“先锋”音响，价超一万元人民币。音响的各种功能，主人大多未用过，唱机没放过唱片，激光装置也不使，只有那么几盒粤语录音带，也积了一层灰尘。我不禁问道：“既然不怎么使用，为何又要买它？”女主人说：“人家都有，咱就得有，牌子、价格还要超过人家。”

愈是阔气的东西愈是要拥有，至于实不实用则不打紧。套用一句经常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广告词，那就是“醉不在酒，醉在拥有”。

以前提倡节约，现在提倡消费，都对。时代不同了。但消费虚荣心却是不宜提倡的。

客观地说，消费上讲点虚荣也并非不可。人都是讲求尊严的，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买些价格明显高于价值的商品，借以自重身份，也未尝不是繁荣市场的个体行为。但考虑到国人目前并不富足，应该提倡的还是以实用为主题的合理消费。

时下有些国家正兴起“反名牌”和“反高价”的消费运动，就是为了抵制贪慕虚荣的消费行为。

保持心态平衡，讲求勤俭节约之美德，少些盲目而无谓的攀比和虚荣，正是应该提倡的消费行为。这一点，对目前之国人尤其有现实意义，与目前的“提前消费”不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伟人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制造了一个新的世纪。眼下“一万、两万特困户，十万、八万不算数，百八十万小康户，千万上亿才算富”，虽然有些吹浮，但的确说明一些中国人真的有钱了。有了钱不知怎么办，有了钱不知干什么。“银行存了几百万，你说麻烦不麻烦”。——怎么办？摆阔！

湖北武汉某老板用5 000张面值50元的人民币当壁纸，装饰儿子的新房。

河南某大款则用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叠成菠萝、熊、娃娃、坦克等“工艺品”，摆在高档家具上。

这都不算什么，还有更绝的呢？

2005年11月20日，京城25岁的富家小申迎娶新娘，用130多辆高级轿车披红挂彩，一溜烟驶过长安街，令围观者百感交集。

长安街上一位交警一时惊得手足无措，以至于手里的步话机都拿反了。事后，这位上岗不到一年的年轻交警说：“我当时真有点抓瞎。因为事先并没有接到上面的通知，说有政治任务过总统车队。那阵势确实让人眼花缭乱：警车开道，6辆崭新的美国‘凯迪拉克’打头，后面是一水儿的豪华型‘奔驰’‘蓝鸟’‘奥迪’。我当是什么人物来了呢！赶紧拿步话机跟头儿通话，头儿也蒙了，没接到上面的通知呀！后来我瞅见了前面那辆‘凯迪拉克’上飘着彩带子，这才恍然大悟，敢情是娶媳妇接亲的车队！不用问，准是大款，有钱烧的，敢这么折腾！”

车队最后驶入京城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宴会厅30多桌宴席已高朋满座，这个婚礼耗资30万！新郎官小申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

大款斗富是一种社会现象。燕莎友谊商城，每双标价3 200元的皮鞋，摆到货架上，不到一星期就卖掉了40多双。据售货人员介绍，一位大款似对这双皮鞋价码不以为然，问道：“还有比这价儿高的吗？”商城的一位销售部经理说：“一件裘皮大衣标价4 000块钱，摆了一年多，无人问津，而一件质地跟它差不多，标价2万元的大衣，却有人买。”

不管舆论界怎么看，追求奢侈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股潮流。

香港排名第一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拥有无数家财，依然住在3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过着平淡的生活，而把钱投向社会公益事业。与斗富者们比起来，真是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对此，不知斗富者们作何感想？

下岗工人、贫困学生乃至超级大款、商界巨头“丢不起人”；处于中间非贫非富的“中不溜”也可着劲儿摆谱，“不输他人”。一句话，都是虚荣人格在作怪。

11

“集体主义”葬送了诺贝尔奖——内耗人格

有一种习惯的说法，似乎西方人重独立，而中国人重人情。诚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注重人与物的关系，因而显得人情味更浓，也更为感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情”更多地表现在“亲情”及“友情”方面，一般的人情则带有明显的人情交换的功利趋向。按逻辑发展来看，重人情则重合作，这似乎比“重独立”更为可贵。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社会心理障碍往往表现为“不合作症”。

半个世纪前，鲁迅就指出：“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半个世纪后呢？情况当然大有改观，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改观。“不合作症”也并非甘地倡导的“不合作”，它表现为所谓的“窝里斗”这一痼疾，我们今天称之为“内耗人格”。

内耗简析

“内耗”的含义是什么？形象的说法是“窝里斗”。但“窝里斗”这个名称不雅，不如“内耗”的叫法来得“文雅”。但用从物理学上借来的“内耗”一词反映“窝里斗”所指称的事实，却有些牵强附会。物理学上，内耗本指一个物理系统正常运行时系统内部非输出的能量自然损耗，它是维持该系统的存在和运行所必需的。而“窝里斗”绝非这么回事，绝对不是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对作为社会现象的“内耗”，有必要在物理学意义外另作定义。从社会冲突的角度看，内耗是毫无社会必要性的破坏性人际冲突与社会冲突。这是说，内耗是破坏性冲突。社会冲突分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前者对社会具有正功能，后者具有负功能，内耗属破坏性冲突，破坏性冲突有两种，一种是社会运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种

是可以避免的，内耗属于后者。

再说，内耗的标的物问题。人们内耗究竟为了什么？大体说来，人们之所以投身于内耗，一是为权力，二是为物质利益，三是为名声，四是为精神上的宣泄。由于内耗围绕的是这些标的物，就使内耗显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损人利己型，一类是纯粹损人型。前者注目于世俗的功利，后者意在自身精神的减压、平衡。显然，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看，内耗的基本目的为争夺生存、发展资源和生存、发展机会，此外，也有精神、心理需要的成分。

关于内耗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六个。

一、目的与手段的不合理、非正义。内耗的目的意在损人，而不以他人的幸福、集体与社会的进步为念。内耗所用的手段则服从于这一损人的目的。因此，在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同时存在非进步性、非人道性、非伦理性和不合法性。

二、内耗一般发生在熟人圈内，中国文化中的“礼”，历来是熟人圈内的成员方可享受的待遇，对陌生人通常无礼可谈，内耗这剂苦药，偏偏也只给熟人圈内的成员享用。

三、对人不对事。人们的常规思维认为，在人际纷争中应对事不对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内耗却反其道而行之，明明白白地对人不对事，即使似乎在对事，心里仍是为了对人，因为内耗的目的就是损人。

四、多以正面突出人物为耗损对象。这一特点，古人叫“德高招谤”“直木先伐”“甘泉必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的人们叫“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椽子先烂”。内耗固然不限于耗损正面的突出人物，但确实以正面的突出人物为主要耗损对象。谁进步了，成绩突出了，才华出众了，德行高尚了，日子舒心了，谁就可能成为耗损的目标。至于模范、标兵、先进人物就更是如此。

五、不求成功，但求别人失败。内耗的这一特点明显地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它追求的是，除非大家齐步走，否则谁也别想挪窝。换一句话说，大家都应吊在一根绳上，要生一块生，要死一块死，谁想自个儿活得比别人好一些，那不行。内耗的耗在这里表现得最清楚、最强烈。

六、背地里做手脚。这是由内耗的目的与手段的不合理、不正当所决定的，它使人说不了口，见不得人，不能光明正大，只得狗偷鼠窃地在暗中捣鬼，飞短流长中造谣、中伤别人。这使内耗之举常趋近阴谋甚或往往就是阴谋。

内耗产生的原因，可分为社会与个人两个方面。

从社会方面看，导致内耗产生的原因有四。第一，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制约。传统社会中的三大弊端是滋生内耗的温床。一是大一统的家长制结构，党同伐异，容不得不合规制的思想、行为、事物和人物；二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在

利益、功业、思想、学识、德行、智慧、能力、享受等人生的一切方面，见不得有居于人们平均水准之上的状况；三是轻礼治轻法治，法律粗疏，不重视、不保护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使得耗人者无法无天。第二，资源和机会的极其有限。就资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适应型文化而非创造文化，所以它能开拓的生存、发展资源非常有限，僧多粥少，为争食而内耗势所难免；就机会而言，传统社会的人生升迁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这种状况迄今尚无根本改变：大家都挤在独木桥似的这条路上，只能互相争斗。第三，社会奖惩导向的偏差。不难想象，如果搞内耗的人总吃苦头，谁还会去干那种赔本的买卖？反过来，假如搞内耗的人十有八九能在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上得好处，比不搞内耗的人得得多，失得少，日子过得好，而不搞内耗的人却总是吃苦头，人们还能不热衷于内耗？社会奖惩机制不完善是内耗盛行的根本原因。第四，群体结构差。群体结构差，是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特征。封建的传统文化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使不少人养成了自我封闭的个性。群体结构差，加剧了内耗。日本人说，单个的中国人胜于单个的日本人，但如果10个组织起来的中国人则劣于10个组织起来的日本人。据美国研究部门的专家说，他们对来自中国和日本参观考察的人，态度正好相反。对中国单个来的特别警觉，因为中国人智力发达，一看就会；如果是两人，则勉强可松口气，这意味着两人往往会“龙虎斗”；如果是五六人的考察团，他们就放心了，因为这种代表团大多是走走形式。对来自日本的正相反，五六个人的可分工协作带走全部秘密，美国人特别紧张……日本管理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人的群体结构强，日本人被称为“组织人”。

从个人方面看，导致内耗的主观原因有三。首先，个人文化素养低，缺少自尊意识和尊重他人的意识；其次，私心和物质主义人生导向；最后，不良的思维定势与行为习惯。一些人染上了搞内耗的恶习，形成思维定势、心态、行为习惯都被内耗争斗模式化。

最早议论中国人“不合群”或“内耗”现象的是梁启超，而最为偏激的则是柏杨，他认为：“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头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体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的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可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一起，就成了一头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

柏杨的言论当然有失偏颇，以偏概全。今天的中国人在群体意识（包括社会意识、国家意识等）方面决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比，但冷静分析，较之其他民族，我们的“内耗人格”毕竟是较为突出的。宏观方面且不论，先从身边说起。朋友聚会聊天，倘要议论自家单位，十有八九历数谁与谁的关系如何，谁与谁矛盾，谁是谁的主人，谁正觊觎着什么位子；而要求调动工作的，许多是因为人际冲突而待不下去的……

下面罗列目前国内“内耗人格”的一些典型表征。

外贸行业的煮豆燃萁

“内耗人格”的表征往往在与“外人”相处时更为明显。作者在纽约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故事：年底，美国老板欲给工人加薪，数额颇大——每人500美元，但他规定：每组只加一人，具体加给谁，由各组民主讨论后决定。这间工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亚洲，故分为日本组、越南组、韩国组、中国组……

通知下达后，秘书要求各组下班前报上加薪名单，日本组最快，几分钟就定出了名单，送给老板一看，老板很满意，此人正是他意料中的人选——技术高、速度快；越南组报上来的是一个技术中等、工资最低的可怜人；韩国组也报上来了，是一个技术最差、人缘特好的和事佬，对此，老板摇摇头，无可奈何。

中国组呢？为何迟迟不报？快下班的时候，秘书再三催促，结果却是：中国人不要加薪！老板听了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真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难道正当的报酬都不要？老板不相信，亲自到中国组了解，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中国组的五个人已经讨论了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他们向老板提出：“要么平均分配，每人加一百，要么大家都不加！”老板生气地把手一挥，取消了中国组的加薪！

一些外国老板得出结论：聘请的中国人最好单独使用，几个人一起就会“内讧”。

另外，在国际经贸活动中，表现在外贸行业的内耗着实令人担忧。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资深人士认为，我们的外贸体制改革需要解决外贸企业之间的“相互残杀”。由于颇多企业竞相压价销售，使全国每年由此损失上百亿美元，再加上一些国家以此理由进行的“反倾销”，损失不可估量。

不少经常来华又谙熟各口岸公司底细的外国公司，以价格为“武器”，熟练地以东家的低价压西家，又以西家的低价压第三家，或者反压东家，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致使我国一些外贸企业损失惨重。

为了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外经贸部曾经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对各商品大都制订了最低限价，各口岸公司为了多做生意，获取外汇，生怕报高了价而失掉客户，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某些单位以各种借口、各种手段来压低报价，如处理库存、给客户特别暗扣……以求多签订单，致使价格不能真正体现价值。如

此“煮豆燃萁”，吃亏只有外贸企业。

在经历了过去的“羊毛大战”“棉花大战”等内耗后，“摩托车大战”曾一度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议。

曾经在越南市场叱咤风云的重庆摩托，出口数量虽逐年增加，利润却节节“败退”，甚至陷入无利时代。

重庆摩托在越南已有“扛不住”之势，在越南办厂的企事业单位已有多家下马，多家从事重庆摩托对越贸易的企业已悄然撤退。“不做、不敢做越南的生意了，”有人叹惜，“这全是重庆摩托在越南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

越南几乎没有公用交通设施，越南人需要摩托车解决“出门难”问题，因此需要广阔的市场空间，加之工业的落后促使越南成不名副其实的全靠进口的“世界摩托车王国”。重庆摩托如潮水般涌入越南市场，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品牌的与杂牌的，都使出浑身解数挤入越南市场“吆喝”，在越南市场展开了血淋淋的价格大战，相互残杀，致使进口单价一路狂跌。

其实，重庆摩托进入越南市场是有优势的，杀入越南不足一年时间，就以性价比优势迅速占领了越南摩托车70%的市场，但是，重庆摩托内耗式砍价杀价，已经拱手将市场让给了其他摩托厂商。

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内耗在知识分子群体是屡见不鲜。“不相容”尽管表现隐蔽，却给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有人问一个狐仙，最害怕的是什么，这个狐仙答道：我最怕狐。人家又问他，狐是你的同类，为什么又怕起狐来呢？狐仙说：“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笔者读《围城》，老是想起狐狸的这段名言来。你看《围城》里的那些角色，高校长、刘主任、韩主任、李教授、陆教授、赵教授……在那“三闾大学”演了多少幕可鄙可笑的闹剧呀！告子说，食色，性也。这些教授们为了饭碗，为了求爱，“全是三头六臂，比人家多个心，心里多几个窍，肠子都打结的。”明枪暗箭，互相倾轧。再看这座围城里的几位女士，见面时嬉笑亲热，一转身却互相诽谤，赌气吃醋，不也是合着“天下唯同类可畏也”那句话吗？看到《围城》中的那群知识分子的神态，难免痛心。

内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所表现，因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及某阶层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导致了内耗现象的复杂化。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多么清高和雅致，也超脱不出客

观社会条件的制约，从而出现内耗。诚然，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使他们之间的“内耗”现象具有其他社会阶层所没有的文化心理基础。

知识分子的天生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究其毕生的精力与时间，去寻觅、发现、阐明真理。然而，知识在某一社会环境或某一社会环节受到了阻滞或破坏时，知识力量就有可能被扭曲、被异化，从而也改变了其原有的形式和性质。知识分子中内耗现象的文化心理的底蕴就在于此。

除了客观性社会因素之外，导致知识这一力量扭曲变性的，还有知识分子的主观原因。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心理，无一不是围绕着求知、求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自重而形成的。但是，如果知识分子把对真理的发现和寻求视为自己个人占有真理的专利条件，那么，很显然，其获得的知识越多越丰富，则其变态性力量也将越强，内耗也就产生了。自以为己不但能发现真理，而且占有真理，摇身变为真理的化身，从而破坏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天然信条，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种种不平等现象，并且会利用、借用这种“不平等”现象，而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必欲让别人也如追求真理般地去尾随、顺从于他（她）。别人倘若不服，便产生了诋毁、攻讦、诽谤、压制等诸种事端。倘若在别人不服的同时，自己也常以真理自居，真理的“占有欲”同样强盛，“内耗”则会加剧，甚至反目成仇。这种“占有欲”如与学术团体配合，则会导致宗派主义；如与研究机构一体，则会形成各单位组织间的矛盾。

此类文化心态，有文人相轻的古老传统在作祟；有家长作风、宗派主义的契合；还有“老婆别人好，文章自己高”的酸臭、迂腐在捣鬼。更深刻、更实质的原因，则是知识分子中权威伦理价值观的沉重与顽固！

诚然，人能弘道、铁肩担道义和舍我其谁的精神与气概，是中国学者志怀高远、宁折不弯的可贵禀性。但另一方面，当它们与学而优则仕、君子求道不求食、读书以治生为上的社会规定联系，并在“圣贤”“王道”的制约之下，将知识学问的“优”立足、归宿到“仕”这一方面时，其人能弘道的坚毅便转换为“吾即道也”的固执，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也会变质为以王道自居的专断。自然而然，所谓知识的力量和学才的优异就成为知识分子的权威基础，再加上以道自居、吾即道也所能赋予的道德色彩，使这权威又具有了伦理的制约作用。服从他、追随他无疑就等同于某些社会公德的遵守。由此，知识分子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极不健康的风气，人人以真理、权威自居，彼此都不买账，“君子有才吾不贫”如此这般，不内耗岂非咄咄怪事！更可悲的是，内耗的双方都“不识庐山真面目”，力争孰是孰非，以求在所谓道德伦理上的自我公正、一贯正确，以表明真理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正是知识分子中依知识、真理独断专行的文化心理，造成了权威伦理，导致了内耗恶果。尽管这也是老生常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了

结；人永远也无法穷尽自身……可是要真正的体验，摆正个人与真理的关系，则远非易事。社会的进步，个人的修养等，对于“内耗”现象的消除皆为必需。然而，权威伦理价值观的突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则至切至要。

知识分子各自为政的“作业方式”导致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保护性的心理自卫等，也是发生内耗的诱因。

现在，诺贝尔奖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获奖者按国籍统计已分布到近50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奋斗了六十余年，可是仍与诺贝尔奖无缘。

实际上，中国至少有一次能获诺贝尔医学奖，因为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是人类首次人工合成有生命活力的结晶蛋白质，使人类在认识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有人提名牛胰岛素研制者得诺贝尔医学奖。可是，胰岛素的合成涉及的单位和人较多，国内为上报名单争论得相当厉害。最后，达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一致意见：“要上一块上，要不都别上。”结果报给诺贝尔评奖机构的名单达14人之多。诺贝尔的评奖原则是，只奖给做出主要贡献的一两个人，最多不超过三人。可是当时中国讲集体主义，不能突出个人，诺贝尔评奖机构又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主持研制人，虽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人为中国提名，终因中国的科研制度问题，也因为诺贝尔奖评选规则，使我们痛失了一次获奖机会。

知识分子群体的内耗还明显地表现在所谓的学派之争。排除异己、“近亲繁殖”实际上在学术界已经是常见的现象。

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成了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报考者一律从严，而对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则宽松许多。据该大学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老师介绍，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据介绍，该大学化学系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在该专业读博士，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大学也极其普遍。

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评说这种现象，“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犹如医学的近亲繁殖一样，其结果必然致使中国学术整体水平下降。不仅如此，硕士生导师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读博士，或者本科同班同学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种学术乱伦，也带来了学术水平的畸形发展。”这位研究人员介绍，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绝对禁止的，同一学校的学生一般不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国各个大学招收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本校的学生。

四川某重点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人们发现四川省以及这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科研人员都是由某知名导师培养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基本

趋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号称“比较文学的四川学派”，在学术上也一致对外。在此次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四川籍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的观点，其众口一词让与会的国外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大声疾呼：“你们应该学习古希腊的学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会下这些国外学者说，如果中国学术界都如此，那么中国的学术完了。

学术的“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成为某个圈子的学术，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红眼病”与女劳模之死

在我国，最常见的内耗就是嫉妒，这是一种隐性的或潜在的内耗，产生的频率却最高。当然，嫉妒也不可能都是一种内耗，作为一种非愉悦的紧张的心理体验，难免会驱动“离轨”行为，然而，隐藏其中的欣羡之情也可能引发或强化主体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这种心理体验虽非人格障碍，却是人格障碍（“内耗”人格）的表现形式。

嫉妒是人的本性，非中国人特有。《旧约全书》中，亚当的长子该隐和次子亚伯都把自己的收获奉献给上帝，都希望上帝会很高兴地接受自己的礼物。但是，上帝只接受了亚伯的贡物。该隐因此不高兴，感到耻辱，他认为，是弟弟亚伯夺走了他的荣誉，因而迁怒于亚伯，并杀死了亚伯。因此，嫉妒也被称为“该隐情结”。

中国历史上，不乏嫉妒的人与事，不少人因遭嫉妒而蒙受不白之冤，或被打入“另册”，或被收监，或自杀轻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前的社会稳态或亚稳态结构均被冲击，权力、金钱、地位、名望等均呈现了变动的分化，由此，内耗人格催生，“该隐情结”也有泛化之势，这类社会心理障碍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扰乱了人们健康的心态。

河南省周口市曾发生一起百余名消费者在一摊点食用了早点后严重中毒的案件。据医疗、公安部门统计，该案件中中毒人数多达140人，生命垂危者16人。

经公安人员调查，一个姓王的包子铺业主有重大嫌疑。其作案原因是王某嫉妒阎家包子铺生意好过自家店铺，遂潜入阎家，将“毒鼠强”放入阎家装碱面的铁罐内。次日，阎用投入毒药的碱面和面做包子，造成100余人中毒。

南京某小吃店主由于嫉妒同行，在其豆浆中掺入“毒鼠强”，导致38人死亡的恶性案件。

曾荣获重庆市劳动模范称号的李修明被犯“红眼病”至疯狂程度的凶手活活打死的报道一经刊发，引发了大众的深思。

44岁的李修明是重庆江津河坝镇自力村人，她通过承包耕地和荒山，种植粮食、树木和药材，饲养家禽，脱贫致富。李修明被评为江津市“粮食生产专业大

户”，在重庆市劳模大会上，市领导称赞她是发展山区农业的好榜样。

李修明万没料到，伴随丰收和荣誉而来的竟是厄运。当地一些人眼看李修明日子好过了，心理不平衡，各种“坑、吃、敲”的招数便接踵向李修明扑来。

村支书眼红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常叫李修明和她的帮工为自己种地，但不给工钱，还要李自带工具和耕牛。村民王某眼红了。他擅自滥砍李家的48株幼树，被法院裁决赔偿400多元、赔栽树240株。但至今未执行。水管员刘某也眼红了，想方设法揩油，不仅自己去水库中打捞鱼不交钱，还邀约别人一起强行捕捞。

最眼红的要数由重庆去该地承包荒山的蒲梅龙、苏昌贵、胡仲书等人。他们见自己的效益不如李修明的好，就要李将水库转包给他们。李不答应，蒲多次寻衅滋事，扬言要打死李修明。悲剧终于发生。

下午，李修明从江津上访返家，路上遇到蒲梅龙等。蒲无端向李掷泥块，并旁凶极恶地吼道：“你太厉害了，到处告状，今天我要打死你！”李修明据理斥责蒲等，蒲梅龙便操起10厘米粗的木棒猛击李的头和腹部，当即把她打重伤。乡亲们发现后，赶紧把李修明送往医院。但因伤势太重，这位辛劳了半辈子的农村妇女在途中停止了呼吸。

这样一位勤劳、善良、受人尊敬的女劳模，却因为他人的嫉妒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实在令人扼腕。

中国人的嫉妒举世闻名，被评为之“东方式的嫉妒”。冯骥才写过一篇文章《富人区》，揭示了这种心态。作者曾向美国朋友，日本朋友，中国南方朋友问过同一个问题：看到富人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会不会嫉妒？美国朋友有些诧异：

“嫉妒他们？为什么？他们能住在这里，说明他遇上了一个好机会，如果将来我也遇到好机会，我会比他们做得还好！”美国朋友如此坦然，平和，自信。日本朋友摇头“不会的，”并解释道，“如果一个日本人见到别人比自己强，通常会主动接近那个人，和他交朋友，向他学习，把他的长处学到手，再设法超过他。”日本朋友理智，善于学习、发展。中国南方朋友就不同了：“嫉妒？”他眉毛一扬，笑道，“何止嫉妒，恨不得把那小子宰了！”中国人如此狭隘，落后，残忍，自己不思进步，却责怪对方不该超过自己。

美籍华人中流传这样的比喻：“下围棋”是日本人的做事方式，“打桥牌”是美国人的做事风格；“打麻将”则是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常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打桥牌”需要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打麻将”是孤军作战，看住下家，防止上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我真忧虑，这种“红眼病”长期熏陶下的中国，会怎么样。

中国人“东方式的嫉妒”还反映在所谓的“武大郎开店”现象阻碍了人才的

发现、任用。就某些国有（这里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有些人有头脑，也懂一些技术是属于那类“明白人”、“内行人”。管理起一个企业，往往会搞得很好。但正因为如此，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又唯恐别人超过他。对于比自己有能耐的下级或部属，不是采取欣赏、培养、重用的正确做法，而是或者不理不睬，或者千方百计的压制。媒体曾公开报道过这样一个消息：一位羽绒制品厂的厂长，在任五年来，挤走了3位副厂长，9位大学生，2名会计师。他所任命的车间主任均有二大特点：一是只有初中文化，二是老实听话，从不提意见。这样的企业前途可想而知，后该厂因毫无生气、产品老化而最终破产。

这种武大郎式的企业家的心灵深处，就是中国人所固有的，与体内的血液一块流动的嫉妒心理。这种嫉妒心理的主要表现就是：我虽然不如你，但也偏偏不让你上来。这种心理的文化背景相当深厚，其根子是小农意识、狭隘、自私，总怕“别人的庄稼比自己的好”，以至于“影响了自己的收成”。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位钢铁大王去世了。临终前，有记者问，你这一生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时，他避而不谈自己企业的钢产量，也不谈自己一生的利润，而是充满欣慰地说：“我这一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我不断地发展比我强的人，并加以重用！”

“红眼病”的诱因一般表现为嫉妒他人的地位、才能、成就，随着我国暴富阶层的崛起，今天还有一个新的突出的诱因，那就是嫉妒他人的财富。事实上，我国正蔓延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贫富心理”。如果此种社会心理障碍得不到矫正，将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

12

自行车比汽车更污染？——自利趋向

屁股决定脑袋

将自利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来阐述是合理的。自利表现为人的自我维护，对自己利益的维护，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行为动力的源泉（原动力）只能是人的诸多需要，其中，人的自利性需要是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充分的行为理由。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作为一种自我维护性需要，自利是态度形成和转变的重要机制。人们的态度确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自利因素的影响，并具有很明显的偏颇性。这种态度的确立，总是以个体特有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为转移，而不是以一般的理性和事实为依据。此外，自利也不仅仅限于维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它也包括个体对其固有态度的维护，尽管这种维护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

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总是倾向于接近那些与自己的固有态度相符的信息而回避相反的。这主要表现在人们态度的认知方面，其中包括信息的选择、理解和记忆的差异。如有关吸烟可能致癌的文章，可读者中约有69%是非吸烟者，吸烟者仅占30%左右；大多数吸烟者不喜欢看“吸烟有害”的文章，而对于宣传吸烟好处的文章看起来却津津有味。琼斯也通过实验发现，被试者并不是从纯粹的理性角度记忆接触到的信息，而是倾向于记住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或固有态度相一致的信息。

自利性因素既然能够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理解、记忆，势必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评论。经常的情况是，人们拥护改革、呼吁改革，但一旦有关的改革措施不利于自己时，便大呼改革“搞糟了”。笔者曾就有关方面课题进行比较性调查，以研究自利性因素对人们态度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事先调查了约500名对象的住户

状况，然后要求他们对房价现状包括提高住房租金做出判断。结果，已购住房的对象大部分预测房价包括房租会持续上涨，而未购住房的对象大部分预测房价会持续下跌。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去分析人们的社会态度，否则，态度分析就显得抽象甚至无所适从。

公众态度的转变涉及自利性因素，社会心理学研究了态度的抗变功能，即公众态度一旦形成便不易改变，其中缘由也与公众需要维护自身心理平衡有关。凯涅尔等人曾向成年人提出一个问题，是否相信报刊上发表的吸烟致癌的论点。做出肯定回答的占总人数的84%，而他们都是不吸烟者，吸烟者只16%。因为对于吸烟者来讲，承认这种情况就是承认吸烟已经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有关研究同时也指出人们比较容易改变他未公开过的观点，而当其观点公开化后，往往倾向于使其合理化，对相反的观点则持消极乃至对抗的态度。这种倾向可以归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需要。合理化在精神分析学中是指公众用一种自我能够接受的理由说服自己，维护心理平衡，实际上，它也表现为自利性因素对于公众态度的影响。

当自利性作为一种偏私的态度和行为站在利他性需要的对立面时，便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心理障碍，因为利他性需要总是反映为社会性需要。此外，自利性需要由于其固有的偏私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妨碍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正确性、社会性。

这方面的表现不一而足，如“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2002年2月6日，人民网发布了新闻《湖南：一场听证会牵动万千市民心》。在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听证会上，关于当时的医疗服务价格，消费者代表认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太低，而是太高”；医疗机构代表却认为“不能反映出医务人员高科技、高风险、高强度的劳动……严重偏低”；而政府部门和法律界等代表的发言便显得“中立”色彩更浓，他们主张价格幅度调整要适当，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应健全对困难人群的义诊制度。

用上例说明“屁股决定脑袋”似乎有些牵强，再看下面一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自利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所具有的性质。

海舸在《上海工运》杂志上撰文说，尽管大多数工会干部在职工群众心目中有良好的形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工会干部忘记了自己是职工群众代言人的身份。他们心里没有群众，对老百姓的痛痒漠不关心，而对如何不得罪书记、厂长，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以至于出现了在企业中发生劳动争议后，由工会主席替代厂长同工人打官司的荒唐事。

这些工会干部形象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把享受“同级党政副职”待遇变成了包袱。他们进了党委班子，但在讨论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时，却和厂

长、书记讲同样的话，有些事情明知不对，也不愿提出与党政领导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生怕丢了自己的位子，犯了“软骨病”。

罗幼培在《法制日报》上撰文说，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然而这一美德今日正在遭受自利的挑战，这种危机已经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社会关系。

一天深夜，一女工下夜班回家，走到巷口时，遭歹徒拦截，她赶紧大呼“着火啦！着火啦！”喊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大家起身后，抓起灭火器就往喊声方向夺去。有见识者，起床后赶紧从家里拨通了119电话。几分钟后，消防车火速赶来，歹徒见状落荒而逃。人们见平安无事，相继回家，唯有消防队长责怪女工“谎报军情”。女工说，深更半夜，我要是照实情喊救命，谁愿意起来冒风险，我只有大喊“救火”，大家才会起床相救。

社会公众是否具备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正常”或者说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备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而自利作为一种社会趋向势必淡化甚至阻碍人们的社会性而放弃社会责任。为一己私利放弃应有的原则，这在当前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多有发生，不仅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出现，就连在学术界也已屡见不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目前，绝对令人担忧的是，为自利而腐败的风气已经明显地蚀坏了“象牙塔”，不少专家、学者为私利搞裙带关系、近亲繁殖就不说了，“学术腐败”目前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利用手中权力满足私欲甚至不惜放弃原则捞钱、捞好处，而脸都不红一下，这就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学术界。

作者赞成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的腐败是真正的腐败！这句话是有深刻含义的。以作者所闻所见而言，一所大学认真整改，综合素质堪“优”但被评审专家评定“良”；另一所大学各方面条件均堪“优”却被评审专家评定“优”，原因在于前一所大学对这些专家教授不甚“尊重”，没有“潜规则”举动，而另一所大学全力以赴搞公关，歌舞会、宴会不必说了，厚厚的红包不必说了，5天评估竟有3天由美女陪伴四处游乐，让人气愤却无可奈何。反映上去，回复只有一句话：“尊重专家。”此类情况在审课题、审项目、职称评审、评奖、评估等方面随处可见，真令人齿冷心寒。

以权谋私已经成为自私趋向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

什么钱最不值钱？

在我国，说到以权谋私，首先就会想到党员干部，特别是具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应该说，我们党风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严重的。自利趋向反映在以权谋私方面，主要有下述特征。

一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二是奢侈浪费，吃喝受礼，游山玩水；三是在干部问题上不按原则办事，任人唯亲；四是权钱交易，为了捞钱不择手段，有的利用掌握人财物的权力，处处“揩油”。

以权谋私最严重且最难治理的当属灰色收入与灰色消费。

“从今年10月1日起，党政领导干部仍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未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不满1 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写检讨，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 000元以上不满2 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款额在2 000元以上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是湖南省2005年为彻底根治领导干部灰色收入出的一记重拳。

湖南省纪委的一项调查表明，不少单位干部的灰色收入已相应或超过工资收入，有些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甚至是工资收入的数倍以至十几倍。各种迹象表明，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还在暗中蔓延，数额越来越大。为刹住这股歪风，湖南省委、省政府就此定了几条“高压线”：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严禁在公务活动中接受非亲友所赠送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严禁以节日、喜庆贺礼等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严禁收受下属单位发给的奖金和贵重物品；领导干部未经批准兼职，包括在临时机构任职的，一律不准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违者，不论领导干部是否知道，都要追究干部本人的责任。

与灰色收入相比，灰色消费则表现得更为猖獗，利用公款挥霍，尤其是赌博的倾向有增无减，广东已破获多起牵涉金额数千万元的特大案件。

办案人员发现，上千万元公款在他们眼中简直等同儿戏，许多款项已无法查明去处，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银行、公司似乎也听之任之，对其缺乏调查，没有制约。查处此案的反贪局同志痛心地说：“如今什么钱最不值钱？公款！因为公款不是某人的款，是大家的款，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挪用公款的灰色消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公款吃喝。中央三令五申，严禁用公款吃喝，但吃喝风仍然久刮不衰，档次越来越高。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某省各大中型宾馆、酒楼，8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宴请招待。

公款行乐。眼下，对某些人来说，酒场上求乐已渐感乏味，享受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出入灯光迷离的夜总会，沉醉于充满神秘色彩的封闭包厢才是最大乐趣。

公款旅游。近年来，出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些官员、厂长经理，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公款上学。一股用公款供子女上学的歪风也悄然刮起。据对辽宁省7所高等学

校调查，学生中用支票、信汇、转账等方式缴纳学费的共2661名，通过核查确定为用公款交费的为813名。

公款送礼。一些单位为了得到上级部门的“关照”，不惜耗费重金送礼打点。某市开展财税大检查，所属粮食系统211个单位居然纷纷向检查组“进贡”。

此外，还有公车私用、公款私存、公费电话、公款炒股等现象。

常规的以权谋私，除主要涉及的党员、干部，其主体也可以是一般的公务员、职员、工人、教师等，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主体，才使以权谋私表现出了一般性，即普遍性，这是最让人忧虑的，自利趋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

中国刮起“审计风暴”

以权谋私的主体一般为个体，但近来以权谋私的主体也扩展到群体、团体、单位、组织。为了谋取所属群体、团体、单位、组织的利益，其方式、方法层出不穷。

下面一则报道摘自2005年12月9日的《经济日报》，文章题目为《关外第一卡》。

出山海关不远，在北京至哈尔滨的102国道上，有一检查站——万家综合检查站，该检查站是辽宁省锦西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绥中县支队所设，是进出山海关车辆必经之地。

11月25日，记者来到这个被过往司机们称为“关外第一卡”的检查站，看到以下几个场景：

场景一：一辆车被检查人员截住，司机被带进检查站内，检查人说：“车上灭火器坏了，要重新买一个。”当被告知买一个新灭火器要花93元时，司机表示“实在没多少钱了”，一位坐在办公桌后边负责开发票的工作人员站起来，“啪”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没钱？出去，外边等着去，不买也行，交100元罚款。”司机见势不妙，躲到一边去了。

场景二：一个带挂斗的解放车拉着运往河北的大米，停到了检查站北侧。30多岁的货主跟记者说，“我经常拉大米从这里过，截住了慢慢通融通融就可以走了。”他还告诉记者，就在大约半个月前也被截住了，开始想拿30元“通融”一下，一看检查人员不要，后又加上20元，塞进检查人员的衣兜，才得以放行。

场景三：在检查站东侧停车场上，一个醒目的“免费洗车”大招牌下，停着一辆货车。记者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免费洗车早已不存在，他们不是来洗车，而是被扣留的。车是辽宁瓦房店市一家花炮厂拉炮药的。坐在驾驶室里吃油条的副厂长说：“车上的货物是从河北拉来的，一切手续齐全，凌晨3点半钟路过这里，他们说没有河北省有关部门的签证货单，一直被扣到现在。”话音未落，厂长和司机从

检查站里出来了，高兴地说：“现在可以走了，原来要罚700元呢。”

据《消费时报》报道，某地一些企业向银行贷款时横遭盘剥，使刚刚活跃起来的经贸活动受到压抑。这些银行给企业贷款时随意提高利率，并无理要求享受赢利后的部分利润分成。为获得贷款，企业只好忍气吞声，而银行则将分利留作自己发奖金。一些企业家呼吁：此风再不刹，经济发展将会受阻。

只要人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如今做这一类“霸道”生意的单位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手里有那么一点权，就想方设法要把它变成钱。自己手里有产品，就以“专卖”“指定”等名义弄钱；自己手里没有产品，就与有产品的单位挂钩，由“管理”者出面发文下通知，由经营单位出面收费。然后，大家坐地分赃。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东北某市一个卫生监督站经营起鼠药，并强行要求一家大酒店购买3吨；某市财政局办起贷款业务，并经营起一家账簿商店，要求企业必须到此购买；……

2006年起，我国刮起了审计风暴，其结果令人震惊，我国的“单位谋私”，即利用单位特权给本单位谋私利的行为极为严重。此类行为既属于“诸侯人格”这类社会心理障碍，也属于本章所阐述的自利趋向。如果这类趋向得不到有效遏止，我国的行政秩序很可能陷入混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需要注意的是，单位谋私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是一些权威性的机构由于具备话语权，因而其自觉不自觉的自利趋向则可能引导舆论甚至决策。

《新快报》曾报道“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不要以为这是笑谈，这是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科学调查与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自行车比汽车更污染环境，谁信？毋庸置疑，这是根本不值一驳的谬论。那些研究者自己都难相信的诊断，为何会出笼？原来，这次环境研究课题是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科研单位既然得到了人家大笔资助，当然要得出一个让出资方满意的结论。

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在金钱铸成的研究者与企业之间互利互惠的圈子面前，不堪一击。类似的圈子还有很多，比如那些经济学家、股评家们与上市企业之间，形成沆瀣一气的圈子；还有一些因血缘关系、师生关系而形成的自然利益圈子；还有通过公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上下级圈子等。这些关系圈，把专家、学者们“圈”得晕头转向。而“圈”出的谬论，又容易误导公众，破坏社会经济正常秩序。对此，那些有良知的科学家、院士焦虑万分，解决这些问题迫在眉睫，而仅靠自律和良知远远不行，必须在体制创新与机制转换上有新的突破。

利益集团还会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利益集团（有时也是一般的较为松散的团体）具有偏颇性，即不具备客观性，同时也要承认其利益所具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由此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13

卫星上找不到的城市——缺损人格

街头电话亭何罪？

与自利趋向这一社会心理障碍相对照的是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反映到了认知方面可归纳为良知偏差、良知缺损。人们对于个体与群体、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缺乏真正统一的认知，即将两者的利益视为一体（当然是有区别性的统一），随着目前社会观念以及相关的社会引导的模糊化甚至部分迷失的状况，人们在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立场更为摇摆甚至排斥利群行为。从“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以及“雷锋叔叔不见了”，缺损人格盛行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课题。

过去习惯上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人更为重视个人，东方文化中的人更为重视群体，我国社会成员属于群体取向。这可能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则不尽然。一项11国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对比研究表明，对于“无论哪个人，在生活中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事情，还要考虑社会大事，你的想法最接近哪一项”的问题，中国个体选择“最重要的是充实自己的个人生活”的人数为64%；选择“仅此不够，要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数为36%；在“偶遇迷路者”时表示要“主动上前帮忙”的人数比例，美国的最高，中国最低。这似乎表明，我国成员的个人取向发展过快，它已经并且仍将给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新时期下的良知缺损冲破了原有的社会规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和谐，加重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与不和谐，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加重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阻碍着社会包括社会文明的进步。

由良知缺损即责任感弱化甚至匮乏而导致的社会心理障碍则是最有标志特征的社会心理障碍。事实上，本书阐述的大多数社会心理障碍都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本章先分析缺损人格，即公益意识缺损和公家意识缺损。

公益意识缺损的直接表现就是人们的公益意识淡漠。

某小区中央有一排花坛，不久花坛上就堆满了各色垃圾，虽不断消除又不断产生，最后终因无人管理成为一片、寸草不生的垃圾中转站。旁边原本还有一个洗手池，几股清泉喷射而出，亦为大家提供了方便。然而好景不长，有的人便把洗手池变成了洗脚池、洗菜池；有的人无聊，在洗手池边“取乐”，用手将龙头堵住，让水四处乱喷；还有人将水果皮、冷饮盒、冰糕纸，甚至石头之类往池中扔，而不远处就有垃圾桶而不愿移动脚步……时隔不久，洗手池因水管被堵塞，垃圾越堆越多而被废弃。

让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从街头电话亭说起。

据统计，北京最繁华地段的电话亭有的一年已连续换过三次。而乱砸电话亭无非以下几类。

日常生活中受了气，上了当，拿着毫无关系的电话亭出气的，路过那儿，顺势一脚。

打电话的一多，老挨不上去的人，急了，顺脚踢一下泄愤。

有些人电话老打不通，急得浑身窜火，只好乱摔电话机，似乎这一摔就能摔通。

更有一帮人，为了获得机盒里的硬币，不惜砸机取钱的。

当然，也不乏拆散了话机设备拿到废品收购站，当废铜烂铁卖了换钱的。

当然，遭殃的不仅是街头公共电话亭，还有其他公共财产，如路灯、公园里的花草、文物古迹，等等。

在历史名城杭州，古物古迹遭到严重损伤。历经千年风雨的六和塔，每层都有乱涂乱画的痕迹。几乎每个人到了这儿都留下“XX到此一游”的手迹。塔后边的乾隆御碑更是惨遭刀斧，十米高的石碑遍体鳞伤。

环境污染与良知缺损

缺损人格的含义是指缺乏应有的公益意识。所谓“公益”当然是指公众利益，这就不光是人们生存的楼上楼下，楼里楼外所涉及的利益，公众利益更为广泛的含义也涉及与公众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物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一个社会的公益意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保护有关。

以人文环境而言，如今书刊市场的“黄祸”泛滥已经严重地侵蚀着人们，特别是不谙世事的青少年。

最容易受到黄色诱惑而失足的是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他们好奇心强，对性有一种神秘感，加上控制力差，由于阅读色情书刊或性描写较多的作品而被诱发犯

罪的数不胜数。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统计，20世纪50年代，青少年犯罪占整个犯罪的20%；60、70年代占31%；80、90年代占45%；到21世纪，这个比例急剧上升，仅在2007年便已经达到72%。有关人员在分析青少年犯罪动因时，都把黄色书刊的影响列为重要的一条。

在某市少管所，2002年至2012年在押犯中，性犯罪占40%左右，最高年度为2008年达52.6%。其中，从14岁到18岁各年龄段看，性犯罪比例呈倒宝塔状膨胀。

在南方某市，2011年抓获的84名卖淫者中，25岁以下者有69名，占卖淫妇女总数的82.14%，其中16岁以下的有21名，占25岁以下的卖淫者总数的30.43%，而最小的才13岁。

镜头之一：北京市朝阳区某街道，十几名少男少女聚在一间小屋里鬼混。公安人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公安人员问：“谁叫你们这样干的？”一男孩答：“书里这样写的，我们跟着学学。”

镜头之二：河南新乡市某电影院前，鱼贯而出的人群中，6个十五六岁少年，叫住他们熟识的一个姑娘，连哄带骗地带到一个建筑工地，他们其中的3个把她残暴地轮奸了。这3个少年分别受到应有的惩罚。公安人员问其中的赖×：“为什么强奸？”赖×答：“学校里流传口袋本，我们看上了瘾。坏书看得多了，就想‘试一试’。”

“黄祸”泛滥在目前实际上还包括色情网站等，限于篇幅就不列举了，其危害同样是触目惊心的。

“黄祸”泛滥的动因是什么？从制黄贩黄的动机看，无非是一个“钱”字。

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无视公众利益的缺损人格，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匮乏的问题，自然环境就因为社会责任感的匮乏而深受其害。环境污染的背后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经济发展，服从经济利益。

天蒙蒙亮，某养鱼专业户就急急地起身穿衣。他就在老黄狗的第一声吠叫中推门而出，快步向鱼塘走去。

鱼塘上方雾气弥漫，他打开手电筒，蓦地，他在岸边柳树下发现了条条翻着白肚皮的死鱼，死鱼密匝匝地覆盖了整个水面。

他是全村最大的养鱼专业户，承包着18亩鱼塘。两年中，他先后投入3万多尾鱼苗。那一汪碧绿的池水，曾给他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啊！但是，乡镇企业无计划发展，也时时给威胁着鱼塘。最严重的是紧挨鱼塘的那家饮料厂，一年前曾因将200袋处理的饮料偷偷扔进鱼塘，造成水质富营养化而引起死鱼事件。官司打到县环保局，饮料厂以负责赔偿直接经济损失5641元而了结此案。谁能料到水质污染的阴影又再次袭来！

当天上午，经县环保局紧急勘察，发现造成死鱼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该饮料厂

8个大口径的倾倒废糖蜜的水缸，因暴雨导致糖蜜全部溢入鱼塘，废糖蜜在水中分解时耗费大量的溶解氧，造成鱼因缺氧窒息而死。另一边，不远处的一家工厂，在鱼塘附近堆放含碱性的废渣，大量碱质随雨水流入鱼塘，又致使大批鱼碱中毒。

望着满塘他曾寄予无限希望的死鱼，他失声痛哭！

水污染的悲剧不断上演，大气污染同样由于一部分人的急功近利，无视对社会公众，对子孙后代、对整个人类都是生死攸关的环境问题，以污致富，其结果令人忧虑不已。

我国某市仅在数十平方公里的城区中就分布着420家工厂，其中排污企业200多家。昼夜不息的滚滚烟尘形成一个巨大的气盖扣在城市的上空。除了自然环境受到缺损人格的影响，就连我们的人文环境也遭到了冲击。庸俗、低俗的文化产品充斥 in 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令人苦不堪言。

缺损人格的表现是公益意识淡薄，致使人们缺乏应有的环境保护意识，包括人文环境、物理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其诱因正是出于自利，由于排他性的自利而导致责任感的弱化或者匮乏。

将缺损人格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社会心理障碍之一，其依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社会比较的结果。这种社会比较的结果不得不使我们承认现实带来的窘迫。

在汉堡定居的一个中国人，对笔者讲了他的一次亲身感受——

他刚到汉堡时，跟几个德国青年驾车到郊外游玩。他在车里吃香蕉，看车窗外没人，就顺手把香蕉皮扔了出去。驾车的德国青年马上“吱”的一声来个急刹车，然后下车拾起香蕉皮塞到一个废纸兜里，放进车中。并对他说：“这样别人会滑倒的。”

在欧美国家的快餐店里，有个不成文规矩，吃完东西要把用过的纸盘纸杯吸管扔进店内设置的大塑料箱内，保持环境的整洁。为了使别人舒适，不妨碍、影响别人，这叫公德。

在美国碰到过两件事：

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猫腰在地上拾废纸。当风吹起一块废纸时，他就像捉蝴蝶一样跟着跑，抓住以后放进垃圾筒内，直到把地上的乱纸拾净，拍拍手上的土，走了。这人是谁，不知道。

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休息室的一角是可以抽烟的，里面摆着几个脸盆大小的落地式烟缸，内部全是银色的细砂，是为了不让里边的烟灰看起来难看。但大烟缸里没有一个烟蒂。我用手一拂，几个烟蒂被指尖挑起来。原来人们都把烟蒂埋下面，为了怕看上去杂乱。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这样做。

他国民众的公益意识时常见诸报端，世界杯足球赛有一报道引起了作者的注意：日本队以0比1败在克罗地亚队脚下，未能创造出线的“辉煌”。球赛结束，清

洁工人打扫现场，却发现无论在现场观球的日本人的场地，还是大屏幕下日本人的聚集地，一点垃圾也没有，所有废弃物已全被日本人装进自备的塑料袋。法国电视台甚至直播了日本人“清理看台”的情景。从记者发回的照片上看到，几个日本青年人甚至跪在地下收拾着纸片，日本人清理看台的镜头着实让法国人“感动”了一阵子。这些日本球迷创造出比球队赢球更令人心动的新闻。

输了球，照理球迷会乘机发泄一番，就不违法乱纪，不扔点空罐子、纸屑、杂物什么的也太不正常了。可这些日本球迷却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清洁工来，真有点令人费解。感叹之余，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许多出国回来的人都感慨地说，人家确实比我们文明多了。无论是社会秩序、环境保护，还是言谈举止、职业道德等都让我们自叹不如，甚至有人说由于我们“不拘小节”，在国外遭遇尴尬是常事。

一位从匈牙利归来的朋友告诉笔者，她是因为租不到房子而回国的。笔者感到奇怪，掏钱怎么会租不到房子？她说有的中国人卫生意识太差，住了人家的房子走了以后，人家要重新装修房子，收的租金不够装修费用。凡是租给中国人住的房子，大都是没有装修的，因为这样弄脏了也不怕，但这样的房子很少，所以中国人在匈牙利很难租到房子。

欧洲国家都很重视环境卫生和保护动物。听人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对中国夫妇，在悉尼多年一直没有怀孕，他们觉得很奇怪，两人体格都很好啊。他们找悉尼的中医、西医看了，也查不出个结果来。最后，一位心细的老医生问了一句：你们在悉尼平时都吃什么？夫妇俩刚开始还吞吞吐吐，在医生的一再追问下，才不好意思地说，他们的住地附近有个公园，平时他们经常到公园里捕些鸽子来补补身子。医生听完，恍然大悟，症结终于找到了。一年后，这对夫妇高兴地抱上了孩子。为什么？原来，悉尼人非常注重环保，城市里到处绿树成荫，鸽鸟成群。人们非常爱护这些动物，并和它们友好相处。但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鸽子繁殖得太快太多，简直到了鸽满为患的地步。最后悉尼政府想出了个方法，长期给鸽子吃避孕药，不让它们自由繁殖。这样，鸽子的肉里都有避孕药了，那夫妇长期偷吃鸽子，还能怀孕吗？

笔者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某某外国旅游城市包括韩国、泰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旅游点都专门设有汉语标志“请不要随地吐痰”、“请别乱扔垃圾”、“请勿大声喧哗”等，着实令人羞赧。有一位名叫张成的作者所写文章，让人不禁感慨，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看，在社会责任感方面，在公益意识方面，国人确实存在着一种心态危机，这种危机往往也是生态危机的心理成因。下面是文章摘选，刊于《读者》2007年19期。

1994年我去瑞士学旅游专业兼酒店管理，十几年来，作为导游我经历了中国内地游客在欧洲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我知道我的同胞多么渴望了解欧洲，可有些游客身上存在着许多与欧洲文化格格不入的习俗，我们花掉自己的钱，填满了欧洲人的钱包，却给人家留下坏印象。

在欧洲的宾馆里，特别讲究的一个词就是“安静”。我们一些团友，一进宾馆就大声地讲话，相互串门，同时还要打开电视，尽管听不懂，甚至都不看，也要把音量放大。

欧洲许多地方严禁吸烟，你要吸烟的话必须事先声明，以便人家把你安排在特定的房间，不能在客房里吸烟。我们这些团友，烟民不少。他们往往把烟点着后才发现找不到烟灰缸，后来直接把用来喝水的杯子当烟灰缸，盛上半杯水，把烟灰弹到里面，烟头扔在里面，还以为这样做是文明行为。岂知人家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做法，他说你吸烟污染了房间，干吗还要糟蹋一只水杯？那只水杯还怎么用来喝水？

此外，我最慥的是进餐馆，尤其是进宾馆的西餐厅和外面的西餐馆。

我时常提醒大家吃饭时小声说话，喝汤时不要“呼噜噜”乱响，我害怕刺激了我同胞们的自尊心，用的是一种委婉甚至恳求的语气。大家开始会按我说的那样做，可是转眼就忘，一拿起筷子就哇哩哇啦地大声讲话。每当这时，我会觉得那些西方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刺着我的后背。

欧洲宾馆里的早餐一律是自助餐。不用说，谁都知道自助餐是只许吃不许外带。而我们的一些团友，吃饱喝足之后，还要往包里、口袋里塞进许多东西，例如面包、点心、小包装的果酱、黄油、酸奶和各种水果，个别的甚至连刀叉都要拿，说是留作纪念。

他觉得反正人家也不知他是谁。别忘了，人家可知道你是中国人！

一年冬季，我接了东部某省的一个公务团，全是各县的主要领导干部。

这个团，十几天来做了不少“露脸”的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法国宾馆里。头天晚上，整团在巴黎红磨坊看表演，大家一兴奋，红酒喝多了。回宾馆后两个同屋的人全都内急，一个一屁股坐到马桶上，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冲着浴缸就尿起来，尿水还没冲。

第二天，酒店大堂经理非常生气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事。

我按照名单找到那一房间的两个房客，问他们怎么回事。其中瘦点儿的那个不说话，另一个矮胖、脸红红的，眼睛一瞪对我说：“胡说八道，怎么会是尿？是茶！”我便回复酒店大堂经理，您大概是误会了，我的团友说那不是尿，是茶。不想，人家马上反驳我说：“对不起，收拾那个房间的服务生恰巧就是你们华人，他十分清楚什么是尿，什么是茶。”我一听就没词儿了。

当晚那个矮胖的县领导打不开自己的房门。我过去一看就知道了：磁卡式钥

匙，人家换了密码，不让他们进去，要向他们讨要说法。我只好带着他们去服务台，果然，人家找他们要罚款。

不想，这位矮胖的县领导一听就火了，当即大吵起来，拍着人家的台子喊：“我们交了房钱，你凭什么不给我们开门？那是茶！就是茶！不是尿！”其他的人闻风而动，也都跑来帮腔，大厅里喊声一片，乱成一团，而且问题很快被提高到政治的高度。矮胖的县领导慷慨激昂地对人家喊：“你们这是歧视我们中国人！告诉你们，别再以为中国人好欺侮了。要钱没有！”

那么多人拍着台子大喊大叫，人家招架不住，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很快赶过来，向双方了解情况。我怕影响旅行行程，马上对酒店大堂经理说：“OK，罚我吧，我出这个钱，请您马上把房间打开。”回过头来我又对大伙说：“好了，问题就解决了，罚款不要了。”一群人立即就什么都不说了，扭头就走，一副得胜而归的模样。

第二天，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我的这些团友想去厕所时，一看要收费，却不愿意花那几文钱，可他们在购物、喝酒时却挥金如土。于是他们站在公路旁，双腿一叉冲着草地尿开了。而那场面，恰巧就被一位路过的巡警发现了。对方把他们叫住，哇哩哇啦地一顿训斥。被抓了现行的那些人尽管听不懂，也明白警察是在骂他们，但谁也不说话。不能随地大小便，就连小孩儿都知道啊。人家这么好的环境，你们这么多的人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地撒尿？这回都知道理亏了。

警察问我这是一些什么人，我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公务员、受法国某公司的邀请前来考察。我没有好意思说他们的官衔。“公务员？”警察觉得奇怪，又仔细地检查他们的护照，觉得这些人确实不像是偷渡者，便很认真、很严厉地对我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马上请他们出境，我们有权立即终止他们的外事活动，并通知外交部，永远拒绝他们的外交签证。”

集体利益之殇

除了公益意识缺损外，缺损人格的另一个方面即是公家意识缺损，指对国家、集体、单位、组织的利益主，要是资财方面缺乏应有的责任感，相反，一有机会还“盗公”“损公”“挖公”，无所不用其极。

重庆市沙坪坝区邮政局曾经突击检查当日从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学院和重庆药剂学校信箱中开取的信件。

检查结果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在当天下午检查的6 487件中，不合格邮资高达987件，占总数的15%，损失金额684.6元。据此推断，这些不合格邮件每年就足以让该区邮政局蒙受9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而从全市范围推断，每年因为不合格邮件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在1 000万元以上。这个巨大的黑洞足以让人震惊。

再举一例，在青海省刚察县热水至江仓的公路上，满载钢筋的汽车、手扶拖拉机不断行来，此情立即引起了养路工人的警惕。养路工人立即联想到近来公路上有好几座桥梁被毁，钢筋被盗的事，于是将情况报告了上级单位和当地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人员很快赶赴现场。最后，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案分子15名。据调查，热江公路从37公里到93公里处有7座桥梁被炸毁，桥面破坏严重，钢筋被挖走，致使公路不能通车。

为挖取钢筋卖废铁居然可以接连炸毁7座桥梁，胆大妄为到何等地步？还有因卖废铁而偷盗航标设施、火车地面感应器以及架空馈线、电缆的，无一不触目惊心。

《航海》2012年第2期刊文披露，在海上形成视觉航标链的上海、温州、福州、厦门四个航标区，每年被盗破坏的航标设施的数字几乎呈直线上升。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内管标范围最广、标数最多的上海航标区已发生十余起航标被盗窃破坏案件。地处沿海开放前沿的福州航标区共发生34起航标被盗窃破坏案件。福州平潭航标站共管辖着25座航标，可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发生了22起航标被盗窃破坏案件，约占该站管辖航标总数的88%。

2011年12月29日晨8时40分，枝柳铁路湖南中转车站人员发现一列货车没按调度令停车，呼啸着冲过中转站往北直驶，不禁大惊失色，因为此时一列南下货车正从怀化南站迎面开来。幸好由于及时发现并采取紧急措施，才避免一场列车正面相撞的巨大灾难。

北上列车为何要违令抢先呢？谜底很快揭开，原来该站南头的机车地面感应器被盗。案犯将地面感器拆卸后变卖给废旧物资收购店，每个1 000多元的地感器仅卖几十元。

据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盗窃通信线路的案件近万起，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间接损失难以估量。近些年来，全国长途通信干线被偷割得遍体鳞伤。以重庆地区为例，其偷窃程度居全国第一。记者到重庆长途电信线务站采访时，站长、书记、工会主席、保卫干部等都不在，一幢空旷的大楼仅仅只有几个人在机关值班。原来昨晚又发生案件了，机关干部大都去抢修线路去了。在家值班的工程师张凤祥同志告诉记者：“我们都被罪犯偷麻木了，若几天没发生线路被盗，还感到‘不正常’”。这话听来让人酸楚。

此外，部分干部、职员、工人私拿“公家”财产在一些地方蔚然成风。

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着一句话“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被践行着，甚至放大着。在全国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公物私拿现象，有人曾将“以厂为家”曲解为“工厂就是我的家，家里缺啥

厂里拿”。于是，偷“公”、“拣”料也就理直气壮了。

据某食品厂质检负责人介绍：厂里每逢月饼生产旺季，不少职工，特别是因人手不够招进来的一批临时工中，不少人偷拿月饼及一些高档糖果饼干，有时一天要丢失几十盒，尽管厂里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可仍屡禁不止。

在其他企业，这样的现象广泛存在，反正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职工们如此顺手牵羊、化公为私，却不感到惭愧，而是心安理得，甚至还满腹怨言。有一名工人，因屡次偷拿厂里的工具和材料被保卫部门查出。他对自己的行为毫不隐瞒，反而振振有词地引用了一句顺口溜为自己辩护：“十个工人九个贼，不如厂长拿一回。”他还质问保卫干部：“我们一起去查一查全厂一些党员、干部的家里，如果他们家里没有公家的东西，就是判我死刑我也心甘情愿！”说得众人面红耳赤，无人敢答“可以”。

的确，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现象也不鲜见。他们明拿暗占公家财物的情形并不比普通工人少。一位厂级领导干部，趁着近年来房屋装修热，把家里统统整修一新，吊顶、暗线、喷漆、打地砖、封阳台、装饰，这几项没有5位数弄不下来。但据知情人透露，他仅仅象征性地付了1000元，外带几条没有花钱买的香烟。既然有如此“上行”，自然也会有那般“下效”了。

上述现象尽管普遍，但还只是一般性的“盗公”“损公”。与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玩忽渎职、监守自盗而给国家造成上亿元损失的行为一样，均是由缺损性人格所造成。由于我国所有制的特征，强调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显得特别重要，矫正国民的“缺损人格”，这对于目前构建和谐社会，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4

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冷漠情结

冷漠泛滥

因责任感弱化或匮乏而导致的良知缺损，除了因缺乏公益意识及公家意识而表现出来的缺损人格外，另一个相关的社会心理障碍就是人们经常表现出来的冷漠症。

有一则小品文：一个怀孕的妇女上了公共汽车。站在过道里的乘客甲悄声对身边的乘客乙说：“这个女人肯定会催眠术。”乘客乙：“你怎么知道？”乘客甲：“你看，她刚一上车，所有坐在座位上的人都昏昏入睡了。”诚然，上述现象并非普遍，但如果从更普遍的现象分析，当代中国的“冷漠症”并非空穴来风。

某市“黑诊所”使数名孕妇母子双亡，市民反应强烈，记者就此事到该市卫生局采访，只见几个干部在聊天，处长躺在沙发上一动未动，一脸不屑，说此事归防疫处管。记者又到防疫处，处长正躺在沙发上与两个人聊天，听说要采访，也是一动也不动。一位副处长说，要采访先列个题目打个报告吧。无独有偶，记者同该市数千摊位无端被砸、商品被毁的商贩代表一起采访该市信访办，上访者请求科长协调解决，那位科长板着脸说：“这不存在协调问题。”上述这些就是可怕的冷漠症。

冷漠是一种没有热情，既不表示爱也不表示恨的态度，在关乎人命与财产的事情面前，官员们的冷漠是可怕的。

令人深思之处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侵害时，依旧保持冷漠，这会造成什么局面呢？人人都保持冷漠，这个社会又会怎样呢？

官员们为何冷漠？其根本原因还是其责任感的弱化。然而，仅仅指责人民公仆的冷漠是不公允的，客观而言，公务员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现在已经

有了较大的改进。冷漠症还有其群众基础，如果追溯起来，也与民族“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劣根性有关。而这样传统的人生哲学又与现代流行的西方个人至上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使老百姓普遍冷漠，以致出现人见恶不愤、见忙不帮，甚至见死不救等事情。

下面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小学6年级学生张某在离岸仅2米、水流平缓、江水不深的地方落水身亡。导致此悲惨事件的原因竟是周围大人无人伸出援手，而是以“不会游泳”的原因搪塞。

师生为张某的死亡痛惜不已，更为当时出现的场面感到愤怒。他们大声发问：“孩子在水中挣扎，有人跪下求救，两个不会游水的小学生都奋不顾身下河救人，可是划船上的大人们为什么连救生圈都舍不得抛？何况这里水势平缓，离岸又近，最深处不过2.5米，浅水处才1.3米。熟悉水情的船工为何见死不救？”

这种冷漠症着实令人齿寒。

据《辽沈晚报》报道，2004年2月10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大石桥市某精品店的岳某从太阳城某银行储蓄所取出8万元现金，被3名歹徒盯上。当岳某将现金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内，准备走出储蓄所时，被歹徒从后面蒙住眼睛，歹徒用刀逼住岳某，遭到岳某的顽强反抗，搏斗中，岳某的手被划伤，下颌被划开，满脸鲜血，现金散落一地。

歹徒捡起大部分现金火速逃跑，而此刻，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旁围观的10余人不顾倒在血泊中的被害人，开始疯狂抢夺散落在地上的现金，岳某在血泊中艰难地大喊：“先别抢这个钱，帮我把罪犯抓着，回头我给你们钱……”

尽管被害人呼救，但现金很快被抢夺一空，随后，这些人很快逃之夭夭……

再说一个悲惨的故事。北京某国企的一对失业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生产。于是，丈夫借来一辆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立刻到大医院，否则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丈夫咬着牙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驶，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那时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车绕道前往医院。由于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惨剧的罪魁祸首是冷漠。长久以来，冷漠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被赞扬为“坚强”和“勇敢”，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被要求成为“特殊材料”制造成的人。

我不想过多地谴责那个不通人情的警察，他不会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会认为自己是“忠于职守”的。是我们共同制造了一种以冷漠为“光荣”，以冷漠为“进步”的社会氛围。我们以为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芜、一无所有的旷野。冷漠的尽头是麻木，笔者想起了作者卢跃刚在《大国寡民》中说过的的一句话：“贫穷和愚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由血腥走向觉醒和反思乃至忏悔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却在血腥中变得冷漠和麻木，他们拒绝忏悔和反思，他们毅然选择逃避和掩饰。如何对待历史，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现实，这两者是相通的。不肯面对历史苦难的人，同样也不肯面对现实的苦难。他们不把冷漠看成一种罪恶，反而将其当成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存策略。

任何阅读过《拉贝日记》的人，任何亲身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都会被那些恐怖的场面所震撼。在德国，集中营已经成为纪念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的疤痕。在一间阴森的地下室里，装满孩子们玩具的箱子被细心地码在一起，堆积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们的小主人们来挑选。在许多小箱子上，用粉笔写着“丽贝卡”“伊莎克”等成千上万无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见，而这些人被暴徒们扔进了毒气杀人室。

今天的冷漠实际上来自于不肯承担昨天的责任。全民共忏悔的呼吁，直至今天还被当做笑话，并遭到聪明人的围剿。社会责任感的淡化，直接导致了现实社会生态的恶化；对责任的躲避，直接带来了冷漠心态的大面积扩散。

纽约凶杀案在中国重演

冷漠症包含了责任分散、趋向刺激、被动恐惧、趋向刺激等因素，我们首先来分析责任分散与被动恐惧。

类似见死不救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不少涉及当事人与歹徒斗争，旁观者众却无人出手相助，仅举几例：

在广州一家餐馆，记者安珂被行窃歹徒杀害，餐馆内外的围观者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合肥市一路公共汽车售票员陆忠被行窃歹徒杀死，全车乘客无一人相助；山东泰安六中女教师于元贞擒捉窃贼时，被歹徒切断动脉，因抢救不及时而身亡，当时围观者也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空军某政治处主任、安全飞行一万里的国家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商店抓住窃贼时，被窃贼刺伤倒在血泊中，围观的群众不仅没有一人挺身而出，而且闪出一条路让凶手从容逃去。当一名过路的大学生想拦汽车把李鹏礼送往医院抢救时，几辆汽车司机不加理睬，疾驰而去，最后虽遇到一位好心的司机，但为时已晚，到医院后，李鹏礼因失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

上述见死不救的场面，平心而论并不是我国的“国粹”，这一幕幕悲剧也不时

在西方上演并引起广泛的研究。

1993年的一个晚上，一位妇女在美国纽约市的一条街道上行走。突然有一个男子从暗处冲出来攻击她。她拼命挣扎、抵抗，并大声呼救。搏斗和呼喊持续了半个小时，最后这位妇女还是被歹徒杀死。妇女的呼救声，出事地点附近居民中有很多人听到了，而且有些人还走到窗前查看，但没有一个人走出门去帮助她，甚至也没有人报警。报纸上披露这一事件后，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并开始对“利他”这一社会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利他行为是人际交往的特殊形式，通常见于人们的短期交往，是一种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助人行为。心理学家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和研究结论得出，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为“他人在场”。

心理学家拉坦内等人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安排被试者单独或者与其他人待在一个房间内填表。几分钟后，从隔壁房间传来了一位妇人的摔倒声和呻吟。当被试者是单独一人或者与朋友在一时，在这种情景下，有70%的被试者会跑过去帮助这位妇女；被试者与一个生人在一起时，则只有40%的人采取利他行为；与一个消极的同伴在一起时，就只有7%的人采取上述的行为了。

“他人在场”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人们的从众心理或模仿心理。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总是倾向于使自己的行为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因而往往依赖于他人的反应。社会心理学家们观察到，如果一个受难者倒在地上，前面的过路人袖手旁观，后面的人也往往漠然置之，一旦有人去相帮，其他人也会仿效。

“他人在场”也可以归结为责任分散。在他人在场时，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责任小了。他们往往认为：“这么多人在场，肯定会有别人出面的。”而如果单独在场，就可能觉得责无旁贷，从而迅速地做出利他反应。拉坦内等人的另一个实验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让被试者单独待在一个房间与其他房间的人进行电话讨论。在讨论中，对方述说自己身体不适，接着就传来了摔倒声，讨论同时中断。实验条件分为三种：第一种条件下被试者觉得他只是与一个人讨论；第二种条件下被试者觉得他是与另外两个人讨论；第三种条件下被试者觉得他是与另外五个人讨论。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条件下，85%的被试者很快就做出了助人的反应；在第二种条件下，有62%的被试者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第三种条件下，则只有31%的被试者做出了反应。由于被试者看不到其他人的反应，因而就排除了从众或模仿的影响，而是责任分散的因素在起作用。当在场的人越多时，个人感到的责任就越轻。

最先提出“责任分散”的是法国心理学家林格尔曼。

林格尔曼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拔河”。他让一些年轻人分别以单独、两人、三人、四人……直到八个人为一个小组的形式拔河，用测力器测量他们在不同群体中用力的情况。林格尔曼发现，当他们单独拔河时，平均拉力是63公斤；两人

组的拉力是118公斤，比平均叠加值少8公斤；三人组为160公斤，比平均叠加值少29公斤……八人组256公斤，比平均值叠加值少248公斤。这个实验表明，群体力量的总数低于个人力量叠加的总和，群体合作的内耗现象确实存在。林格尔曼把这一现象称为责任分散——当一个人单独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他独自承担责任，会有积极的反应，但群体完成时，人们希望别人多承担一点，故常常有退缩和保留。

众多围观者见死不救的冷漠症便可以归结为责任分散——总是希望有他人来管这事，用不着自己出头。

此外，也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诱因，那就心理学所称的被动恐惧——因担心自己的行为得不到外界支持而衍生的恐惧心理。许多文章在谈到此类冷漠症时，都异口同声地指责当事人缺乏正义感、公德心，这样分析是不完全的或者说并不具体。很难想象在几十个乃至上百人、几百人的围观者中，所有人都是缺乏正义感、公德心的。可以断定，其中不少人亦有行为的冲动，但因为责任扩散和被动恐惧心理作祟而蹑足不前。

下面一例是发生在长途客车上的案件，与责任分散和被动恐惧相关。

1998年，北京军区某高炮团三连战士魏学雷坐上了江苏姜堰通往北京的双层卧铺客车，赶往部队。上车后，小魏将皮箱放在过道中间，晚10时30分左右，小魏发现两名歹徒正在撬自己的皮箱。“这是我的皮箱，你们拿它干吗？”两人一愣，随即扣上箱子推给小魏，并示意他不要吱声。这时，下层卧铺上一操着江苏口音的人小声告诉小魏，他被这伙人抢走了3 000元钱，小魏大声责问两名歹徒：“你们这是明目张胆地抢劫，快把抢的钱退出来！”见有人“找事”，两人凶相毕露，掏出水果刀指着小魏：“臭当兵的，少管闲事，小心我们戳死你！”

“我这个当兵的管定了这个事！”小魏大吼道。一看小魏胆敢“叫板”，车厢头部又站起两名歹徒，四名歹徒会合在一起，挥舞着亮闪闪的尖刀朝小魏猛刺过来。小魏边和歹徒搏斗边高喊：“抢钱了，大伙快帮忙抓歹徒啊！”谁知，车厢内的43名乘客竟然卧铺旁观，就连被劫钱者也不出一声，无一人出手相助。

就这样，小魏身受重伤，司机竟然慑于歹徒的淫威，开门将他们放走。

数百村民在围观什么？

围观这种“看客”心理早就被鲁迅抨击多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冷漠症仍不时发作，不得不令人扼腕。典型的看客心理无非是因无聊而围观，从而引起追求刺激的趋向刺激心理。

陕西绥德县赵家砭乡丁家沟村小学曾发生过一起当众轮奸女教师的恶性案件，该村村委会主任、小学校长、教师等视而不见，同事无一伸出援手，在全县引起极大愤慨。

孙女士，家住郊区三里屯，常进城卖豆芽。有天傍晚，她因收款结账，收摊晚了。回家途中，经过一个小树林时，忽然跳出来一个男青年，手握一把牛耳尖刀，逼住她往林内走，并要跟孙女士发生关系，孙不干，那人即凶相毕露，对着女方咽喉，勒逼她快脱衣服。事出突然，孙女士只得哆哆嗦嗦地脱掉上衣和裤子，那男人又扯下她的乳罩和内裤，这才丢下刀子，把姑娘放倒在地上，欲行强暴。孙女士挣扎之间，手中碰到男青年放在地上的刀子，她猛地拿起尖刀，对着男青年赤裸着的下体连刺两刀，一边大声呼救：“抓坏蛋呀……”

男青年负痛而起，女青年乘机机会，也一跃而起，赶忙往村中人多的地方逃去。来到街上，由于她的喊声凄厉，果然惊动了许多人，可是，他们并不去抓坏蛋，都在一眼不眨地围观孙女士。

孙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丝不挂地跑到街上来了，她又“啊呀”一声，把手中带血的尖刀扔掉，双手捂着下体，恳求围观的人们送给她一件衣服遮遮下体，但却无人答应，众人还是只看她的胴体，她只好回到受害的地方去找自己的衣服，围观者仍紧紧跟随着她看个不停。走到村后小树林，她才发发现不但色狼不见了，自己的衣服也一件都没有了。

姑娘再次向围观人呼救，然而，仍无人肯做好事。而且，围观的人愈来愈多了，孙女士忽然发现有个老太太要把自己的上衣脱下送给她，她赶快上前去接，却被一男子拦住了：“你把衣服给她，就没好戏看了。”

有人又说她刚才手里拿着带血的刀子，说不定本人是杀人凶手呢！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愿意帮助孙女士了。

万般无奈，孙女士捂着羞处，闯进了一家尚未关门的服装店，幸好服装店里只有一个女青年售货员。孙女士向售货员说明自己被暴徒扒走衣裳，无法见人，恳求售货员先赊给她两件衣服，她保证改日把钱送上门。那售货员对自己的同性毫无同情之心，坚持买服装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店概不赊欠”。虽经孙女士苦苦相求，仍不让步。

有一位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从自己家里找了女儿的两件衣裳，送给了孙女士。这场历时50多分钟的“裸体围观”方告结束。

趋向刺激的围观在今天还有一个新的特点：嘲笑。这是传统的看客所少有的，因为自觉有愧，传统看客只是默默地看而后一哄而散。

兰州雁滩一牛肉面馆的六名员工到黄河边一沙坑游泳时发生不幸，两名员工溺水，其中一名员工被及时救起，另一员工沉入坑底。事件引起近千名群众围观，闻讯赶到的水上派出所民警叫来羊皮筏子下水营救，可是筏子客因费用问题几次放弃打捞。为了及时将溺水少年救起，四名好心市民冒着生命危险下水展开义务营救，可是没有想到围观群众竟鼓掌起哄，嘲笑营救者。

趋向刺激的看客在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发展：围观跳楼自杀者并发出哄笑。这是与我国当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极不和谐的音符。诚然，跳楼者中间有不少“跳楼秀”，但多数还是因为种种窘迫、压力、痛苦、无奈而采取此种极端手段的，当他们站在死亡边缘犹豫徘徊时，他们的同胞为什么要发出种种哄笑、讥笑甚至欢呼鼓掌呢？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

兰州街头曾发生一起轻生妇女跳楼未遂事件。在近3个小时的僵持中，大群围观者的态度、反应令人困惑，折射出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发人深省。

一名妇女爬上了所住招待所六楼阳台护栏，声称其4万元钱在兰州被骗，欲跳楼自杀。很快，楼下围起了大量观众。兰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在接到报警后，迅速派出巡警解救，兰州市消防队也赶到现场。

经过两个多小时劝说，警方采取“偷袭”的方式，从侧面窗户潜入阳台，成功将其抱下护栏。轻生妇女最终得救了，但记者在现场却惊奇地发现，大量围观者不仅没有表现出该有的庆幸，反而对轻生妇女被人救下表示“失望”。在巡警解救的过程中，有几位围观者居然说：“要跳就早跳嘛，干耗着干啥？”当巡警将轻生妇女成功救下，现场一片惊叹，许多人摇头叹气，表现出失望和遗憾。一围观者甚至说：“早就可以跳了，都三个小时了，分明是不想跳嘛！”

趋向刺激所引发的社会心理障碍与我国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极不相符，甚至有违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5

“帝王情结”与“圣贤期待”——权威人格

帝王情结与权威人格

中国人很尊重“权威”人士。

什么是“权威”，就是权力和威信。

官是民的权威。

师是生的权威。

上级是下级的权威。

老子是儿子的权威。

丈夫是妻子的权威。

男人是女人的权威……

什么是权威，权威是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有一定威信的人。

因此，孔子是知识分子的权威。

孙子是军事家的权威。

韩非子是法家的权威。

权威是不允许否定的，权威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权威不会说错，不要对权威说“商榷”，不要对权威说“不敢苟同”。

权威是要大家维护的，权威做的错事是有道理的，不错不行的。

权威说的错话是有含义的，不错不能充分表达的。

权威读的错别字是有目的的，不错哪里来的幽默。

中国人捍卫权威。

中国人崇拜权威。

权威人格是中国人另一个突出的社会心理障碍。权威人格是由德国学者阿多诺

提出的一种人格特征，表现为具有权威态度，要求他人服从，而非权威人士则表现出对权威人士崇尚顺从，甚至顶礼膜拜。

权威人格作为社会心理障碍具体表现在社会交往中的过分自谦、自我贬低，这种情况有人称为“非我症”，即在社会交往中迷失自己。比如过去，子女对父母自称为“不孝”，学生对师长自称为“不才”，女婿对岳父母自称为“愚婿”。这种尽量降低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的习惯依然表现在各种场合，如称自己家为敝舍、寒舍、茅舍，称自己的文章为拙作，称自己的孩子为犬子，等等。在社会性道德评价中，倘若你要略略表现出一点自信、自尊和自爱，那就免不了招来“骄傲”的贬斥。

这种自贬的习俗倘要寻根，恐怕要与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有关。前几年的荧屏几乎成了帝王们的一统天下：电影《康熙大帝》上映，长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最受群众喜爱的电视剧奖。为帝王们歌功颂德的长篇电视剧不胜枚举，风靡全国。

在此，笔者不想臧否艺术家们的辛勤劳动，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国人有如此之强烈的帝王情结？这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

——是古为今用吗？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人们还是习惯用传统的思维认识今天的事物，而历史上对国民影响最大的人无过于皇帝。于是，文人墨客们便拿那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功德启迪当今世人。《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时，众口一词的反映是：当今社会就需要雍正式的铁腕人物。其实，时过境迁，企图以帝王手段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充分发扬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指望明君贤臣一言兴邦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帝王情结又称为圣贤期待。今天翻开《辞源》《辞海》，对圣人的解释为：其一为道德智能最高者；其二指旧时对封建帝王的尊称。两个注脚恰好道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即以圣人的道德为内为体，以王者的仁政为外为用，体用兼备。内圣外王之说使得远离现实的“圣”的探究真理，弘扬教化之理想事业与“王”的现实施政得到了一个契合点。从此，“内圣外王之道”便成为中国人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最高理想。圣明天子成为中国民众所向，向往崇拜、集道德学问与王权于一身的最高偶像。也正是有了王与圣结合的构想，中国民众才有了世代循环不已的圣贤期待。因为，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切身利益相去甚远的圣贤之业已系结于其利益攸关的帝王之业。圣贤期待的内涵便是圣与王相融的合二为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芸芸众生一代又一代地翘首，总期待着有一个圣明天子出来广布甘霖。清官意识、伯乐期待、姜

太公情结等则是这一文化心态的缩小或变体。岁月悠悠至今，圣贤期待已积淀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

国人的圣贤期待、帝王情结，使权威人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了其根须，时至今日，其表现依然盘根错节。

权威人格在时下的表现可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论。例如，某人一旦出了名，头顶就仿佛罩了一个光环，连身边的鸡零狗碎也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某人演了一两部电影，唱了几首流行歌曲，有了名，就可以做广告，指导大众消费，甚至登上大学讲堂，其声望令专家不敢比肩。至于做学问，权威作用则更是不可小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做学问不找靠山，不引经据典，一个字：“难”。

在中国，权威人格最具有代表特征的当属一个“权”字了。官本位及等级观念使权威人格充分地展现了其核心特征，那就是无条件地崇尚，无条件地服从。不唯真、不唯实、只唯“上”。这方面的陋习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直接障碍，与现代化社会的民主过程也是格格不入的。笔者的朋友到美国去了几年，就发现了一些明显的反差：

来美国的一些亚洲新贵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身边少了一份熟悉的羡慕，多了一份失落。于是，他们随时分发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可这并不管用。于是，他们又一掷千金，买下华屋名车。可气的是，竟然连那些居斗室、开破车的美国佬也“我自岿然不动”，不肯景仰，当然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袖口或领口的名牌商标。在美国，高薪、华屋、名车的群众号召力没有在新富国家那样大。

很多美国人身为工薪阶层，也是心满意足。当你出入豪华宾馆时，为你叫车的男孩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你能感受到他的自信。他未必羡慕你选择的道路。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职业，选择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活出了一份自信。于是，那些在本国高高在上的贵人们到了美国后就傲气顿失。

一个访美的亚洲官员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有一个故事，美国著名的《悄悄话专栏》女记者辛迪·亚当想约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做个单独采访。多番努力，终于搞定，希拉里同意在她出席纽约曼哈顿大学俱乐部的一个妇女集会，跟辛迪谈一个小时。

采访就定在曼哈顿俱乐部里。这个俱乐部有着百年历史，注重传统，古色古香。辛迪先到，在大厅候着。到了时间希拉里还没来，她坐不稳了，悄悄地把大哥大拿出来，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守门的老人过来了，说：“夫人，你在干什么？”

女记者说：“我跟克林顿夫人有个约会。”老头说，“你不可以在这个俱乐部里使用手机，请你出去。”说完后老人就走了，辛迪收起了手机。

一会儿老人又来了，看见辛迪没走，还与克林顿夫人在大厅里高谈阔论，老人不乐意了，说：“这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你们必须离开。”克林顿夫人说：“咱们走。”随后，她乖巧地拉上辛迪就出去了。

这个老人可不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他选择了守门，拥有了一份权贵们不敢在他面前猖狂的自信。

权势人物的气度是制度和人民调教出来的，常常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比尔·盖茨想参加哈佛的同班聚会，被有些同学拒绝了。是呀，你盖茨选择中途退学，跟同学没多大关系，聚个嘛劲？选择了在哈佛毕业的同学未必都选择了向金钱屈服。

大学需要“明星”撑场面

权威与身份有关。身份由地位、权力而定，也由名望、名人而定。身份与面子一样，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公民导刊》2003年10期有篇文章这样说道：我国到美国弗吉尼亚参加国际武术比赛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中失手受伤，于是被送到医院急诊。“她是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获得过国际冠军，我们必须去最好的医院。”在车上，我方陪同人员说。到了医院急救室，护理人员为她做了心电图，然后等待医生接诊。陪同者又要求医生赶快为她检查，但医生正在抢救一名心脏病人，护士要求她再坚持一下。多次交涉无果后，陪同者拉长脸对护士说：“她是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是在刚才的国际比赛中出事的，请你马上叫医生过来，耽误了事情医院是要负责任的。”护士毫不示弱：“医生现在在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在垂危病人和死不了的病人之间，医生必须首先抢救垂死挣扎的病人。”医生检查了病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轻微脑震荡，建议病人做个脑电图。可又要排队等候。陪同者又要求加快速度，医生开导说，看病必须按规矩排队等候，医生会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程度做出决定，对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急救中心的人员说，在第一时间内抢救心脏病人和病危的伤员，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次很普通的急诊却凸现了一种文化的差异：一是美国医生护士眼中好像没有“老外”这一概念。来自中国的运动员，并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耽误了事情要负责任的”，但医生和护士仍“我行我素”，都不怕负“国际影响”的责任，只是自顾抢救心脏病患者。在他们的眼中，病人就是病人，医生的天职就是看病，“老外”也好，自家人也罢，重要的是“在第一时间抢救心脏病人与病危伤员”，内宾、外宾都一样。

不知美国词典中有没有身份一词？我们送诊的人多次强调、反复强调这是最优

秀的运动员，也就是说，此伤者非普通伤者。在我国，身份这东西太重要了，比如说，领导偶患小感冒，医生再忙碌还能叫领导也去排队等候？那不是让领导“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即使同样是普通公民，衣衫褴褛的老农民与光鲜照人的城里人该谁先谁后？都是卖肉，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卖，一个陆步轩卖肉就舆论大哗，只因陆步轩是北京大学毕业生，身份特殊。

中国人与外国人对于身份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的大学与外国的大学在这方面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例如，大学的“脾气”有多大？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许多大学的“脾气”那可是相当的大。

在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边区，有一位女学生中学毕业的考试成绩达到了申请牛津大学的标准。这可是百年来头一遭，当地政府十分重视。令人遗憾的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面试后称，该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不要。于是，当地政府就一级一级地向上找，最后找到教育大臣出面说情，也没管用。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前去说清，结果还是没戏，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布莱尔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牛津大学硬是不给面子，理由就是一个：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布莱尔丢了面子，心里自然憋屈，私下发牢骚说，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结果这话传到了牛津大学，师生大怒，立即宣布，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

哈佛大学校庆，打算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参加。里根一想，机会来了，就让人带话，能不能送他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按说，荣誉博士毕竟不同于真正的博士，所以应该算不上什么大的原则问题，何况里根还是现任国家元首。可哈佛师生对此却议论纷纷，认为他和学术一点都不沾边儿，还是不送的好，于是里根没来。爱来不来，庆典照办，哈佛还是哈佛。

其实，国外有些大学历来就不拿“领导”当盘菜。哥伦比亚大学曾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曾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布什总统的弟弟，也被佛罗里达大学拒绝授予荣誉学位，只给了个荣誉校友。这些大学够牛气吧！

当然，也不是所有大学的“脾气”都这么大。我们的一些大学就平易近人多了，对名人不但没脾气，为了追星，甚至投怀送抱。某歌星、某影星现在想读什么大学甚至当大学教授，恐怕不是什么难事，有些大学的这种作为真让人悲哀。

疯狂的名人效应使得名人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名人就忙，忙得整日赶场，有的不亦乐乎，有的疲于奔命。日子久了，名人就顾不上自己的本行了，成为一个“脱产”的纯粹名人。至于过去是靠什么出的名，现在还能不能拿出出名的东西来，名人没有时间去想，更没有时间去做。需要名人的人更不管这些了，他们要的是名人的“名”，并不管名人的“实”。

中国使用名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人一出了名就给他安排个官职。于是，名以官传，官以名传，名越大官越高，官越高名越大，相辅相成，水涨船高。于是，他们渐渐地离赖以成名的业务也越来越远了。

学术权威的恶果

如果我们的大学都需要歌星、影星、球星来撑场面的话，这说明作为高等学府，大学的学问已经做不下去了。说到做学问，依现在情况看，我国的学术成果质量不高，恐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权威人格挡道的缘故。

2003年7月30日，张浩、宋正海两同志在《南方周末》撰文说，长期工作在我国航天战线的蒋春暄高级工程师，因对数论极感兴趣，自1973年以来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数论，他用自己创立的全新的数学方法，解决了世界公认的几大数学难题。

然而，蒋春暄只是个业余数学爱好者，在数学界是个无名的“小人物”，因而长期受到难以言说的冷落；他曾将论文寄给数学界权威人士寻求指数，遭到拒绝；一些权威更是诋毁蒋春暄的研究成果为一堆“垃圾纸”，说他研究数论是一个“想蹬着自行车上月球的人”；国内一家著名数学刊物因受权威编委的压力，对蒋的投稿，一概退稿。十分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质疑者无人能指出蒋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的疏漏或错误，只是把精力用来论证蒋春暄成果的支持者和发表他论文的刊物没有权威性。

无奈，蒋春暄将论文寄到美国，却立刻引起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数学家、《代数·群·几何》杂志主编桑蒂利教授的高度重视。该杂志不仅连续发表了他的论文，还破例为他出版了数论专集。该杂志编辑部主任乔治·韦斯在接受中国《科技日报》采访时强调：“就我们接触过的各方面数学评论家而言，这些评论家审查过蒋的全部工作，都认为他是最重要的数论科学家。”

此外，权威的美国《数学评论》转载了蒋发表的论文摘要。

对蒋春暄的数论成果，国内外学者评价的反差为何如此之大？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这从深层次折射出，我国现今的学术界也被权威人格影响，以致学术成果得不到公正评审。科技评审自然要重视并发挥专家的作用，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威，排斥原始创新成果，阻碍了学术的进步。

由于传统的权威人格在我国学术界盛行，导致年轻人治学没有个体的独立性。后一代跟着上一代老态龙钟的步伐，年轻人有时不得不按老前辈的框框著书立说，缺乏创新意识和自主治学精神。在此情况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能是空谈。

由于权威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术论文盛行大量的“注释”及“参考文献”，使得中国学术论文的引证之风盛行。如果注释及参考文献多，说明有学术内涵、质量高，否则便不上档次，尽管作者所提出的思想、观点确实属于原创且有价值的也不

行。从现在情况看，学术界“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的信仰化态度未变，最典型的表现还是“打语录仗”，用权威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思想。

权威人格的另一种表现便是人微言轻。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3日刊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大河湾段的黄河大坝上，旗水务局副局长视察防汛，恰遇年过七旬、经常在黄河边放羊的张成万老汉，张成万说：“这个地方最危险，因为这个地方是担土垒成的大坝，土虚不结实。”副局长听后什么话也没有说，瞅了羊倌张成万一眼就上车走了。结果大坝决口，淹了3个自然村，冲塌了数千间房屋，6 000多人无家可归。同样，“彩虹桥”垮塌之前，退休老工人周耀琪早就发现了那座彩虹桥焊接质量有问题，因此他在桥垮三年前就到处找人反映此事，警告“彩虹桥有一天可能垮”。然而无论县委、县政府还是质量技术监督局，根本没有人听；有的人还以为周耀琪不怀好意，是“想揽工程干”。

《现代职业安全》杂志2004年7期刊载：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在北京主办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当20多名农民工代表开始发言的时候，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有的人一开始就质疑：农民工能坐在这儿吗？即使坐在这儿能说出来什么？说出来能有用吗？

下面摘选王选教授在北大的演讲。这篇演讲在《读者》刊出时标题为“思想的声音”，相信对读者是有启发的。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们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他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这是很奇怪，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脱离第一线5年，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

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

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在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间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0岁；英特尔的3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仍然是“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开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是根本不懂的。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

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神医开出的“官场妙方”

前述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名人权威、学术权威，这两种权威人格的常规表现在现今社会已是十分普遍。权威人格的另一常规表现为地位权威，即“唯上”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名人权威、学术权威均是服从于地位权威的。

某市修建一座名园，内有一条仿古街道，刚建成时，木料尚未全干，一些人要在街旁房屋的门、窗、屋檐上绘油漆彩画。参与建筑的一位教授指出，现在漆画，过不了多久就会起泡、脱落，几千万元就白花了。旁边的人告诉他说：“你别光看是否经济、合理，要知道，首长效应比任何效应都重要！”起初，教授不明白什么是首长效应，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就是做出来的东西让首长看了满意。结果，他们就在市领导来视察之前匆匆漆画完毕。首长不知内情，看了果然非常满意。这位教授痛心地说，制造假象迷惑领导，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种行为更是可恶。

“让首长满意”固然有理，“只要首长满意”则集中而凝练地表达了权威人格的中国特色。

“我们是戴着锁链的猫。”一位人民警察要求记者录下他的话，“我们不怕罪犯，怕的是领导不公正。如今的犯罪分子，最常用的威胁是：我姑父、我叔叔或我大爷是某长、某书记。咱办案不得不先摸准那些家伙后面有什么官撑着他们的胸脯子。”

某省省委书记在谈到官员本领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们的官员中，迎合型、适应型的太多，开拓创新型太少。不少干部在面对市场经济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显得很被动。扭转这一局面是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环节。”

在解释什么是迎合型和适应型的官员时，这位官员幽默而形象地说：“什么是迎合型？就像小品演员，为迎合部分观众的趣味，将瘸子、瞎子演得惟妙惟肖，引得群众哄堂大笑，其实毫无意义。这就是迎合。现在我们的不少官员，整天就琢磨领导的意图，迎合领导的心理，而不是考虑现实的问题和困难，想办法如何去解决。适应型的，是领导说一句，他就办一句，说不出的他就想不到，或不去想。这种官员多了，会严重降低我们迎接市场经济挑战的能力。”

地位权威致使地位低下者盲目服从地位居上者，一切“唯上”而不“唯真”。

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厦门一家企业与大连一家公司因便条问题打了官司，厦门一家法院做出判决，将厦门这家企业的货轮判给大连那家公司抵债。可是，大连方面去执行拖船时却受到方方面面的阻挠，法警、法官出面强制执行，

仍无济于事。

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此事始末，厦门市领导看了电视后，和有关方面打了招呼，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这对大连那家公司来说当然是好事，可是这种解决的途径让人悲哀。

法律的尊严、法律的神圣、法律的强制性还不如领导打声招呼。打赢了官司，而执行不了，反而要通过找领导打声招呼，这究竟是法律赢了，还是权威赢了？

难道领导的权威真的比法还大吗？这实在发人深省。

唯上不一定是上级，只要是“上面”就行，这种服从型人格已经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下面这篇文章摘自《读者》2006年第6期原创版，作者为孙杰。

第21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订阅的一份国家级教育杂志封面上有一个大字号的标题：《人民教师，无尚光荣》。看到这个标题，我在心里笑了一下，知道“无尚”其实是“无上”的误用，但却无心去跟这份杂志较真儿。后来，有个班要办一期庆祝教师节的板报，几个同学便来向我借阅相关资料，我随手就将那期杂志给了他们。晚自习的时候，那几个同学抢着告诉我，他们看到封面上那个“无尚”，一致认为用错了，便按照杂志上公布的编辑部电话给编辑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编辑。他们告诉她说，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上面根本没有“无尚”这个词，只有“无上”，当“最高”讲。他们说：“阿姨，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应该在下期杂志上更正一下。”那个“阿姨”说：“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好像有问题，但是，新华社的通稿用的就是‘高尚’的‘尚’，而不是‘上下’的‘上’，因为领导讲话的原稿上就是那么写的……”有个同学问我：“老师，那我们要是卷子把‘无上光荣’的‘上’写成‘高尚’的‘尚’，给分吗？”我说：“那要看谁阅卷了。要是那个领导或者那个编辑阅卷呢，可能就给分，要是我阅卷呢，可能就不给分。”

说真的，我为我这样的回答感到羞耻！

可我多么害怕，害怕孩子们会重复我的轨迹，害怕他们会被慢慢磨光了锐气，害怕他们看到谬误时，仅仅是“在心里笑了一下”，然后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或者，他们再也懒得去努力分辨真理和伪真理，“反正分辨了也没用”——我多么害怕他们会这么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也巴望着我们的教育能够打造出一批敢于说“吾爱吾官，吾更爱真理”的人。

16

权力拜物教的衍生物——官位情结

班干部“索贿受贿”现象

说到“官位情结”，让我们先从孩子们谈起。

翻阅报刊，发现现今的学生包括小学生出现了一种早熟，暂且称为“权早熟”，主要指对官位和权力的崇拜。

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童声”，道出了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严肃主题。

在沈阳市某幼儿园，当老师给一个幼儿班的孩子上课时，问他们长大以后干什么。结果，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当官、做大老板、做警察，此外似乎别无选择。

据幼儿园教师介绍，这个班共有34名儿童，家长中有国家干部、工人、教师、科技人员、警察、现役军人和个体经营户等。

当记者提出同样的问题后，孩子们纷纷举手抢答。一个说：“我长大了当处长。”问他为什么，他说：“处长最厉害，有权，有钱。”“我当主任，主任能管我爸爸……”另一些孩子嚷着说：“我要当警察，警察多威风呀，什么都管，谁都得听他的。”另一些孩子则说：“我长大了当大老板，开最最大的饭店，挣可多可多钱，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一个孩子直截了当地说：“我要去美国当董事长……”

当记者问到你们想不想当农民、工人、科学家时，孩子们的脸上露出迷惘的神情。

据统计，这群说话还连不上句的孩子中，想当官的占三分之一左右，想当警察的占三分之一，想当老板的接近三分之一。

“权早熟”带给孩子们的危害并不比“性早熟”“钱早熟”小，甚至还要更大些。“权早熟”表现为一些孩子从小就崇拜权力，成为“权力拜物教”的小信徒。

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调查报告，七八岁的小学生，一问长大干什么，十之六七会说当省长、市长、县长、厂长、董事长，最起码也要当个乡长。如果从“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角度来看，倒也“其志可嘉”，可要再往下问一句，你为什么要当官，那答案就热闹且不太美妙了。童心未泯且不善于掩饰的孩子就会叽叽喳喳地告诉你，当官能天天坐小轿车，隔三差五有人请吃饭、钓鱼、打保龄球，逢年过节有许多人送红包，写个条子就能替亲戚朋友办事，还能管很多人，等等。

对于孩子们的“权早熟”，我们的老师、家长以及亲朋好友，究竟要负什么责任？比如说，莎莎的爸爸是个局长，所以莎莎每天坐着爸爸的轿车去上学；江江很为自己当处长的爸爸骄傲，因为三天两头有人请吃饭、唱卡拉OK、打保龄球；林林的表弟考重点中学分数不够，可是当教委主任的舅舅写了个条子，表弟就进了重点中学……这一切的一切，孩子们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将来一旦权力在手，他们也会如法炮制，照猫画虎。因为当官有权，有权就能得到诸多好处，所以连小学生也有一种“官位情绪”，这种心态辐射到整个下一代，将对我国今后的廉政建设构成严重的心理障碍，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实际上，“官位情绪”目前已经在校园泛滥。

数位读者曾致电某报，称上小学的孩子在学校当“官”当惯了，回到家后竟然对家长“发号施令”，官气十足，他们对此表示忧虑。

记者在某市重点小学发现，一个班50名学生竟人人都有“官”做。一小学班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锻炼每个孩子的协调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小就有当“官”的意识了。

据该老师介绍，她所在的班级设置常任班干部10名：班长一正一副2名、生活委员2名、文娱委员2名、体育委员2名、宣传委员2名。剩下的40名学生分成5组，每组设组长2名，40名学生每周轮流担任。在这支庞大的“从政”队伍中，文娱委员和宣传委员的职能是重叠的，组长的工作也是轮流转的。但这样的重复和轮流设置却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官”当。

“为了协调好这些‘官衔’，老师们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一位已担任了近10年班主任的小学老师无奈地说，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平衡来自方方面面的关系。现在一些家长也不知为什么对孩子当官格外感兴趣，每到班级选取班干部时，家长们都会积极活动，打电话、递条子、拉关系，弄得老师们左右为难。一旦某个呼声很高的学生落选，家长往往会找到学校，指责选举不公，甚至告到学校领导那

里去。所以，一些老师便想出这种“全班皆官”的主意。

但令老师忧虑的是，一些学生已经在不自觉中将“官职”的大小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尺码。一位二年级的学生评上了优秀学生干部，按惯例他就不能再参评三好学生。可这位学生竟然问老师：“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哪个‘官’大？”此外，在“官位”思想影响下，有的学生竟然在选举时通过给同学赠送小礼物的方式来拉选票。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小学生后发现，虽然有的同学回答当“官”可以锻炼自己，更好地为同学们服务，与此同时也认为可以管人，挺神气。但一个刚当上小组长的女孩子在记者追问下竟然说，以前她当不上班干部，爸妈总是说她没出息，现在当上了，爸爸妈妈也有好脸色看了。

显然，家长对“官位”的重视也影响了孩子。采访中，一学生家长痛心疾首地告诉记者：自己是公司经理，常有人上门送礼，接受礼物时一般要半推半就，然后心领神会地收下。后来，他发现当班长的女儿在决定是否帮同学做作业时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我是班长，要坚持原则，但是看在你送我礼物的份上，这次姑且帮你做一回作业，但下不为例哟！”这番话当即惊得家长目瞪口呆。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班干部，也有人请吃饭、请玩。”因此有人忧心忡忡地打进某报热线，强烈呼吁有关部门行动起来，刹刹这股在小学生中萌芽的“歪风”。

连小学生都知道利用班干部的“官位”索贿受贿，长此以往，待全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官位意识”，国家也就危险了。

“官位情绪”与“权力拜物教”同一渊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现象。马克思引述莎士比亚的名作《雅典的泰门》里一段名句：“金子，可以使黑变成白，丑变成美，错的变成对的，卑鄙变成尊贵……”说明金钱万能，具有至高无上的魔力。在我国，西晋时代出现了鲁褒写的《钱神论》，也对金钱的作用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但是，在社会生活里，金钱却不是万能的。有一种比货币更大的力量在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运行，这便是因官位而衍生的权力。

有了官位，就可以按照官位高低、权力大小享受一些特权，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因“工作需要”而产生的特权目前被无原则地夸大了、滥用了。其中，有两个问题较为“典型”。

法律上的刑事豁免权。我国自古就有“刑不上大夫”的古训，那是封建专制制度重要特征之一。在今天，这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较广范围内仍在发生作用。多少大案、要案，因涉及某位“县太爷”或者“道台”之类的官员，便发生“立案难、调查难、处理难”三难现象。据司法部门反映，对官员违法案件的查处通常是

“发案多，立案少；免诉多，起诉少；缓刑多，实刑少”。

不仅官员本人，官员的家属也可借光，享有部分“刑事豁免权”。据各地报纸揭露，大大小小的“衙内”，逍遥法外者、重刑轻判者屡有所闻。而新闻媒介所捕捉到、又经逐级审批、准予公开揭露的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整座冰山深藏水下。

经济上的权钱效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权与钱，从来是相通的，可以互相转化。清廉自守的官员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乃封建社会官场的真实写照。从另一角度来看，有钱可以买官。自从秦皇、汉武实行入粟拜爵，直至清末，卖官鬻爵之事，史不绝书。历代称为“捐纳”，即以钱买官。买官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通过官位而获得更多的钱。

官本位的社会结构无论有多少动听的说辞，事实和客观上都放纵人心强烈的贪欲；官位不论大小，一旦进入其中，即有相对应的回报。贪欲促使无限制的权力越轨，由于官本位的社会本身并无自动调节机能，而后来的人群还是要不断涌向这一独木桥。清代一位士子曾致信友人：“我辈束发受书，便思服官，而道路转修，学力转难”，可见其无可奈何的自动性质，由此出现的种种怪现象：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就成为常态。

毋庸讳言，“官本位”在我国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并不存在，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存在和发展仍有相当“肥沃”的土壤，一方面是传统的“权威人格”的积淀，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官位”所衍生的诸多权力，包括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实际上，这种利益也不仅仅指物质方面的利益，还有一种精神方面的满足，如“高人一等”的成就感。正因为如此，连小学生也追逐官位、垂涎权力。如果此种社会心理障碍不予矫正，势必贻害社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的“处级和尚”

任何意识的存在都有其社会基础。“官位情绪”的流行也不例外，它直接与权力带来的诸多利益关联。如被请到基层解决问题、参加喜庆典礼、参加奠基或者竣工剪彩等，都要有“出场费”，礼品、红包、购物卡一类不断翻新。海南某家公司举行开业大典，用纯金剪子剪彩，并以此作为“纪念品”，赠送给“出场”的领导。此后，海南的“金剪子”越海登陆，广东某市不仅推出18K、24K金剪，还出现剪彩人不辞辛苦，一日剪彩两处，得纯金剪两把的“景观”。

抬轿缘有坐轿人，送礼缘有受礼人。这类“出场费”价码的日渐提高虽然与请者、送者关系不疏有关，但与某些“为官”者更有直接关系。习惯使然，如若没有“出场费”，只是清茶一杯，工作餐一顿，那对不起，再要有请，绝不出场。那理由自然堂皇得很：工作繁忙排不开。而若这次“出场费”给得好，有了铺垫，那下次

再请，再忙也要“躬请”。这叫“不给好处不出场，给了好处乱出场”。为什么有的地方芝麻大的小事儿，也有较高职位的领导出面“捧场”；而有的活动的确需要领导“出场”的，却屡请不到？个中奥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场费”。

眼下不少当官的有“灰色收入”。2000年湖南省纪委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少单位的“灰色收入”已相当或超过工资收入，有些领导干部“灰色收入”甚至是工资的数倍甚至十几倍。调查时有人反映，如果来者不拒，一个经济不发达地方的县市主要领导干部每年的“灰色收入”在10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则在20万元左右。

我国“官位情结”的盛行也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制度有关。

中国人现在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一切以“官”作为衡量标准的做法，这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官本位”。

所有职别的工资、职称、待遇，都是以官员的级别与级差来作为基本准绳的，所以，在我们国家才会有“局级教员”“厅级总工程师”“处级和尚”之类的说法。无论是条条，还是块块，其职称、工资、待遇的评定都是参照干部的标准，这在世界上是比较少见的。

曾经有个知名度很高、而且很富有的国外管理专家访问中国，到了北京，他要求住套房，可宾馆服务员却加以拒绝，理由是这些专用套房是专供局级以上干部住的，旁人不得“染指”。可人家外国人不理解，言称“局长算什么东西，他能跟我比吗？局长多的是，可我只有一个”。可局长就是局长，服务员硬是不理睬那位外国专家的要求，没让他住进套房。这类外国人看来非常滑稽的事，在我们眼里却是稀松平常、不足为怪的。当外国专家看到人民大会堂门前那片锃亮的高级轿车时，无不惊讶地说：“政府官员的汽车怎么能比企业家的汽车豪华呢？简直不可思议！”

北京一位老教授，是国内外皆享有一定威望的学术泰斗，在得重病之际，居然还住不进某家大医院的病房，因为老教授还够不上老干部待遇，医院“认官不认人”。甚至在老教授病危的时候，连叫一辆单位里的小车都叫不到，因为那些小轿车是给主任、院长、所长之类留着专用的，不能随便出车。

几经周折，老教授终于没能救过来，在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学术遗产后与世长辞了。在发达国家，像这样一位知名学者，不用说其待遇了，就是年薪也可能比总统多，更何况其他什么“处一级”“局一级”之类的官员了。

在现实社会里，新闻多乎其多，但总有这么一类以车子为线索的新闻，诸如某官员运用公款或扶贫救灾款购置进口豪华小轿车记党纪、政纪处分；某官员卖掉自己的小车办教育事业；某机关一律停止坐进口小轿车而改坐国产车子……这类“车子新闻”就相当引人注目而每每都能成为百姓评头论足的热门话题。

有天笔者收听电台广播，欣赏了一则“车子新闻”：某地一位县长因心肌梗

死，需急送医院，但因在一个劲儿地等自己的专车而耽误了时间，以至于病情恶化而死亡。

其实何苦呢？依老百姓的想法，“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急病发作，救命要紧，叫辆出租车，或喊辆三轮车，同样可以火速送医院，非得等什么“专车”不可。这位县长大人的死，有关当事人应负有一定责任且吸取教训，须知，人命不是学费！

不知道后来电台怎样评论这件事。但某些国人的“专车”观念为何这么强，非专车不去，非专车不坐，难道坐专车真的比性命还重要？有道是“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可他这回是真正的“物使君子”了。

倘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往往又不是这样的了。专用小车，在某些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并不亚于身价和官位。自古以来，“出有车，食有鱼”“高车驷马”之类就是官家或富豪人家华贵的象征。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只有县级以上官员才有车坐；即使在街上车水马龙，私家车来往奔驰的市场经济年代，专用小车还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众人羡慕的权力、身价、官位的象征。出门坐上这玩意儿，其神气、其风光依然绝非引车卖浆者之流可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不然，谁还来当县长、局长。试想，如今赫赫县长书记下乡骑毛驴或坐三轮车，那面子该往哪儿搁？难怪就有县长急病发作而“宁死不坐”出租汽车了。

不由想起了如今某些拥有公家小车绝对支配权的公仆。出门治病不说也罢，就连三五百米走亲戚之类的事也一律进入“专车化”；自己坐不过瘾，还将至爱亲朋拉来享受，动辄对他人说“开我的车去”，“我让我的司机去接你”。据说有人当官最引为自豪的事就是“有自己的专车”，而退了休最伤心的事是“没了专车坐”。一位长期享受专车待遇的领导调到一个没有专车的新单位，第一次出差坐大巴就受不住，一是要到窗口挤车票，二是在车里与老百姓混在一块大有寒酸感。上面那则因专车而闹出性命之事，大概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专车化”的定势思维所致吧。

车子是等级的标志。著名历史学家、前全国人大常委夏家骏教授因为不坐小车、穿着老旧衣服而常被警卫“挡驾”。夏老去大会堂开常委会经常是挤公共汽车去的，有一回开六天会竟被拦住五次。警卫人员说：这个老头又不坐车，怎么看也不像首长。还有一回他好不容易进了门，坐电梯时又被服务员拦住了。因为这是首长专用的。夏老就问：“谁是首长？”服务员答：“常委。”夏老说：“我就是常委。”服务员才半信半疑地让开。而夏老在甘肃考察时的经历更具“幽默”色彩：一位服务员始终没有想到他是贵宾，一直不给他上茶，弄得前往迎接的副省长十分尴尬。

等级标志多矣，亦有很多不成文者。

解放军某部一位少将只身回家探亲，夜间在某市下车，为了方便，投宿车站附

近一家小旅店，在办理住宿登记手续时，这位身着便装的将军引起了旅店工作人员的警惕。负责登记的会计仔细察看了他交出来的证件，用怀疑的眼光反复打量着站在柜台外的将军，又认真盘问了一番，才把将军带到后面一间房屋住下来。会计回到堂前，轻声对服务员说：“刚才来的这个家伙八成是个冒牌货。将军怎么会住我们这种小店？你快去派出所报告，请他们马上来查。”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刚入睡的将军吵醒，门外有人大声说：“快起来，查店了！”随之进来三名全副武装的民警，他们不仅对将军神色严厉地盘问了一番，还要将军带上随身物品跟他们“走一趟”。经过公安部门连夜与将军所在部队联系，终于查明这位将军确非伪装的歹徒。第二天，公安局长送走将军后，笑着说：“这位将军也是自找麻烦。要是到高级宾馆去住，谁还怀疑他！”

官太太争夺战的缘由

据媒体披露，一些企业纷纷抓住机构精简之时机，“抢购”那些从政府机构精简下来的人员。一家大企业的老总说：我抢分流干部，目的不在他们本人，而在他们带来的“无形资产”，也就是“权力资源”。他们这些人曾经是权力的拥有者，在他们原来的工作中已织起了一定的关系网。这些资源是无法从市场上获得的。

到底是企业家，凡事从经营出发，从市场出发，一下子就发现并看准了那些从机关下来的人的“权力资源”，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把这种“资源”及时地抓在自己手中。现在常说我们搞企业的缺乏市场观念，这位老总绝对是一位驾驭市场的高手！湖南某地发生这样一件事：某县先后调进县长、副县长、财政局长、公安局长、工商局长、交通局长、乡企局长和工商银行行长等9名领导干部。这9名干部的夫人也随之调入。于是该县一些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闻风而动，四面出击，争先恐后，各施其招，发起了一场官太太争夺战。请看9名夫人被宴请的一组数字：财政局局长夫人29次，工商银行行长夫人25次，工商局局长夫人27次，县长夫人20次，副县长夫人16次，公安局局长夫人14次……共计162次，人均18次，其中企业“参战”103次，行政机关“参战”59次，财政、工商银行夫人名列榜首，是争夺战的主攻目标。

这场争夺战引起了县委和组织部门的不安，直到他们出面制止，才熄灭这场“战火”。是因为这些单位缺人？不是。是因为这些夫人是难得的人才？不是。是因为这些夫人有热门专业，是抢手人才？不是。这9名夫人中仅有两人懂会计、统计业务，其余7人都是后勤单位服务人员和一般职员。

既然在这些夫人身上找不到专长，那么为啥争夺会如此激烈呢？目的很明确。从个人讲，无非是搞裙带关系，编制关系网，搭个人爬升的阶梯。从小单位、部门利益方面讲，无非是往后拉赞助、借贷款、上项目时，大树底下好乘凉，近水楼台

先得月。

权力具有的负效应致使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领导干部的旗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屡屡得手。据《中国工商报》2006年3月9日报道，曾在三家国有企业任厂长并致使这三家国有企业停产或破产的林志国原是一名汽车司机，文化程度低到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然而他靠自己精心编造的关系网，并谎称是某中央领导的干儿子，仕途竟一帆风顺，被提拔为某市化工局局长。后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200万元。

另有一人，被“双规”时年仅38岁，先后收受贿赂、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1 051.09万元。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极力炫耀他与中央领导的“特殊关系”；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排拼造的他与多位中央领导的合影；他幻想着自己将来要当封疆大吏、副总理；他总把自己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经常对许多市县和厅局级领导干部说，“我这回跟你谈了半个小时，可是高看你了”；他过生日的时候，多位市委书记、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来送礼，其中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向他行贿3.5万元和1万港元；他曾对一个老板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时，对一位秘书长心怀不满，曾露骨地对这位秘书长说，“你当秘书长，还不是我一句话”。他在北京为情人购买了豪华住宅姘居，他还曾在汽车里与一个女人鬼混，被派出所抓住。领导干部这样评价他：作风一贯霸道，飞扬跋扈，在机关中口碑很不好。他多年来跟着省领导当秘书，没有学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却学会了摆谱训人，俨然是“二书记”。有人夸张地说：“他是个人物，以前是让谁上台谁就上台，现在是让谁下台谁就得下台。”

组织上在对他实行“双规”前3个月，他居然通过了“三讲”，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工作者并上台领奖；他在担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期间，为出“政绩”搞了大量的虚假账目，并且一直对上级谎报“军情”，造假数据，骗取上级机关的好评……

这位令人触目惊心的巨贪是谁？官方媒体《瞭望东方周刊》刊登了署名江山的文章《李真从秘书沦为贪官的警示》。文章详细披露了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正厅级）李真的种种劣迹并深入剖析了其蜕变堕落的原因。

文章说，李真有着“奇迹般”的经历：1962年5月出生于张家口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981年中专毕业，先后在张家口地区果树场、张家口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7月调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工作，为一般工作人员；1990年11月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当秘书；1993年6月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当秘书；1994年12月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12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97年7月任局长；1998年4月任党组书记、局长；2000年3月1日被“双规”；2001年4月被依法逮捕。

文章引述“中纪委”《通报》指出：“经查，李真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以下未标明币种的均为人民币）、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 051.09万元。”

文章最后引述一位多年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干部的话：李真假冒高级干部子弟，靠假文凭、假档案，打造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到处招摇撞骗，捞取政治资本，在短短7年时间里由一个普通干部擢升为正厅级干部，成为一个能量和权力均超过其职务的人。当秘书时无人能监督，当局长时没有人敢监督，这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是极不正常的。

17

五粮鸡尾酒与茅台威士忌——非我偏差

马克中国奇遇记

这里的“非我偏差”亦属于非我症，但与习惯性的权威人格不同，主要指单纯崇洋甚至媚外的自贬性认知。张藏藏等人所著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样说道：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逸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夜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我身上这件T恤了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5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待了3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我从没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让自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四十多摄氏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啊！她就那样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得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病症。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是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是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你在法国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覆和鄙夷时，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义务：捍卫自己的文明！

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员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后面接着来一句汉语“你好，××饭店”，可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前台订房时，对方告诉你的是××美元/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你会有在国外的感觉。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为外国人方便，却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难道这就叫做走向世界、对外开放？

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

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找不到的，呜——”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

要带十打避孕套……

他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样，随时随地分泌。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们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

张藏藏等作者的愤慨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受到的。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殖民文化苗头，值得警惕，其心态也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谈到的。他说：“中国人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地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一些殖民文化现象，孙中山也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譬如，他批评一些人“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什么‘乔治’‘威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甚至“连中国人住的地方，都不敢去；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这些批评是十分尖锐、十分深刻的。

有些人好像对什么都看不顺眼，总是处于一种自怨自艾甚至自轻自贱的精神状态之中，看到不良现象，就摇头说什么“中国人就是这样”“中国的事不好办”。有些企业在购置设备的时候，置价廉而性能不亚于洋货的国产同类商品于不顾，非花外汇进口外国设备不可。有些地方，有些企业，自己不练内功，总指望寻个洋老板来依靠，好像只要外国人一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有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正确地自我肯定，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力？

我们并不否认，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比起发达国家来确实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必须引进外资、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尽快地缩小这种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证明了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我们没有理由轻贱自己，我们的立足点要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当年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强调，中国自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称赞这类人是“中国的脊梁”。我们民族急需坚强的脊梁。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总经理赵忠玉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件发人深省的事。他们到日本学习重轨全长淬火工艺，日本人只让他们在40米以外看15分钟。后来，他们自己搞出来了，速度和性能都超过了日本，日本同行要求前来“交流”，他们也只允许客人在40米外看15分钟。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的历史要靠中国人自己创造。”

在咱们国家，自己的公民往往不如外国人那样受到礼遇和尊重。比如北京故

宫就专设了“外国游客入口处”；某城市的酒吧街专设了外国人用的厕所；外国人在中国游玩发生了问题，总是调遣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最高明的医生去营救。你不能不奇怪，咱们中国人好像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似的。可人家老外不这样，自己的公民最受优待：在美国空港入口，美国人总是优先，外国人靠后；日本也这样，那里的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七八十个，给外国人的只一个。若是嫌太挤，那好，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转换过牌子，你再走。他们就是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尊重自己国民。他们懂得，无论是总统还是职员，是军官还是失业者，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大都是由本国公民创造的，本国公民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对此，我们中国人应该反思并知耻。

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后来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中国人还要放在棺材里送回去，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反之，找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把自己的骨头摔坏了，政府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

自尊者人必尊之，自贱者人必贱之。你首先把自己看重了，人家才把你看重。曾发生的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撒野受鞭刑的事，当事人的两个国家都了不起。一方面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替本国公民求情，可见国家对国民的重视；另一方面新加坡偏不理这个茬，鞭子照抽。因为这涉及国家的尊严，你抽了，人家才拿正眼看你，不抽，人家反而看不起你。

自轻自贱、恭外而倨内的事在我国屡见不鲜。作者曾会晤一名“洋婆子”，26岁，中德合资企业职工，丈夫为中国人。此人热爱中国，选“苗”为姓，人称“苗小姐”。谈到对中国的印象，她希望中国对本国人文明些，不必对外国人一味客气。她谈道：违反了交通规则交通警察只对她笑笑便挥手放行，而中国的司机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她和丈夫一道出去办事，中国人只对她打招呼、握手，而不理她的丈夫，她很难过，认为中国人不尊重自己的同胞。

一个时期内，从各个新闻媒体纷纷传来明星出国生子的消息，一时引发诸多议论。

要说在哪儿生子本无关紧要，可明星们的言辞却让人惊诧。某明星向媒体坦言，就是要“让孩子生个好地方”。仿佛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一处可供他的下一代健康成长。说到底，这些人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做中国人。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国人，抬高抬高自己的身价。笔者认识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者，此人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出版的全部英文著作都赠予他。此人回国后又作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版过英文著作。

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做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文章如果引用大量外文资料，只要洋字母一列出来，身价自然高。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的处境不说都知道，前者只差敲锣打鼓就能名利双收，而后者有的连工作都难以找到；前者大都是教授待遇，后者则只能苦笑。

2013年1月21日的《经理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巧的是当事人也是“马克”。

搁在十多年前，别说把洋人请到家里“证婚”，就是想见个面都不容易。现在好了，你也用不着害怕，对于你的邀请，洋人还乐得屁颠屁颠的。美国人马克就被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同胞，莫名其妙地请进了国人的婚礼。马克不无疑惑，“怎可以随便赴不相识者的婚礼呢？”两位西装革履的体面青年说：“你们外国人光临婚礼，婚礼立刻就显得够级别上档次了，千万别推辞。”于是，马克与另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意大利女郎悉数被请到一间酒店，大吃大喝了一番。吃白食的代价是，与新人及双方家长、亲友一一合影。民间如此，官场更是如此。比如经济招商就喜欢唯“洋”是取，常常就闹出了有损国格人格的事儿来。这年头崇尚“换双眼睛看自己”，我们仍不妨再让马克唱唱主角。马克一不留神，就被面熟的朋友拉到内蒙古跑了一趟。他在大草原上游玩、吃住不说，临别时人家还赠了土特产。马克一脸困惑，在回程的火车上朋友才透露内幕，原来内蒙古方面期望与国外搞项目合作，北京的朋友就将马克介绍成来中国考察的“外商”，尽管马克也明明白白对公司负责人说自己在京留学，但朋友解释说人家不在乎你是留学生，还是其他什么身份的老外，只要是副洋面孔，人家与你照几张合影，就可对外、对上、对下宣扬他们公司正在迈向国际了。

可如此捞外快的好事，有一回还真把马克吓蒙了。有次去南京旅游参观贸易博览会，一时间竟有好几家厂商过来与他洽谈业务，希望他来华投资办厂。盛情难却下，他坐上了厂商的轿车赴酒宴。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热情甚至都有了些劫持的意味了。席间，马克一再声明自己是来南京旅游的，无力投资，可是如此大实话人家硬是不信。其实也未必不信，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仍反复宣传优越的投资环境，最后竟坚持要马克在一份总投资额200万美元的合资意向书上签字，马克当时吓蒙了。当然不独马克有如此“奇遇”。他的一位金发碧眼朋友，因其“标准的洋人形象”，曾被邀请为一家开张的超市剪彩，出席过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国际会议”，当然更是“参观洽谈”过一些内地工厂，他们每回出境表演的报酬从2000元至数千元不等。

官人商家为何如此苦苦让那些真洋人扮酷“假外商”呢？马克的中国朋友就解

解说：“意向书不是正式合同，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最后，马克不得不签了那份200万美元的意向书后才得以脱身。

外国使馆区的“女黄牛”

非我偏差目前在我国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是取洋名，而最为尴尬的是“重洋婚”。

内地不少城市的商店、大楼，洋名、怪名林立，触目惊心。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店铺，却偏偏挂上个洋招牌，比如“英斯泰克”，英文原意是仪器，却有一家以售卖妇女用品的商店，居然以此为名，风马牛不相及。至于什么“赛克赛克”“卡萨布兰卡”“诗丹尼”“梦德华”“戴安娜”，也屡见不鲜，甚至中国人自己居住的楼宇，也要叫“罗马花园”“海德堡公寓”“伯爵中心”，真不知人间何世？

随着大量新店铺的开张，带“洋”字号的招牌也日渐多了起来，什么“戴拿斯桌球城”“芝加哥娱乐厅”“圣保罗精品屋”。明明是自己的名牌服装，却非要用“中国的皮尔·卡丹”标榜不可；明明就在家门口的商业街，却偏要以“东方的华尔街”来提高身价；本来是明清建筑风格的宾馆，却硬要扛上个“中国夜巴黎”的霓虹广告牌；就连千年古城苏州的河堤上，也赫然写着把苏州建设成“东方威尼斯”的标语。苏州就是苏州，威尼斯就是威尼斯，各有情调，何必不顾身份，硬开洋荤呢？更有甚者，某地某城某街道，满眼洋文招牌，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说不清，只落得一片“殖民文化”的气氛。

理发店称“发廊”已够味了，命名“发屋”“发室”也属近义词，可有的硬要挂上“梦娜”“蒙尼坦”“基斯”的招牌。若不是见到里面的理发工具及陈设，怕是不敢贸然进去的。

报刊上常见“梦丹娜”“埃迪”“伊娜”“芭蕾”“雅黛”等洋名称。要命的是，这些洋名儿已从化妆护肤品之类泛滥到了医药、食品、服装、家电等各行各业，大有席卷中国市场之势。恐怕不久，五粮液也得更名“五粮鸡尾酒”，剑南春则称为“剑南威士忌”才卖得出去。

北京有一家商场曾在报章刊出庆祝开业两周年特价销售的广告，列举了50个商品名称，其中46个是“法里奥”“百迪”之类洋名，就连国产饼干也叫“克力架”“曲奇”。首都师范大学学生曾做过一次调查，指出西单商业街大小商店500多家，一半的店名均有欧美化色彩。在一家商场的二楼，共有21个小摊档，只有3个小摊档的名字有中国味，而商品名称则光怪陆离：产自山东的火腿肠叫“得利斯”；产自无锡的自行车叫“西格玛”；产自新疆的羊绒时装叫“贝斯卡”。

取洋名之风，被学者指为“洋污染”之一。上海某街道幼儿园，130多名幼儿中竟有20名取了洋名，诸如“尼娜”“丽莎”“露莎”“捷尼”等，占幼儿总数的

15%左右。

笔者不断在那种昂贵的、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有的佩戴着假发，有的拄着手杖，有的牵着一匹马，有的挥动高尔夫球杆。笔者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好多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名叫“格林尼治”的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笔者还看到过数不清的形象：标榜着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却佩戴在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的脖子上；一件百分之百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卷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英文名，以至于在一家公司工作四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这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

笔者某朋友在其短暂的新闻生涯里，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而那些时尚杂志谈论的永远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甚至一些最负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京大学学生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大学则变成“中国的麻省理工”……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们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它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它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它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它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2008年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洲的、欧洲的、非洲的、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这些洋人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笔者会觉得我们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它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z取代了王有才；早餐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它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本身是具有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叫“关东店1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

实生活，而不必等美国《国家地理》和美国探索频道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是匮乏的，在心理上是慌乱的。只有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许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即使你穿着一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尼治”公寓，每天都喝摩卡咖啡，但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多么荒唐。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在“重洋婚”的剧情中，那一出出令国人尴尬的情节吧。尽管中国不乏成功的洋婚，但那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却是一幕又一幕的骗局。

北京东郊那180个国家组成的使馆区，占地万亩以上，各式各样精美别致的小楼，进进出出不同肤色的人种，以及那门口威风凛凛的中国武警战士，都向人们提示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它对渴望出国的女人们具有逆转不了的魅力……

想走使馆的捷径、利用婚姻关系出国的姑娘们，经过在使馆区几年来的“摸、爬、滚、打”，已经练就出了一套经验。她们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和档次。

在日本使馆门前泡“黄牛”（指长年在那里转悠）的女人，大都娇小玲珑，有着日本女人那种特有的谦恭神态，举手投足都是经过刻意修炼的。她们在这里徘徊徜徉，心里想着东京的繁华和美丽。

在东南亚使馆前的女人，大都年龄在30岁以上，浓妆艳抹不减当年，她们尚有自知之明，“年龄不饶人”，失去了优势，她们认为，东南亚等国家尽管小，但只要能去也算是出国了，再说，她们还可以由东南亚国家再辗转去第一世界的国家。

在美、英、法、德等使馆门前的“女黄牛”们，堪称是一批外貌一流的女性，她们的年龄大都20多岁，服饰打扮突出了“紧、小、露”的特点，既不失东方美韵又颇具性感。她们在使馆门前来回踱着“一字”步，颇像时装模特在做表演……

在使馆区里，笔者与一位“卧”在英国使馆门前的黄小姐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不怕受骗，她认为受骗比受穷强。她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在英国干一年顶在中国干20年，她的一批从使馆区“冲”出去的朋友，有才两年多一点就回来的，回来的人又盖房子又买汽车，特别扬眉吐气，浑身上下都是金的银的，她们这一世真没白活。

据笔者观察，“泡黄牛”的女人，大部分都是待业青年，她们是抱着誓死要出国的信念闯入使馆区的。毫无疑问，她们充当“黄牛”的毅力和信念坚如磐石，要改变她们的这股韧劲，是很难的。

韩某是某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她长得秀丽端庄，对在国内生活一直没有兴趣，一心想出国，希望自己所画的油画，在世界油画市场上一展雄姿。

为了这个目标她付出不少代价，她曾为接近外国男人自愿到某美术学院外籍美术班充当全裸人体模特，她在那里一站就是4个钟头，让蓝眼睛的外国男同行尽情地画。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有人请她去吃饭，并请她到宿舍里去画裸体画，终于“越过雷池”的事情发生了，然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她就能出国。

后来，韩某不愿忍受这无结局的日子，她也“冲”进了使馆区。她在那里支起画板，画进进出出的外国人，终于又有外国人以买画的“名义”上前，那些心怀“春意”的外国男人，像捕获到猎物一样，把韩某塞进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拉进了大使馆里……

虽然韩某不停地付出，但得到的仍然是请吃饭的报酬。“热闹”完了之后，便是“大撒把”。

出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此气候熏陶下的人们似乎都在做着自己的出国美梦。对于那些既无海外关系又没有能力通过托福考试的人来说，涉外婚姻便是一条可供选择的最佳途径。

这一现象在东方大都会的上海滩司空见惯。

据统计，上海市婚姻管理处自1985年7月1日直接经办包括外国人、外籍华人和华侨在内的全部涉外婚姻登记工作以来，涉外婚姻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增速迅猛。

在这些涉外婚姻中，以中国女子外嫁他乡的占绝对多数。婚姻的复杂性众所周知，特别是这种功利目的十分明显的涉外婚姻，更是悲喜交加、酸甜苦辣，个中甘苦，唯有自知。

如今的世界，已进入全球大通婚的崭新阶段，正因为如此，一些境外不法分子纷纷乘虚而入，粉墨登场，一双双贪婪淫邪的目光射向温柔善良的东方女性，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和悲剧。

进军中国的“野鸡大学”

非我偏差不仅仅限于重洋名、重洋婚，实际上，它的典型含义是，只要是外国的，特别是“洋人”（这是有特殊定义的）所有的甚至与洋人有关的都是好的，即“月亮也是人家的圆”。其中，也涉及对洋品和洋商的态度。

出于非我情绪，国内许多单位无意用国货，盲目购洋机、洋品。以机电设备进口为例，最高额达到300亿美元，机电设备一年用汇超过“六五”时期10年用汇额。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这些设备都是非引进不可的吗？大量的调查表明，引进设备中相当大一部分国内完全可以制造。为弄清楚机床进口概况，有关部门曾组织了数百人次，分赴上海、广东等10个海关，查询了近400万份机床进口报关单据。经逐项分析得出结论：这批进口机床中有半数是国内能制造而无须引进的。对

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出现一些重复引进在所难免。但是，重复引进、不必要引进的比例如此之大，则令人吃惊。

我国一贯主张，引进中国还没有的先进技术，是我国实际所需的。比如，我国是生产豆腐的古国，现在却要派人远涉重洋去日本考察豆腐的生产技术，引进日本的豆腐生产线。结果因生产出的豆腐成本太高且不合国人习惯，只好搁置。

比如，沪产“麝香保心丸”30秒急救见效，由中药材牛黄等制成的日本“救心丹”则要3分钟，且“救心丹”的价格比8元一瓶的“麝香保心丸”高出四倍多。但令人不解的是，“救心丹”赫然出现在各地大药房，而各种质优价廉的国产冠心类药物却不得不在家门口退避三舍。

洋中成药蚕食“中药王国”已不止冠心类药，在全国近600家中药厂的激烈竞争中，洋中成药乘隙而入，各个击破，把我国同名同效药接二连三挑下马来。广东某年进口川贝枇杷膏、保心安油等中成药800万美元，全国一年进口中成药价值竟高达8 000万美金，占了国内中成药年消费量的20%。

药业界人士担忧，国内原料如果继续低价抛售，而多头进口仍不能理顺，价廉物美的国产中成药还会被一一打败，继而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按需进口”则是救治国产中成药被蚕食的一帖良方。

洋食品形成的超级波则更为直接。一位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级主管说，中国没有可口可乐的对手，也没有可口可乐的空白点。此外，洋饼干、洋糖果、洋奶粉等正迅速地占领国内市场。每年的糖酒食品交易会，以往都是国内厂商扮主角，但从2003年开始，洋食品开始占有优势，特别是易于机械化生产的食品。

洋品在中国形成冲击波的心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我偏差的原因，反过来，这种冲击波呈现的放大效应又强化了非我偏差。这是对本国经济文化发展十分不利的心理障碍，当然，有人强调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优胜劣汰，但月亮真的就是人家的圆吗？

另外，打假也不可放过“打洋假”。然而，正如产品有伪劣假冒一样，前来投资的外商亦有少数不法分子甚至假冒者，他们利用我们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和一些人缺乏国际贸易经验以及崇洋心理，通过合资，倾销劣次生产设备，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南方沿海某市一机器制造厂花100万美元由西欧某国引进150台机器设备，等到卸下货来，厂方的十几位技术人员全部傻了眼：这150台设备竟有137台是八成新，甚至是更旧的货！厂方与外商交涉，对方振振有词：我们的设备已经经过SGS（国际检测机构）的检测，绝对价值相当，况且，合资协议并没有申明全部要新货呀！厂方知上当。事已至此，该厂被迫放弃了与对方的合作，但是却因违约花掉50万元人民币，更让人痛心的是，总投资达1 800万元的新建项目搁置下来，间接经济损

失无法估计。后来通过调查，某国的这家公司只不过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皮包公司，其投资的所谓设备只是从当地廉价购买的淘汰货！

某县经多方努力，好不容易办起了一个经济开发区。为吸引外资，县里赶紧仿照外地制定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在国家、省、市级10余家报刊上大幅刊登招商广告。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前来洽谈投资事宜的大小客商有一千多家，其中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8家企业也加入了投资谈判的行列。香港一家公司名为某世界名牌汽车生产配件的合资项目，引起了该县的极大兴趣。据对方称，该项目投资风险小，利润高，项目总投资为100万美元，正式投产后两年即可赚回投资，第三年可获利润，他们愿全部以设备投资的方式投入70万美元，该县只投资30万美元即可。该县欣喜若狂，当即向对方亮牌：不仅承诺全部的优惠政策，而且答应可以把优惠政策规定的减税3年改为免税5年，并恳请对方尽快签订合同。双方一拍即合，当天就爽快地在谈判桌上达成了协议，约定该项目生产设备由外方投资商负责在国外购进。然而，该县按照对方提出的技术要求投资100万元人民币修建的几排厂房，迎来的却是在我国属于淘汰对象的250台国产设备！经过了解，这家港资企业还在东北某省采取同样的方法倾销了100台同样的国产设备。

在国内，外商拖欠中国企业货款的情况已非常惊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外商拖欠中国的货款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外商拖欠中国的货款多是账龄不短，所造成的损失，需要数倍额外营业额才能弥补。要弥补100亿美元欠款的损失，当企业边际利润（即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利润）率分别为2%、4%及5%时，则要多做5 000亿、2 500亿及2 000亿美元的生意。

造成外商欠款的原因，主要是中方企业缺乏警惕性和防范意识，生意头脑欠缺。有的外商直言不讳地说：跟中国企业做生意，没有钱不要紧，中国公司会提供无息贷款。用中国人的钱为自己赚钱，万一亏了本，则是瘪了中国人的口袋。

2004年12月，一条消息迅速流传：四川长虹有40亿元人民币在美国被骗。为此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2004年度预亏公告，长虹每股预亏竟达1元。在此之前，还有所谓的“世界华人经济共同体”以可以办理特殊人才绿卡为诱饵，致使国内上万名艺术家上当，被骗人民币3亿多元。

一位在欧洲游历了一年的中国人曾经感慨地说，“没有被骗被偷，不算畅游欧洲”。国外的骗术让人防不胜防，进入21世纪以来，“野鸡大学”就让许多一心读“洋学堂”的中国人大呼上当。当然，也不一定是上当。笔者所在的大学曾经引进一位“海龟”博士，此“海龟”博士不仅没有拿得出手的论文，甚至连必需的博士论文也没有，但仍然被委以重任并评为教授，此外还获得了数十万安家费、科研

经费，后被发现博士文凭为美国某野鸡大学的假文凭，该人才逃逸不知去向。实际上，该人已在重庆连骗三家大学得手，竟然还担任过在重庆召开的“国际市长峰会”的主持人呢！

在美国，“野鸡大学”呈泛滥之势，几乎遍布全美各个角落。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一些“野鸡大学”很早就大摇大摆地进军中国，堂而皇之地在中国招生。一些“野鸡大学”还推出种种“优惠”：不用来美读书，通过中文教学就可拿到美国学位。据调查，由“野鸡大学”颁发的学位不在少数，尤其是MBA学位最吃香。

在华人数量最多的加州，“野鸡大学”最为猖獗。美国《世界日报》资深记者鲍广仁对“西部太平洋大学”“哥伦比亚州立大学”等“野鸡大学”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他说，“野鸡大学”颁发假文凭、假学历有两种方式：一是向留学生收取昂贵学费，然后装模作样地给他们上点儿课后，就颁发各种学位证书；二是直接卖学位证书，留学生连学都不用上，就可以获得想要的学位。鲍广仁介绍，被“野鸡大学”坑骗的学生主要来自中国，这些学生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不知情受骗，另一种是明知“野鸡大学”在骗人，也心甘情愿去受骗。这种人留学美国，就如同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购买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

18

惊心动魄的锦西“假兵案”——物化偏差

钱、钱、钱，命相连

物化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是一个应用得比较普遍的概念，并且带有贬义，指人在机器化大生产中的“自我消失”“人性消失”状态。

但中国的物化在开始时是非常令人神往的，中国的物化是指一种消除事物差别，物我化一的意境。物化一词起源于《庄子·齐物论》；物化一事发生于“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当然，后来物化也指人死，秦观在《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一诗中说：“辩才虽物化，参寥犹夙昔。”

在传统的认识观里，物化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在诗中是那种物我合一的意境，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将物化作为社会心理障碍来分析是鉴于这样一种现状：对物质、金钱的崇拜使人们迷失了自我甚至迷失了人性，这种“拜物教”的残渣在我国已经被顶礼膜拜，我们可以把这种物质异化的现状归结为“物化人格”，但笔者仍然倾向把这类心理障碍归结为认知障碍而不是人格障碍，因而用“偏差”来进行标定。某权威经济学家在某权威大报上的“警示名言”曰：“向钱看、向前看；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一时间，这句话竟被视为“改革圣

经”。从否定“一切向钱看”到鼓噪“一切向钱看”，中国人的认知变了。

中国人喜欢叫嚷“钱、钱、钱，命相连”。如今，有多少人为钱所累，眼中除了钱便无别物。笔者就曾经调查过下面一宗案例。

徐福海的老伴暴病身亡，扔下两个尚不懂事的儿子。他既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总算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又帮助他们成了家。

孩子大了，徐福海也退休了。退休后的生活很是孤单。儿子有了媳妇也不来看望他了。不久，经人介绍，他被一家个体饭店高薪聘去当厨师。他想，趁此机会挣三年两年的，攒笔钱，好重新成个家。

三年过去了，徐福海有了一笔十分可观的存款。两个儿子得知后便开始登门了。每逢年节假日，他们几乎是住下不走，他们觉得，要想真正从老头子那里得到好处，就必然要独占这棵“摇钱树”。事也偏偏凑巧，就在这期间，有人为徐福海介绍一位当会计的老伴。两人见面后表示满意，商定国庆节登记结婚。

两个儿子知道后，背着父亲到女会计家一顿打砸，并威胁女会计，硬是把这桩婚事搅黄了。老人知道后，火气难忍，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

中秋节的前一天早饭后，医生告诉徐家兄弟，其父病情恶化，生命有危险，要他们做好准备。兄弟俩听后，焦急万分，轮流趴在父亲的耳旁问：“爸爸，您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爸，您没忘啥呀……”不论儿子喊得怎么亲切，老头子依然是眼不睁嘴不语。不一会儿，哥哥有事回家去了，弟弟认为时机到了，急不可耐地摇着父亲的手臂问：“喂，你把存折放哪了？你要是真的走了，那存折可咋找啊……”徐福海愤怒地抽回胳膊，将手放在胸口上。小儿子一见父亲的右手指支出三根，喜出望外，一口气跑回父亲家。他逢“三”便翻，翻遍了第三个抽屉、第三个相框、第三个木箱、第三本书……结果，一无所获。

哥哥领着3岁儿子从家返回医院，见弟弟不在病房，料定弟弟先下手了。他想起刚才离家时妻子说，一般老年人都喜欢把贵重的东西藏在枕头里或大衣领夹层里，心急如焚，急忙骑车驮着儿子去父亲家。

来到父亲家里，见弟弟正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地吸烟，哥哥谎称为父亲取两件换洗衣服，说着便开始对父亲的衣物、行李进行了全面的搜查。弟弟的两眼却死死盯着墙上的大镜子，从那里严密监视着哥哥的行动。

突然，弟弟发现哥哥从父亲的呢子大衣领子里，掏出一张小小的纸片，塞进了自己的衣兜。他认定，那纸片一定是存折。为此，兄弟俩扭打起来，弟弟的个头和力气均不如哥哥，他不但未夺下纸片，反而被哥哥打得鼻青脸肿。已经红了眼的弟弟，一眼瞥见了正在门口玩耍的小侄子，便急忙冲了过去，抓起这个白白胖胖的3岁孩子，用尽全身力气朝门框撞去……

随着一声惨叫，孩子的头颅如同迸裂的西瓜，脑浆和鲜血喷飞，一命呜呼。

见此景况，哥哥抱起儿子的尸体痛不欲生。片刻，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疯了一般跑进厨房抡起了菜刀，冲着正在发呆的弟弟举刀就砍，一连砍了十几刀，弟弟的脑袋也像一个剥烂了的西瓜。望着惨死的儿子和弟弟，哥哥自己也绝望了。他一把掏出那张存有15 000元的存折，拼命地撕扯着。在纷纷扬扬的纸片中，他将菜刀的锋刃又朝着自己的脖颈抹去……躺在病床上的徐福海闻此消息，长叹一声“作孽啊”，就停止了呼吸。

不知何朝何代何年何月起，钱便成为人们神奇的不可缺少的伙伴。鲁褒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莎士比亚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一点点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钱如此神奇如此重要，于是人们就“求”之、“挣”之而不疲。当然，人们“求”钱“挣”钱，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也是“甜蜜的事业”。然而倘若“求”钱“求”得出了格，“挣”钱犯了“科”，那便是为钱所“累”了。

“钱累”，带给人的往往是心理的畸形和变态。莫里哀著名剧作《悭吝人》中的阿巴贡，穿着褴褛守着钱柜过活，一旦钱柜丢损便捶脚顿足，大呼“不要这条老命啦”。英国诺西汉郡有一位名叫霍金斯的百万富翁，患了癌症，临死前决定把自己的积累全部吃进肚子，结果被钞票梗塞喉咙一命呜呼。

古人云：“君子使物，不为物使”，人通过正当的辛勤的劳动“挣”钱无疑是一种幸福，一种慰藉，然而人一旦为钱所“使”所“累”，使其人格发生了扭曲、变态，那就可怜和可悲了。阿巴贡、霍金斯以及那些提心吊胆、神经衰弱的经济犯罪者们，不是一面镜子吗？

拜物教是原始社会的现象，由于原始人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理解，石头、树木、太阳、大象、男性生殖器之类，都曾被当做神灵来崇拜，以求获得庇佑。后来，“拜物教”一词也移作他用，如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等。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外来文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外来文字及其所代表的事物，未经消化就变成一种新的“拜物教”。而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一些地方已成为这样一种东西。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繁荣举世瞩目，1978至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8%，“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GDP的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GDP既不考虑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教育质量、游戏快乐，也不关心成年人的音乐陶冶、诗歌韵味、爱情甜美；GDP既不考虑家庭的天伦之乐、骨肉情深、婚姻稳定，更不关心社会的人口剧增、资源匮乏、官员腐败。GDP反映经济增长，但不反映社会是否协调、城乡是否同步、结构是否合理。

有学者对GDP的作用生动地提出诘难：“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等，所有这些……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这如同1998年的大洪水，它虽然严重破坏了堤坝、房屋和道路，但它并不削弱GDP（因为它根本就不计入GDP）。相反，由于灾后重建的大量投资，GDP反而会上升。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悖论——灾害不仅造成财富的毁损，还会导致GDP的增长。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以GDP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不等于GDP是“第一要务”。考核某一地区的发展，某个领导的政绩，单纯考核GDP增速、GDP排位、GDP人均等指标，必然导致GDP拜物教。更为实质和全面的要求是，失业率、社会保障水平、入学率、生态环境状况、城市化水平等，都应当列入考核指标。GDP当然不是坏东西，但GDP包容不了所有的好东西。我们既需要“绿色GDP”的经济生态，也需要与GDP同样美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一切向钱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价值倾斜，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金钱黑洞的漩涡。

时过境迁，一些原以为一成不变的成语，如今看来，也须进行“改革”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且看下列随世风嬗变而演化的“成语”：

作家——投笔从“融”（投笔从戎）

历史学家——谈“股”论“金”（谈古论今）

书法家——玩物丧“字”（玩物丧志）

科研人员——“金”疲力尽（筋疲力尽）

技术人员——坐以待“币”（坐以待毙）

银行人员——持“资”以“横”（持之以恒）

记者——言为“薪”“生”（言为心声）

医生——精益求“金”（精益求精）

教师——谆谆“叫悔”（谆谆教诲）

演员——多“财”多艺（多才多艺）

司法员——软硬兼“私”（软硬兼施）

出版商——添“资”加“页”（添枝加叶）

受贿者——据“礼”力争（据理力争）

抢劫者——无“为”不至（无微不至）

中小學生——“财”疏学浅（才疏学浅）

家庭教师——因“财”施教（因材施教）

老实人——愚昧无“资”（愚昧无知）

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关于金钱的名言虽然直白但很有哲理：“金钱是很好的仆人但不是好的主人。”正是如此，当人们被金钱所主宰，行为产生均出于金钱动机时，所产生的金钱黑洞就会吞噬人们的良知，从而变成良知麻木的“金钱人”。

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曾感慨万千地对记者透露他同一位“倒爷”的奇异对话：

我说：你倒什么？

他说：我倒彩电。

我说：你怎么从工厂拿出来？

他说：有多少环节我都打得通。前几年只要几百元，后来涨到千余元，现在只要拿出万余元来，任何环节都畅通无阻，而且都是合法的。

我说：你打通这些环节的钱和你赚的钱的比例如何？

他说：上半年除了上税，我赚100万元，关税花了不到20万元。

我说：你赚了钱怎么处理？

他说：我正愁没地方存。

我说：你自己挣的怕什么？

他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又说：赚的钱再用来储备紧缺物资、商品，现在准备储备有色金属，下一步就是倒腾有色金属。我可以倒走你重庆的铜材，你信不信？不要看你是书记。

我说：你倒腾物资，商品运输怎么办？

他说：毫无问题，而且都是汽车运输，打通火车环节目标太大，代价太高，抓住了不好办。

我说：汽车你怎么弄得动？

他说：最多一个月两条烟就解决了。

30多年过去了，“倒爷”已经成了陈旧的、过时的名词，正如“投机倒把”一样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只要有钱，“多少环节都能打通”的现象并未绝迹，相反，权钱交易在现今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受贿索贿层出不穷。云南省个

旧市某落马贪官就自嘲道：“有钱能使官推磨。”可以说，这方面的案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需要指出，官员们的“金钱动机”近些年来有了新的突出表现，那就是出于利益驱动（当然主要是自身利益）在行使职权中“捞钱”，如滥用罚款、违规收费、违法创收等。在一些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有钱的案子争着办、无钱的案子推着办已经成为“潜规则”。有的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打牌赌博等可重罚有“油水”的案件抢着办，而对强奸、抢劫、斗殴等费力、费时、费钱而又无“油水”的重大刑事案件则不积极办，甚至拖着不办。有的法院庭室之间争办经济案，争收诉讼费，而不愿办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费少的案件。某市法院出现了经济、行政、刑事、民事审判庭和政工、行政、办公室等所有庭室、全体干警都争办经济纠纷案件的现象。

曾几何时，娼妓现象在我国死灰复燃。旧社会的娼妓，大多数是因生活所迫而堕入火坑的，而现今的“小姐”大部分已经不是迫于家庭负担或经济压力，她们信奉的“金钱至上”，实则是为了满足其高消费甚至奢侈的生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姜某，来自上海，平日里最向往深圳、香港。尽管她家不穷，但她渴望金钱能够一多再多。于是凭着她颀长的身材、白净漂亮的脸孔、乌黑亮丽的卷发，发誓要到深圳捞够钱才“衣锦还乡”。她曾将自己包租给香港客，每日捞取卖淫费5 000港元，并利用空当外出与深圳那些发了大财的个体户、包工头勾搭，额外再赚钱。在公安机关抓获她时，她在银行已存有30万元。对卖淫嫖娼，她认为是一种交易：“他出钱我卖身，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对谁也没有损害。”

李某，杭州人，出身于干部家庭，本是某大学的学生，在出国热潮的冲击下，她也梦想有朝一日出国留学。她终于受不住诱惑，到深圳做起了卖淫的职业。她认为只要挣够钱就可以远走国外，实现自己的“夙愿”。她在深圳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接待过港客、供销人员、司机、包工头等近200人次，每次收取费用200元以上。在她的银行存折中存有20万元人民币和近万元港币。在受审时她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人格，有钱就升格。”“金钱至上”的意识使卖淫女青年丧失人格，成为纯粹违法赚钱的机器。

笔者曾有幸参加了一回“影视作品研讨会”，才弄明白了如今许多影视评论专家对一部作品的优劣评价是怎么来的了。那次研讨会是专门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女导演召集的。虽说那位由女演员改行的女导演一向在影视创作上默默无闻，但聪明的她却傍来一位大款，专门出钱替她包办了这次很大排场的“研讨会”。那天我赶到会场，一位负责会务的半熟脸先生对我耳语道：“发言，赶紧发言！”我当时不

解其意，问：“为什么非得发言？”那半熟先生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发言，给钱，给钱！”明白了“发言给钱”的奥妙之后，我再抬头一看，只见一位两鬓花白的著名老评论家正在激动发言：“你们剧组刚把样带送来时，我当时并没在意。但当天晚上我刚看了一盘，就感动了，就忍不住流泪了，真是好啊！它不但讴歌了无私奉献精神，还深刻批判了拜金主义。不能眼睛老是盯住钱不放嘛！……”紧接着，许多经常在报刊上对影视作品发表评论的著名评论家们，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发言，而且全是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

金钱黑洞的漩涡所波及的面积越来越大，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均不能幸免。知识界、学术界一向被称为“净土”，但这块净土的污染亦日益严重。

《中国人事报》2012年7月23日刊登奚旭初的文章说，科技项目立项、验收、组织专家评审，保证项目的科学性、水准，保证公共财政支出的科研经费不“打水漂”，其本意无可指责。

然而，眼下评审费行情大幅飙升，两三百元早已拿不出手，500元只是“意思意思”，1000元也只是平常数。据中科院一位研究员透露：他每月获得的项目评审费，多则七八千元，少则也有三四千元。看来，评审费已成为专家们“创收”的捷径，靠着这条捷径，一些专家不仅早已实现小康，而且实实在在地富起来了。

文章说，专家付出了劳动，获取一定的报酬，亦是理所应当，但是这种评审活动，获取酬金的多少，应该加以规范。离谱的评审费之所以离谱，往往是评审中的“非科学因素”所致。随着承担政府立项的科技攻关项目的企业越来越多，为在立项、验收时能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不少企业就在评审费上做文章。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在高额的评审费面前，公正性自然打了折扣。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被滥用。若见怪不怪，放任不管，结果必然演变为“评审腐败”。

当然，各种各样的考前培训班亦如此。它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有正规的，有不正规的，有靠强大实力占领培训市场的，也有靠投机取巧分得一杯羹的。同类培训班收费的高与低，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辅导老师押题准不准，以及辅导老师是否和出题人有“关系”，是否了解出题“内幕”。据笔者了解，每年考研之前，就有一些辅导名师坐飞机不停地穿梭于各大城市的辅导点，一次2小时的辅导课酬劳可高达5000元甚至上万！辅导名师凭的是什？凭的是押题特别准。押题准一方面源于他的经验和判断力，另一方面就是源于他所掌握的“内幕消息”。

很显然，一些考前培训机构将“培训班”变成“泄题班”，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损害了教育的公正。这种现象如果不加遏制，任其蔓延，不仅会助长学生们投机取巧的心理，而且会损伤人们对考试、教育、文凭、知识、人才的信任和尊重。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维护考试的纯洁性不仅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需要，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一般来说，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交易规则是暗箱操作，由于没有谁愿意把它摆到台面上，因此也只能是一种潜规则。一种潜规则只有得到社会上很多人认可的时候，才可能会大胆地站出来，走到前台明处。行贿所传递的信息，最值得我们关注。

实际上，最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净土之上象牙塔的学校。我国的诸多学校以前被称为“清水衙门”，也正面临金钱黑洞的漩涡。

仅湖北一省的统计，就有补课费、资料费、文娱费、电影费、开办费、茶水费、公交费、试验费、修缮费、公物保管费、设备仪器费、学籍管理费、班费、赞助费、筑路费、图书费、旅游费、服装费、绿化费、法律费、民办教师费等40多种收费。

有一首所谓的“咏叹调”，唱的便是目前学校的“百费（废）俱兴”：

入学要缴注册费，
放车要缴存车费，
校诊要缴医药费，
热饭要缴烧炭费，
晚读要缴照明费，
考试要缴试卷费，
哎呀呀，费费费，
“清水衙门”染污秽，
问君何以诺多费，
盖因学子是消费，
如斯作为对不对？
百费（废）俱兴最实惠，
家长腰包倒了霉，
“清水衙门”本色褪。

金本位PK官本位

物化偏差的核心还是来自于金本位的观念，正如权威人格的核心还是官本位一样，当今社会，有人公开喊出：“这一次只邀请金钱，把主义什么的晾在沙滩！”当金钱黑洞卷起漩涡时，我们应当怎样坚守自我呢？

天津作家吴若增在《中国需要文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品格如果不说是已经崩溃的话，至少也是滑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人格理想与价值

观念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和坍塌。如果我们继续讳疾忌医的话，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不只是文学和艺术，而将是几代人健康的灵魂。文章指出：当今时世，可怕的还不止是人人谈钱、想钱、赚钱，也不止是为了钱而伪劣假冒，甚至杀人越货，真正可怕乃彻底可怕的还在于钱已成了人的价值尺度。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堂而皇之公开地正面地赞美金钱并宣称“只要能赚钱就是英雄”。是不是我们刚摆脱了政治万能的疯狂，又陷入了金钱万能的疯狂？

“物化偏差”之所以作为社会心理障碍，其重要特征就是“以赚钱论英雄”，金钱被称为衡量价值包括人的社会价值的权重砝码甚至是唯一砝码，于是，人们对之趋之若鹜，连“官本位”有时也不得不让位于“金本位”。

如今的“时尚”是：某些大官要傍大款，某些大款要靠大官。

所以，某些大款是大官的座上客，某些大官则是大款的门上宾。

所以，某些大官将一张张优惠的批文源源不断地送到某些大款手中，一顶顶“红帽子”（“优秀企业家”“改革能人”“巾帼英雄”“××十佳”等）一股脑儿扔到大款的头上，因为谁都明白当今中国的“国情”：“红帽子”本身就是“保护伞”。而某些大款呢？给某些大官的“回报”自然是慷慨的、丰厚的，譬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一次就“笑纳”了周坤的2 000万元，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受了周雪华310万元的“馈赠”，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则收下了“铁哥们”赖昌星54万多元的“好处费”……

正因为如此，这些大官和大款之间就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此，被人称为“政治暴发户”“经济暴发户”（贪污受贿1 000多万元）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就曾对一个大款非常坦率地说道：“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

“官傍款”成为时尚，道理很简单，“款”追求“官”的权；“官”追求“款”的钱。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不少“官”均成为“款”的走狗。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1999年“昆明世博会”上成为风光无限的亮点。但当时就有一个老板私下里这样评说：“我用脑袋担保，李嘉廷早晚要出事。”是的，身为一省之长，却成了老板们呼来唤去下赌注的人物，真是可悲复可怜呀！据报道，自李嘉廷从哈尔滨市市长调去云南当省长后，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昆明消费最为昂贵的“海鲜街”上，围着李嘉廷身边转的人是社会上各种各样“有脸面的人物”，其中不乏商人身份的企业老板等，李省长后来发展到“有请必到”的地步。待他事发后，一位老板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几个老板在昆明一家高档饭店聚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便琢磨着来点刺激，一个老板说：“今天谁要

是把李省长叫到这饭桌上，我输给他10万元！”话音刚落，另一个老板随口应道：“这有何难！”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不一会儿，李嘉廷乐颠颠地赶来，虽然是残羹剩饭，但丝毫没影响李嘉廷的情绪。酒足饭饱之后，老板们恭恭敬敬送走了李嘉廷，然后相视大笑。那位设局的老板连声道：“我服了，这钱我认输，我认输！”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这件事前因后果交代得十分清楚，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贪官李嘉廷的嘴脸，实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贪官李嘉廷的所作所为，正中当时昆明那位老板在一次酒后说的话，“我用脑袋担保，李嘉廷早晚要出事，他经常来‘海鲜街’吃喝，包括宴请他的私人朋友，都是由老板们买单，那些老板是什么人，为什么愿意这样做我最清楚，他们从来不会白花一分钱的。”

是啊，不要说堂堂的高级干部一省之长，就是一个市长、县长，在老百姓眼里都是崇高的，如要与其见一面，都难于上青天，何况是个省长。但李嘉廷，只要老板送钱送物，他就随叫随到，利用职权认真替他们办事、卖力。一位老板事后坦白说：“我们认为李嘉廷不像一省之长，钱送上去，项目、资金他都亲自给你去打招呼，亲自给你去跑腿。”这是多数“老板”对李嘉廷的共同感觉。李嘉廷的“贪”让许多办案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凡是上门行贿的，他都笑脸相迎，后来发展到什么都收，什么都要，根本不管东西的贵与贱。在李家客厅里摆得满满的全都是礼品，很多连包装袋都未拆开过。光是香烟就可以开个大大的香烟店：有几百上千元钱一条的高档烟，也有几十元钱一条，甚至十来元钱一条的普通烟，劣质烟。这个贪官真是不分大小，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以金钱多寡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核心标准，这就促使更多的人患上“恐贪症”或“金钱焦渴症”。

平心而论，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公众尽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在安然地接受着一切好处与实惠之后，心理天平的震荡与倾斜开始了——公众中日渐滋生、蔓延着恐惧贫困的心理，它并不是狭义上的无米下锅、“钱”关难度，而是一种融合了对过去值得回味的无竞争、平静似水的日子的眷恋、对现实无法适应的苦恼，以及对未来难以明确把握的忧虑等多重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忧患意识，这可由一句为历代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窥见一斑。但凡事过犹不及。对贫困的过分恐惧以致成症，就会使人陷入丧失理智、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自私狭隘的境地。

“只有黄金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至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人口质量，包括人的心理状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诸多内容往往被忽略不计。

有这样一首歪诗，据说是某位领导干部的得意之作：“改革是否有问题，酒楼饭馆看肚皮；大家肚皮是鼓了，看来改革无问题。”这首诗实际上充分体现了一部分人包括领导干部的幼稚。不是吗？

有些人对群众“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大惑不解，甚至抨击群众“忘恩负义”。殊不知，人作为社会人，物质需要的满足仅仅是一个方面，精神需要的满足更是必不可少的。以物质代替精神，即在“拜物”的同时排斥人的精神需要，这也是拜物偏差的特征。

某单位派慰问组慰问离退休职工，老人们个个喜上眉梢。哪知慰问组到后，屁股没沾板凳边，只给每人丢下一份薄礼就拔腿走了。“这叫哪门子慰问，连句暖心话也没有啊！”老人们说。年年教师节，无非就是教师该日某时到财会室领慰问费若干。机关评先进，被评上的仅仅被通知到财会室领奖金若干。“现在人们讲究实惠。”有人这样说，但蹊跷的是，为什么人们在吃肉的同时照样骂娘不误？

我们经常谈到国情。关于国情研究，我们往往只注意了资金、资源等方面，恰恰忽略了最不该忽略的最大的国情之一，即民众的心理定势。经验证明，没有相应的与文化心理配合的社会方案是注定要失败的，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议论：

当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19

南京大街博士行乞 ——怠惰趋向

胡适考证：明朝亡于麻将

中华民族向以勤劳著称。自然环境的恶劣、人口的压力，使中国人必须加倍努力，才能生存。但是，我们也有怠惰的遗传。

怠惰因子，表现于精神领域：思想上，我们惯于接受圣人现成的教训，而懒于独立思考；政治上，我们寄望于明君，而不肯自己判断；法治上，我们期待清官，而不思改造官僚体制；道义上，我们求助于侠客伸张正义，而无力自救。总之，我们总想由圣贤、明君、清官、侠客，替我们把一切都想个周全、做个周全，恩赐一个好社会，这就是前文所说的圣贤期待与帝王情结。

怠惰在行为方面也有诸多表现。随着社会的进步，一方面生活压力减少（这里指的是基本生活），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压力加大，均有理由促使人们的行为趋向怠惰。前者可归为不思进取，即“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后者则可归结为人们在激烈竞争中实施退却或回避的自卫本能。有研究发现，这种自卫本能不仅是一种心理方面的自卫，也可能是一种生理本能，一种个体差异的生理本能。

日常生活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对工作厌倦、对学习没有兴趣，甚至非常讨厌学习的人，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发现，这是一种病态反应，此病叫做“无兴趣病”，有人又称之为“职业倦怠症”。有的学生经常逃学，也可能与患有此病有关。对此病最早开始研究的是德国病理学家克吕格尔教授，他发现有一种病毒可使人感染上无兴趣病，此病毒称为无兴趣病毒，属疱疹病毒六型，病毒的载体主要是人。它可通过喷嚏传播。此病的开始症状像感冒，此后出现颈淋巴结和腋下淋巴结肿大。

怠惰的表现可以从文化的研究窥得一斑。说到文化，现今人们提及最多的无非是“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澡文化”“性文化”“牌文化”等，其趋向

主要还是“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奶嘴文化”。

东方尔在《青年时讯》撰文说，继几米绘本火爆之后，听说又有不少半老不小的男男女女又为着“低幼读物”疯狂起来。如纯属儿童读物的“麦兜麦系列”在订货会上大受成年人的欢迎；如许多大人一进书店什么书都不要，就要《丁丁历险记》；如在不少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在前几位的永远是那些“成人童话”。

文章说，对浅层快感的追求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也是人类最为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快，工作压力的日趋增大，现代人在不自觉中追求轻松、惬意，不付出思考即可轻松获得快乐的阅读。这情有可原，可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如果有一天，人们除了只能看懂漫画、小人书之外，从根本上丧失了其他的阅读能力的时候，他们还快乐得起来吗？谁都知道，当“文化”进化成奶嘴，当文化的力量蜕变成了“安慰婴儿”入眠的功能，对于人类意味着是一种怎样的滑稽，可奶嘴文化的炮制者和奶嘴文化的享受者们依然趋之若鹜。

趋向休闲固然不错，但趋向怠惰、游手好闲、不劳而获则明显是阻止社会进步的根瘤。如今各地游荡的乞丐数量猛增恐怕与这一趋向不无关系，而广州甚至成了全国乞丐的“集散地”。

据《侨园》1994年第03期《乞讨发财不是梦》刊载，现今的行乞者中，因生活困难而行乞者仅占8%，其余绝大多数均把行乞作为一种生财手段。河南省郸城县的残疾青年崔某，是放映电影的个体户，收入甚丰。可每逢交易会、春节期间，在广州的车站、码头、宾馆附近，人们往往能看到他行乞的身影。有人问他为何乐于乞讨，他说：“乞讨只需伸伸手，就可以弄到港币、外币。”据收容站工作人员介绍，被收容的行乞者，一般身上都有一两千元，有个别人竟成了“乞讨万元户”。安徽省六安县的青年蔡某腿有残疾，他充分运用这一“特长”，多次到广州、深圳等地行乞，被送进收容站时，他的身上竟藏有各种面额的港币一万多元，还有数千元人民币。

中国人向来视济困扶危为一种美德，许多人把向乞丐施舍当做善事。行乞者们正是瞅准了人们的这一心理而展其技，以博得人们的可怜和同情。在一些行乞者的眼中，广州是“乞讨的乐园”。他们说，“东西南北中，发财来广东”“待在内陆地干十年，不如在广州讨半年”。

据统计，广州仅被收容的流浪乞讨人员，平均每年就有17 000多次，某一年更增至28 000人次，收容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行乞者前来乞讨的时机，多选择在春节前后。这些行乞者把在广州的乞讨所得寄回家乡，在那里或盖新房，或买现代家用电器，或办喜事，使得同乡羡慕不已。有一首顺口溜说道：“外流，外流，跑遍全球，分文不带，吃穿不愁。一趟外流，样样都有，三年外流，回家盖楼。”这

种以“生财”为目的乞讨现象，不仅损害了国家形象，还给城市的治安、交通、卫生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绝不能对其放任自流。

中国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生观无疑也助长了怠惰的趋向。河南省商城一位农民曾自编顺口溜：“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子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这当然是他满足于安定生活的自然流露。但是，透过这首顺口溜，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心境吗？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社会学者曾经做过一次普遍的社会问卷调查，发现赞成“一日三餐吃太平饭，无事就可以”的占56%以上；赞成“宁肯少赚钱，也要活得轻松些”的占71%。对下岗职工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下岗人员并不是找不到工作做，而是不愿意从事一些繁重且待遇不高的工作，宁愿待在家里。在全国人才市场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人找工作，另一方面是工作找人，因为一些工作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主要是嫌脏、累。人们宁愿过游手好闲的日子。

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各地脱贫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还在贫困线下徘徊。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外，还有心理因素。也就是说，在贫困地区，有一些消极的社会心理影响农民的认识、行为，制约了农民的求富动机和进取精神，使农民长期陷于贫困。由于这些社会心理比较典型，集中地反映在贫困地区农民身上，又是导致他们贫困的心理原因，故可统称为致贫心理。主要有两种表现：首先是安贫乐道心理。安贫乐道心理是指对贫困的文化、生活等现状安然处之自得其乐的心理状态。按常理，人们总是希望丰衣足食，向往美好生活。但是，在贫困地区这种特定社会，农民深受千百年来知足常乐、安贫知命等伦理思想、宗教观点、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安贫乐道的社会心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观点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影响更深，如：一些贫苦农民至今还以“红苕饭，蕲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为自己的贫苦生活解嘲。其次是惰性心理。惰性心理是指不愿改变生活和劳动习惯、性情懒惰害怕吃苦而导致贫困的一种心理现象。某省37个贫困县（市）辖区面积占全省的51.7%，农业人口占全省的36.8%，但可耕地面积仅占全省的31%，明显人口多耕地少，有的县人均土地不足0.7亩。农民常常是“两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七个月忙忙闲闲”，没有紧张感。

怠惰趋向的突出表现是趋向消闲，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麻将风”。全国各地哗哗啦啦麻将声随处可见；麻将牌桌挤挨成阵，随处可见。张书省有篇《小城轶事》颇有意思，现摘录如下。

友自成都至，言及川地事，一路上对“麻风”泛滥颇多感慨，不经意间竟列举

出些许趣闻：

一女士好容易挤出一天时间陪年迈的父母去春游，至一湖光山色极佳处，呼一小船，欲逆流而上，尽览风光。刚登船，父即手指船舱惊呼曰：摆一麻桌极妙矣。船家瞬间变戏法似的撑起一张方桌来，且麻具俱备。又有同船二人吆喝加入，一直打至远去又复回，日东转日西。晚归，女士叨叨甚累，父母极言痛快。女问及两岸景色，父母面面相觑，无以对之，只知输赢几多，不知足迹何处。

一乡官受命去某村，因阴雨可能酿成灾事而疏散百姓，刚入村，一竹篷下诸多农人麻声正沸，此官员言及雨大可能有灾，言辞凿凿却无人应睬。未几，村道已有水流涌动，此人即大呼曰：水来矣！众人皆望四周，复看了看他，一人愤曰：大惊小怪！余则毫无表情而麻声依然。少顷，水流更大，已闻哗哗之声，此人思忖：看尔冷静能几时！然观之麻桌，一围人已全将脚抬至方桌横木处，牌兴却丝毫不减。其人叹曰：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今见矣。

一农人进城卖菜，只见菜成两行，不知人之何往。扭头四寻，靠屋檐处人自成堆，皆麻友矣。农人兀立少顷，手痒难耐，磨蹭驱前。稍近，即有言欲小解者拉他入围。初还顾盼其菜担，久则心无旁骛。有人呼曰买菜，农人头也不抬：“自己称吧！”称罢又呼曰交钱，农人头也不回：“就放那儿！”天色既暗，农人方归菜筐处，菜已无，钱也无。农人却毫不在乎：“菜值几何？尚赢八元呢！”

地方号召发展居民区楼顶绿化，可种草，可栽花，可植小木，久之可让灰暗色城市成一片绿色。令既下，各家皆登屋顶，均发现其平顶上眼界甚宽，空气甚鲜，放一麻桌再好不过。于是不久，各家楼顶均成麻桌之所在。某日傍晚，落日晚霞，其景甚美，上司自城侧山上下观小城，惊呼：我城已成诸葛孔明之八卦阵图矣！只见影影绰绰之中，绿色未果，方阵星罗棋布……

胡适曾谐趣说：从各国对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

胡适认为，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其实中国还有第四害，这就是麻将。前三害经近代的革新，已差不多化为历史陈迹，只有这第四害却“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竭的样子”。他估计，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有100万张麻将桌，就算每桌只打8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得消耗400万小时，相当于损失寸16.7万天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胡适痛心地问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他以史为证说，麻将的祖宗马吊在明代曾风行天下，士大夫整日整夜地打马吊，

把正事都荒废了。明亡之后，清人吴伟业《绥寇纪略》，就说明朝是亡于马吊。

手术刀下的阴影

上面的题目完全是一部恐怖片的题目，不过，用它来形容发生在我国的越来越多的医疗事故是恰当的。

2012年7月中旬的一天，当浙江省某医院护士用车推着一位刚动完手术的6岁小病号回到病房的时候，病人的母亲立刻惊呆了。原来，应该做在儿子右腿上的手术竟然被做到了左腿上，而病腿却依然如故。看到这种情况，母亲不禁失声痛哭。

这实在是令人痛心。这位小病号来自浙江农村，因患胫骨上段骨髓炎，被杭州一家医院收治入院。门诊医生对患者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可是入院以后在填写病历和入院登记的时候，一位医师竟然把右小腿错写成左小腿。接着，护士在填写体温单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手术前一天，按照惯例，护士为这位小病号做消毒工作，依照病人父母的指点，正确地做到了右腿上，但是护士并没有向医生报告病历上的错误。当小患者被抬上手术台接受手术的时候，两位主刀医生没有进行认真询问和查对。结果，小患者好端端的左腿被切开一道10厘米长的口子，胫骨中端白白地被钻孔、开槽，腱骨被当做死骨凿掉，部分骨髓也被当做炎症组织刮出。

早在1983年年底，在一家省立医院里，曾经发生过“误切好肺”的怪事儿：一位老干部，被查出肺部有癌细胞，又进一步经过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and X光检查认为“左下叶外侧段肿瘤可能性大”。

这一天，医院为这位患者做“剖胸探查”手术。三位医生打开胸腔，没有摸到肿块。两位助手提醒主刀医生摸不到肿块恐怕不好开下去，主刀叫手术台下的人念患者的病历。听完病历上记载的检查报告，主刀说了一声“开”。于是，患者的左下叶肺便被割掉了。手术以后医院对切下的标本多次进行切片检查，都没有找到癌细胞。原来患者被切掉的左下叶肺是好肺，而病肺在右边，由于左下肺已经被切除，右上肺就不宜再切除了。这位患者只好忍受着肺癌的折磨，不久便去世了。

该切除右肺却切除了左肺，本已离奇，但更离奇的是该切除脾却切除了肝。

《健康报》曾经多次报道了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矿医院外科，在给该科一名患肝硬化、门脉高压的主治医生做脾切除手术中，将肝左外侧当做脾切除，导致该医生死亡。《健康报》就此问题向全国百余名外科专家发出咨询调查表，其中有一半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60名外科专家一致的结论是：“从未见闻，难以理解。”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朱预教授在信中说：“将肝左侧叶当脾切除，不仅从未见闻，而且是骇人听闻的……这对外科医师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肝和脾解剖上是根本不一样的。切断肝时，

肝组织和脾也不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教授说：“看了报道后我感到异常惊讶与痛心，高级外科医生把肝当脾切除，真是难以理解。”

40名专家认为此案不是因技术水平低引起，而是“玩忽职守”。怠惰趋向的直接表现是消闲趋向，间接表现则可为不敬业。不敬业的痼疾并非现今存在，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应付了事、马马虎虎的处事作风在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中时时可见。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损失竟达2 000亿元！我们常常谈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但在敬业这方面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大。

在学校课堂上，上课时教授讲“WTO条款”，大家昏昏欲睡。为了醒瞌睡，教授使出看家本领，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课余为日本餐馆洗盘子以赚取学费。日本的餐饮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即餐馆的盘子必须用水洗上七遍。洗盘子的工作是按件计酬的，这位留学生计上心头，洗盘子时少洗一两遍。果然，劳动效率便大大提高，工钱自然也迅速增加。一起洗盘子的日本学生向他请教技巧。他毫不避讳，说：“你看，洗了七遍的盘子和洗了五遍的有什么区别吗？少洗两次嘛！”日本学生诺诺称是后，与他渐渐疏远了。

餐馆老板偶尔抽查一下盘子清洗的情况。一次抽查中，老板用专用的试纸测出盘子清洗程度不够并责问这位留学生，他振振有词道：“洗五遍和洗七遍不是一样保持了盘子的清洁吗？”老板只是淡淡地说：“你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请你离开。”

为了生计，他又到另一家餐馆应聘洗盘子。这位老板打量了他半天，才说：“你就是那位只洗五遍盘子的中国留学生吧。对不起，我们不需要！”第二家、第三家……他屡屡碰壁。不仅如此，他的房东不久也要求他退房，原因是他的“名声”对其他住户（多是留学生）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他就读的学校也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转到其他学校去，因为他影响了学校的生源。万般无奈，他只好收拾行李搬到了另一座城市，一切重新开始。他痛心疾首地告诫准备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日本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呀！”

“这就是WTO的规则！”教授厉声棒喝。学生不禁悚然动容，睡意全无。

轮子·盘子·骰子·裙子

怠惰趋向反映在职业取向方面是不敬业，反映在职业态度方面则是“不作为”。

现今有许多民谣都是讽刺“官场”不作为的：

八点开会九点到，十点开始作报告，台上念讲稿，台下睡大觉；
九点上班十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看看表，吃了中饭车马炮；

一杯茶、一支烟、一张“参考”看半天，来了文件画个圈，实际问题不沾边；
没有红头等红头，红头来了看外头，最后还要看风头；
上午满天飞，中午端酒杯，下午早早回，晚上画乌龟；
七两八两不醉，通宵麻将不累，三步四步都会，出了问题就退，领导说的都对；
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喝混日子；
上午轮子转，中午盘子转，下午骰子转，晚上裙子转；
点上稀客、面上游客、桌上常客、灯下扑克……

在与基层群众座谈中发现，群众反感的是“四工”干部。

一是“搬运工”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道照搬照抄上级的文件、指示。表面上看，这种干部贯彻上级的指示热情很高，态度坚决，而实际上他们对本单位、本部门究竟该解决哪些具体问题根本就不清楚。群众说，这种“鹦鹉”式干部，起不到领头雁的作用。

二是“泥瓦工”干部。办事没有原则，整天嘻嘻哈哈，不点头，不摇头，遇到问题绕道走。群众对这样的干部见而生厌。群众说，党的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当家人，当家人就要为民做主。

三是“临时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建功立业的事业心，没有赶先进争上游的锐气，只顾眼前利益，搞短期行为。群众对这种混日子的干部，既无信任感，又无安全感。

四是“合同工”干部。缺乏公仆意识和奉献精神，患得患失，不讲风格，斤斤计较。群众说，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奉献而不是向人民索取。如果凡事不肯吃点亏，只与群众争高低，那还叫什么公仆？

每当有关媒体上报道了“××地区发生了安全事故”，或“××地方又发生了有毒污水污染环境”的新闻后，不论是文章的结尾，还是播音员的话尾总会有这样一句话：“引起当地领导高度重视”“有关部门表示将着手整治”。

先是老百姓状告无门，再是新闻媒体曝光，最后才是“引起当地领导重视”。如此三段论般的“办事”方式风行于某些地区早已非一日二日了。

尽管常听有关人士说，凡是经过如此“告状——曝光——重视”三段公式处理后事件、案件，一般都能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可是老百姓的事儿，缘何非要等到“告状——曝光”这两个环节后才能引起“高度重视”呢？

很显然，根源只有一个，如今在我们的某些地方领导、某些干部、某些有关人员当中，正流行着一种“麻木”病，即“不作为”的麻木。

别小看这麻木，它虽然比不上恐怖分子散发的炭疽热病毒，随时随刻让传染上的人上西天，但凡是染上这种麻木病毒的干部、领导却一律患上一种名叫“冷漠”

的病症。这种病症患者的典型症状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是“民不告，官不理”。有的官甚至连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儿，只要没有人告状，或有人告状了，没有曝光，便当这种事情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如某些地区制假活动连续猖獗数年之久，直到有人曝光后才能引起高度重视。其二是遇到事情，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终至石沉大海。官场的推诿功夫，历来是国人为官的首要功夫之一。时下是，不管是哪一个地区，收管理费时，大盖帽满天都是，来了一批又一批，一旦出事了，那事儿就成了皮球，在十几项大盖帽间飞来飞去，就是找不到负责任的人。

将法律作为橡皮筋，视执法为文件游戏。笔者不知此语用来形容这些“不作为”麻木冷漠病症患者的工作作风是否恰当，但笔者至少确信，自古以来凡是贪官庸官，在他们没堕落之前，总是先从“不作为”的麻木开始的。这种官场，麻木冷漠症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也许只是个别“当地领导”“个别有关人员”，拿着“薪金”不办事。可是，如果这种“不讲干活，只想享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作风蔓延开来，其结果必然是在这个国家形成一种冷漠的“公害”，而此害一泛滥，最先遭殃的是谁？笔者想，不用笔者再费笔墨，三岁小儿都明白。

如果将“不作为”仅仅归结为“官场”现象那是有失公允的。“职业冷漠症”（亦称“职业麻木症”）的表现存在于各类群体。笔者观察到，在许多单位、企业都有一种所谓的“工人助理”——农民工。干活的时候，总是由这些农民工或临时工顶着，正式工则在旁边消闲娱乐，不时斥责其“助理”几句。

据《金陵晚报》报道，2005年夏天，关于南京博士乞讨事件的议论热浪席卷全国。在南京熙熙攘攘的丹凤街上，你也许会看见一个衣着整洁、戴着眼镜、一身书卷气的乞丐，而他曾是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热能博士！据其导师介绍，这位陈博士很聪明，还曾是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燃煤磁流体发电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后来，他和爱人双双辞职，准备出国到澳大利亚发展，但最终未能出国，他再想回到学校，可未能如愿。于是陈某自己搞了一个小产品，在外面开了个小公司。但由于他既不谙市场深浅，又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公司很快就倒闭了。

陈某也曾四处找工作，但一直不顺，碰了不少钉子。后来，陈某就一直待在家里，他不想出去找工作，只想过所谓简单的生活。除了看书，他空闲时就一个人去爬爬紫金山，或逛逛玄武湖。对于家里有米没米，他一点不关心。天热了，他就待在家里，把空调打得足足的，让自己舒舒服服的。陈妻实在忍受不了，2004年他们离了婚。

前妻与他分居时，把家里所有的钱物都留给了他。这些年来，陈某就以此度日。每日只出不进，日子渐渐困窘。他开始在天桥摆摊卖书。然而，家里的藏书也是有限的，后来，他只得到街头乞讨，成为“中国目前学历最高的乞丐”。

经过了学历教育最高层次的博士生教育，陈某实现了“学历成人”，却无法做

到“精神成人”“道德成人”“法律成人”和“伦理成人”，充分说明了现行学历教育制度在育人方面的某种缺失——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育，遗漏了心理素质教育和生存技能培训。在大街上等待嗟来之食的“博士乞丐”，给我们留下太多思考。

该反思目前的教育体制了。笔者观察到“不作为”趋向在高校亦有诸多特征，较为突出的是“后大学生”现象：一些毕业生不愿面对社会竞争，留恋大学生生活，于是借口考研或考公务员，仍然留在校内或就近租房居住，不时去图书馆看看、听听讲座。实际上，他们即便闯荡社会，也可能是“不作为”的。因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着怠惰趋向是明显的，势必要对他们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20

境外赌城兵临北中国——投机情结

读托尔斯泰能找到工作吗？

开宗明义，这里所分析的“投机”属于贬义，而投机情结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心理障碍：不崇尚实干，总喜欢寻求一个不费力但却能迅速成功的捷径。有读者可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人们都喜欢投入少产出大的事。但是如果社会成员都只做这样的梦，不崇尚实干，整日里想着天上掉馅饼，社会还能发展吗？更何况，这种情结往往还会陷我们于不义，即不择手段，从而为道德、法律所不容。

投机情结的表征可以从国民的浮躁心理和功利主义倾向分析入手，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功利主义倾向。

所谓理论功利主义倾向指的是人们将理论研究仅仅作为自己获取名利的手段的一种倾向。换言之，具有理论功利主义倾向的人，不是将理论研究看作是发展理论的途径，而是作为个人获取各种物质利益及名誉的重要手段。这种倾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尤为严重。

自然科学的理论由于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因而自然科学家很难仅仅通过名词的变换、术语的更新“创造”出新成果来，但社会科学中这样的“创造”可屡见不鲜。一些理论工作者为了快出成果、多出成果，置理论的准确性以及社会价值和理论价值于不顾。

浮躁心理与功利主义倾向在高校表现较为突出。据王小平著的《大成奥秘》所说，河北经贸大学曾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要求全校同学必须阅读包括《三国演义》《史记》等在内的文史名著。

这一旨在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举措，却引起了非议。一位

学生说，读《三国演义》能帮我们找到饭碗吗？他们说，外语、计算机和经济类书籍以及传授各种处世技巧、成功经验的书籍才是大学生的“必修课”，这项制度对学生是“强加的负担”。

学校教务部门则认为，现在大学生受应试教育和专业面过窄的影响缺乏人文底蕴。课外阅读一方面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对学生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人文素质，得到做学问的初步训练，都是大有裨益的。他们认为，人的现代化并不是仅靠计算机和外语以及专业知识就可以实现，而应该是在人文素质基础上的现代化。读名著对培养人才而言，绝不是强加的负担。

复旦大学学生为得到星期一、四晚上六点半开始的《股票与外汇的个人操作》的选修课，从下午三点半就开始占位置；上海交通大学的选修课《金融市场与证券投资分析》吸收了427名学生，占选修课人数的20%。而普通心理学、脑的生理功能、教育经济学等理论性太强或专业味太浓的选修课受到大学生的冷落。

上海师范大学学生杨容辉对记者说，他们选修一些实用性强的选修课，是为了在毕业中更好地推销自己。大学生从就业中发现无论是文科类学生还是理、工类学生，在具备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后，又懂得一些供销、投资分析决策及买卖协作谈判等业务知识的“复合型”学生，在分配中深得用人单位青睐，极易找到理想工作。于是，校园里出现了选修课冷热极差的现象。

2008年，上海市科协进行了“上海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的抽样调查，这是上海首次对市民科学技术素质进行的大型调查。市领导对这项调查热情支持，并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填写了答卷。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一半的成年人弄不清楚电子和原子谁大谁小，有30%的知识分子竟认为电子比原子大；有25%的人从未听说过“大陆漂移说”；“热空气是上升”的，上海市民中有20%的人不清楚；有30%以上的上海人不知道“吃盐过多会得高血压”；有30%的人对“肝制造尿”这个明显错误的概念表示认可或不置可否。更让人吃惊的是，竟有38.6%的人相信迷信，还有近半数的人表示不反对，只有6.4%的人强烈反对。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中国科协”曾完成了“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两项调查。调查共发出问卷约5 000份，问卷的回收率达90.5%，调查对象包括了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的18岁以上的公民，调查结果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是相信科学的，是需要科学的。但他们的科学素养还不高，今后必须在我国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群众的科学水平。

调查指出，在接受调查的公众中知道地球绕太阳转的人有78%，但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就是一年的人却只有50%。听说过“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人有73%，但知道在人类出现以前恐龙就已灭绝的人就只有22%。调查还表明，

一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也不为多数人所知，知道牛顿的人最多，占31%；知道达尔文、哥白尼、爱因斯坦的人分别占25%、21%和21%。在举出的几位中国科学家之中，祖冲之的知名度最高，有25%的人知道，知道李四光、袁隆平的人则分别是14%和11%。

《文化报》报道，香港影星周润发飞抵东北某市时，几百名手持花束的少男少女在机场等候时，听说同机到达的还有一位名叫“杨振宁”的名人，便纷纷探问：“杨先生是唱什么歌的？”无独有偶，该市一家电台在播发杨氏来访的消息时，竟然将其名字错念成“杨振宇”。

某些港台影星、流行歌手风靡大陆，关于“星”的行踪、活动以及逸闻趣事，甚至“桃色”“粉色”之类的“秘史”，屡屡为一些报章所青睐。于是，十几岁的孩子人人不仅能讲出一串当今影星歌手的名字，还能“侃”出他们的一段段非真非假、似奇似怪的经历。可是，若请他们讲讲爱迪生、瓦特、牛满江、钱学森等人，小小的“追星族”里居然无一知之。

浮躁心理与功利主义倾向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读书冷漠症”。

上海图书馆的借书证曾令少人梦寐以求。然而，上海图书馆专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留的借书证，至今还有数千张仍“待字闺中”。上海图书馆专给高级知识分子的借书证为什么得不到他们的青睐？

“要借书证干什么呢？”一位在中外合资制药厂工作的技术人员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我们厂的生产设备是从国外进口的，生产的药品都是按外国老板拿来的配方生产的，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花力气去研制。既然不搞科研，要这张借书证又有什么用？”

“我们这儿有许多学术著作和期刊无人问津，可有两部书却出乎意料地成了大热门。”专为学术研究提供精神食粮的图书馆参考部同志告诉记者，“一部是《国外大学指南》，尽管每查阅一次需收费2元，可来查阅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另一部则是《中国工商企业名录》，摆在阅览室里没几个月就已破旧不堪了。”对此，记者甚为不解，查阅《国外大学指南》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查阅《中国工商企业名录》呢？

“现在企业改变经营机制，首先得到实惠的是销售部门。他们的工资奖金是和销售业绩直接挂钩的。”一些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可技术人员到现在还在拿平均奖。尽管上面颁布了不少对技术人员的奖励条件规定，可又有几个技术人员拿到过？现在企业的销售部门可是一个肥缺啊！”

企业是如此，那么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教授们呢？

“还不是一样，”采访中，一些教师告诉记者，“现在大学和研究所也是人心思‘钱’。真正能坐下来搞科研，并且能坐得住的，实在是不太多……”参考部的

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即使领取了借书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不来借书。”

在知识变得日益重要的今天，我国却有近40%的青年在家中无书可读。这个令人忧虑的信息是一项权威调查透露的。

《图书馆学刊》1994年01期《我国很多青年基本无藏书》刊载，这项调查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广州、上海、黑龙江、辽宁、山东六地青少年研究所及广西团校联合举办，其涉及面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9个省、市、自治区4 654名城乡青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表明，近40%的年轻人除了课本一类的书外基本无藏书，只有50册左右的达36%；藏书在500册以上的仅占2%。

《中国出版》1993年第07期刊载，有人说，一个国家出版业的现状，国民对书籍的态度与消费，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1990年《欧洲侦察》做过统计，世界上图书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德国，人均120美元；挪威列第二，为115美元；芬兰、瑞典为95美元，居第三；美国为90美元，居第四；英国居11位，为61美元；日本为58美元，居15位。这些书籍人均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国民的素质、文明的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也是同步名列世界前茅的。

就我国而言，人均图书的消费估计不到10美元，如果剔除通俗类、娱乐类、文艺类图书及科学技术的人均图书消费量肯定少得令人吃惊。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我国每年有大量书店“失踪”，90%的农村供销社现在不再经营图书，大部分省的乡镇文化站处于瘫痪状态，很多公共图书馆一年未进一本新书！一位中学教师感慨：

现在国人越来越不爱读书了，这一说法大概不会有多少异议。这几年我买了好多特价书，应该说，这些书都是优秀的人文书籍，但都是被半价处理的。前年，我回安徽农村老家探亲。我的老家全村近2 000人，自费订阅报刊的无一人，经常购买报刊的只有一位中学老师，但他本人购买的书籍也很少。我的兄弟姐妹大都在城镇工作，经济条件在当地算不错，除弟弟订阅一份电视报，外加购买一份晚报外，其余姐妹三人连一份报刊都没订，更谈不上买书。想一想，这情形何止发生在农村和小城镇，就是大中城市甚至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如何。我供职的中学，教师大多是大学本科学历，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研究生学历，又有几人读书？除了手头的几本复习资料外，大部分人多年来连一本人文书籍都没有买过，教师真的变成了“教书匠”。由于投稿，我常和一些报刊编辑、记者联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不大读书的。当一个社会连教书的人都不愿读书，连从事新闻、文化事业的人也不读书，或读书很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不崇尚实干的投机心理势必轻视尚需时日，尚需艰辛的科技活动包括刻苦钻

研。笔者身为大学教师已深为如今学生的学习动机堪忧。因投机心理驱使，急功近利的表现则更为具体。下节将有相关阐述。

凯恩斯炒股炒出的笨蛋理论

说到不崇尚实干而崇尚投机，这方面的表征亦不少。就官场而言，不是靠勤政、廉政、实政，而是靠逢迎、巴结、送礼而提升的现象比比皆是，最直接的便是买官卖官，如“马德案”。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既买官又卖官。他自己供称为了当上绥化市市委书记，一次就给时任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送去80万人民币。另外，他也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多人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22万元，另有大量来路不明的财产。“马德案”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超半数的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此案；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人牵涉此案。

国人崇尚投机的案例亦不在少数，集中在一个“炒”字。让我们先回到30多年前那一场疯狂的“君子兰”热吧。

1983年至1985年之间，进入长春市的外地人惊异地发现，这里家家户户养着君子兰，街谈巷议是君子兰，连商标招牌似乎也离不开君子兰……当人们迷迷糊糊地来到君子兰交易市场，那里更是一番惊心动魄的情景：一棵巴掌大小的君子兰竟开价几千，甚至几万，现金交易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每棵十几万！正如有人描述：卖君子兰的像疯子，买君子兰的像傻子；疯子疯得精神癫狂，傻子傻得拿钱打水漂。

一些养花专业户转眼之间成了巨富，其中不乏百万富翁，出入有高级轿车，左右有秘书相随。一位养花大户竟出十二万元钱买了一条纯种的德国狗为其守门，其富有程度可见一斑。君子兰已经成为财富的象征，弄得人们神魂颠倒，盗窃抢劫案成倍增加，连公安局局长和法院院长家的君子兰也不能幸免。更有甚者，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检察院有个姓方的检察员竟然在白天佩戴枪支，驾着一辆吉普车开往长春，要明火执仗地抢劫君子兰城里的君子兰。遗憾的是，不慎走漏了风声。他的车子刚一开出鞍山市，长春市公安局就接到电话，于是长春市调动起公安系统的全副武装，甚至连消防队的车辆都开动出来了，全城严阵以待，吉普车一开进长春市就落入了包围圈……

中国人讲究“热”，这“热”那“热”。“君子兰热”后还有席卷全国的“鹰卡热”，不值一文至多仅有象征意义的“鹰卡”最高时竟炒到6 000元，令人咋舌。而更为广泛的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触动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神经的当属“炒股热”。如果有人以“投资”来形容中国股市，那是在睁眼说瞎话，因为没有什么股民在认为自己是投资，“炒”就是博市场差价，炒买炒卖便是典型投机。这方面，著名经济学权威凯恩斯亦有切身体会。

靠课时费攒钱，凯恩斯可算楷模。1908年至1914年，他什么课都讲：经济学

原理、货币理论、证券投资等。他因此获得的评价是“一架按小时出售经济学的机器”。凯恩斯赚课时费的动机是为了日后能自由而专注地从事学术研究免受金钱的困扰。然而，仅靠赚课时费是积攒不了几个钱的。

凯恩斯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1919年8月他借了几千英镑做远期外汇投机去了。仅4个月时间，他就净赚1万多英镑，在当时相当于他讲课10年的收入。投机客往往有这样的经历：开始那一跳往往有惊无险，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进了自己的腰包，但就在他飘飘然之际，他却忽然掉进了万丈深渊。3个月之后，凯恩斯把赚到的利和借来的本金亏了个精光。赌徒往往有这样的心理：要从赌桌上把输掉的赢回来。7个月之后，凯恩斯又涉足棉花期货交易，狂赌一通并大获成功。受此刺激，他把期货品种做了个遍，还嫌不过瘾，就去炒股票。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已赚得盆盈钵满。到1937年他因病而金盆洗手的时候，已经积攒起一生享用不完的巨额财富。与一般赌徒不同，他给后人留下了极富魅力的赌经——最大笨蛋理论，这可以视为他投机活动的副产品。

凯恩斯用了这么一个例子：从100张照片中选择你认为最漂亮的脸蛋，选中有奖。当然，最漂亮的脸蛋最终是由最高票数来决定的。你应该怎样投票呢？正确的做法不是选自己认为漂亮的那张脸蛋，而是猜多数人会选谁就投她一票，哪怕她丑得像时下出没于各种搞笑场合、令人晚上做噩梦的娱乐明星。这就是说，投机行为应建立在对大众心理的猜测之上。期货和证券赌博也是这个道理。比如说，你不知道某个股票的真实价值，但你却花20块钱一股去买，为什么？因为你预期有人会花更高的价钱从你那儿把它买走。马尔基尔把凯恩斯的这一看法归纳为最大笨蛋理论：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你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出更高的价格，从你那儿把它买走。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无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而如果再也找不到愿出更大笨蛋把它从你那儿买走，那你就是最大的笨蛋。

凯恩斯的这个理论也不神秘，在我国股市，这就叫“博傻”，因为股市炒市一般就是一场赌博。

说到赌博，那可是国人投机心理最酣畅淋漓的表征了。

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虽排不上号，但内地赌客的慷慨大方却是出了名的。有消息说，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的中国豪赌者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他们输掉的钱是惊人的。赌场认为“中国人是亚洲人中唯一有巨额现金的人”，为此，米高梅大赌城等几家赌场已经在中国开设了办事机构，为中国这些豪赌者申请签证提供帮助。

博彩业人士说，国人显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一是他们在赌场可以几天

几夜不睡觉；二是赌注大。据报道，一名中国女企业家10个月就输掉了2 000万美元，而一项调查澳门博彩业的报告说，中国大陆赌客一年在澳门输掉的赌资就达2.59亿美元。2.59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可以解决多少名因交不起百元学杂费而期待人们资助的失学儿童？可以解决多少名月工资仅几百元的下岗工人的生活问题？可以兴建多少因资金不足而无法上马的重点工程？我想，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是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些一掷千金的赌客是何许人也？当然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也不是经济拮据的农民和下岗工人，而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比如，广东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每次下的赌注就是80万港币，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的记录是100万港币，沈阳慕马案中的那位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在两年半内飞澳门狂赌17次，4次登上香港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到公海赌博，3天就输掉上千万元！这么多的钱哪里来的？当然是公家的、企业的、地方财政的、人民银行的，他们用不着担心自己倾家荡产，虽然输了也脸不红心不跳，更不心疼。想一想，对这些将大把大把的钞票送上门来的“阿爷”，赌场老板能不笑逐颜开为你办理签证吗？

《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17日刊载，在我国的周边地区，一张庞大的赌博网已经悄然形成。这一网络原来以东南亚为主，多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云南是境外赌博的“重灾区”，仅在云南瑞丽对面，离边境线不到100米处的缅甸，就新建了两座赌城，而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首府孟拉是一个离中缅边境线只有几公里的小城，赌场林立。云南省公安厅透露，周边国家仅靠近云南边境地区就有赌场82家，但这些赌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允许本国国民参赌，显然是专门为中国人开的。

如今这一网络已经慢慢延伸到中俄、中朝、中韩，甚至中蒙边境，如“英皇娱乐中心”。据了解，“英皇娱乐中心”位于朝鲜东北部距离罗先市20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它决不允许朝鲜本国人出入，投资者亦非朝鲜人。

纪检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俄罗斯人不会来，韩国人来不了，到这里来的彻头彻尾都是中国人。”

延边纪检部门曾派人跟随旅游团到这里实地暗访。“一座小岛，一栋大楼，靠海，像度假村一样。”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中国的旅游团到这里后，那些人把行李一放，就一头扎进赌场里。

“赌场很豪华，百家乐、老虎机、扑克一应俱全。人民币换成筹码，赌博时以美元为单位。”

“到这里的旅游团就是赌博团。”州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保守的估计，每年流入这里的人民币至少2亿。

鉴于从2004年年底开始，由公安部、中组部等17个部委联合组建的“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禁赌风暴，“英皇娱乐中心”及一大批境外赌场相继关门。然而随后发现，境外赌博——不仅死灰复燃，赌客转赌中俄边境，此外，新的赌博形式如网络赌博、赌球等迅速崛起。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调查发现：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几乎等同于全国旅游业一年的总收入，超过6 000亿元。

科技界的“七宗罪”

浮躁投机之风盛行，这在我国不是秘密。下面有一民谣“颂”之。

年过五十算“青年”，
短训三月算“大专”，
上过讲台算“教授”，
照书抄录算“试卷”，
领导拒贿算“新闻”，
退出赃款算“清廉”，
扫扫大街算“雷锋”，
按时上班算“模范”，
质量一般算“名优”，
一般商品算“特产”，
换换包装算“高档”，
不骂顾客算“笑脸”，
唱支歌儿算“歌星”，
拉笔赞助算“导演”，
乱凑词语算“词人”，
两篇短文算“作家”，
戴顶帽子算“著名”，
出本庸书算“经典”，
浮躁投机处处有，
难得糊涂闭只眼。

浮躁投机之风也浸染了科技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列数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背离科学道路的“七宗罪”。

一是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他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真的假学历”和

“假的真学历”，有的人虽然拿了真本本，可上课、写论文、答辩全是别人帮助他完成的。他举了个例子：北京某单位招了位“海归派”，他在简历上说，他在美国某试验室工作3个月，发表了6篇论文。一核实发现，5篇是假的，还有一篇是第三作者。

二是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

三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老师窃学生的、上级窃下属的、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学术抄袭、剽窃之风盛行。更可怕的是，一些学术腐败被揭发后，当事人仍然春风得意，甚至升官。

四是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国际上首次”“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这些字眼随处可见。

五是一稿两投甚至多投。一组数据、一段材料、一些观念，AB组合、BC组合、AC组合，杂拌后冠称“综述”，同样的观念、同样的数据被反复转用，了无新意。

六是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现在学术界出现了“搭车”署名、“虎皮”署名现象。这次论文，你搭我的车，下次论文，我搭你的车，大家同进同退。可谁都没想过这样会发生“车祸”。

七是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现在媒体上，尤其是电视上，以全国性学会名义为某些商品做宣传的事情俯拾皆是，建议中国科协禁止所属学会为商品做广告宣传。

面对铺天盖地的古籍译本，人们在最初的欣喜之余又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在这些或标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经典系列”，或自封为“集合数十位中青年学者，做出古籍出版新贡献”的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精彩的译文、独到的见解，而是“兵团式操作”“火箭式出版”以及俯拾皆是的谬误。

首先，错译现象非常严重，例如，将“赤地”错译为“一片赤红，烧了个精光”；把“口占”错译为“表演口技”；把“女闾”错译为“妓院”。其次，乱译现象更令人咋舌，例如，把“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任意发挥成“所谓江上处女，就是一大群长江之畔的少女，她们平日自命清高，而不肯跟出身贫贱的凡人接触。这时有个家里穷得没蜡烛点的少女，也由于某种关系而跟少女们生活在一起。”大段译文与原文毫无联系。最后，漏译现象也比比皆是。

为了了解一些劣质译文产生流程的真实情况，笔者走访了北京几所重点高校的文科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曾参与过这种古籍今译的造书活动。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说：“我们搞的几套书都是书商干的，他们找到宿舍，当场开价，译成后立即抱走。为减低稿酬，应有的作者校改清样也免了。”另一所高校的学生则坦言：“现在造书十有九空，但又抱一线挣钱的希望，于是译时基本抄注解，只把

个别字句任意改一下以免版权纠纷。一本书大约一两周即可译完。”非法出版物如此，那么正规出版物又如何呢？一位历史系的学生讲：“我们译的那套书倒是正规出版物，教授做主编，但数量大，催稿急，只好组织兵团作战，水平参差不齐，错误在所难免。”

据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经达到500多种，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种之多。其他如：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文学原理、大学语文等学科也有相同的情况。

那么，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采访了一位同门师兄，这位师兄硕士毕业5年，已经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向作者透露，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但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后来编教材简直成了套路。他告诉笔者，编教材既不用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在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做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

浮躁投机之风促使学术造假，也促使现今各种考试造假。

醉心“洋插队”的人，路途是坎坷的。“语言关”即是他们必须要通过的难关。有人攻关不获，饮恨长叹；有人望“关”生畏，心灰意冷。也有人迂回取“关”，另辟“捷径”。于是在考托福、GRE的大军中新添了兵种“雇佣兵”。兵源多来自高校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们英语基础好，“专业对口”，上阵出马，往往马到成功。

高等学府，应该容不得弄虚作假。然而，随着伪劣商品充斥于市场，弄虚作假弥漫于社会，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也在炮制着自己的伪劣商品，玩弄着弄虚作假的把戏考试作弊。这股风普遍而又深入，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从人文学科到理工农医，从高年级到低年级，概莫能外。今天，大概没有哪一位校长敢拍着胸脯说：

“我这个学校没有作弊现象！”高校学生对考试这种检验自己所学成果的常规方法，有严重的逆反心理。某大学中文系有的学生为应付考试，竟形成了个规模不小的“作弊互助组”。一个同学从某“关系户”搞到了考题，然后互相辗转传抄，一夜之间传遍了20多人之手。于是，20多份相同的答案使试题成了公开的“内参”。

“大家欢迎我来做个检查，我非常高兴。谢谢大家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使大家有幸认识我。”这就是“作弊互助组”主要成员在全校检讨会上的“开场白”。而得到的反应是几千人的捧腹大笑和鼓掌狂呼，据说，此举还赢得了不少异性的好感和倾慕，“作弊互助组”的成员还以他为盟主结成了“同盟”。

各类考试均有弄虚作假的现象。一位曾经给法官监考的老师谈了如下经历，据碧海青天BBS，1999年5月28日载：

这么多年，我参与了大大小小的监考不下300次，但给法官监考仅此一回。可就这一回，在我眼里，审判庭高耸的审判台仿佛低落了许多，法官高大的形象也似乎矮小了许多。

那是个星期日，人民大学组织的政法系统法律知识考试在我们学校举行，我参加监考。考试开始不久，考场便一塌糊涂。本来有资料可以查阅抄录，但大多数人连出处也找不到，便大声询问或东奔西窜地抄，之后笑哈哈地表达抄了一个答案的喜悦，其情景只有香港的股市可比拟。太不成体统了。我忍无可忍地声明：保持安静！没想三分钟后，形势更为严重，尤其是一位什么公子哥闹得更凶。

作为法官，应付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掌握的普法知识，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可看那场面，真让人失望。可见我们一些法官素质之低、能力之差、知识之缺乏、业务之笨拙……如此素质的法官怎么办案？幸好还有少许几位在认真答题。

《中国教育报》上有一篇文章谈及学术论文制假的几种类型及模式：父子型——父代子（也有个别情况下子代父）写论文；夫妻型——夫代妻或妻替夫写论文；师生型——师为生或生替师（师有名气有关系，但没时间没精力搞研究，只在学生论文上署名发表即属生代师）写论文；上下型——下级代领导（这在目前已是“流行性感冒”）写论文；抄袭型——找一本不常见的刊物抄一篇投出去，高明一点的则改头换面，胆大一点的便原汤原汁；牟利型——代写论文收润笔费……学术界、知识界尚且如此，其他领域投机之风盛行且有何过？

21

中国人都是哲学家——欺瞒趋向

神秘的434工程

某地一位孤残老人，在年末岁初的一个星期之内，一连洗了18次澡！这位孤残老人为什么要这样不厌其烦地洗澡呢？原来他碰上了岁末年初“送温暖”的高峰期：一天之内，上午有甲单位的“送温暖”队伍送老人进澡堂洗了澡，下午乙单位的“送温暖”队伍又来了，所做的事也是陪护老人洗澡。后两天丙单位和丁单位亦是如此，于是遂有7天洗了18个澡的故事。

看了这个故事，恐怕读者也会和这位孤残老人一样脸上带着哭笑不得的表情吧？这个故事较为典型地展示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痼疾，那就是形式主义花架子。严格说，形式主义花架子主要涉及的是政府组织的活动，上级布置，下级必须认真执行，所以，“轰轰烈烈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这样，上级下级皆大欢喜。

形式主义花架子是欺瞒趋向的主要表征，内容可以不要但形式必须存在。在我国，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也是特有的国情之一。举目所到之处，到处可见“文明执法、公正办案”“严肃考纪违者必究”“严禁赌博不准喧哗”等信誓旦旦的警句，然而实际情况呢？下面是一篇短文《中国人都是哲学家》（作者孟波）：

在中国工作两年后，我的新加坡朋友杨准备回国。在送行宴会上我请他谈谈对中国人的看法。他说：说实话，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没有我们新加坡人高，但是，我发现中国人的哲学素质都很高，几乎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这一点我们新加坡人自愧弗如。

看我大惑不解，他解释说：你们的哲学素质主要体现在你们的“口号文化”上，在中国口号几乎无处不在，像“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国家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厂兴我荣，厂衰我耻”，“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等等。口号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讲，政府官员能讲，“面的”司机能讲，甚至连一些孩子也能讲上几句。而且这些口号一般都很有特点：一、极富有哲理，正反两面没有一点漏洞，简直圆满至极；二、口号都朗朗上口，极富音乐性；三、紧扣时代主题，富有鼓动性。这些口号，我觉得如果让我们新加坡人来想，恐怕三天三夜不吃不睡也难以想起一条来。这简直就是人类智慧的极致，佩服佩服。

听完朋友的话，我准备谦虚一番，谁知朋友却话锋一转说：不过你们中国人虽然都是哲学家，但一般都是光说不练，即使练了也和说的不是一码事儿。比如说“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我发现你们的城市的确是人民建的，但是建好之后呢？好像很多宾馆酒楼、豪宅别墅、娱乐场所并不为人民吧！当然还有很多“人民××人民建”，结果也常常是“人民建好××”之后“××”却往往不“为”人民。再比如国家税收，“取之于民”并不错，但是有时却没有“用之于民”。我发现你们的税务局大楼总是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阔气，那么这些“用之于楼”的钱到底是不是“取之于民”呢？再比如，你们口口声声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可是如果你们的教育不穷、孩子不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搞“希望工程”？再比如，“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明明是你们的国有企业有30%都亏损，怎么就没有听说有几个厂长感到“羞耻”从而辞职的？相反怎么老是看到那么多的“穷庙富方丈”？再像什么“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我怎么听说，有的人天天工作都非常努力，今天却也在努力找工作？而另一些人天天工作都不努力，怎么也不用努力找工作呢……

杨这一番话直说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杨见状，赶快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说好说不好是水平问题，说不够是不够朋友的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瞧，又一个哲学家出炉了！

形式主义花架子与怠惰趋向中的投机不崇尚实干似乎相关，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国人是热衷于搞形式的，特别是对政府布置的活动，我们的公务员是特别热衷于搞形式的，你能说这是怠惰？

看看曾经的卫生大检查吧，这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的大检阅。

1992年，全国展开了卫生城市大检查活动。据统计，全国共有434个大小城市卷入了这次“大扫除”，经受了这次评比检查的考验。于是，“434行动”或“434工程”这一代号便被及时发明出来，成了那个夏天使用频率最高的“专业术语”。1992年7月，“全国爱卫会”向各地正式发出通知，并将检查评比的内容分解得十

分详细：食品卫生、灭鼠灭害、环境保护、市容市貌、道路整洁、公共厕所、垃圾粪便、城市绿化……最后要评出全国前10名及后10名，同时登报表彰及曝光。

狠就狠在最后这句，说担心也就担心最后这句。一时间，“434工程”成了全国各个城市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A市说是市，其实只是个县——说全点，叫“县级市”。A市接到通知三天后，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在一个闷热无比的下午，全市“434工程”动员大会第一次全会在市府会堂正式召开。参加者都是带“长”字号、“任”字号的各单位一把手，市长亲自作了两个多小时报告。

“……到了检查时，哪块区域出了问题，我们拿承包者是问！”市长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如果连个卫生也抓不好，那他还有什么工作能力可谈呢？”

包干区一划，小城方方块块总算动起来了。按文件要求，A市得翻建25座水冲式厕所，而一座小型的冲式厕所也需要五六万元。指挥部就这一专题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在醒目区域先搞上10座应付一下。装修一旦结束，即派专人看护，暂不对外开放，以保证其内外不受污染。

“大检查”的前二天，小城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指挥要员倾巢出动，模拟检查团在全城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首先，全城通向郊区的各条道路都派“重兵”看守，禁止农民的拖拉机、板车、粪桶担子进城；其次，市内所有的三轮车、板车见一辆扣一辆，集中运到体育场仓库看管，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取缔一切摊贩，管他有证还是无证，检查过后再说。模拟检查团分几路出发，查一处，指示一通，发现问题，当场决策，当场解决。

当日下午检查团的轿车进入市区，前面有一队警车开道，后面有一队轿车跟随，两旁有一支摩托车队护送，红灯闪闪，警号长鸣——总之是排出了A市最强阵容。

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座座欢迎彩楼；建筑物上到处是巨大横竖幅标语，每个单位门前都是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节日景象。

马路两旁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布满了臂带白底红字袖章、手拿扫帚畚箕的卫生监督员，他们已经在此迎候了3个多小时。地上绝对见不到一个烟头，一片树叶，一点痰迹，人行道上除了人和自行车外别无他物，大马路上空荡荡，只有洒水车响着电子音乐来回奔忙。交警也一改常态，穿戴得整整齐齐，手握对讲机笔直地戳在马路中间，规规矩矩地对着车队挥手敬礼……

第二天上午，检查团分几个小组沿不同路线同时出发。团长带的这组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陪同，B副市长和市报记者小马也在里面。首先查的是一家副食品商店，除了一位女营业员的指甲太长外，没有发现其他大毛病。接下去应该是中心菜场，这是A市最大的菜场，离市中心不远。但团长提出换个菜场看看。

陪同的人紧张地看着B副市长，B副市长心想幸好我们留了一手，准备了第二梯队，否则就要出洋相了，他很从容地说：“那就到城北菜场吧。”

团长一行刚上车，记者小马就亮出对讲机呼叫起来：“我是一号，我是一号，检查团改道去城北菜场，请火速准备，并组织好摊贩！”

好在城北菜场总体上还说得过去，菜场蛮整洁，就是没有一个卖菜的，苍蝇倒有几只。

“附近有厕所吗？”团长问。

B副市长也不清楚，就问当地街道办事处主任。主任一边答应一边暗暗朝居民组长D老太使眼色。D老太拐过街角便抢先一步向厕所飞跑，也不管男厕所有没有人，冲进去掏出“雷达”（杀虫剂）呼呼呼一阵猛扫，然后将纷纷落地的苍蝇拾到手帕里包起来，退出门去……

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的。

车队一次又一次地启动。小马冲着对讲机一次又一次地呼叫：“我是一号，我是一号，车队离开青春路，向东去了光荣路，估计要到梅花路……”小马代表B副市长直接遥控指挥着一个特别行动队：他们会在车队即将到达的道路上临时布置鲜花和垃圾箱。

难忘的3天终于过去了。检查团又被安全准时地移交到下一个市。小城从“抽筋”状态又渐渐恢复到平静。小城人又能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节奏过自己的日子了。城四周道路一撤“岗”，农民的板车、小推车便加倍地往城里涌。憋了好几天的小摊贩们一股脑儿把变质的货都端出来大贱卖。

10天过后，人们渐渐看出来了，小城除多了几座新厕所外，似乎什么也没变。现在上街找厕所可方便了——地位突出、色彩鲜明、装潢讲究的便是。

卫生搞完后，人们开始还关注着报纸上的评比结果和名次，看看自己得了第几名。等来等去不见动静，这份兴趣也就烟消云散了。而报纸在大谈了一阵“防止回潮，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后便不见了下文。

《广州市政》1992年07期刊载，在某大企业，一份统计表，长长的一串名单，列出这个厂去年迎检参评的数字——182次。其中检查团来了144次，有关部门在该厂搞评比38次。笔者抄录了其中的一些：经济民警年终总结、公共汽车站站亭修建评比、民族工作评比、侨务工作评比、街道绿地卫生检查、少年创造发明评比、菊展评比等。

一年365天，把节假日包括在内，这182次检查评比，即意味着两天一次。一年182次迎检、参评，厂里要有多少人搞接待、多少人准备各种材料，要花去多少招待费，没有专门统计。不过“全厂总动员、迎接检查团”这句话各厂都适用。一个厂办主任告诉笔者：我们不敢说哪个团重要，哪个团不重要，只能认为凡是来的都

重要。他们“见面就烧香，见神就磕头，见灯就添油”，哪个团也惹不起。

检查评比往往就是走走形式。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诸多检查评比往往涉及领导们的形象甚至官位，所以大家仍然乐此不疲，怠惰不得。如果所谓的“434工程”没有提出要评出全国前10名及后10名，同时登报表彰及曝光，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全国性闹剧了。

形式主义花架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领导们的形象问题。

1999年6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以《割麦记》为题的三幅新闻照片，不妨将其文字说明照录如下：6月4日，江苏省宿迁市商贸局领导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小麦，记者受邀采访。早上6:40，乘一辆轿车到50公里外的县城泗阳县；7:40，早餐；8:00，县商贸局组织3辆轿车同行到10多里的葛集乡；8:40到该乡，乡派一名副书记、一名副乡长另乘一辆轿车到葛二村；9:00车行至割麦现场，路上有小沟正在排麦田里的积水，村干部组织五六个农民将路铺平并从农户家抬来木板搭上让车通过；9:25，割麦开始，电视台摄像镜头紧跟领导转动；9:50，割麦结束……11:05，记者返回市区发稿，有关割麦领导在县城宾馆休息，打扑克，参加酒宴。

这几年，媒体经常有这样的报道，“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台下听得呼呼大睡”，并附有照片，于是台下睡觉的领导干部被批评甚至被撤职，名曰之“整顿会风”。

被批评被撤职的领导干部姑且不评论，因为确实有多种原因，确实也有部分领导干部对工作缺乏敬业精神应该受到处理。但实际情况是，现在参会听台上作报告，往往是想不睡觉都难。为何？盖因为现在的报告均形式化了。下面便是领导们通用的发言稿。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的×××会议，我认为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刚才某某同志，以及某某同志的讲话，我认为，讲得非常好，非常深刻。希望在座的同志，认真领会，深刻理解。回去后，要传达某某同志及某某同志的讲话精神，并认真落实，真抓实干，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对于×××工作，我讲几点补充意见：

一、对于×××工作，我们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充分领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要从深度和广度上更加推进。我看，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认识！各级领导要充分领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级组织要加大抓×××工作的力度，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的局面，使×××工作更上层楼。

二、要加强落实，要把×××工作落到实处。目前，有个别同志，个别部门，

存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热衷于开大会，传达文件。当然，开大会是必要的，上传下达也是必需的。但是，光是讲空话、打官腔，是不行的。对×××工作，要真抓实干，重在落实。各级领导要把×××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认真部署，狠抓落实。各级领导要为×××工作，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舆论环境，扎扎实实推动×××工作的开展。要抓出实效，抓出成绩。

三、要加强领导，做好协调工作。各级领导要加强协调工作，要把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步调一致地推进×××工作的开展。目前，有些部门，遇事推诿、互相扯皮，这种官僚作风，十分要不得！这种作风，轻则导致工作效率降低，重则影响我们的威信，影响形象。我们要坚决铲除这种官僚作风。

四、要在实践中探索×××工作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工作与市场经济有没有关系，我看是大有关系。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的影响将波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工作也不例外，它也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因此，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何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去探索一下，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五、参与×××工作的同志，要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同志们，对于×××工作，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同志们，你们承担×××工作，肩负了各级组织对你们的殷切希望，希望你们要脚踏实地、同心同德，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添砖加瓦！

以上五点，供大家参考。总之，大家要振奋精神，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开拓进取，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谢谢大家。

渭南抗洪一线的怪现状

真正的欺瞒趋向还不是形式主义花架子，而是编造事实，即不是“弄虚”而是“作假”。下面便是一经典的作假镜头。

一批领导在猎猎飘扬的红旗背景衬托下，奋不顾身地投放沙袋，投放结束后，有关领导大声宣布：“罗纹河倒灌入水口封堵成功！”随后，镜头转移至大堤上，先是介绍领导，接着领导宣读嘉奖令、念贺电，最后又有领导讲话。你如果在荧幕上看到这样的情景，可能很兴奋，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抗洪场面真是壮怀激烈，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尤其让人感动。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仪式。领导们投放沙袋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三分钟。然而，为了这三分钟和一句宣布“封堵成功”的话，1 000多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足足准

备和等候了一个上午，除了为领导们放置好沙袋，还要在烈日下列队等候。而这些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已经在抗洪一线奋战了一段时间，已疲惫不堪了——在半个小时的仪式活动中，好多战士悄悄坐到了地上，还有的竟然睡着了。特别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其实垮塌的大堤，已经在头天晚上成功封堵了！

如果不是新华社记者“搅局”，这次“表演”真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领导们洪也抗了，封堵也由他们宣布了，嘉奖令也宣读了，贺电也念过了，真是皆大欢喜。

然而，形式主义做到这个份上，怕也是登峰造极了。所以，对这种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主义，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要改善领导形象，要务实、要亲民，但是，说说容易，真正身体力行却不像动动嘴皮子那么“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真的做不到，只好来虚的，把形象和政绩“做”出来——而“做”，总是有把握的。而领导干部之热衷于“电视上有形，报纸上有文，电台上有声”也就是缘于这一原因。至于是不是劳民伤财，这样弄虚作假的危害是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的，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自己的“形象”和“政绩”。

作假由来已久，从“浮夸风”的始发期到现在，仍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奉命去拉一只地瓜，到了地头上，突然风雨交加，见有一个宽大的山洞，司机一踩油门便开了进去。雨过天晴，汽车开了出来，回头一看，司机傻眼了，原来那山洞是地瓜的虫子眼……

这不是笑话，是牛皮，1958年时吹的一个牛皮。

乡里来了参观团，要学习村办企业的经验。他们从材料上看到，这个村之所以走上了富裕之路，全靠企业办得好。谁知，参观了半天，他们连企业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村长指着一只母鸡说，一只母鸡可以生多少蛋，这些蛋再孵成小鸡，小鸡长大了再生蛋，鸡生蛋，蛋生鸡，这里面就有产值，就有利润……

这也不是笑话，是牛皮，一个2008年时吹的牛皮。

把时针拨回到1958年，人们不会忘记，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大跃进的“卫星”一个一个上天，一个牛皮比一个牛皮吹得大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现在时针到了2008年，当年的“浮夸风”已经有所收敛，但“欺瞒趋向”仍然明显，“作假”仍然屡禁不止。

黄海之滨某某县有几户农家养樱桃鸭发了财，县长号召全县农村家家养，并下达指标，限期完成。有的乡镇完不成任务，领导干部只得虚报数字。到年终，县长案头的统计报表中，全县樱桃鸭饲养量已超过300万只。于是县长心血来潮，下令办一家禽羽加工厂，耗资1 000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一套屠宰设备，可开工不久就停工待料，原来实际饲养量只有统计数的10%。

作假可分为被动作假与主动作假两类。前者一般迫于上级的压力，与某些过

高过滥的目标考核、达标升级分不开的。很多地方在制定社会经济计划时，不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而是预先由某些官员通过估量形势和上级心理编造一个数字，然后层层摊派，并规定完不成者惩，完成者奖。因这些计划订得太高，超出实际能力，下面确实难以完成，一些领导迫于压力，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搞虚报浮夸。

两位干部向报社反映，他们曾向一位乡长了解这个乡去年的经济状况，乡长说：“上报数字确有水分，单就农民纯收入而言，实际测算数字是805元，后来上面一再批评我们思想保守，缺乏争先创优意识，我们被迫调整到980元。”由此可窥一斑。

中央电视告记者曾到湖南南部某地采访，当地一位乡长向记者猛烈抨击当前基层政绩考核中弄虚作假、打肿脸充胖子之风。乡长自述：

我在湘南一个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

先说农民人均纯收入吧。我们乡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生活水平在全县比较靠后，可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数字并不落后，2005年报的是4 300多元，2006年增加到4 600多元。实际上，农民可用现金少得可怜，平均起来每年也就600到700元吧。每年开春，大多数农户买了农药化肥、缴了孩子的学费就没啥钱了。乡政府门口有个长途汽车站，每年春节刚过，民工就争着上车去广东，把路都堵塞了，看得我们真心酸。有一部分村民在附近煤矿挖煤，做苦力。挖矿环境恶劣，有个自然村只有500来人，就有25个农民不同程度得了尘矽病。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报得这样高，主要是以前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盲目造假的结果。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据实上报，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好壮着胆子虚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虚高还有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导致自筹建设资金的压力超过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招商引资的考核最离谱。县委、县政府将投资规模500万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列入乡镇考核指标，而且要求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外资企业。我们乡交通不便，也没有很多资源，招商引资很难，但我们乡在2005年报了3个，2006年报了4个。考核方案要求很具体，要看企业工商执照、纳税证明，还要检查现场。为此我们就从市里请来一个老板，让他帮忙出具各种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再找一个临时性的工地做摆设，把考核组带过来。对于我们这套假把戏，考核组也非常清楚，但大家都不说破，因为考核组也知道，这项指标的下达本身就不合实际。不过，既然上级要考核某样东西，哪怕弄虚作假，我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搞妥当”。

再说沼气池建设。建沼气池本是件好事，它能够提供生态燃料，节约能源成本，但它有一个前提：农民必须养猪。可我们乡很多农民不养猪，没有沼气原料。可是县委、县政府去年还是给我们乡下下达了建41个沼气池的任务。建一个沼气池，除了上面下来的配套资金外，乡政府要补600元钱。建成的池子实际上没用，是做给上面看的！像这样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需要出钱的事还不少。乡镇财力非常紧张，现在全乡的债务有350多万元。

在统计部门汇总排列各种考核数据时，我们凭关系找熟人，刺探某项工作排到县里第几位。如果打听到其他乡镇把分加上去了，名次超过我们，我们就得赶紧找人“公关”。我们是一个农业乡，怎么可能跟那些有煤矿的乡镇比经济总量、比工业产值？但考核政策却是“一刀切”。

政绩考核中这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我们干部和群众影响很大。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讨上级欢心上，在办公室闭门造车，炮制成绩。这些干部作风飘浮，使得我们有些工作落实不下去，政令不通，有些问题不是县委、县政府自身就可以解决的，我们期望全党上下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被动作假”与“主动作假”相比较，其发生层面更为广泛，它不仅仅涉及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还涉及学校学生的学习，这是更为令人担忧的事。如果“造假一代”陈陈相因，相互推波助澜，我们这个社会可能会因“诚信危机”而坍塌了。下面是一名高中生发出的愤慨：

报载，本市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的一个班在期末考试前向学校申请“无人监考”，学校予以批准。但考后有80%的考生向学校举报有人作弊。于是有教育界人士痛心道：“现在的孩子，跟谁学得这么不老实？”闻听此言，作为高中生的我颇为腹诽：“跟谁？还不是学校教的？简直是贼喊捉贼！”

从小，我们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已经能从容不迫地用作弊对付上级检查团，而且弄虚作假的技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提高。我的表妹就读于本省最好的小学，为迎接市教委的检查团，在突击大扫除后，老师把崭新的学生手册发下去，让家长把以前是一片空白的“家长评语”和“班主任意见”都填完。我的小姨显然对此缺乏经验，竟用同一支笔、同一种笔迹填写，结果被老师退回重填。可没想到的是，还是不合老师要求，学校命令家长把学生手册多折几个角，尽量弄得脏一些，皱一些、旧一些，就像以前一直在用似的，以瞒过检查团。当然相比之下，我们高中生就成熟得多。我表姐的学校为了迎接“省级规范化高中”验收，挖空了心思：高中生造假能力强，无须麻烦家长。对此，老师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于是档案的编造工作在学生们谈笑之间就完美地完成了。按要求，省级规范化高中要有心理咨询

室，于是一夜之间，某位校工穿上白大褂，挂上个牌子，这就OK了。学校的人均面积不够，校内拥挤不堪。于是学校规定，检查期间只允许高一学生走正门，其余学生只好从一个隐蔽的后门进出了，只怕给检查团留下拥挤的印象。不过，这一点我们跟农村学校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为了迎接“普九”检查，有的学校花钱请人顶替辍学学生的位置。我们真是佩服：老师就是老师，什么时候都不含糊。既能对学生进行光明无私的思想教育，又能指导学生“适应社会，为将来评职称争先进做准备”。真是祖国教育事业的“多面手”啊！

作文课也是撒谎的重要阵地之一。例如1998年高考作文《战胜脆弱》，很多考生编造父母双亡以博得阅卷教师的同情。这不奇怪，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被老师勒令购买《作文章法大全》一类的书，并在老师的指导下“活学活用”，以丰富头脑中的“素材库”。只要作文里有从让座捡钱扶老大娘过马路，到晕倒在讲台上的老师和半夜背自己到医院的妈妈之类的善人善举，老师就满意地给你高分。诗界革命时，黄遵宪老先生“我手写我口”的理论在作文中只能换来“不深刻”的评语。这难道不是撒谎，不是欺骗吗？始作俑者又是谁？

我说得过分了吗？没有。其实很多时候老师和学校，以及现行教育体制使学生们学会了说谎，学会了作弊是学生视为真理的老师和学校在无形中，甚至明火执仗地教他们撒谎、作弊、欺骗。

“官出数字”缘由“数字出官”

主动作假的缘由很明显：或为讨上级的欢心、或为沽名钓誉、或为中饱私囊。一言以蔽之，为私欲所驱使，其中，多数动机为“升官”。请看下面几例。

某市在2005年仅有2亿元产值的乡镇，2006年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奖惩办法的文件，其中规定，“对乡镇企业发展成绩卓著（年增长达100%以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可享受副处级待遇”，结果一年之间竟冒出了个11亿元产值的乡镇，其中3人还坐上了副处级的交椅。群众称之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某县为调动乡镇领导主攻棉花单产的积极性，设立了“棉花单产奖”，规定：凡单产出100公斤的，得奖金2万元。某乡立即召集班子开会研究，在面积上“动脑筋”：将上报面积由3.8万亩减少为3万亩，并要求与会者统一口径，一致对外。年终评奖时，该乡皮棉单产由实际数85公斤上升为110公斤。乡领导欢欢喜喜地从县表彰大会上领回了2万元奖金，班子成员人人有份，多的分得2000元，少的500元。

某区举办三年农村人均多种经营纯收入达千元活动。这个区的某乡第一年就暴出了许多大冷门：鸡由2000只一下发展到5万只，山羊由十户一头增加到一户十头，甲鱼放养面积由30亩一下子扩大到1500亩（知情人透露，上述数字至少有五

成水分)。年底,该乡向全区宣布:提前两年实现了达千元目标。于是,区委、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这个乡的典型事迹,并请乡领导在全区巡回介绍经验。没多久,恰遇分管农业的区长外调,于是乎乡长大人就成了区长大人。欢送会当天,不知谁在该领导乘坐的小车玻璃上写了一行字:“热烈祝贺‘水’区长上任。”

《统计与信息》1997年62期有篇文章记载: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的大张庄是个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原村支书张伟曾被树为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的典型,不仅当上了劳动模范,还荣升为范庙乡工委书记。但是大张庄人并不以他为豪,相反他们投书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了一大堆问题。

大张庄的村委会盖得很气派,村委会办公室墙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奖状和锦旗。

但是,记者走进几户老百姓的家里看到的却是房子低矮昏暗,屋里破破烂烂,大人小孩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问起他们的收入,不是摇头就是叹气,说除了地里的一点产出外,没有额外的经济来源。这里人均只有一亩多地,一年纯收入不到800元,而大张庄上报的是人均年收入在1300元以上。

如此微薄的收入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摊派。摊派有多种形式,有摊钱、摊义务工。如建大张庄工业小区时,张伟等强迫农民在7月的骄阳下干活20多天;建所谓的“万寿乐园”,每人25元;中学建校费,每人24元;修路费,每人10元。此外,还有数额不等的“计生富余费”、个人所得税。

离村委会不远处是大张庄养牛场,这是大张庄作为小康村的“样板工程”,也是张伟的政绩之一。但养牛场有场无牛。据老乡们说,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张伟急中生智,令村民们把自家及亲戚家的牛牵进养牛场,牵牛者奖励2元,不牵者受罚。果然造成“肥牛满圈”的兴旺景象,博得领导的赞扬。

大张庄的另一“样板工程”是工业小区,占良田近50亩,修建时因毁掉青苗,占了邻村土地,引起公愤。张伟只得拆东墙补西墙,强割本村村民李宗付的6亩地给邻村,3年不给李宗付任何补偿,李宗付无地可耕,生活无着落。建成后这个工业小区一年多来只挖了一条深沟,没有一点工业的影子。

住着两层半的别墅,却欠下160多万元的建房债,这就是广东省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农民们的“小康生活”。2003年,记者深入这个所谓的“奔小康”达标工程所在地高塘村进行了调查采访。从村口望去,整齐规划的别墅群颇为壮观。一位赤脚拿着砍刀的梁姓农民告诉记者,别看农民住别墅,实际都很穷,42户村民主要靠种笋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筹建高塘农民新村的居委会副主任杨焕桐说,他向上级政府打了一个发展“三高”农业的报告,报告称,高塘村种竹笋人均收入有5000元。恰逢英德市政府要寻找一个较富裕的村作为试点建别墅式农民新村,规定农民新村的每套别墅占地面积为24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8平方米,每户

造价8万元左右。“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在这种口号的倡导下，当地政府要求基层建农民新村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村民本来就没有钱，哪能完成政府的目标呢？镇政府只能要求村民去借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高塘村目前因建别墅所欠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村民奔小康成为空谈，村民在过着债台高筑的生活，几家建材供应厂相继倒闭破产。

“官出数字”缘由“数字出官”。虚假政绩既然可以加官晋爵，那么“浮夸作假”何乐不为？反正上下一条心，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3期发表刘德亮的文章说：2007年听说两件事，令人深思。一件是，某上级领导到一个村检查工作，村干部汇报工作之前，悄声问陪同的乡干部说实的还是虚的。乡干部厉声说：你说实的想挨熊啊，啥好说啥！这位村干部便对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像背书一样滔滔不绝地汇报了一大堆成绩。上级领导听了啧啧称赞，临走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表扬村干部有工作能力，乡干部领导有方。

另一件是，某地上级机关向各村布置灭鼠任务。甲村的干部在喇叭里吆喝了几声，村里有一半人家买了灭鼠药，药死了几百只老鼠。而乙村干部，则根本没把灭鼠当成一回事。到了月底，上级让各村汇报灭鼠情况，甲村干部如实汇报了下药多少，灭鼠多少。乙村干部汇报说，全村每家每户都下了鼠药，灭鼠达到上万只，基本绝了鼠患，等等。在总结会上，上级点名批评了甲村，表扬了乙村，并号召向乙村学习，还把带镜框的奖状发给了乙村干部。

听了这两件事，笔者不由糊涂起来，这到底是谁哄谁呢？是村干部哄了上级领导，还是村干部自己在哄自己？是上级领导容易被哄，还是村干部不哄不行？

想了许久，笔者才悟出，上级领导喜欢被哄。如果上级领导根本不了解情况，被下面哄了尚可谅解，可是有些领导明知那是假的，却还当成真的来对待，这就不能不说明一些问题了。因为下面工作有了成绩，上级领导也就有了政绩，如果缺少哄人的“成绩”，他的政绩也就不那么“辉煌”了，所以只要能哄住他的上级，也就算本事了。

有的上级领导明知下面弄虚作假却装聋作哑，其动机很明显：皆大欢喜、均为升迁。于是乎，“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22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依附人格

时下流行上岸热、返贫热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无个性，大一统，国民缺乏主体意识。大一统的稳定的社会文化和结构，使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深受传统的群体道德、群体人格、群体价值的束缚。人们生活在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超常社会之中，绝对依附他人，依赖权力，因而形成了国民普遍的人格悲剧。这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心理障碍。

“多请示，多汇报，一切按上级指示办。”这类带有“指示情结”的话，是长期计划经济模式的产物。计划经济中的一切经济行为，都要严格按上级指示动作，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于是，办任何事情，必须请示，必须汇报，经批准方可行动，久而久之，下级养成“等、靠、要”的惰性，缺乏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上级形成“大保姆”的习惯，平添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弊端所致，最终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信赖“红头文件”的痼疾在计划经济的超稳态结构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陶斯亮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当时中央高层领导人认为，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就行了。

认知方面的依附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从行为意向方面分析，国民的依附人格表现是全方位的。仅就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关干部流行的“下海潮”而言，现如今则出现“上岸热”。其原因无非是下海承担的风险大，不如行政单位“旱涝保收”，除工资外，还可有一笔较为可观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则腰包就更鼓了。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其有效性、可行性均具备线性操作特征。

依附人格的表现是全方位的，下面两位交通肇事者的不同结局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单位”的车容易出事。

早春的某个夜晚，一辆日野牌卡车在山西通往北京的公路上奔驰。司机李某已驾车行驶了十几个小时，他不时揉揉疲倦的双眼，心里琢磨着，要是能美美地睡一觉该多好。正走神儿，李某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骑车人的身影，他立刻紧急刹车，可是来不及了，骑车人已经被撞倒在地。这下，李某的倦意顿失。他急忙把骑车人送到附近的医院。经医生紧急抢救，骑车人总算保住了性命，但由于大脑严重损伤，骑车人成了“植物人”。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植物人”依然活着，依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十几年间，李某所在的汽车公司，为患者支出的医疗费达几十万元。事后人们感叹道，幸亏李某在国营汽车公司开车，若是个体司机，这个“植物人”十几年所花的医药费足以使他“倾家荡产”。李某自然也很知足。肇事后，他受到一些小小的处罚，如今依然过着与大多数人水平相当的生活。

同样是开车的，个体出租汽车司机董某与李某的结局就大不相同。董某为了多跑两趟车，多赚点钱，开着属于他个人的出租车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飞驰。由于车速太快，车子拐弯时，将一个在自行车道上骑车、身穿飞行服的飞行员撞倒，车子从被撞者的双腿上轧了过去。事后董某被医院告知，飞行员两腿粉碎性骨折，将终身残疾，他傻眼了。根据裁决，董某将赔偿医疗费及其他费用好几十万元。为了支付这笔赔款，董某卖掉了汽车，卖掉了家中所有的家用电器和值钱的东西并取出所有存款。最终，他倾力支付了应该赔偿的全部资金。从此，他一无所有。

在农村，国民依附人格的特征往往表现在不愿“脱贫”。尽管农村没有“单位”，但上面有共产党，反正“共产党不会不管穷人”。

数字往往是枯燥的，却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到2010年底，我国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1.02亿人减少到3 000多万人，降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以下。

巨大的成就中，却有一片阴影：返贫，这是贫困地区面临的新困惑。

在大巴山区、井冈山地区、沂蒙山区、武陵山区、横断山区、十万大山地区、乌蒙山区……我国东、中、西部18个贫困片、带，都程度不同地笼罩着“返贫”的阴影。原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高鸿宾对记者说：据估计，返贫率占已解决温饱户的10%~20%。“八五”期间，全国共减少6 000多万贫困人口，若按15%的返贫率，返贫人口高达1 000万。

甘肃省渭源县杨庄乡斗鸡沟村一位贫困户，乡上救济其一头牛，他既嫌麻烦，又想花钱，灵机一动，把牛卖掉了，买了只羊养着，以对付上面的检查。过了一段时间羊也不想养了，卖掉换成鸡，又省事，又有蛋吃了，自得其乐。到后来蛋吃完了，鸡也宰了，依旧“一贫如洗”。可他照例不慌不忙，因为“共产党不让饿

死人”！

甘肃省舟曲县某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吃回销粮，从未间断过。出路在哪里呢？记者与几位村长座谈。一位村长不假思索地说：还得靠国家给救济款、回销粮。群众现在最担心的是将来回销粮越来越少了。另一位则说得更直率：每年到山下的县城背回销粮，往返25公里，太辛苦了！我们盼望在乡上建一个粮站，背起来近些。这个乡的九源村，海拔2570米，草山面积大，发展畜牧业条件得天独厚。县上自2001年以来筹资3万元扶持村民养牛。结果人们把牦牛赶到海拔3980米高的山顶草场，用石头堵死唯一的出路，任其自生自灭。冬天，大雪封山，牛吃不到草。至于牦牛什么时候产犊，什么时候死了，村民一概不知。一些贫困户越救济越懒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一些青壮年农民“宁肯受穷，不肯吃苦”，出去搞劳务，不几天就跑回来，声言“吃不了那个苦”！

一些贫困户不愿“脱贫”，许多贫困县也不愿“脱帽”，奥秘在于可以获得政策优惠及扶贫基金。

就在众多贫困地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同时，相当一部分县却在竞相争戴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的“帽子”。一些县级领导到省里、到中央找部门、找领导软磨硬泡要求将这顶“帽子”多戴几年。原国务委员、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认为，此风不可长，对这种现象不仅要给予严厉批评，并且为县级干部约法三章，要求他们带领群众以苦干代替苦熬，尽早摆脱贫困局面。

如今，某些地方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以当贫困县为荣，当上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很光彩。有的县委书记、县长在大会上兴奋地宣布：“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被列入了贫困县。”而有些因为近几年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已经退出贫困行列的县也不敢声张、宣传，恐怕招致干部群众的不满，落得县领导“沽名钓誉”之嫌。有些领导到北京找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申诉说：“你们若不把我们县选定为贫困县，我回去不好交代，换届选举的时候可能要落选。”贫困县的帽子在一些贫困县里，并不是经济发展缓慢的体现，而是个炙手可热、可带来种种实惠的宝贝称号。在许多县看来，戴上并保住“贫困帽”是政绩，丢了这一“帽子”反而成了罪人。

因为有了这么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好处，对诸多“贫困县”来说，摘掉“贫困帽”是傻子，保住“贫困帽”反而是政绩。记者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一个旗，旗委书记是当地人，由于该旗摘掉了贫困县帽子，旗委书记被提升为副市长。然而，副市长从此每次回老家都只好悄悄道来，悄悄地去，因为当地人骂他“为升官而摘了‘贫困帽’”。

在城市也不乏不愿“脱贫”的人群。身强力壮的市民宁可留在家里无所事事，

依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也不愿意接受社会机构提供的工作机会……如今，这种怪现象在深圳似乎正逐渐多起来。此间人士分析说，有关部门应当尽早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办法，不要让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培养懒汉的“黑洞”。

深圳市香蜜湖街道自1997年开始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人数逐渐增多，现在已经成为深圳福田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人数最多的街道。据负责发放特困补助金的办事处人员介绍，绝大多数人自从领取特困补助后就没有工作过。华富街道办事处也反映，不愿工作的心态在领取特困补助的家庭中比较普遍。办事处曾多次提供一些家政、市政领域的工作机会，最终都被特困户拒绝。

据悉，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深圳市为救助特困家庭而专门设置的，每人每月可领取319元，一个3口之家共可获得957元。

据了解，广州救助站有不锈钢防盗门，铝合金窗户，内设250张单人铁床，人均占地8平方米，有餐厅、阅览室，并为老弱病残及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单设房间，还免费为受助人提供一套洗漱用品。救助人员每天的伙食标准为8元，比工作人员每天的伙食标准还高。据救助站有关负责人介绍，仅在2005年6月这里就救助了346人。而深圳的救助站正在抓紧修建乒乓球室、阅览室和健身室，每个房间最多住8个人，房内装有电视、电扇，并建有设备完善的冲凉房和网球场。

由于救助站的优越条件，致使一些人不愿离去或者离去后又想方设法回到这里，弄得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十分头疼，他们认为救助站已经成为养懒汉的场所。

2004年2月，市志愿者总队队员张世文办起了重庆第一条老人救助热线，从热线电话公布至今，他接受了8 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咨询，为300多位老人上门服务，帮助和安抚了110多名孤寡老人。某日，张世文接到一位上海人徐为贵（化名）的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来渝做生意亏了本，又没有找到工作，已饿了好几天肚子，需要好心人的帮助。张世文爽快地请徐吃了一顿火锅，还给了200元路费。

意想不到的，徐回上海后每天都打来电话诉苦，说他在上海开店急需一笔钱，要张给予更大的帮助。频繁的骚扰逼得张世文不得已把徐的号码纳入通话黑名单，然而半月后，张却接连收到几封徐的来信，信中称：“近期我必须依靠你资助生存，或者你在重庆尽快给我找个工作。”张世文只好自嘲道：“可惜我不是上帝！”

据张世文说，有时候一个月就接到400多个要钱的电话。救助热线已经成为懒汉讨钱的专线，让他不胜其烦。

当“独一代”遇到“独二代”

现代社会强调自主精神，然而我国的年轻一代却热衷于“啃老”。这个不争的

事实显出了依附人格的中国特色。

“婚前父母供养，结婚父母操办，婚后回家蹭吃蹭喝，有了孩子父母侍候……”这是当前相当一部分青年男女与父母家庭关系的现状。

鞍山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200名子女中有82%的子女缺乏自立能力，搜刮父母，当地人称之为“刮老”。

调查90户家庭，数字显示，子女每月到老人家就餐的，每户达66人次，日平均2次之多；其中仅有18.5%的子女交纳生活费，81.4%的子女白吃。在交纳生活费的这部分子女中，人均生活费仅为7.5元。一些已婚子女本来已另立锅灶，但仍是把自己家当“旅社”，把父母家当“饭店”，白天在（父母）家吃、晚上回（小）家住。还有一些子女，把结交的朋友客人领到父母处招待，花费由父母出，自己落个人情。

许多子女把父母处当作自选商场，看中什么要什么。一到父母家，冰箱必开，抽屉必翻，吃的、喝的、玩的、用的、看的、养的，都在必拿之列。有的老人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无可奈何。

“刮老”问题如此普遍存在，不能不令人忧虑。如果青年人不能自强自立，又怎能设想一个民族的奋发向上呢？

由于“啃老”已经成为时尚，所以20世纪流行的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经很自然地被改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拥有这种观念的人能够担当社会责任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很难推动社会前进。“啃老”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心理障碍不可小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安琪的调查报告称，在中国各大城市，成年的未婚子女中有85%仍需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加上服装、手机、上网、零用钱等，未婚的子女竟然每年人均花掉父母上万元。这一现象在《重庆时报》记者刘芳芳所撰写的报道中得到了印证：

记者调查发现，“啃老族”现象在重庆不容乐观。重庆市就业保障局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4年，重庆共有“啃老族”5万人左右。

家住南坪，今年24岁的小进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富家公子”。他的父亲是某区政府的在职干部，母亲为某高校的教授，他们对小进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大学毕业后，小进也曾找了一些工作，但一般干不了3个月就会换工作。据他称是“没兴趣，不想工作”。如今，小进谈了个女朋友，整日在家无所事事。每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晚上就约和他同样家境殷实的朋友玩到半夜方才归巢，父母对他

毫无办法。

大渡口区的刘忠一直没工作，靠工资也不是很高的妻子养活。但妻子也嫌现在的工作太累，就辞去了工作，结果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于是，刘忠便把3岁的儿子寄养在了自己的父母家，夫妻俩整日打麻将，靠一人100多元的低保过日子。刘忠的父母也不宽裕，已退休多年的老父不得已去找了个看守仓库的工作贴补家用。刘忠告诉记者，其实他也挺想出去找个工作，但初中毕业的他无一技之长，参加了好几次招聘会都被单位拒之门外，唯一能做的就是修理工、搬运工等服务行业，可他又怕丢面子，所以干脆整日赖在家中靠父母养活。

小凌去年刚毕业，却已在家中“待岗”一年了。小凌不仅拉得一手好琴，而且品学兼优，才貌双全，很受老师和同学的青睐。可就因为毕业没被自己中意的公司录取，她便一蹶不振，不再积极地找工作。小凌的父母表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却只能眼看女儿这样过下去。而小凌则认为，父母既然生下了自己，就应该对自己负责，钱用在儿女身上理所应当，而对于自己的未来，小凌闭口不谈。

“如果说‘傍’字还是以亲情为基础维系，有些许温情的成分，是社会新人在‘心理断乳期’的短暂依赖，那么‘啃’字的出现，就令人心寒了。”社会学家甘会斌老师认为，“太辛苦”“太累”，几乎是所有“啃老族”一致拒绝工作的理由。

甘老师还指出，从伦理上看，成为“啃老族”固然有各自的客观原因，然而，就社会责任感而言，就业是成年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个人信用建立的基础，特别是在那些只有退休金的家庭，“啃老”的行为不仅给父母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是在没有支付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占用着社会公共福利。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新失业群体”自身而言，本领不大而又好高骛远是就业障碍的根本原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长期失业不仅不可能“天下掉下来个大馅饼”，而且与社会就业群体的长期游离，也会使自己边缘化，钝化自身的生存嗅觉，最终成为无根的浮萍。

据从事青少年心理研究的丁老师告诉记者，“啃老族”的大量存在是因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给予了过多的溺爱和呵护，使他们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意识。丁老师告诉记者，“啃老族”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过多的关注，致使存在很大的心理缺陷，再加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们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所以，当真正需要独立或面对选择时，他们往往会以逃避来应对。

依附心理是否与独生子女的社会问题有关？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社会问题如今

又有了新的视角，即“独一代”遇到“独二代”，陈陈相因，心理障碍如何矫正？

2006年，时值49岁的会计毛阿姨明年就要退休了，可她却异常忙碌。年初，她的独生儿子和媳妇为她添了一个孙女。正是从那天起，需要她照顾的“孩子”增加到了三个：小孙女，还有儿子、媳妇。

“这孩子，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做爸爸了呢？”在孙女出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毛阿姨的口头禅。不光是毛阿姨，连26岁的陈某和24岁的方某也不敢相信他们俩已经孕育出了下一代。

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这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虽已成年的他们仍习惯于受上一代的照顾，却又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与他们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特殊身份：独生子女。如果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称“独一代”的话，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就是“独二代”。

两代独生子女，带着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和弱点，在21世纪相遇了，这是一幅很特别的图景。

生于1979年的陈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1981年出生的方某是他的师妹，前几年考上了公务员，在上海某区档案局工作。虽然两人在大学时就谈起了恋爱，但他们常说自己在没想结婚的时候结了婚，在没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

虽然当了爸爸，但陈某却说“没什么感觉”，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每天下班回来，照旧吃父母已经准备好的热菜热饭，吃完了就去上网打游戏。方某也是独生女，家务几乎不会干，吃完饭，要么看看电视，要么上网聊聊天。

“说实话，孩子怎么带，我们一点也不会。”小夫妻俩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挺理直气壮的，“反正父母早就说了，有了孩子他们帮着带。”

其实，陈某和方某也曾憧憬和想象过怎样养育好孩子，但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

“小孩好玩是蛮好玩的，可实在是太麻烦了！晚上一哭，你就要起来哄，尿布湿了，你就要起来换。热了、冷了、饿了、饱了都要闹，太累了！”陈某夫妇向很多人抱怨过孩子出生后的操劳，并说他们已无法忍受了。因为烦躁，陈某还动手打过女儿。

“也不能怪他们，家家都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哪家不是从小宠着惯着，更别提做家务带孩子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妹妹是姐姐带大的，家务是兄弟姐妹分着做的。”

但目前毛阿姨最担心的还不是儿子儿媳能不能学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陌生感。

毛阿姨说起一件小事：有个周末，她和陈某一起带孙女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她在医生检查的空当上了趟卫生间，而陈某则坐在检查室外打着掌上游戏机等候。回来的时候，毛阿姨远远听见医生喊家长进去把孩子抱走。待她走进门内，却看见陈某呆呆地看着并排躺在床上的三个孩子——原来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有时亲戚朋友来看望孩子，他就站在那里，一转眼又去打游戏了，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毛阿姨对记者深深叹了口气，身边不到周岁的小孙女紧紧贴着她，谁抱都不要，“我有时候还真有点害怕，儿子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看起来孙女也要我一手带大。等孙女再大点，他们父女会是种什么感情呢？”

毛阿姨有时也会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一代失去太多，所以才会把太多照顾和希望给予了儿子这一代，以至于拥有太多关爱的他们已对下一代没有了需要？

1979年出生的柴方方（化名）虽然还没结婚生子，却已提前遇上一群小孩子。身为幼儿教师的她，谈起这些孩子，只有两个字——头疼。

“我也是独生女，自己难免也有些娇气。来干这个工作前，做过一些心理准备。但现在一些小孩身上的毛病好像比我们小时候更严重，比如说，心理承受能力差，家庭条件越好越经不起挫折，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我们班有个孩子曾在大家面前说错一句话，其他孩子笑了，明明没有恶意，她也会大哭一场，甚至开始仇恨别人。”柴方方对记者说。

“自理能力也差，总想依赖他人。不少孩子午睡后连自己的被子都不会叠，中班的孩子吃饭还需要大人喂。而且遇到事情懒得动脑子，容易放弃。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自己真的不会干这些事。”她指指一个正在整理玩具的男孩，“你看，他现在整理得挺好的，可是如果这会儿他妈来接他，他就会把玩具一扔，让他妈妈帮他。”

说话间，柴方方开始上课，她问孩子：“小朋友，你们谁生过病呀？”“我！”“我！”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生过病呢？有过的举手。”这一次，举起的手掌稀稀落落。“我的爸爸妈妈不会生病的。”有个孩子大声说。柴方方回头向记者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回报意识比我们弱，觉得人家帮他们做事情是应该的，所有得到的东西也是应该的。”

不管怎样，柴方方最后还是掌握了主动权，比较成功地“控制”住了这群孩子。相比之下，另一位独生女、做小学教师的车雅（化名）的处境就显得有点糟糕了。

生于1981年的车雅，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一所中心小学做语文老师。这也是她从小理想，但这份期待已久的工作，她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一些小孩实在太恐怖了，才一丁点儿大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小时候虽然在家里比较任性，但看到老师还是很害怕很听话的。可现在一些孩子，好像根本没

有什么害怕的对象。”车雅告诉记者，就在上周，班里测验，她发现有个女孩子拿出书来偷看，当时她就把书没收了，可她没想到这个8岁的小女孩当场就站起来拍着桌子说老师冤枉了她。

“哪有学生对老师拍桌子的？我都愣住了。我忍住火气说：‘我观察你好几分钟了！’可这学生就是不承认，还拉着我去找别的老师评理，很凶地指着我说：‘她凭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不就是个穷老师吗？’我忍不住跟她大吵起来。”一旁的老教师都劝车雅别跟一个小孩子计较。车雅说，她那时特别想哭。

“这孩子显然在家里没听过一句重话，觉得人人都得听她的。第二天她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向我道歉。她的态度很冷淡，我的态度也很冷淡。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记恨她，但她真的伤害了我。”

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黄珍（化名）老师已教了近30年的书。她也有一个跟车雅差不多大的女儿，她对记者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师生关系也从以前那种长幼尊卑变成平起平坐。一些孩子在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不信任老师和学校，一些孩子还觉得老师又穷又无能。“但回过头来说，我们做老师的也的确要自我检讨一下。一些年轻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大多还是独生子女，也没受过什么挫折，虽然在有些知识背景方面他们比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要强得多，但在德行育人上，他们还需要磨炼。”

车雅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了，因为她说自己害怕了。“我跟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相处得很好，我本来还以为跟上一辈有‘代沟’，可没想到我却和那些小孩相处不下去。我受不了这样老是受气的生活。我的爸爸妈妈也心疼我，希望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一年坎坷的教师生活让车雅长大了不少。她说，好在通过这些事自己已慢慢学会了退步和相让，并能时常自律不再轻易任性了。

依附人格的表征目前也有了新的内容。在一项社会调查中，妇女包括（年轻女性乃至女性大学生）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倾向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老公挣钱多，你还会工作吗？”对此类问题，被调查的女性60%的人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持赞同意见；而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持赞同意见的竟达80%。

又一年毕业日期临近，一些女大学生竟抱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想法忙起了征婚。这种征婚行为被大学生戏称为“曲线就业”。

在哈尔滨南岗区某婚介中心的登记本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条征婚启事：未婚女，23岁，某校在校大四学生，身高1.67米，貌美如花，德才兼备，本科以上学历，寻身高1.7米以上，真诚善良、有车、有房、有3年以上大公司工作经验的未婚男士为伴。据该婚姻中介的负责人李女士介绍，现在她们时常接待一些来征

婚的大学女生。而在某婚姻中介所，记者同样看到了一些写着在校大学生寻求有车有房成功人士的征婚广告。通过查找，记者发现，这家婚姻中介所当年一年共有20余条自称是在校大学生的征婚信息，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大三学生，且全部是女生。

据某婚介所业内人士介绍，大约在四五年前该市就有女大学生征婚，近两年人数不断增加，来征婚的大学生九成以上都是本科应届毕业的女生，其中半数以上是外地人，征婚的条件也非常相似，几乎都是寻求有车有房的成功人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大学生征婚呢？记者几经周折和一位征婚的女大学生薇薇（化名）取得了联系。薇薇是哈尔滨市一个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24岁，谈起征婚的原因，薇薇笑着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啊！”薇薇告诉记者，同学们把这种征婚叫“曲线就业”。她说，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大，去年毕业后，很多同学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同学一年换了三四个工作，每月的收入还不到2 000元。自己就读的不是名校，家又在外地，毕业后想找个好工作留在城市很难。即使找到了工作，那么少的收入只够维持租房、吃饭等正常的生活开销。不如趁着年轻漂亮又是大学毕业生，找个起点高的丈夫结婚，一方面避开就业的麻烦，另外还可以省去10年的苦日子。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部分女大学生变得现实了。“嫁个好老公，少奋斗10年”成为一部分女大学生的口号。大学校园里甚至开始流行“男靠家，女靠嫁”的说法。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有房有车，那么对方的学历、年龄等问题，征婚的女大学生们大多不予考虑。

丫头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依附人格在我国最为典型的表征当属“单位人”了。有篇小品文形象地将其表现出来：

日本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300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水原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水原没有死成。正当水原悲伤之时，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水原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水原的落选。正当水原一家人大喜过望之时，公司却又传来消息：水原被公司除名了。原因很简单，公司的老板认为：“如此小挫折都经受不了，这样的人在公司是干不成什么大事的。”

美国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300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汤姆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汤姆没有死成。正当汤姆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汤姆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汤姆的落选。正当汤姆一家人大喜过望之时，美国各大州的知名律师纷纷来到汤姆的家中，他们千方百计地鼓动汤姆到法院告这家公司，让公司支付巨额的“精神赔偿费”，并自告奋勇地充当汤姆的辩护律师。

德国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300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肖恩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肖恩没有死成。正当肖恩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肖恩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肖恩的落选。正当肖恩大喜过望之时，肖恩的父母却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进入这家公司。他们的理由不容置疑：这家公司工作作风如此差劲，进入这家公司对儿子的成长毫无益处。

中国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300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晓东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晓东没有死成。正当晓东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晓东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晓东的落选。正当晓东大喜过望之时，晓东的父母却从商店买来锦旗和奖状。他们来到公司，远远地望见公司老板便跪了下来，他们满含热泪地说：“多亏你们救了我儿子，我们家世代代铭记你们的大恩大德呀！”

查《现代汉语词典》，“单位”有两种定义：一是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如米、克、秒等；二是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显然，生活中单位的称呼，早已踏破了词典的篱笆。我国以前的单位，的确与众不同。它除了机关、团体的工作之外，还要管我们的户口、粮食、副食、医疗、住房，进而思想改造、政治学习，治安环卫，结婚离婚，入团入党，奖励处分，甚至死后处置。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通过单位；行政拘留及劳动改造，也要与单位通气。“我是有单位的人！”算得上一种豪言壮语。

单位与单位又有不同。大单位，小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党政军，全

民集体，甚至寺庙也可以附为地师级、县团级之类单位。好的单位，可以解决包括从出生到火葬的各种人生难题；差的单位，也可以发一个铁饭碗，有困难可申请补助，犯错误得接受批判，大致都能够就地解决。至于公社、大队、生产队，算不算单位呢？词典上不算，社员却要认账，也算吧。“大跃进”后，它管安排活路，登记工分，发口粮、救济粮，后来还管批房宅基地，配生育指标，等等。甚至多年前连外出逃荒的证明，也得由生产队这个单位盖章放行；有了这一纸单位证明，似乎乞讨也理直气壮了。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好单位，中央单位、省级单位。

“我单位福利特好！”肯定引来羡慕目光。你在科研单位、文艺单位，谁不会想到你的才学或者才能呢？你在保密单位，用不着打听，你的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就已大体清白了。如果你的单位是什么生产组或集体商店，最好少提，尤其是在谈对象和借钱的时候。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单位”的观念也较前显得淡漠，“单位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嬗变。这能否说人们对单位的依附已经自觉地衰减了呢？非也，事出无奈，改革开放的洪流谁能阻挡？被动顺应吧，不然有什么办法？而人们骨子里的“单位”依附仍然经常地作为支配行为的意识或潜意识。

“单位人”的心理嬗变与“主人翁地位”的身份嬗变不无关系。强调了多年的“主人翁地位”已经成为依附人格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某钢笔厂一工人下班时身上放了许多钢笔，不小心被门卫查出。厂长闻讯赶来，声称“偷拿产品，严加惩处”。该工人不慌不忙说出一番歪理：“现在强调工人的领导地位，工人是主人。国家有我一份，工厂也有我一份。主人拿自己的东西怎能叫‘偷’，也没听说拿自己家的东西犯法的。再说，你厂长的主人翁地位能体现在小车进出，公款吃喝，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只能体现在拿点自己生产的产品上了！”一席话说得众人哭笑不得，似乎是胡搅蛮缠，却也不无三分歪理：工厂是国家的，理论上大家都有一份，所谓“工厂者我们的工厂，企业者我们的企业，单位者我们的单位，我们不拿谁拿，我们不吃谁吃，我们不玩谁玩！”但在实践中，一般的“主人”——工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些权利的。只有公仆——“主人”的管理者们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这些权利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所以，一般的主人要行使主权只能“拿”，并且说出让孔乙己自愧弗如的高论来。

嬗变的“主人翁地位”使人产生“丫头管钥匙，当家不做主”的意识或潜意识。那么，依附人格在“单位人”身上就可能成吸附人格，肆无忌惮地从“自己的家里”拿东西。这种现象在某些国有企业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有一句几乎人人皆知的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拿

谁？当然是拿公家。拿什么？大到机器配件、仪表仪器，小到信封、大头针，只要有用的就行。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对“干一行拿一行”习以为常：拿私人的东西被视为偷，拿公家的东西则随你便，“拿风”劲吹。当下，“拿公家”甚至成为一种变相福利。

据调查，全国每年因公物私用、流失（实际上也是私用）的数量，如果折合成价款计算，大约有3 000亿元。

在一项调查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悖论：与非公有经济相比，公有经济中的公有制对集体所有制而言，员工的主人翁精神更为淡薄，雇佣思想更为严重。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员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是由国家代为行使的，其应得的劳动报酬以工资的形式领取，当然会对其“主人翁”地位不予置信。更重要的是：员工未能在其单位中享受应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审议权、决定权，其在单位行为的运行中始终处于被动的被管理地位，自然会从“单位人”的依附人格变为依附人格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重视且亟待矫正的心理障碍。

23

中国人何时成了“中性人”？——恐惧情结

老鼠过街的时代特色

作为一种情感障碍，恐惧情结说白了就是胆小怕事。中国人素以勤劳勇敢著称，何来胆小怕事？让我们先从中国人最容易表现出来的“自保”特征说起。

国人“前怕狼后怕虎”行为源于传统的自保心理，因而出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原则，其最高境界则为：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也就是国人所说的“好好先生”。中国人的这种特征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也日益为外人所知。在美国相当多的大学里，很多美国老师和学生只要一提起中国留学生便说：timid, timid……（胆小，胆小……）缘由在于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初到美国后，总是“低头走路”，那样子就像怕遇到坏人。他们从来不主动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搭讪，上课也很少主动举手发言，很少提问或者加入课堂讨论，当然，也“少管闲事”以求自保。

如果说这些留学生初到异国他乡的表现情有可原，那一个叫柳墉炫的韩国人的议论就发人深省了：

某个周日，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件特别令我震惊的事。

那天夜里，我和一位朋友在一家餐厅的露天座位吃饭，突然传来啤酒瓶砸在墙上的巨响声。我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正一拳往女朋友的脸上挥去。我当时坐在距离他们三四张桌的地方，等我赶过去制止时，那个女孩已经满脸是血。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部分原因是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这么粗鲁地打一个女孩。但最让我震惊的是，旁边围观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上前阻止，没有一个过去安慰被打的女孩，也没有人报警！所有人都看在眼里，都倒吸凉气，都替那

个女孩痛心，但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

我对此大惑不解，对于旁观者的无动于衷甚至有些愤怒。后来，我跟中国朋友们就这件事进行过很多次讨论和辩论，他们都相信，在场的人多半也在内心感到自责。但每次讨论到旁观者的行为是对是错的时候，我的中国朋友们都显得很宽容：“这不关我的事，为什么要管呢？”

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是不足以解释这种违背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的。我想，我的中国朋友多半是怕我这个外国人因此对中国人产生不好的印象。但后来，我跟中国人打交道越多，越觉得“为什么要管”的想法绝不是偶然现象。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人传统上信奉集体主义，珍视和谐共处，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反。但我在中国和西方的生活经历却表明，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远比西方人自我。为什么呢？

首先，它与中国的家庭教育有关。中国的父母常常会告诫自己的孩子“少管闲事”，有的干脆直接说，别去帮助别人，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年轻人也表现出很强的从众心态，与西方同龄人受到的“积极表达自己”的社会鼓励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无动于衷的心理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看客，看来中国不但在过去有看客，现在也仍然有。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很长时间以来只专注于赚钱，忘记了社会的道德传统，变得越来越物质。我听到不少外国人说，中国人现在比美国人更物质主义，为了赚钱可以不顾一切。

我担心的是，所有这些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在中国社会催生出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倾向。文章开头的那件事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种自私的个人主义却以各种形式表现在方方面面。

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很少有人给老人让座；马路上，司机们当街争吵，不管会不会造成交通堵塞；报纸上，总能读到工厂非法倾倒工业废料、污染环境的报道。

这种态度还在中国社会滋生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每一次对别人的不幸袖手旁观，这颗种子就长大一寸；这颗种子越大，中国人就越自私、越无所谓。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我看来，这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可以理解现在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经济发展——毕竟，与迫切的买房问题相比，道德似乎太过遥远。但是，中国自成立以来走过了那么长一条艰辛的道路，能有今天的成就实在不易。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停下来想一想：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我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确保中国未来的成功？

中国人为什么胆小怕事，究其根源还是与前述的自利趋向、冷漠情结、缺损人

格等有关。中国人有许多“怕”：

怕给医生护士提意见（下烂药）；
怕给领导老师提意见（穿小鞋）；
怕给交警提意见（乱罚单）；
怕给税务人员提意见（多缴税）；
怕给检查人员提意见（不过关）；
怕给收发人员提意见（扣信件）；
怕给安空调的提意见（留隐患）；
怕给厨师提意见（吐口水）。

仔细观察当今中国社会，不难发现许许多多颠倒的“怕”，其中尤为典型的大概有如下几种：

一是好人怕坏人。火车上、汽车上，一把匕首就会使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旅客乖乖交出钱物。公开场合，一句“老子是坐过牢的……”就会产生巨大威慑力，使众人赶紧闭了嘴巴。在不少地方，正不压邪已蔚然成风了。

二是债主怕欠债者。本来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但现在这一切都颠倒了。欠债者常常比债主更为生猛，只需一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便能让债主灰溜溜而去。

三是“上帝”怕小贩。且莫说店大欺客，大商场动辄对“上帝”（消费者）冷脸冷色、糊弄欺哄，乃至侮辱搜身，就连那街头“游击贩”也可随便对“上帝”（消费者）谩骂抓扯，纠缠不休。

四是“李逵”怕“李鬼”。每当“李逵”要动手打假，“李鬼”及其保护者便马上采取应对措施，或走漏风声，悄悄转移赃证，使你查无实据；或通过长官出面干预，制造障碍；甚至恶人先告状，反诬“李逵”越权执法，等等。在“李鬼”面前，打假常常以“假打”告终。

五是“主人”怕“公仆”。按理说，“公仆”是为“主人”服务的，应该诚惶诚恐才对。可如今我们却常常看到“主人”在“公仆”面前惊恐不安，谨小慎微……一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顺口溜即是这种“怕”的真实写照。

……

怕这怕那，怕到最后，大家都会成为不痛不痒的没脾气的“中性人”，继而社会也会成为不死不活的“中性社会”。正常的社会是鼓励个性的社会，而被斥责的社会只能是没有希望的“温吞水”社会。

说到社会，有希望的社会是有其管理特征的。按作者的观点，管理就是社会的灵魂，社会有无希望的枢纽在于管理，在于“人—人”系统的管理而不在于“人—物”系统或“物—物”系统的管理。但如今中国存在的一个突出隐患便是我们的一些管理者明显存在“不想管”“不会管”“不敢管”的现象。

就“不敢管”而言，形式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学生怕老师，但老师现在也怕学生。如果老师对学生严格管理引起学生不满，就可能在“评教”中吃亏。不仅脸面不好看，还会直接导致经济损失甚至职位损失，所以现在的老师，特别是大学教师奉行的就是“好好先生”的准则。

再如，下级怕领导。而如今领导也怕下级，如果严格管理引起下级不满，政绩考评中也可能吃亏，也会直接导致经济损失甚至职位损失。笔者曾以党校教研员的身份到多地调研，所到之处均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学员接待。每每见到这些学员到处敬酒，要求下属给面子时，笔者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领导难当的问题是“怕”字当头。除了下属，不敢得罪的人也多。一家大型电子厂成为盈利大户后，到厂里谈广告的、卖挂历的、拉赞助的便络绎不绝，其中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有新闻单位的，还有工商、税务、银行、公安等部门的。该厂的厂长苦笑着说：“这些部门我哪个也得罪不起，心里气得打哆嗦，却还得赔笑脸掏钱。”工商、税务、银行、公安等部门的管理也难，为什么呢？其中很多人员都是权势人物的小姑子、大舅子，谁也得罪不起。

恐惧情结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其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对社会犯罪的忍让与退缩。这方面的报道屡见不鲜。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0年9月19日下午2时30分，一辆车牌号为川E-05507的长途卧铺班车，从古蔺二运公司开往广东省东莞市。车上除了3名司售人员，还有42名乘客。

该车从古蔺县城开出不久，就发生了故障，在一小镇检修。这时，一个躺在前排司售人员休息铺上、上身赤膊的男青年站起来重新调铺位，把男的全赶到后面，女的全安排在前面。这人叫王善雨，24岁，身高1.70米左右，古蔺县石屏镇桂全村人。这次，他是乘车去广东打工的。

女乘客中有个叫巧妹的姑娘。巧妹今年19岁，这次是跟大姐和三哥阿强去广东中山打工，第一次出远门。经王善雨精心“安排”，巧妹与大姐被隔开，三哥被赶至后面，巧妹被安排到王善雨身旁空铺上。

晚10时，车仍原地不动，为了省电，车厢内没有开灯，大部分乘客都在黑暗中昏昏沉沉入睡。王善雨扯过一床薄被给巧妹盖上，一只肮脏的手顺势摸进来。巧妹大惊，用力把“狼爪”拨开，气愤地说：“下流！你再这样，我要喊人了。”王善

雨凶狠地说：“喊也没用，老子不怕，告诉你，老子杀过人，你要出声，我就捅死你！”说着，用一把锋利的牛角小刀抵住巧妹的咽喉，巧妹只觉得一股寒意蔓延全身……就这样，色胆包天的王善雨轻而易举地强暴了巧妹！

9月20日中午，该车进入贵州省境内。刚刚过足了毒瘾的王善雨精神焕发，无以排遣，便邀请同行的安某（17岁）登上二排左上铺，一人一瓶啤酒，在巧妹的身边猜拳行令。下午5时许，兽性发作的王善雨对安某说：“你先下去，我完了你再上。”说着把巧妹扳转过来，压在身下，再一次强奸了她。

这一次，巧妹的三哥阿强发现了，他走上前，从巧妹身上把王善雨拉下来，说：“她是我妹妹，你不要乱来！”

王善雨从铺位下跳下来，一拳打在阿强脸上，血从阿强鼻孔里流出。阿强愤怒地握紧拳头要还击，王善雨亮出一把十来厘米长的牛角尖刀，蛮横地说：“你不要命了！”

虽然乘客大部分是强壮男子，但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挺身相助，没有一个人敢仗义执言。

阿强无奈对躺着闭目养神的骆某说：“你是车主，在车上发生的这种事，你应该管一管！”骆某冷冷地说：“我只管卖票开车，你们自己争吵，关我屁事，我又不是你的保镖。”歹徒听他这么一说，胆子更大了。

第二个牺牲品是同为19岁的小叶。小叶跟着男友去广东中山打工。两人就在巧妹对面上铺。夜幕悄然落下，小叶抗不住倦意，昏昏沉沉睡过去。

“下来，一边去！”“她是我女友，请你高抬贵手……”“我再说一遍，下来，一边去！”王善雨口气凶狠，根本没有通融余地。小叶的男朋友低头不语，顺从地爬下自己的铺位。小叶要跟着男友转移，王善雨按住她：“你留下！”小叶便不敢动。王善雨已经不屑于再说什么，直接动手剥小叶的衣服。男友手足无措，苦苦哀求。王善雨又掏出那把牛角小刀，威胁说：“快走开，小心老子捅你个透心凉！”男友畏畏缩缩地走开，王善雨饿狼般扑上去，蹂躏了几乎昏过去的小叶。当晚，肆无忌惮的王善雨又窜到前排右下铺，赶走同铺的小女孩，以牛角刀威胁，强奸了24岁的阿凤。根据车主骆某后来交代，当时，他曾想出面制止，但见车上的人都装聋作哑，阿凤几个同村人也毫无反应，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心安理得地睡觉了。

9月21日上午，该车驶入广西南丹县境内，王善雨又开始逞凶。在一个路边饭店停车吃饭时，王善雨下车买回一瓶白酒、三瓶啤酒，在车上跟安某对饮。乘着酒劲，他手握牛角刀，与提着酒瓶的安某窜到后排，对39岁的周某强行搜身，搜出100元和一张周的妻子许某的身份证。王善雨把钱和身份证收入囊中，说到了中山，再拿200元来赎身份证。周某听了，不敢说半个不字。后来，王善雨如法炮

制，屡屡得手。如此顺利得手，连王善雨自己都感到意外。

下午4时，该车驶进广西宜州市，照例在一个路边饭店前停车吃饭。身心疲惫的阿凤没有下车，王善雨又把同铺的小女孩赶走，再一次强奸了她。这么多人，进进出出，都听到了她的求救，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援。路边不到20米，就有宜州市公安局110报警点，也没有一个敢去报警。

晚上10时许，车开到广西宾阳县城北安顺加油站，再度发生故障，司机停车检修，乘客中终于有人悄悄给宾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的宾阳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闻警出击，5分钟内赶到安顺加油站，将全车司乘人员押到公安局讯问。

7月5日，广西南宁地区中级法院对发生在客车上的这起极其恶劣的强奸、抢劫案进行一审宣判：王善雨犯强奸、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 000元。安某犯强奸、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车主骆某也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一把普通的小刀可以吓住一车人，这与当年一个日本鬼子便可吓住一街人有无关联？

中国是个英雄辈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高扬英雄主义旗帜的民族。然而，当历史发展到现在，人们反而习惯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歹徒拦路抢劫，数十人观看却无人见义勇为；一个妇女被歹徒施暴，数百人围观无一人挺身而出；一个小偷在火车上割包，一车人（除事主）都闭上眼睛装着睡觉……于是，“老鼠过街”有了新的“时代特色”：“50年代，人人喊抓；60年代，人人喊打；70年代，多喊少打；80年代，少喊少打；90年代，懒得喊打；新的世纪，满街害怕。”

恐惧是一种感染病，等到大家都恐惧得蒙上自己的眼睛时，我们就没有退路了。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一段话令人深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咄咄怪事：失主不敢领失物

恐惧情结并非中国人的专利，但国人的恐惧情结更集中在见义勇为的缺位方面，并折射出有关联的其他社会心理障碍如冷漠情结、自利趋向、缺损人格等。需要指出，见义勇为的缺位并非指国人缺乏正义感。恐惧情结并非认知障碍，而是情感障碍、意向障碍和人格障碍的综合，具体的诱因为三：怕麻烦、怕报复、怕无用。

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为宿疾便不赘述了。

怕最普遍的诱因则是怕报复。例如：

女职工刘敏被开除了，因为她强占厂里新盖的宿舍楼，在受到警告后拒不退出。这位女工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闹。她对儿女说：“不闹，他（指厂长）还以为我们怕他！”她的矛头指向厂长。次日，她带领儿女，三次闯进厂长家吵闹。厂长没有让步。一天后，她又带着儿女，夜半闯进厂长家里，踢坏房门，砸碎后窗玻璃，撕破厂长的睡衣，殴打厂长的妻子。厂长被迫无奈，向法院起诉。到此，风波才算平息。闹，是企业用工权改革的一种反弹，也是许多被开除者的普通心态。闹，是争口气，是“你让我不好，我也让你好不了”。

如果把各种闹的办法列举出来，其中不少是花样翻新，别出心裁的。

齐女士被开除后，就四处散发厂领导企图调戏自己的上告材料。同时，她丈夫一天给厂长至少打一次电话，威胁说：“我妻子被你侮辱、开除，她活不下去了。如果她被你们逼死，我就跟你们拼命！”每天这么一个狠巴巴的电话，还真有点考验厂长的神经。

成先生被开除后，倒是不吵不闹不动手，他知道这么做违法，所以他不干别的，而是整天跟着厂长。厂长在办公室工作，他就拿只凳子坐在那门外候着；厂长下班吃饭，他就拿个馒头在身边站着，跟电线杆似的；厂长回家，他就在厂长家的客厅陪着。

上述案例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了，更有甚者，刀砍的有之，投毒的有之，泼硫酸的有之，放火的有之，绑架的有之，管理者能不“如履薄冰”？

发生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案例亦是“层出不穷”。

2003年7月15日，出租车驾驶员李某急匆匆地赶到合川市合阳刑警责任区中队报案：他在黄坪小学附近被车上三男青年持刀抢劫。鉴于案情重大，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很快将其中两名持刀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连夜突审和周密侦查，专案刑警很快锁定了第三名犯罪嫌疑人——社会青年汪大海。他们详细了解到，汪大海外号“汪二白”，现年17岁，常在南津街上十字转盘一带活动，此人心狠手辣，爱好武术，身上还随时藏有一把匕首。

7月21日晚上8时许，武警李军龙在上十字转盘一带守候时，汪大海出现了。但狡猾的汪似乎嗅到什么，突然飞奔。李军龙大喝一声，猛扑上去，一个扫堂腿将汪大海掀翻在地，紧紧地将其压倒人行道旁边。汪大海“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反手就向李军龙的胸部刺来，李军龙手疾眼快，一把握住汪的两只手腕，使出全身力气将两只手腕按住，汪大海见双手被按住，匕首舞不动了，遂回过头来，一口咬住李军龙的手臂，霎时，钻心的剧烈疼痛传遍了李军龙的全身，紧接着，汪又向他咬了数口，顿时，李军龙的鲜血顺着手臂外淌。

此时，围观路人超过500人，其中还有不少是青壮年。李军龙对站得最近几个中年人说：“我是刑警，在抓捕逃犯，请帮我一下。”一边说，一边把挂在胸前的警官证出示给他们看，可几个人仍无动于衷。李军龙又请求道：“来帮我按住一只手，我给他上铐。”可仍然没有人动，直到另一名武警赶来才将汪制服。后来询问围观者为何不协助刑警，得到的回答均是“怕报复”。

现场将赃物、赃款发还给失主，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然而，2002年7月11日在重庆市石油路派出所举行的“夏季破案战役”赃物、赃款发还会，却遭到“冷遇”。因为众多失主的“怯场”，发还会显得异常冷清，短短的20分钟便草草收场。望着放在桌子上无人认领的“战果”，民警脸上流露出了丝丝苦涩的表情。

上午9时30分，仪式开始。派出所会议桌上摆满了随身CD机、手机、彩电、DVD、首饰等，另有现金10 000元。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前来领取失物的市民并不多，就是来的市民表情也十分平淡。面对记者的采访，或躲避，或拒绝，或一走了之，更有甚者说“拍照可以，但只限于背部”。一位中年妇女领了失物准备离开，突然发现一名记者正向她走来，她惊慌地边退边摇手：“不要采访我，万一见报了，他们（犯罪分子）来报复，我该怎么办？”

难道领取被盗之物是一件丢人的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失主称，万一报纸报道以后，违法分子顺藤摸瓜前来报复，咋办？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持这种害怕被报复的心理的失主占大多数。望着桌子上一些无人认领的“战果”，派出所民警一脸莫名。

“怕报复”不是个别现象，据2009年1月11日《武汉晨报》报道：武汉市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正在举行，武汉市市委书记陈训秋于1月9日与30多名市人大代表座谈时在现场作出要求：大家都要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现场的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市委书记要求不录像是出于鼓励人大代表说真话、保护说真话的代表的目的，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我们在为市委书记良苦用心感佩的同时，也不能不生出一些疑问、看出一些问题。

武汉市委书记要求不录像，不是空穴来风。人大代表因为说真话大胆进行监督而遭受打击报复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

人大代表只有在不录像情况下才敢说真话，折射出当前还缺乏真正能让人大代表畅所欲言的环境，折射出人大监督机制尚不够健全的境况，表明什么时候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没有错位才可能会有真正有效的监督力量存在的困境。

人们经常说“举报难”，究其症结，仍然离不开“怕报复”的话题。

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的沈先生因当了一回举报人，被迫“重装”出门。即使是大热天，他也穿着长大褂，腰间插着弹簧刀、菜刀和一把锃亮的斧头，沈先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沈先生向工商部门举报外来人员刘某将猪肉串冒充羊肉串进行销售的行为。当月，根据沈先生提供的线索，有关部门依法取缔了这个食品加工窝点。在工商局奖励举报人的颁奖典礼上，面对众多的记者，沈先生声明：“我是冒着生命危险举报的，这次敲掉违法分子100多万元生意，他们和我很熟，只要有一点点线索就能找出谁是举报人。你们千万不能把我泄露出去。”

沈先生和工商局负责人专门提醒新闻单位，报道时不要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可就在当晚，他手拿奖励证书的特写镜头还是上了电视新闻。没几天，匿名电话接踵而至，沈先生的处境危险。警方表示，不可能对其实行24小时监护，请他自己当心，加强防范。根据警方传授的经验，沈先生在自家门上装了猫眼，用钢丝网将窗户包得严严实实。为防止有人恶意纵火，他还在家里备好了两罐干粉灭火器，同时购置了菜刀、斧头等防身器具，以备不测。举报人当到这个份儿上，也确实令人气愤与尴尬。

“神勇基金”诱发怪异动机

在双休日乘火车到某市看亲戚的路上，笔者和几个陌生人聊天，因为互不认识，所以也就没有了顾虑，大家侃侃而谈，对社会的丑恶现象，发泄自己的恼怒。乘客A说，我市市委书记，百姓送他个雅号叫“楚百万”，他住次医院，给他送红包者不计其数。他的女儿、女婿、外孙以及杂七杂八的亲戚来医院看病，都是由市卫生局局长陪同，CT、核磁共振，统统免费检查，好药更是白送……我妻子是医院高干病房的负责人，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乘客B说，我市组织部长，是个到处配种的风流人物。在郊外风景区盖了一幢漂亮的小别墅，没有200万元下不来。金屋藏娇，里面住着一个如花似玉的俏佳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包二奶”吧。我咋知道的？因为我表舅是郊外那个村的村委会主任……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举报时，他们说，等着别人举报吧，咱是只骂娘不开枪，害怕的是逮不住老鼠反而遭鼠咬。

如果仅仅抱怨人们的怕是怕报复，这也不完全对。人们的怕还包括“怕无用”：我举报了谁，谁毫发无损，反而自己落不到好，招致诸多不利。

2004年，中国医改阵痛之时，胡卫民在中央电视台面对亿万观众，痛批湖南娄底中心医院公开推行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等腐败行为。胡曾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想通过回访做一篇《胡卫民医生正义的胜利》的文章，却发现这位揭黑斗士早已向法院提出正式辞职并离职。

胡卫民不收红包、不吃回扣是出了名的。有年轻医生听说要被分去胡卫民医生的科室甚至会大哭。医院党委书记说，这件事是真的，在他那儿没有回扣、没有

提成、没有资金，过辛苦日子，怎么能不哭。全医院的人都不愿意到他科室里工作，现在他没有助手，虽然胡卫民在医院身兼两个重要科室的主任，但一个月只有2300元工资，他甚至要每个月自己出几百元钱请一个助手。

胡卫民因为揭露医疗腐败，跟别人发生了争执，医院里有人把他踢成了阳痿，老婆就和他离婚了。虽然孩子判给了他，但也因为揭露医疗腐败而得罪人，有人把他的孩子拦在半路上，威胁孩子，说你父亲挡了我的财路。他为了孩子的安全就把孩子交给前妻。可是，他仍经常受到威胁。

娄底中心医院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娄底中心医院因为胡卫民揭出了医疗腐败的黑幕而出名。作为医院的领导人他很有压力，因为这家医院代表了中国医改的典型标杆。书记说，我们知道他是好人，胡卫民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不能表扬他，否则医院里对我会有意见的，因为我鼓励他就是不让大家搞好效益。

胡卫民辞职的同时还给湖南省委书记和娄底市市委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主要是说他的苦恼。这封信上写道，虽然他身为娄底市政协委员，在全国获得了近十个荣誉，但在院内没有得到任何表彰，院内同事骂声不断，说他是娄底医院界的叛徒。湖南省委副书记曾经公开发表讲话，号召湖南省全省的医药工作者向胡卫民学习，但是娄底中心医院却一直装聋作哑。

恐惧情结既然是出自于怕麻烦、怕报复、怕无用的自保心理，那么其矫正途径亦很简单，除了“升华”（提高个人思想境界）外，还要围绕安全、自保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包括监督制度、保全制度及奖惩制度。

就监督制度而言，除了监督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行为外，也要监督在各种幌子掩盖下的隐蔽勾当，即“隐性报复”。南京市某化工厂工人因举报厂长的经济违法行为，遭到开除厂籍的报复。在检察院调查时，厂长声称这是在搞“优化组合”，举报人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在处理这起打击报复事件中，检察院也只能单方面保护举报人，而实施打击报复的厂长却未受到任何处罚，因为行政处分的权力在主管局。据南京市举报中心负责人讲：明显的打击报复事件还比较容易纠正，至于那些对举报人采取扣奖金、调工种等“穿小鞋”的事件，检察院无能为力，而这种现象更普遍。

健全上访制度亦是重要一环。对上访人员采取围追堵截，甚至殴打关押，是一些市县公开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的“打错门”令人发指：几位壮汉在省委大院对一老太太（领导家属）拳打脚踢达十几分钟，致其遍体鳞伤。事后一位公安局领导道歉：“打错了，不知你是领导的家属。”如此嚣张，可见普通老百姓上访的境遇。

笔者曾经在对一个有效份数为3000多份的问卷调查做分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肯定“社会应伸张正义吗”这一问题的占97%；肯定“你应该伸张正义

吗”这一问题的占86%；肯定“你会见义勇为吗”这一问题的占63%；肯定“你会举报坏人坏事吗”这一问题的占31%。在反向提问中，肯定回答“你不会伸张正义”及“你不会见义勇为”“你不会举报坏人”等问题时，给出的理由均集中在“怕报复”及“怕举报无用”。鉴于此，矫正恐惧情结的制度建设除了监督制度外，更为具体的是保全制度及奖惩制度。

“法律不能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今后谁敢举报？”宁夏灵武市临河镇农民马某问道。

2005年6月，马某举报包括儿子在内的4人盗窃高速路上金属指示牌。灵武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时，临河镇有一百多名村民旁听。庭审中，起诉书中的一句话令法庭一片哗然：“经临河镇马××举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4名犯罪嫌疑人被灵武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法院判决当晚，另3个被判刑人的亲友来到马某家，扬言要和他算账。第二天晚上，在自家后门，马某遭到4名不明身份的人一顿棒打脚踢。

被迫无奈，马某只好背井离乡，远走青海。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电话那头，肖先生的声音哽咽了。两年前，他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后遭到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

肖先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开个小店，一家人虽不富裕，却也幸福温馨。2006年7月14日晚，肖先生看到家门口有几个人在打架，其中有他认识的同乡。当天晚上，肖先生接到派出所民警打来的电话，“这时我才知道那个人已经死了”。肖先生最后答应作证，但前提是警方为他严格保密。“当时他们拍着胸脯保证说没问题。”在肖先生的帮助下，警方抓获行凶者，但犯罪嫌疑人钱某和钟某逃走了。

一个月后，肖先生的一个亲戚给他打电话，说钱某等人正四处打听他，让他躲一躲。他们是怎么知道是他作证呢？“判决书上都写了。”亲戚的话让肖先生如五雷轰顶。肖先生找来一份判决书，一看惊呆了：他们说了什么话，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肖先生给办案民警打电话，民警让他先躲一阵。民警说，泄露他作证消息的不是公安局方面，是法院要求必须实名举证。

钱某很快找到了肖先生，没过几天，有两个人到他店里来闹事。2006年12月，他那个亲戚再次给他打电话，说钱某他们又要来报复了。当时肖先生的儿子刚满月，他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到了杭州，我才告诉老婆这一切，一家人抱头痛哭。”

某天吃过晚饭，家住哈尔滨市道外区的83岁老人谢某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外散步。当他走到一火锅店附近时，被一辆调头的黄色跑车（司机刚从火锅店喝完酒出来）撞上，他当场就被撞趴在车的发动机盖子上。此时，跑车不知为何突然加速，

推着老人冲到路边的墙上才停下来。见有数十人围观，肇事司机下车看了看，并威胁说：“谁也别瞎说，谁说了就整死谁！”由于遭到恐吓，围观者都站在一边，不仅没人敢上前抢救老人家，更没人敢给谢家报信。待120救护车赶到现场时，老人家已经死亡。

据谢家人反映，与肇事司机一伙的人在当地很“霸道”，有黑恶势力背景，没人敢惹，就连进入小区收废品的都要向他们交“保护费”。慑于这伙人的特殊背景，证人害怕遭到报复，不敢作证。

事发后，警方和老人家属都在寻找目击证人，但没人敢作证。警方张贴了寻找目击者的启事，可没人提供线索，破案一度受阻。据谢家人讲，出事后，一位好心目击者悄悄地把肇事车车号刻在了墙上。谢家人多方打听，终于在小区内找到了这位目击者，并送去礼物表示谢意。可第二天早上，夫妇二人来到谢家把礼物送回，两人一进屋，就哭着央求：“我们搬到这里才4个月，不了解情况。我们现在就卖房搬家，这件事我们不想参与了，就饶了我们吧！有我们作证，你们家的问题可能会解决，但我们还有孩子，若过个一年半载的，孩子被人捅一刀怎么办？”

据了解，老人夫妇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与很多老邻居关系不错。但事发后，以前熟悉的邻居见到谢家人，都低头走过。有人想到谢家来看看却没胆量，只能打个电话。他们都怕会惹上麻烦。

实事求是而言，对于目击者不愿出面作证的现象不能片面谴责。我国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够。目前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可以说形同虚设，属于法律空白。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都有责任保护证人，但对职责规定不明确，而散见于一些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也很难对证人起到保护作用。由此看来，对见义勇为和举报者实行严格的保全制度才是矫正社会恐惧情结的有效途径。

仅有保全制度也是不完全的。人的行为总是带有趋利避害的性质，就是从自保的角度，社会也应该实行更为有效的奖惩制度。人的行为模式表明：由于需要与诱因的共同作用，人才产生相应的动机并推动行为产生，而行为的后果对后继行为的产生有相反的效能，在行为后果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行为会衰减或终止（负强化）；在行为后果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行为会继续或增加（正强化）。毋庸置疑，强化奖惩力度是矫正社会心理障碍的有效途径。

多家报纸都曾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杭州市纪委、市林业局等部门召开表彰重奖会。会上宣读了对杭州钱塘江防洪大堤“烂泥工程”的举报人沈先生通报表彰并予以奖励的决定，当场奖给沈先生1万元奖金……

一个普通的举报人，受此“隆重表彰”并被“昭示天下”，说明此事定不是那“狗咬人”的寻常事。这个因为举报丢了饭碗毁了事业的倒霉鬼，在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副市长的手中接过奖状和沉甸甸的大红纸封时，笑得很尴尬、很艰难、很勉

强。他的笑充其量只是苦笑。

苦笑之一：讲真话为什么这样难？沈先生发现“烂泥工程”后，向杭州6家“有关部门”举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在举报信上均署上了真名实姓；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私，他用10万元作抵押。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举报石沉大海。后来虽然被“召见”，但这些部门领导关心的却不是举报的内容，而是责问举报人“究竟是为了什么”。甚至连某纪委的领导都说：“告来告去，材料还是都到这里，费那事干什么？”

再后来，沈先生还受到了“当心脑袋”“汽车撞死你”的恐吓。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翻身解放要抛头颅洒热血冒生命之险，而今当家做主几十年了，为了揭露一桩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居然也要像当年揭竿起义的革命者一样搭上身家性命，也要拿出“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来，这是当初只想“不愧对子孙”的沈先生始料不及的。面对这些曾经对他发难现在又发奖给他的“有关部门”，沈先生除了苦笑，还能怎样？

苦笑之二：良民何以成了刁民？沈先生也是搞工程承包的，但他自从举报以来就丢了饭碗，就没接到业务。即使在他成了新闻人物被“昭示天下”之后，也依然是“孤家寡人”。按理说，如此有良心又有责任心的人，应是各工程单位求之若渴、求之不得的人，可现实是他没有业务。这不由得让人生疑：难道所有的工程都有“猫腻”不成？

举报“烂泥工程”后遭恐吓，被迫东躲西藏的沈先生，一次在一位记者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市江干区信访接待室，那里的一位同志听了他的反映后劝说沈先生：“现在的举报人最后都是这个下场，举报是有风险的。”“举报人最后都是这个下场”，这句不大好听的话出自一位政府信访人员之口，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不能轻易责怪其“危言耸听”（信访工作人员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否恰当，则另当别论）。

举报也应归为“见义勇为”类。我国各地均设立了“见义勇为奖”。遗憾的是，这类奖励基本上未发挥作用，有关部门能不反思？新加坡为了鼓励见义勇为设立了“神勇基金”，最高奖励为80万新加坡币，约合人民币160万元。如果我国实行这类基金，情况会如何呢？在如此高昂的见义勇为的氛围中，还有多少“过街老鼠”敢于现身呢？

一方面切实颁发“见义勇为”奖，另一方面增设“见死不救罪”，那些纯粹的令人心寒的“看客”应该也会挽袖上前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通过各种制度建设，既降低见义勇为的成本又增加其利益，即减少投入增加产出，见义勇为的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才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在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运行后，国人的恐惧情结必然大为降低。

24

从唐骏的“学历门”说起——素质偏差

“野鸡大学”应运而生

2010年的热门新闻之一当属唐骏的学历造假事件了。名声赫赫、炙手可热的“打工皇帝”竟然也陷入“学历门”，真不可思议，但其实也很正常。这里说的“造假”仅指“野鸡学校”而言，包括被人称为“圣殿”的美国均有此类学校——听不听课无所谓（有的甚至连教室都没有），交钱即可领文凭。如果加上纯粹造假，即伪造证件的，可以说，持假文凭在世上混，甚至混得还不错的大有人在。为何学历造假？当今社会是个只认学历的社会，就连招管道工都注明要大专以上的文凭，不造假行吗？更何况，文凭高低与位子、票子直接相关，博士文凭就相当于副教授，如果是海归博士，就更不得了，不仅相当于教授，其享受的待遇也绝不是那些头发老白、熬了几十年的老先生们可比的，能不趋之若鹜吗？

社会发展状况取决于人的素质，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阻碍社会发展的心理素质我们称为社会心理障碍。如我们在前阐述的认知障碍、情感障碍、意向障碍还有人格障碍。本章阐述的素质偏差亦属认知障碍，其含义为，对人才素质的错误判断，在今天即表现为学历至上。出于对学历，对名牌大学的追求，我们的学生、家长、教师、领导包括众多公务员共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轰轰烈烈的荒唐剧。

文凭不过是一种证明，只能证明你受过几年教育。可如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凭成了万能通行证。

如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这张“通行证”。没有这张“通行证”，你就是身怀撒豆成兵的绝技也没人理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就报道过，广东2002年全省招聘司法干部时，梅州地区的考试状元竟然被拒之门外，原因是他的文凭无效（远程教育项目尚未备案）。广东招聘司法干部的笔试题绝不会像普法考试这么简

单，如果能把这些题答好，考出梅州第一来，他的考试水平一定要超出学法学的大学生的水平，对这样的人才，应特殊对待。若按学历要求，叶圣陶则无法获得教育家的称号，毛泽东也不该是思想家，因为他们连大专的文凭也没有！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洋人学一学，《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招聘广告上，只有2%要求硕士，4%要求学士，其余都没有学历要求，只要求某项工作你能不能干。

文凭虽是学历的证明，但不该让人们去为文凭服务。如果我们各行各业都以本事论英雄，谁还去讨弄那个假文凭？假文凭泛滥，就是因为唯文凭是举而不是唯才是举。

我们一方面广开教育渠道，倡导素质教育，一方面又唯文凭论。这正像自己上边用嘴吹起气球，下边又用针扎眼，刚鼓吹完了，就放气。这到底是在嘲弄自己，还是在欺骗自己？

眼下，大学博士热已“登峰造极”。在某些高校里，连保卫处长、膳食科长，都是博士。

如今的博士生培养犹如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完全是规模化大生产。南方某高校一位博导一次便招收了30名博士生，加上上两届所招人数，他同时指导的博士生60余人。一位老师同时教60名小学生尚有困难，何况是同时教60余名博士？

生活中常闻“公仆”傍大款等说法，其实，在学术殿堂里，这一切只不过变了个花样罢了。某些高校，某些博导热衷于招收大型国有企业的头头“攻博”。有的高校甚至明码标价，只要企业肯出学校标定的价格，便招该企业的头头为博士生。由于博士吃香，不少人便挖空心思“考博”，于是便出现了一些奇闻。某人本科读的是英语，硕士读的是法律，而博士读的是经济。是他智力、精力超群吗？非也。他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各种关系与背景。“考博”过程中的猫腻与“攻博”过程中的弄虚作假都是“博士热”的直接产物。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只重名号，不辨货色。这与当今官场的掺水浮夸等腐败行为如出一辙。

如今爆炒博士的“理论基础”是，凡事只有博士能，其他皆为下品，如一些高校出台了此类政策：凡无博士学位者申报高级职称与科研项目时一概免谈。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如果王选、袁隆平晚生若干年，便当不上教授，中国的激光照排系统和领先于国际水平的杂交水稻便无法作为科研项目而获准立项，因为他们的科研和学术水平早就被当今的唯博士论者一棍子打死了。

中国的学位制度是从西方学来的。在欧美各大学里，决非“唯博士是举”，而是唯才是举。职称、科研项目的评审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膳食科长等职务非博士莫属之类的事在欧美大学里只能是黑色幽默。

如今的高校及一些部门之所以爆炒博士，就在于他们要用博士人数为本校、本

单位装潢门面，同时也为应付上级部门的考核、评审做准备。

博士炒热了，博士增多了，难道我们的大学科研教学水平就随之上升了吗？

大学“爆炒博士”方兴未艾，官场也急迫跟进，博士从政已经成为新的热点。从政当然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在书房里坐惯了冷板凳的博士们，到地方上挂职头衔往往都高得吓人。因此，多数从来没有享受过高官待遇的书生们是非常热衷于从政的。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真正能够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己专长的，往往还是自己的专业。

把学术精英拉来做一次集体的官场秀，实在是一件丑陋的事情！如果博士们真的想要做官，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行公平竞争，扭扭捏捏跑出来成何体统？让知识分子参与官场秀，这种做法不仅败坏了大学平静的教学和研究氛围，而且有违背录用公务员之初衷的嫌疑。

大凡是国内的事情，总有跟着“一股风上”的习惯，这是一种缺乏甄别能力和独立意识的坏习惯。博士从政也是如此。当大批的优秀人才流向官场，当大批的知识分子通过与地方官员的关系网捞到晋升之阶和经商的便利与背景的时候，我们的高校和官场便让人多了一份担忧。

新华社曾引述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副院长的话，披露了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领导干部谋取高学历文凭现象后的内幕。虽然现在学校的分数线一降再降，但仍然有人希望不参加考试就进门，进门后，这些“干部学生”课也不来上，考试让人代考，论文靠挂名，答辩打招呼，还有的则通过上级部门打电话、批条子，要求在考试、论文答辩等环节放一马。一名曾给学校批过项目的部门头儿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花20万元帮他搞一个真的博士文凭。

这种靠权力或金钱获得的高学历文凭，被称之为是“真的假文凭”，即这种文凭虽然是从正规程序得到的，但文凭拥有者却没有经过正规的入学考试，没写过毕业论文，只是报个名，按要求交钱，钱交够了就毕业获得文凭。

为什么现在领导干部们热衷于谋取硕士、博士等高学历，并且有不少领导干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也要谋得一张“真的假文凭”？

显而易见，就是因为现在高学历文凭得到社会的重用，尤其是现在选拔干部非常讲究学历的高低。任用干部看文凭，本来是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种体现，但是，一些地方和个别领导，对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视人才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把重视学识，简单地等同于重视学历，又把学历简单地等同于文凭，到最后，就变成了文凭就是水平。这种唯文凭是论的倾向，其实是一种不合理不科学的“人才高消费”。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在党委、政府班子人员中必须要有某某学历的成员若干，在几年之内，党委、政府班子人员中的领导都要达到某某学历以上。民间“总结”出来的干部任用的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确实比较

“实在”地说明了文凭在一个人仕途升迁中的“重要性”。因为文凭是一个“硬杠杠”，文凭的走红便“顺理成章”了。然而，要一下子获得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高学历，不像喊几句口号那么容易，于是，那些动机不纯的人，不择手段地骗文凭、买文凭，乃至伪造文凭，“权学交易”或“钱学交易”等腐败现象也便不可避免地蔓延、泛滥开来。可以说，“学历腐败”是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腐败新品种。

说是学历腐败，恐怕教学双方都不同意。学校可能会说，这是教育改革，是在探索一条在职教育的新路子，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尽量多的高素质人才；地方政府可能会说，这是在职教育，是为了提高干部素质，培养更多的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诚然，这些理由很充分，然而恰恰是这种堂皇的理由掩盖着正在发生着的学历腐败。降低招生标准，降低对学生的要求，并非教育事业的改革，而是教育事业的耻辱。若干名牌大学办的“硕士研究生课程高级进修班或研修班”，降低入学标准，压缩课程门类与课时，把正规授课改为讲座、讨论式授课，用课后写文章代替考试。一些学校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研究生班，甚至主动放低标准，只要有大专学历就可以报名。近几年，一些官员、企业家还纷纷申请当“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现在，一些官员、企业家已经成了高等院校教授、博士生导师，甚至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了。长此以往，在权和钱的作用下，会不会有官员、企业家兼职的院士和大学校长，就很难说了。如果把这些都称为“教育改革”，那可真是“中国特色”。说白了，这些硕士研究生教学点，不过是高等院校中某些部门的主要创收源而已。

如果真是教育改革，如果真是在职教育，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干。其一，凭大学文凭验明正身后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其二，读研的经费应当自理。绝不能以干部培训的名义，用纳税人的钱让他们去为升官镀金。公费读研、公车来往、公费住宿乃至公费请客送礼，干部个人增加知识的读研学习如此“零成本”和“零风险”，分明是学院腐败和官场腐败的杂交新品种，现行的干部培训制度，应当进行改革。

由于唯学历是举，唯博士是举，导致我国涌现出一支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下面是记者张立勤采访的几例，刊载于2001年2月7日《中国青年报》。在声名赫赫的名牌大学围墙外，在寻常巷陌的大杂院、小平房甚至破败荒凉的北京巴沟村，聚居着一群年轻而心怀梦想的人，一年又一年，如鸵鸟般孜孜行走在象牙塔的一隅。他们管自己叫“考研专业户”。

这个面色苍白的姓黄的土家族年轻人，两年前毅然辞去工作奔向京城，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他要用知识重新锻造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拿下硕士帽，牌子越硬越好，他要用这个撞开那些令人艳羡的名企高职的大门。两年过去了，然而……

“考研是智慧、毅力和财力的竞争，顶不住压力就是全线崩溃。今年再考不上

的话，明年可能就不考了……”他盯着地面，低声说。

不考的话，他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经济、前途……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可能再回原单位，到外面去闯，他凭什么？谁都知道，那些装在脑子里的应试知识在现实中毫无用武之地！

他现在经常怀疑自己，问自己这样没日没夜地复习考研是对是错？结果没有答案。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否定自己等于承认这么多年莫名其妙地把青春花在一件错事上。

“很多次我在心里大叫：我要死了！我要发疯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可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我还活得好好的，还得打起精神面对这一切。真的冷静下来就想，付出了这么多，放弃了那么多，我现在还什么都没有，血本无归，不是太亏了吗？我怎么甘心，怎么甘心！”他看上去痛不欲生，又疲惫不堪。

见到张磊的时候，是在暮色中北京师范大学门外的小平房地带。那儿也是考研的“老巢”，8个人一屋，上下铺，像学生宿舍，脏兮兮的水泥地上蟑螂窜来窜去。

“说起这几年的考研经历，我只有两个字：辛酸。”一谈起考研，他的眼神立马黯淡了。笔者这才注意到，他的额头竟爬上了细细密密的皱纹。

“精神上的摧残太大了！心理压力太大！我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就喝咖啡……早晨还得起来看书。从21岁考到26岁，头发大把大把掉，觉得自己真老了……”

“有时候我也想，我是不是太偏激？非得一条道走到黑？我考的是哲学，辩证法也懂得一套一套的，怎么就过不了自己心上的那个坎儿？以前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爱说爱笑，朋友一大堆，现在不知怎么着，不愿和人交往，变得爱挑自个儿毛病了，什么都收到心里了。也许自己真的是变了。

“眼瞅着那些黄毛丫头都窜到我头上去了，我能服气吗？业务能力还没我强呢，不就是文凭硬点吗？每次听人评价，总说小伙子人不错，就是学历低了点。我听着就不是滋味儿，总觉比别人矮半截。那时北京到处都在考，不是考托福、考GRE就是考研。我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实现从大专生到研究生的飞跃呢？就那么个纸片儿，可是块‘敲门砖’哪！走哪儿人家都认。

“可考研真不好玩！有人说考研是条贼船，上去了就下不来了。现在大家都在算考研成本，比如这个大师的辅导班是200元，那个名家的串讲班是300元，每年还水涨船高呢；复习资料越来越贵，还有吃呀住呀的，一年不花个七八千到一万多元能撑得下来吗？我听说有哥儿们干脆向朋友借钱考研，这投入产出比他也算过，一旦上了研，特别是热门专业，那还不立马来个咸鱼翻身吗？他还管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可他们有没有算算精神损失费？时间、金钱、爱情，全搭进去了，输了个精光，什么感觉？再玩一次吧！可怕的是那种失败感，像滚雪球，越滚越大……我越来越

越有种感觉，如果这辈子我考不上研，这种失败的阴影会笼罩我一辈子！即使干别的，我也不会成功。我一定要证明自己不是失败的！这已成了我身上的一个结了。

“这个社会，能力需要学历来证明，学历能为能力的施展提供‘敲门砖’，我就缺那么一块‘敲门砖’哪！为什么就那么难？我的心态是不是有点扭曲？”

他哈哈笑起来，自嘲、凄怆。“假如这次又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现在不想考不上，我一定行！”但这种激昂中透着股莫名的虚弱和倦意。

“我是谁？我是‘考研大仙’，想和你聊聊，喂，怎么不给我回伊妹儿呀？”电话那头一个低沉的男声说。

笔者的耳朵立马竖了起来。没想到在网上随意发出的E-mail竟然有了回声。

这个俨然成仙得道的声音来自西安，声音的主人叫高某。从北京某理工大学毕业后就过上了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家里那间几平方米的书房里整整待了4年，就为了一个目标：考研。平时他连楼都不下，一年四季能说得上话的只有包括爸妈在内的六七个人。然而隐士生活换来的依然是年复一年的败局，去年他预感到可能会有转机，分数终于下来了，总分超过分数线三十多分，但是高等数学却差了4分！他又一次感受到命运无情的嘲弄——

“现在社会太看重学历了！前一阵西安有个招聘会，我去逛了逛。那些公司的老总对本科生挑三拣四，一听说是研究生，哎哟，那眼神立马就不一样了。考上了研就是个机会呀！我还年轻，25岁，不甘心这么平平静静过一辈子，人要有志气！”

高峻继续侃侃而谈，语气越来越激烈——

“现在的考研就是叫人死读书，今年背的明年就忘了，真没办法！考的和用的是两个系统，如果没考上，等于白学。英语、数学和政治这些基础课很多都是看你的死记功夫。像什么公式、时事文件，我们这些考研的奉若神明地背题，虔诚得不得了。咱们中国真是‘考试之乡’啊，我们整天埋头做阅读理解、完形填空，可一碰上老外连话都不会说。悲哀啊！”

……

可怜的考研大军，你们就别叫苦连天了。在你们下面，还有一支更为浩荡的高考大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在为名牌大学的文凭咬牙奋斗了，特别是高中那没日没夜的学习啊，你们也是尝过的，那使人崩溃的压力甚至使人弑母，这可是千古悲剧啊！

徐力的榔头砸向母亲

高考带给学生们的压力世人皆知。重庆市沙坪坝某中学高三学生徐俊（化名）因不满母亲的施压，以书面形式罗列出了母亲的“8宗罪”：（1）攀比成绩之风

严重，把同事的孩子与我进行对比；（2）喜欢唠叨，用口头禅施加压力如“前途就看这一年了”“要为父母争口气”等；（3）每个找我的电话都要彻底盘查，干扰我的正常生活；（4）过分关心，每次吃饭都详细配菜，并强行规定吃水果喝牛奶；（5）监视我的学习，趁给我送水果牛奶进房时检查我是否在学习；（6）要求过高，必须上名牌大学；（7）请家教上辅导班、买辅导书；（8）每次测验都要详细询问成绩、排名。

平心而言，中国绝大多数母亲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子女的。但可怕的是父母因向孩子施压而被孩子杀害的。

当然轰动全国的要属浙江金华的徐力弑母案（该案发生于2000年1月17日）。从他在金华市公安局看守所内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记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高考学生的压力及其内心世界。

记者（以下简称记）：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吗？

徐力（以下简称徐）：当时，我和母亲吃过中午饭以后，我母亲洗完碗就到我的房间里把电视打开，然后转身去在那儿绣花。我吃完以后，就在那儿复习。我又削了一个苹果，走到房间里去，边看电视边吃。母亲就开始责备我，我期中考试只考了第18名，告诉我期末必须考进前10名，否则自己看着办。然后，母亲语气强硬地说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你也没关系。再加上她自己又非常伤心，她说我的成绩总让她不满意，再加上她单位里的事情和朋友的事情，她觉得自己活在世上非常累。我当时脑子里就开始发昏，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想到学校去，走到鞋柜那里就看见放在那里的榔头，当时脑子里就产生一个念头，把榔头拿起装进了袋子里，走进了房间，又看见母亲眼里挂着泪水，表情又很凶，我心里就非常害怕。怕看到母亲难过，我当时念头更强烈了，把母亲打昏，我俩都可以得到解脱，我当时就打下去了。

记：你第一榔头砸下去的时候，砸在你母亲什么位置？

徐：后脑勺。

记：她有什么反应？

徐：她问我干什么？

记：她没有回头吗？

徐：当时，侧面回过来。

记：你看见你母亲的眼睛没有？

徐：我看见一点。

记：她是什么眼神？

徐：非常害怕、吃惊。

记：接下来呢？

徐：我发现我母亲还没有昏过去，我就砸。

记：发现你母亲死了之后，你做了什么？

徐：我就把母亲放到箱子里去了，再把地上的血用拖把拖掉，把床单放在自己床的床底下。墙上面有几点血迹，我用剪刀把它刮掉了。

记：接下来呢？

徐：我就把裤子换了一下，再打个电话给她单位里，就说母亲生病了，下午不来。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记：你在毁灭现场的同时，你在想什么？

徐：我就想自己快点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

记：平常就是你跟母亲两人在家吗？

徐：我父亲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

记：每个星期父亲回来一次，你们家里是怎么团聚呢？

徐：一家人一起吃饭，坐在一起看电视。

记：谈话内容都谈些什么呢？

徐：一般时候很少三个人一起谈话，要么是我和父亲，或我父亲和母亲。基本上以我的学习为主要内容，他们总为我的学习而吵架。我们很少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各管各的事情。我和我母亲、父亲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母亲觉得父亲是初中生，和父亲说他也不懂，不太和我父亲交流。

记：这些是你自己观察，还是你母亲跟你说过？

徐：我母亲是个大学生，而父亲只是个初中生，她就觉得当时嫁给我父亲比较委屈，她的其他同学过得都比她好一点，她觉得她应该和她的同学一样。

记：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母亲过得不幸福？

徐：因为她的烦恼比一般人多，对我期望太高了。当我达不到她的期望时，她就非常难过。她总是把我放在自己的心里，再加上她觉得自己每天都是省吃俭用，把什么好东西都给我，自己过得不太好。

记：对比别的同学家庭，你有自卑感吗？

徐：自卑感是有一点。

记：有没有想过邀同学到家里玩？

徐：没有。

记：为什么？

徐：不想让别人过多地了解我自己家里，我母亲在家时，有些话又不能随便说，有一种束缚感。

记：从来没有同学去过你家吗？

徐：去是去过，很少。有时候我到同学家里去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走到一旁，

自己做自己的事，让我们有空间聊天。而我母亲却每次都坐在旁边，不肯走开。她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有时候说我要跟同学讲讲话，你过去吧。她就会说有什么话我不能听的，不肯走。同学也不太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这样就不太好沟通。有些话，稍微谈到外面的话题，我母亲就会等同学走了以后说我。

记：很多人告诉我，你母亲非常关心你。你们平常的关系，在外人看来也非常不错。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徐：生活上她对我比较关心，特别是吃的方面，她总是安排得非常好。

记：能跟我说说你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吗？

徐：从上学开始，母亲就让我考试要在97分以上。期末考试如果没有95分，她就要打我了。有时候作业得了3分（5分最高），再差点得2分时，母亲就会把我拖到老师家里去，问问原因。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觉得我母亲这样对我要求太严了。

记：你母亲经常打你吗？

徐：考试考不好就打。大考考不好就打，小考考不好就骂几句。

记：怎么打你？

徐：木棍、皮带。

记：你心里怎么想呢？

徐：比较委屈。觉得这么大的人了，还被母亲打。有时候我自己明明没有错，自己已尽力了，但是她还是不能理解。觉得我就是不能低于前十名，当时就觉得压力非常大，觉得自己好像总是为学习而学习。学习就没有什么快乐，也没有什么乐趣。

记：尝试过和你母亲沟通吗？

徐：尝试过。有些事情想法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如果成绩不好，我自己会找原因，可以坐下来慢慢谈，不要动不动就发火。但是母亲认为，我就是应该听她的，不可以反抗，不能对她不尊敬。什么事都应该听她的，自己不能有主张。

记：在你的一篇随笔《摆钟》里面这样写道，“说起我的生活来，可谓单调极了。每天就像钟一样，从家里摆到学校，再从学校摆到家里。就在这无数次的摆动中逐渐形成了我的性格。”你认为你的性格是单调的吗？

徐：比较单调，觉得自己的性情有点古怪，长时间只知道学习，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学习。每天的世界就是学校和家里，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

记：别的同学呢？

徐：别的同学有的和我一样，有些同学过得就比较丰富，电脑、杂志啊，他们的父母亲都允许他们看，让他们玩。

记：你在你们同学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徐：因我不太喜欢主动和别人打交道，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和他们讲，在有些同

学眼里就有点内向。我母亲报纸也很少让我看，杂志就更不可能。我买足球杂志也遭到她的反对，她觉得不应该让我接受外面的事物。

记：你所指的外面的事情是哪些事情？举几个例子好吗？

徐：电脑方面，一些新的东西，我都没什么时间去看。回家的路上和同学在一起，他们有时讲有趣的话题，我在旁边听，就觉得自己能接受外面的一些思想，觉得这样自己就不会太落后于时代，跟上时代潮流。

记：我在你的一篇作文里发现有一段话：“这一代青年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富有色彩、但也是最纷繁复杂的时代，目睹这一切，要想让年轻人由衷地感到青春的美丽确非易事，要想让青年人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牢牢把握住前进的方向，时刻把自己的追求与祖国人民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就更难了。”你还记得写过这段话吗？

徐：有点印象。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还是以学习为主，好像自己要追求其他方面的生活比较少，觉得我们青年人自己有的时间比较少。

记：在你的眼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徐：竞争非常激烈，必须要努力学习，以后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记：你母亲给你设计的前途是什么样的前途？

徐：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

记：你母亲这种想法你能不能接受呢？

徐：不太能接受。

记：为什么呢？

徐：我自己的能力不能把我定性在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我觉得在我们四中能考上这两所大学根本是不大可能的，浙江大学也不是很多，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用心，但也考不上名气这么大的学校。

记：你对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有一种恐惧？

徐：有点恐惧，我觉得自己万一考试失误，就会成为一个废人了。考不上名牌大学，就一点用处没有了。

记：现实生活中不是仍有不少没有文凭、没有学历的人同样生活得好好的吗？

徐：但我父母不能够目睹这些，他们觉得只有考大学才有出路。他们常说只给我一次机会，第二年再参加考试根本就不行。我考不上，他们就不要我，就叫我自己出去生活，他们都不会理我了。

英文字母有多少画？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团长写了一份长达3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四段文字：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掉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

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最后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部分，也有四段文字：

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

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

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

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们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百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天赋。中国的学校只承认一种，那就是把课堂上灌输给他们的知识写在试卷上的天赋；美国的学校则承认孩子各有各的天赋，并且在教育中让他们竭力张扬他们的天赋。

与先进国家的教育相比，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只注意灌输知识，然后在高

考、考研中层层进行淘汰，逼着学生死记硬背一大堆考完就无用的知识。在教育界的权威人士看来，学历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智力，智力就是素质——“知识就是力量”嘛！这是一种典型的素质偏差。

诚然，学生在学校也可以学到许多工作上有用的知识，但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往往剑出偏锋，出一些看似高明实则愚蠢的试题诱使学生钻入死胡同。李岚清同志在郑州考察时就怒斥过某个学校英语考试要求学生回答“英文字母有多少画”。

外语特别是英语学习耗费了学生极大的精力，结果呢？按前述那位考研大学生的话：“学了十几年，连与外国人对话都不行！”中国最重视的是语数外，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到底是何种现状呢？张心阳同志有篇文章颇为生动，兹摘录如下：

看过初中三年级的女儿的语文作业，我禁不住恼了。如今的一些教育内容，不是教导学生掌握知识、开启智慧之门，而是搞歪门邪道，教人如何同垃圾知识搏斗。

口说无凭，让我从厚厚的题集中随手挑两个例子，有一道题还是某地的中考题：

其一，贾平凹的《读书示小妹十八岁生日书》有这样一段文字：“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满是书籍，却常读过十不能记下四五，这全是年龄所致也。”出的题目是：这段话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这句俗语是什么？其中的两个字形相同音不同，请写出这句俗语。

其二，《人类需要梦想者》一文讲述的是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不图私利的品德，其中有这样一段，美国记者到居里夫人实验室采访，居里夫人说出了世界上每一零星镭的所在地，记者问：“法国有多少呢？”“我的实验室只有一克。”“你只有一克吗？”“我一点也没有。”题目要求从下面四句话中挑一句填入横线处。这四句话是：A.这一克是属于人类科学事业的。B.这一克是属于法国的。C.这一克是属于实验室的。D.这一克是属于比埃尔居里和我的。

上述两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专门找了所在单位里的五个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回答。第一题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第二题五人答A，两人答B。你觉得他们应该得多少分呢？评判为0分。

我不想在答案上纠缠，我要说的是，贾平凹的原文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俗语去替代呢？如果我们教人写文章不是鼓励用自己的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而是如何用成语、俗语、套语，大家千篇一律，这样的文章还能看吗？天下文章因各具特色而丰富多彩。陆游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一个鲜活的句子硬教人改成一句俗语，不是故意要人“参死句”吗？第二题的标准答案是C。可无论是依据全文的主旨，还是我们一向对孩子们进行的所谓思想教育，回答A才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可是这一回却偏偏不是这样，这除了让人去蒙还能说明什么？话说回

来，回答A到底又有什么错？我们说出土一尊青铜鼎，发现一块动物化石，都属于全人类，全世界仅有的几克且正在进行科学研究中的稀有物质，怎么不可说属于人类科学事业呢？如果不是，“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

我们的语文教育成了这个样子，真让人愤怒又伤悲。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并不是好好培养人才，而是为考试服务，以考住学生，拉开分数档次为目的，至于学习考试的内容是不是与真理常理相违背，是不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是不是有助于开启和拓展学生的智慧和思维，是不是为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素质基础，似乎不在一些教育者的考虑之列。

语文教学如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数学呢？据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但是孩子们为此付出的是沉重的代价。调查显示，中国的中学生在学校用来做数学题的时间是每周307分钟，而其他国家孩子学数学的时间仅为217分钟；中国学生回家后还要花4个多小时的时间对付数学题，而其他国家孩子在家里学数学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令人痛心的是，中国学生为这个“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有14.9%。教育专家大声疾呼：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不是计算器，而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在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

孩子们的想象力到哪里去了？被应试教育压抑住了。社会的进步，是需要想象力的。没有想象力，就不会有飞机、轮船、汽车，不会有牛顿定律、相对论。因此，发达国家十分注重想象力的培养。美国有这么一篇小学生作文：“有几个小男孩，到郊外去玩，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只蛋，有的说是蛇蛋，有的说是鸟蛋，争论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蛋拿回去放到烧烤箱中去孵……蛋壳快破了，大家紧张地盯着看，哈，蛋里孵出的是里根总统！”这篇作文被推荐到全国性的报上登载，被广泛地推崇。

某校出了这样一道高考历史复习题：“香港回归后彭定康的心态如何？”这是历史题吗？该校历史教研室的老师一致肯定，“当然是，彭定康是历史人物”。那么为什么历史课不分析秦始皇的心态呢？这道题有标准答案吗？如果有，依据是什么？说到历史考试，碰巧手中还有一篇张寿卿同志的短文：

我儿子正在读高二，考了一道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哪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第二问儿子答不出来。我帮他查找资料，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是打到现在的匈牙利附近。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发现美国世界史这道题不是这样考的。它的题目是这样的：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

有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洲去，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但是600多年前，黑死病在欧洲猖獗的时候，谁晓得这个叫做鼠疫？如果没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没有死亡，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荷兰等国就不会强大，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不够强大，意大利不够强大，盎格鲁—撒克逊会提早200年强大，日耳曼会控制中欧，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

教师一看，说：很棒，分析得好。大笔一挥A！其实这种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都要思考。

不久前，我去了趟日本。由于日本总是同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产生纠葛，所以我在日本很注意高中生的教科书。他们的教师给高中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在7至8世纪年打了一次仗，19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

其中有个高中生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回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我们的油轮就得统统走右边，走基隆和高雄的右边。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我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是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我们的货轮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我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按照判断，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对华抗战的准备。

其他学生的判断，也都认为中国跟日本的摩擦，会从东海开始，从台湾海峡开始，时间判断是2015年至2020年之间。

这种题目和答案都太可怕了。撇开政治因素来看这道题，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很有问题。翻开我们的教科书，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每个学生都努力答题。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什么时候割让辽东半岛，什么时候丢了台湾岛、澎湖列岛，赔偿2万万银

两。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背得滚瓜烂熟，都是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数字。那又怎么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可能会怎样！

中国应试教育就是知识灌输，特点就是灌输、灌输、再灌输。在填鸭式的灌输过程中，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甚至接受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垃圾知识，从而被扼杀了可贵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给人的感觉——中国教育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再反思，就来不及了！

中日学生的较量

我国的素质偏差模式，即学历—知识—智力—素质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其中也有家庭教育的助推作用。家庭教育重学历、重知识、重智力的偏差在独生子女的条件下，出于溺爱更容易表现出重智轻德、重智轻劳的趋向。我国一批教育工作者曾历时半年，足迹遍布14个省市，通过回收6 200多张问卷发现，在“哪些表现使父母最高兴”这一问题的选择中，78%以上为“考了好分数”及“比赛获了奖”，而“做家务劳动”和“在学校做好事”占的比例仅有9%。

安徽省合肥市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家庭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的意识日渐淡薄，已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在被调查的674名学生家长中，有42.3%的家长认为，只要能保证升学，一切劳动都可撇开。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87位父亲中有39位认为“学习是头等大事，至于劳动是其次的”；63位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中，有40位称“只要孩子学习搞好了，累死也由我担着”；162位高中文化程度的父亲中，有65位父亲认为“劳动可有可无”；386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家长中，有219位说“正是因为我自己是体力劳动者，所以拼命也得让孩子‘登龙门’”；39位文盲父亲中，有30位认为“老子流汗吃苦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只要孩子学习跟上了，不让老的操心，拼老命老子也心甘情愿”。

下面是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镜头。

镜头一：在麦当劳或肯德基餐厅的一隅，一个男孩或女孩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汉堡包或者啃着鸡腿，旁若无人。母亲或者父亲在旁默默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沉浸在孩子快快长大的梦想之中。尽管口水早已在嘴中翻江倒海，但他或她的角色却经常只是个陪客。在这儿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陪吃。

镜头二：每天早晨、中午和傍晚，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在上演像当年八路军进城时的热烈相迎的盛大场面，无论是寒风肆虐的冬天还是酷暑难当的夏天。一个个掉了门牙的老人拉着自己小孙子（女）的手；一个个步履匆匆尚未睡醒的男人或女人带着自己依然睡眼惺忪的孩子；一个个小心翼翼的“现代远征军”

（保姆）紧抓着小主人衣服的一角……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护送和相迎这些小祖宗们上学放学。一个美国人路过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所小学，只见该校门口黑压压地站着很多人，于是就问：“他们都在干什么？”“在接孩子。”人们不假思索地说。“接孩子？”老外一脸困惑。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姑且把它叫做陪行吧。

镜头三：夜晚，窗门紧闭。台灯下，孩子们伏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父母在一旁坐着，或是举头望明月（监视），或是低头思故乡（瞌睡）。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兢兢业业地扮演着陪读角色。

镜头四：周末是人们放松身心的法定时段，是人类留给自己生命难得的喘息时间。西方人把周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个人时间。然而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每个周末，你都可以看到无数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奔赴各种战场：钢琴班、提琴班、舞蹈班、书法班、围棋班、英语班、作文班等。教室里，孩子们继续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劳作，而父母们呢？却在学校门口呼吸污浊空气的同时，幻想着从孩子的琴声中飘出帕尔曼式的悠扬与激情。这就叫做：陪练。

镜头五：中国有一个奇观，那就是每年各大学开学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一群比自己父母长得高大的“大男孩”和“小姑娘”们伫立在一边，而他们的父母却气喘吁吁地为其办理着种种入学手续。这些父母就像仆人一样侍候着他们的主人，而这些主人们却不时地板着脸，嫌弃动作已经不太利索的父母们。

德国社会学家比克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民族间的较量实际上是母亲们的较量。与其他国家的家庭教育相比，我们真的应为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担忧，为我们未来的社会发展担忧。

为了培养学生从小具有顽强坚韧的意志和健壮的体质，日本教育界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艰苦教育。日本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推行了一种“上山下乡”“土留学”活动，即让学生到生活条件差的岛屿、农村、山寨去，接受艰苦劳动的磨炼。许多城市的中小学生兴致勃勃地来到边远山寨。在一个月的“土留学”期间，他们有3周时间在农户家中，与农村孩子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另一周时间则在老师和农民合办的“留学中心”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

每天早晨，天刚刚亮，参加“土留学”的学生就赶紧起床，自己动手做早饭，饭后马上同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有的喂牲口，有的送粪，有的担水做家务。通过“土留学”活动，许多学生反映“精神特别愉快”“比在城市里身体健壮”“更爱劳动了”。

澳大利亚人均收入2万澳元，人民生活较为富裕。然而，富裕的澳大利亚人却信奉：“再富也要穷孩子！”下面是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见闻。

在每年最冷的7月，几乎看不到澳大利亚孩子穿棉衣和防寒服，最多只是在

“短打扮”外面罩一套绒衣，便像无事人一般地在一早一晚的嗖嗖寒风之中走着。而一等太阳出来，便又将绒衣脱去，只穿短衣、短裤、短裙。在我们公寓楼附近有一所体操学校，每日傍晚训练结束时，常见家长陪着光头、赤脚、只穿背心短裤的孩子从学校里出来，尽管寒气袭人，但家长却毫不在意。

曾在悉尼一家妇产医院看见这样一幕：一对夫妻来做二胎产前检查，妻子进诊室面见医生去了，丈夫便带着两岁的女儿在外面大厅等候。少顷，女儿闹着要喝水，于是那父亲便在身旁的自动售货机上顺手扯了一个免费塑料纸杯，冲进厕所接了一杯自来水便递到孩子手里——那父亲不是买不到饮料，自动售货机正出售一元一杯的可口可乐和橙汁。他也不是没钱。据认识他的人说，他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主管，年薪15万。

澳大利亚人酷爱勇敢者的运动——冲浪，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父母都常带孩子去海滩。孩子们跟着父母冲浪，呛水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父母最多也只是为其拍拍背，便鼓励孩子再次下海去搏击风浪。某日到曼丽海滩散步，在远处看见一个孩子冲浪回旋时摔了跟头，我便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救人！”而正在近处晒太阳的父母见了反倒不慌不忙：“那是浅水，淹不死人……等他自己爬起来！”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校中午不放学，午餐可以在学校餐厅购买。但自己带饭的学生占大多数，一般是一瓶可乐再加一个汉堡包和一点水果，下课时随便在校园里寻一个地方坐下便将其“消灭”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到将剩余食物甩得一地的现象。如果仅从孩子们所带的食物上来，任你怎么也判断不出其家是贫还是富。

如果认为，像美国这样“海淫海盗”的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是不讲究道德教育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读者》2011年第6期有一篇《文明是从小炼就的》真值得我们一看。

美国孩子从进幼儿园大班起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坦白地说，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美国孩子在二年级以前学的文化知识少得可怜，一位数加减法做不利索的不止一两个人，但学校对学生的生活习惯培养却毫不含糊。

小家伙们入学的头几周，老师会带他们去学校的每个地方熟悉环境，教他们该如何排队，领号拿中饭，如何用厕所，如何使用图书证来借书、还书，以及乘坐校车的步骤、程序、规则，对于教室里每天的正常运作程序更是不厌其烦地再三讲解，组织学生操练。如果在我们这儿，一定会心疼：这么多时间就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了！而正是因为这番苦心，从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中，孩子们学到了许多生活常识，形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美国低年级小学生有许多手工课、画图课，他们经常把桌子上、凳子上弄得很乱很脏，但美国老师一定让他们自己清理干净，直到老师满意为止。我开始总觉

得孩子们磨磨蹭蹭还干不好，不如我手脚利索地一块儿打扫，但我的助手告诉我：

“我们从来不在孩子走后帮他们收拾，他们得收拾清理干净才能离开。上手工课往往8点45分就歇活了，然后我们会交代他们把自己的书、书包、笔等收拾好，将自己周围的地面清理干净，凳子一定在桌子下面放好，课桌按规定放好，然后在门口排好队离开教室。虽然看来他们学习的时间少了，但可以想象，每天都如此训练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不会扔下一堆垃圾不管，更不会在街上乱扔垃圾吧！”

美国学校还明文规定，孩子不许说脏话，如果说了下流话，那是要被直接送进校长室的。老师教育孩子要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鼓励，尤其是小学经常会开展围绕这类主题的课堂教学活动，将它们贯穿于阅读、数学和其他任何科目的教育过程中，真正是“寓德于学”。就我所接触的美国小学生来看，很少有谁——哪怕是最自由的高中生——会恶语相向、互相辱骂、人身攻击。老师的示范榜样作用也不可低估，美国老师可以严厉地惩罚学生，但从不允许在人格和自尊心上对学生有任何伤害和侮辱。

美国老师还告诉学生：咳嗽、打哈欠、打嗝、打喷嚏乃至放屁都必须说Excuse me（劳驾）。咳嗽、打喷嚏都必须捂住嘴，老师会告诉小学生这是为了避免细菌传染，当然也是出于礼貌。一桌孩子围在一起读书、做手工、画画，要用蜡笔或其他什么材料是绝对不允许远远地伸手去拿，而要很礼貌地请附近的小伙伴拿。老师总是鼓励孩子们说Excuse me（对不起）、Thank you（谢谢）。小学老师告诉学生：“这些是magic words（有魔力的话），用了它们，你就会得到更多帮助。”在美国书店里，关于礼貌用语和举止的书数不胜数，学生潜移默化，礼貌用语自然成了语言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孩子在长大过程中就算不经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洗礼也知道使用文明用语礼貌待人。

美国的小学老师管得很严，如果没听到学生用礼貌用语就会马上打断学生的话问：“你说Excuse me了吗？”“你忘了说Thank you了。”“你伤害了你朋友，快去说sorry，再给他一个hug（拥抱）。”如有小家伙行色匆匆，企图从老师前面溜过，老师一定逮住他：“你不能从别人的前面走过，快说Excuse me。”任何老师看到在校园内大肆奔跑的学生都会喝止住：“只许走。不要跑！”不仅是在教室里，在学校任何地方，学生都不能大声说话，必须悄声。许多有经验的低年级老师很会训练学生，他们让孩子学会辨别各种声调的说话方式，让孩子们知道：在户外操场上可以说话声音大一些，而在室内只能inside voice说，甚至whisper（低语），只要能让老师或同学听到你的声音就行了。学生声音稍大时，他们会立即制止，制止方式不仅用言语，更会随着环境使用眼神、手势等身体语言。美国教育非常注重这些，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在公共场合大声自顾自话、大声接电话都是粗鲁、不礼貌的行为。就拿上厕所来说吧，小学低年级老师一般都定好不同时间段，男女分队而

行，将孩子们一起带去上厕所。大家坐在厕所旁的过道边，依次安静地轮流如厕。等的过程中，孩子们往往还人手一本书。有时看到小家伙拎着裤子就出来而没听到冲水声，老师一定让他回去“补课”。反正一天下来，去哪儿都排队，学生排队等待的时间、次数很多。我经常会觉得这种做法纯属浪费时间，效率不高，可是这些美国孩子长大成人后不用再补“文明素质行动计划”，不需要实行“文明守则”，那么到底谁的时间用得更科学、更聪明呢？

孩子们吃饭更要排队。如果队排不整齐，老师不会带着孩子们去食堂。在食堂排队时彼此交头接耳地说话会有被请到“雅座”吃饭的危险，所以只能耐心、安静地排队，拿好牛奶、果汁及主食到规定的餐桌吃饭，学校只允许学生非常低声地说话，如果“不会小声说话，那就彻底保持安静”。小学生们吃饭的时间非常有限，中途如果出点小纰漏，搞不好一顿饭没吃完就得收拾盘子回教室上课了，但美国老师还“狠着心”说：“一顿饭不吃没关系，得让他们记住这个教训！”

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都知道进出门要注意自己的身后，从不会“砰”一声把门关上，而是自觉地给后几步的人推住门，直到后面的人走过来为止。小学生们更是以能替老师把门而自豪。

这许多日常细节正是我对美国文化教育感受最深的地方。我在教室里走动时不小心碰到了学生，学生会抢着说Sorry，学生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美国教室窗明几净，本以为是艺术美化，谁知美国教室真那么干净，孩子们可以直接在地上爬来爬去，尤其是阅读课，老师坐着摇椅，而地板上围坐一群小学生，坐姿各异，怎么舒服怎么坐，只要在听老师讲故事就成。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美国老师的较真，说一不二就把队给排直了，倘若有一两个孩子排不直，决不罢休。说好要大家非常安静地做这个活动，那么同学们就得非常安静，否则活动取消。

美国的家长对孩子也如此要求。学生在校违纪，家长被叫到学校里来往往都会向老师再三强调一句：“孩子的这种无礼行为在我家里也是决不允许的！”唯恐老师认为他没有家教。正是因为美国老师和家长对孩子从小一丝不苟的态度，严肃认真地训练他们文明礼貌习惯，才使他们长大后不会在家给父母带来耻辱、出外远游让祖国蒙羞。

我国许多报刊曾报道了77名日本孩子和30名中国孩子《夏令营中的较量》（该活动于1992年8月举办）。其中有几个情节特别值得回味。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苦不迭之时，他们背包的带子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地又说又笑起来。一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清香的内蒙古奶茶。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珠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代？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起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孙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做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天空蓝不蓝？”“蓝！”“你们还来不来？”“来！”这几声狂吼震撼了整个草原。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3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 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的，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却把水喝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时，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把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与公德心；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爱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

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炼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说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学历不代表知识，知识不代表智力，智力也不代表能力，能力也不代表素质。我们重视智商（现在学术界又提出“情商”），实际上，人才素质的核心是“德商”“性商”——“性格决定命运”。孩子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素质，通过中外比较，应该有所答案吧？

25

中国大地的“羊群效应”——模仿趋向

明年还种大蒜否？

人的心理具有“效前律”，因而社会行为就有模仿趋向。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观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都是由模仿习得的。模仿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对众人的模仿，即“随大流”。模仿特别是对众人模仿具有的社会意义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社会认识的需要，我们每个人获得的知识信息以及经验判断力都有限，往往需要参考他人的意见；另一方面是，人际适应的需要，如果我们不与他人保持一致，很可能就会成为“越轨者”而被孤立，甚至受到惩罚。

任何事物存在两面性。模仿（包括从众模仿）的社会意义也折射出了事物的另一面，即模仿既可能形成定势，特别是思维定势、观念定势，从而阻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也可由于模仿形成诸多社会消极现象。当模仿成为社会明显的行为意向时，则明显成为一种意向障碍，阻碍社会发展。下面我们通过社会现状作进一步剖析。

模仿趋向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可简单地用“羊群效应”说明：一群羊来到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另一群羊也随之而来，最后所有羊均为之渴饿而死。由羊群效应而知，“随大流”的效用尽管可以维持一时，但长此以往，大家捆在一起则难以迈步。成功的案例往往是突破模仿的藩篱，与众不同。美国富豪亚默尔原本是个贫穷的农夫，得知加州发现大金矿，他随人们一同前往。荒山野谷，气候燥热，水源稀缺。亚默尔权衡利弊，断然放弃淘金而去寻找水源，挖水引水，然后出售，仅仅几年就成了大富翁。

笔者在给研究生讲课时曾经出过一道题，去年种大白菜的人都赚了钱，今年种大白菜的也都赚了钱，你明年还种大白菜否？标准答案应该是“不一定”，但研究

生大都倾向于还种，认为是符合价值规律的。中国人一般倾向于还种，所以，2010年大蒜、绿豆、生姜价格暴涨，形成“羊群效应”，这并不奇怪，中国人特别喜欢“一窝蜂”！

影视书刊市场近几年为清宫戏垄断说明了什么？实际上，接下来的势必是“一窝蜂”，同样的题材甚至是相似的情节马上接踵而至。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想象力出现问题！身为“四大发明”的载体，我们中国人在这几千年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发明？难道说中华民族只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想象创造的民族吗？模仿趋势不衰减，我们社会发展的步伐必然蹒跚。现实便有许多值得担忧的，例如“大学城热”。大学城主要建设在郊区，占用大量农田，而大量农田流转的结果造成了大量失地的农民，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多大学城？“大”是不是就是校园之大？如果不在创新教育、培养创造能力的学子上下功夫，打造国内外的知名品牌，而仅仅在圈地扩园方面做文章，那将是一种悲哀。

大学之大，并非校园之大，首先是要有大师。大学之大，还在于他的大度能容，不搞“一言堂”，不搞“一花独放”。大学之大，亦在于对学术和知识的高度尊重，努力营造一个名家辈出，新秀脱颖，人尽其才的小环境。

当然还可以开列许多，但就是难以找到规模取胜的例证。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向国门，要跻身世界名牌榜，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教育内涵的增容，而不是外延的增量。

又如“大都市热”。据悉，如今我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然而，这一目标对其中的某些小城市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这182座城市约占全国667座城市总数的27%。

建设将近200座国际化大都市，从客观条件上讲近乎痴人说梦。众所周知，建设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首先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它不是简单地圈出多少平方米的土地，修建几条宽阔的马路，然后再拍几张国际化大都市的宣传画就成的。美国不能说不富裕吧，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也不过是把一个纽约建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而已。难道美国的芝加哥、华盛顿等著名城市就缺乏世界眼光，不想往国际化大都市靠拢？英国只有一个伦敦，法国也只有一个巴黎，日本同样只有一个东京，而德国的柏林恐怕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怎么柏林的市长就不着急呢？

既然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城市念念不忘自己的国际化大都市情结呢？依笔者看，这不是这182座城市的市民过于“恨铁不成钢”，而是某些急功近利的领导追求“影子政绩”。

再如“商务区热”。据建设部统计，我国正在兴建CBD（中央商务区）的地级以上城市有30多个，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南京、福州、深圳、厦门、无锡、绍兴等地。

CBD是个舶来品，世界上许多国际化大都市都有CBD，曼哈顿的繁华，让国内

不少城市眼热，一些城市希望通过兴建CBD，促进经济发展，虽然愿望可嘉，但问题在于，兴建CBD需要实打实的条件。有关专家通过调研后认为，建设CBD的城市至少应该具备5个条件：足够的国家影响力；足够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处于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核心位置；积聚了各方面的人才。而我国大陆同时具备这5个条件的城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结论，对一些热衷于兴建CBD的城市和官员，不啻是一盆凉水，一副醒酒汤。

不顾条件，一哄而上建设CBD，不仅不能促进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反而会平添“冰箱里面只放着萝卜干”的怪现象，会造成土地、资金、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容易促使官员头脑发热，整日忙于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终会损害城市 and 地区的发展。建设CBD不能一哄而上，有关城市、有关官员应该冷静下来。

“形象工程热”。许多年以前，在我们共和国的官场上，流行着一句很动听的官话，叫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没造福一方，何以证明？大凡唯“形象工程”是瞻。某某书记若是真的在自己的任期内建了几项亲民利民的“形象工程”，的确难能可贵，问题是，现实中的某些“形象工程”都是“所谓的”，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违背“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原则。“没有条件上也硬要上”，这些工程都是从百姓的嘴巴里夺食垒堆起来的。其目的，不是为了造福于民，而是为了蒙骗上级，取荣誉，骗取官位，更有甚者，从中渔利，中饱私囊。结果，总被这些工程老百姓诅咒为“恶迹工程”“害民工程”。甘肃某市，人口不足14万，每年财政收入不足2亿元，却大张旗鼓拆借、挪用、募捐资金、兴建起一个4万多平方米的巨大广场。广场地面铺着平滑如镜的花岗岩、大理石，四周矗立着高高的多灯头豪华广场灯……广场漂亮了，却拖欠680多万元工程款无法偿还。安徽某市的一个小乡镇也搞了一个100多亩的大广场、最后搞得镇财政相当紧张，连农民的征地补偿款都兑现不了。一边是皖西最大的豪华城市广场，一边是农户透风漏雨的低矮茅舍。面对这样的“形象工程”，老百姓怎能不伤心骂娘。

“开发区热”。不办开发区就发展不了经济，已成为一些地方干部的看法。有些地方不顾条件，不从效益出发，纷纷动工兴建开发区，而且认为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其结果是开发、建成、收效脱节，反成了经济发展的负担。

某省建立的乡级以上开发区近300个，总面积达2485多平方公里，但当中存在着许多隐忧。一些县市本来经济基础薄弱，却一下办起三四个开发区，牌挂了，地盘圈了却只有虚名，有的开发区开始报2平方公里，后来一直升报到11平方公里，挤占大量的耕地。某经济开发区通过办理农转非户口筹得500万元，但征地款就用了450万元，而整个基建费用为5500万元，如何办下去成了一个大问题。

某市也掀起开发区建设热潮，一下涌现出开发区132个。但除6个初具雏形外，绝大多数连基础设施都没有着落。有的县一厢情愿，划了一大块地却无力搞基础设

施，盲目等着外商来投资。

原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指出，开发区建设要讲求实效，避免一哄而上。建开发区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联合国开发计划总署驻北京首席代表亦曾提醒中国的市长们，对新开发区投资时要慎重考虑。

还有“过节热”。有人做过统计，仅仅几年的时间，我国各地一下子冒出1 600多个“节”，天天张灯结彩，夜夜歌舞乐鸣。不少地方为了把节过得气派一些，热闹一些，大肆摊派，大把大把地花钱，工厂停工，学生停课。为了使节日的意义更丰富，早就谈好了的招商项目不签字，不公布，硬是等到过节那几天再宣布和签字。有一个市过节第一天就宣布，政府招商引资几个亿，可到了节日结束的那天，招商引资还是那个数。下面是某县级市举办“艺术节”概况。

开幕前夕，艺术节主题歌的演唱者还没有找到。为郑重起见，市政府B市长和宣传部Z部长携重金星夜赴京，转了十八道关系，才见到男歌星L先生和女歌星F小姐。二位歌星接下巨额酬金，对二位汗流满面的地方大员轻轻一笑：“放心好了，一定去。”然而，开幕前一天，他们迎来的不是两位歌星，而是一盒录有艺术节主题歌的磁带！开幕式上，听着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嘶哑的主题歌，B市长和Z部长如吞蚊蝇，面面相觑。

为了给艺术节增添节日气氛，组委会除命令全市各单位制作100面彩旗外，还规定要制作一组大型展灯。并规定，谁家灯大灯亮，谁家领导就会受奖。于是，有的单位花10万元制作一个10米高的“火树银花”灯，有的单位跑到四川自贡去选购奇灯异盏。一时间，全市到处灯火辉煌。只是市里许多工厂的机器因为电力不足，“哑”了不少。

弹丸小城A市虽是首次举办艺术节，却气势如虹，一口气发出5 000份请柬。为了使中外嘉宾都“来有归所”，组委会命令全市所有宾馆旅社、招待所在节日期间，一律挂出“今日客满”牌子。遗憾的是，应邀而来的很少，连随行的家属在内，也不过2 000人，有的宾馆尚有一半空房。尽管如此，组委会仍三令五申，不准接待过往散客，以免给外人留下节日冷清的迹象。

参加艺术节的来宾，吃住行一律免费，但须持有组委会发放的临时证件。一日中午，一宾馆服务员发现一男子胸别记者证，尾随别人也入了餐席，感到可疑，遂上前欲将其叫出。旁边一人劝阻道：“这是组委会办公室张主任家的，是本艺术节的特邀记者。反正吃的是公家的，你我就少管闲事好了！”

艺术节期间，某厂举行新闻发布会。可是，当各新闻单位记者赶到新闻发布会现场时，却被挡之门外，并被告知：会场座已满，不再接纳。记者们挺纳闷：哪儿忽然来了这么多记者？后来，知情人告诉记者：这场新闻发布会要发一些东西，来者都有份。所以，新闻发布者的三亲六戚及有关或无关领导就“捷臀先坐”了。

A市勒紧裤腰带从财政上挤了600万元办艺术节，同时对外地过往车船征高额费用，并号召百姓踊跃捐款。市领导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办艺术节，经贸成交额预计可达1亿元以上。可是，艺术节一结束，算盘一拨，实际成交额不足500万元！记者皱着眉头去找市长。市长手一挥：“可以高度概括嘛。就写：节日期间客商云集，经贸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客商们纷纷赞扬，本届艺术节十分成功……”

形形色色的“跳楼秀”

正因为人们的行为趋向于社会模仿，所以过马路也好，到菜市场买菜也好，人们都存在“效前律”的特征，由此，“托儿”应运而生。以下是几个常见的例子。

一天，笔者到某地办事，刚跳下公共汽车，就被两个怀抱鞋盒的姑娘拉住，对方亲热地笑着说：“大哥，麻烦您一下，你的个头和我哥差不多，帮我试试这旅游鞋，行不？”听她的口音，是东北人，考虑到人家大老远来买双鞋也不容易，就同意了。于是她俩把鞋盒放地上，把一只旅游鞋放上，我把一只脚伸了进去。

然而，她俩左摆弄，右摆弄，五六分钟过去了，还没试完。见我不耐烦了，其中一个长相秀气的站起来和我侃起来，东拉西扯，问这问那。我开始警惕起来，张目一看，旁边就是一鞋摊子，有四男一女斜披大红条幅，上面写着“旅游鞋季节处理大甩卖”。摊子周围，像我这样试鞋的人有很多，这些人构成了抢购景象。我明白了，他们是鞋“托儿”。我恼火地抽出脚来，问那姑娘：“你们这样干，一天挣多少钱？”和我聊天的姑娘脸色难看了，不待她答话，一个身披红色广告条幅的小伙子走过来，将一只大号鞋伸到我鼻子底下，虎着脸说：“买鞋吗？不买一边去！”

某邮局门前，有个仪表讲究的中年男人，胳膊弯儿里夹着精巧的黑皮包，不动声色地看着来邮局买纪念邮票的集邮者，忽然，他眼前一亮，来到刚从邮局出来的一位军人面前，说：“你一下子买好几版邮票，真敢下本钱啊。”军人看看他，说：“替朋友买了些。”中年男人说：“想不想买名贵票？外国的。”军人犹豫了一阵，说，“能不能先看看？”“当然可以！”

中年男子打开皮包，取出一个票本递给军人。军人展开，只见里面六枚一套邮票，设计别具一格。中年男人说：“西班牙人搞的，我们国内极难见到。”军人问：“多少钱？”“美元要八十，人民币要一千。”“这么贵？”

一位早就站在旁边，似乎对这邮票感兴趣的挺洋气的姑娘，从军人手里接过邮票，说：“我刚从日本回来，那边卖二百多美元呢？来，给我两套。”姑娘从包里拽出两张外币，买了两套。她刚要把邮票装好，突然一个外国妞喊她，她猛抬头，随之冲过去拥抱。外国妞用中国话问她来干什么，她说来买邮票，把手里的邮票给洋妞看。洋妞接过一看，“哇”地一声叫，问是在哪买的，然后连叫“漂亮，

便宜”，便也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套。这一来，买邮票的人越来越多，军人再也忍不住，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不过还是差一百多块，这时卖邮票的中年人说：“知道你们当兵的穷，再说都是集邮爱好者，给你吧！”军人买了邮票，边走边仔细看邮票，走不多远，隐约听到洋妞“哇”一声，回头看去，那洋妞和姑娘重演“相见”一幕。军人忽地明白了，这种邮票太一般了，只值几元人民币。

火车站广场。又一列车进站了，人流涌向出站口，某地旅游团的一行20多人刚出站就被一个胸戴宾馆工作人员牌子的漂亮姑娘截住，介绍她们宾馆的诸多好处。旅游团负责人正和她交谈，忽然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旁若无人地对姑娘说：“小黄。我们公司30张床位留好没有？”姑娘说留好了。那干部说：“可不许像上次那样让别人去住啊，条件越好越要讲信誉才是啊。”姑娘连连点头。

姑娘转脸对旅游团负责人说：“刚才这位是我们的常客，有兴趣就到我们那儿去吧，亏待不了你们。”这会儿，有一个提着大旅行包的人过来，说：“小黄，有床位吗？”姑娘笑着说：“又来办事了？还住我们那儿？”“当然，就图你那儿干净、安全又便宜……”

听到人家那么说，旅游团负责人不再犹豫，跟着姑娘，带上20多人上了前往该宾馆的班车。进了房间，才觉上当，设备简陋，床位拥挤，脏兮兮的，价格还那么高。旅游团负责人有意打听那干部模样的人和“刚下火车的旅客”，可这俩人根本就无踪影。

人天生具有的模仿趋向，使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仿效他人的行为。模仿有时就像一支魔棍，使我们的社会行为趋同化。而模仿一旦成为一种社会趋向，还经常地使人陷入盲目甚至疯狂的漩涡之中。

荷兰的“郁金香热”过后，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春也上演了同样疯狂的“君子兰热”。

那时进入长春市的外地人惊异地发现，这里家家户户养着君子兰，街谈巷议是君子兰，就连商标招牌似乎也离不开君子兰……当人们迷迷糊糊地来到君子兰交易市场，这里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情景：一颗巴掌大小的君子兰竟开价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突然，也不知是哪一天，君子兰的身价竟然一落千丈！来到市场上的人们全都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些上万元一株的君子兰变成了几百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几十元，几百元一株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君子兰盛衰之奥秘当然与人们的从众模仿相关。你买赚了，我也买，我买赚了，他也买了。买来买去，价格越抬越高，直到有一天，市场上只有卖的没有买的了，价格如飞瀑暴跌当然就不奇怪了。

由此解释中国股市的“过山车”现象亦十分贴切。中国股市曾由上证综指的

1 000多点跌至300多点。后来，反复震荡上涨至6 000多点，最终又下跌到1 000多点。其间，连年亏损的公司股票可以卖到50多元，皆因机构、股民们的追涨杀跌所致。涨就买，跌就卖，一度呈现模仿从众的疯狂局面。

更令人担忧的是房市。在炒房客的轮番炒作下，房价呈飙升状态，不少县市的房价一年翻一番，引诱更多人模仿投资。如今中国的房地产热颇像全球经济危机前的美国房地产热。世人皆知，后者为前者的因，前者为后者的果：美国人看好房地产价格上涨，于是纷纷贷款买进房子以期价格上涨后卖出，于是大家彼此模仿，逐渐推高房价。后来，市场上只有卖家没有买家，紧接着资金链条的断裂导致房地产价格断裂。于是人们“断供”，引发银行倒闭，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目前我国的房地产热颇有经济危机前夜的征兆。据称，我国至少空置房屋6 000万套，可供2亿人居住，而炒房客仍在大量买进囤积。最后他们想卖给谁？驱车经过那一片片空旷如墓地的别墅区，真让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作为社会心理障碍的模仿趋向可分为两种形态，一为前述的非理性模仿（盲目从众），另一为后述的非道德模仿（消极从众）。

许多消极的社会行为来源于模仿，特别是从众模仿。笔者为了探求让座心理，采访了一位两岁女孩的母亲。

“刚才好像有一位孕妇站在你旁边？”

“那又怎么样？”

“似乎你应该给她让座，你瞧这上面写的。”笔者用手指了指车厢上印着的一行字说。

“那又怎么样？写归写，做归做，哪里都是这样。”她的话显然有所指。

“这话总有点不好听吧？”

“哎呀，你蓄着精神去教训你的爱人吧。我怀孕时，谁给我让过座？这叫报应。”

她的话着实震撼了笔者。之后，笔者又陆续采访了各式各样的人，问他们不让座的理由，答案五花八门：有的根本没想到让座这一说，有的认为抢到一个位子实在不容易，有的觉得大家都不让座，自己何必逞这个能……而其中说的最多的是，我生病时，我爱人怀孕时，我婆婆走亲戚时，谁给我们让过座？今天我凭什么给她让？

有人曾经对“自杀秀”的说法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冷漠心态的凸现。但“自杀秀”却是真实的存在，请看以下几例。

一座新建大楼的楼顶上，几名民工以“跳楼”相威胁讨要工钱。劳动部门和派

出所人员陆续赶来，经长时间艰难交涉，终于在“明日发工钱”的协议下平息了事态。第二天发工资时，只有七八个包工头来领钱，一直没有民工的身影。原来，跳楼的“民工”是包工头扮演的，他们的“跳楼秀”是为了讨得工程款。

一名身穿蓝色短袖衫的男子站在山城饭店12楼的露台边缘上时而哭泣，时而高喊着要跳下去，并不时做出向前纵身的危险动作。先期赶到的重庆市消防四中队队员及菜园坝派出所民警对该男青年展开劝说工作，但男青年丝毫不予理会，始终不肯下来。下午4时许，不断用手抹着汗珠的男子开始变得烦躁，突然吼了声“太晒人了，受不了！”一脚跨进了露台靠里的地方，回到了安全地带。

一男子爬上步行街一工地的施工电梯做跳楼状，当时，很多市民站在下面观望。不久后，该男子竟掏出手机拨打110，在手机中称他要跳楼“希望110派人来”。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当地消防队为防不测，还在电梯下铺上了充气救生垫。最后经各方劝说，该男子回到了地面。

一位中年男子站在嘉陵江大桥栏杆外，大声嚷叫不想活了，他说如果妻子不来接他就跳江自尽，同时威胁劝说者不要靠近。由于他的妻子一时无法找到，众人心悬一线。几个小时后，这位男子抽完一支香烟后便自行翻进栏杆回家。

对于“自杀秀”的理解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因为某种原因特意在公众场合表现出自杀迹象；二是在无阻碍条件下有充分的时间但无实际的行为实施。对“自杀秀”的原因分析可分为两个层次：外显层及内隐层。

外显层的原因多种多样，下面仅就重庆市发生的几例说明。

重庆北部新区消防总队对面，一名男子爬上一座15米高的施工塔吊扬言自杀，因为老板无理解雇。消防总队、特警大队接警后3分钟赶到现场，在塔吊下支起巨大气垫并进行劝说，2小时后，该男子明确表示不想自杀了，但他因双腿发抖迈不开步无法下来，消防官兵只好用绳子套住他将其解救。

北碚某高校一女生站在7层楼高的学生宿舍楼顶露台上叫嚷要自杀，原因是男友抛弃了她。这位女生一边哭着一边向楼下扔帽子、围巾，又取下戒指扔下楼，之后又将鞋子、袜子扔下楼，经老师和同学相劝3小时后才被解救。

一吴姓中年男子为毒瘾所困，竟翻出石板坡长江大桥，悬在桥外企图自杀，并脱下身上的羽绒服扔下大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与救援人员对峙5小时后，回心转意自己爬了回来。

这些“自杀秀”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为常见的是民工爬上塔吊索要工资。据报载，仅在2013年3月12至3月15日这几天，重庆市主城区就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民工王彬彬、陈小伍（均为化名）爬上会展大厦工地一20多米高的塔吊索要工资，直到施工方将1800元现金拿出后，两人才下了塔吊。在九宫庙某建筑工地上，民工唐某突然爬上塔吊并扬言老板再不付工资就自杀。事后唐某向记者告称，他和同

乡给老板打了几个月的工没拿到一分钱，无奈只好以此举要挟老板。大渡口群胜村某建筑工地的塔吊上，站着一位索要工资者，他情绪激昂地诉说自己的难处，对下面妻子的苦苦劝说无动于衷，直到营救小组筹足了钱才爬下塔吊……

“自杀秀”的外显性原因折射出了目前社会矛盾的多样性，但这些外显性原因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为什么社会像中了邪一样，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企图自杀者呢？类似“自杀秀”的现象以前极为鲜见，十年九不遇，其内隐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显而易见，媒体信息传播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媒体的报道，可以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及行为起到暗示作用。一俟民工爬上塔吊索要工钱的消息传播开来，就会引起社会模仿的连锁反应。

小腐败：日益滚大的雪球

某天，一位友人来访，谈及当今电视，在有感屏幕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同时，总觉得有点遗憾。他说，在暑期中，有的打麻将，有的去跳舞，有的去旅游，有的谈恋爱，只有一个小学生成天看电视，老奶奶则叮咛他要多读书，不料那小学生（孙子）说：“读书！读书！你看电视里有谁在读书？家里又有谁在读书！”

人是社会人，社会环境无时不对人的心理行为产生各种影响。由于社会认知和社会适应的需要，这种影响更容易表现到人们的从众模仿方面，包括非理性模仿和非道德模仿。就目前较为普遍的违法乱纪行为来看亦是如此。比如贪官污吏说：如今就是这么个社会，周围的人都在贪，我不贪，能混得下去吗？

包工头说：如今就是这么个社会，咱要是不紧着送礼，咱还能包得到工程吗？

买官者说：如今就是这么个社会，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咱不去进贡，乌纱帽轮得到我戴吗？

制假贩假者说：如今就这么个社会，到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我一个人弄真的，人家相信我吗？

明星们说：如今就这么个社会，那么多人想方设法偷逃税款，我不跟着来，我傻呀？

校长说：如今就是这么个社会，哪个学校不挖空心思多收点钱？我当然也不怕钱多咬手！

一些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源于模仿。在湖北省阳新县某粮食部门发生的特大贪污案中，这个仅有82人的单位，竟有79人先后卷入贪污案的浊流，其犯案过程就带有明显的模仿包括从众模仿的轨迹：员工之间相互模仿、领导之间相互模仿，员工模仿领导，最终全所空库存60万公斤粮食。

职务犯罪作为社会公害，其诱因与腐败息息相关。分析腐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我们不难得出一个令人吃惊也是令人忧虑的重要特征，那就是相当一部分腐败

行为的产生源于模仿，特别是从众模仿的压力（主要为社会适应压力），我们称之为消极腐败或被动腐败。

现今说到腐败，有一新名词为“小腐败”。含义有二：一是指情节轻微的腐败；二是指普通人也涉及的“以权谋私”。张明澍同志的一篇文章颇具玩味，现摘录几节。

我第一次想到腐败要分大小，是六年以前，我儿子该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住在一个新小区，没什么像样的学校。通过一番调查研究，我找到一所区重点小学，各方面都合适但学校要12 000元赞助费。我当时真是义愤填膺。国家不是规定义务教育吗？为什么要钱？还要这么多？我徒具“知识分子”的美名，一月工资不到2 000元，好不容易写本书，才拿了6 000元稿费，却要交好几百元的税。到哪里去凑12 000呢？腐败，真是腐败！

这一肚子气没消，又要挈妇将雏回老家探亲，由于买不到车票，只能通过家乡的驻京办开了三张三指宽的纸条。这是列车给驻京办的关系票，凭它可以到车上补到卧铺，但不能从进站口进，得走旁门左道：外地车进京之后，要到车库去简单地保养一下，拿条的人到车库直接跟乘务组联系上车。我拿着条，正要过车库前的道口，出来一个老头，喝住我们一家三口，这地方不准过。老头身上穿的衣服，说是铁路的制服又不是，说不是隐约又有点像。除此没有任何标志表明他有管理这个道口的权力，道口四周也没有限制通行的标志。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顾不得问了，如果火车从库里开走，那么好不容易搞来的三张条就要变成废纸。赶紧说好话，老头歪头看看我，说：给点烟钱吧。我给他十元钱，开路。到车跟前，手举条子使劲晃，有个穿制服的人拉开车门，我一看他摇头，赶紧递上十元钱。摇头立即变成了点头。这趟车上得不容易，我一是恨上了那个老头，二是恨这个乘务员。到这时候，我还没有发现腐败有大小之分的理论。但我把这老头跟这乘务员都列入腐败之列。

车开之后，正好收钱的乘务员管我这节车厢。似乎有点歉意，他走过来跟我聊天，他说你能弄来这条子还有点本事，驻京办一天也就三张，这是我们乘务员的铺位，腾出来卖点钱，车组发点奖金。我心想你利用职权捞钱，不是腐败是什么？他说乘务员平均每人工资800元左右，缺的这400元，车组就靠这类办法补。他最后这两句话在我脑子里有点像闪电闪了一下的感觉。

乘务员走了，我接着他的话往下想：他要补工资的缺，找上了我。如果我是一个教师，我也有缺，我就找学生家长补我的缺。学生家长是个医生，他就找病人补他的缺。病人是城管部门的，他几乎可以找任一个要盖房子的人或单位补他的缺。如果正好工商局要建办公楼，那就是工商局的人来补他的缺。工商局可以找铁路局

的人来补缺，因为铁路局要办一个企业。这就转回来了，正好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就是“小腐败”。

“小腐败”是普遍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被容忍。工资不足以维持平均生活水平的程度有多普遍，“小腐败”就有多普遍。比如职权部门的公务员外出度假，他人埋单。笔者的一个局级朋友就被邀到著名风景区度假，邀请人的目的不过是要“中央干部”到当地走一遭，让市里领导知道他在上边有关系，以利自己的提升。其实，我的这位朋友对此也很反感。但是怎么办呢？一到“五一”，这家说去武夷山，那家说去海南岛，面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面对朋友的询问，阮郎羞涩，他能说去哪里？他也是个局级干部了，如果给他的工资可以承受得起自费度假，他又何必出此下策。年节之时接收红包，借用汽车，大多出于跟上述度假相似原因。还有就是以单位名义搞的五花八门的“创收”，正如政协委员举的例子，学校乱收费、乱摊派，科技界成果评审不要会提意见的评委，不要科学态度严谨的评委。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举不胜数。比如民警跟小姐勾结起来，后者诱人嫖娼，前者破门收罚款，类似于旧社会的“放白鸽”，说起来又可气又可笑。可是如果你去责备那个民警，他还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呢！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老婆去看个病就要好几百，他一个月工资加上奖金才多少。

一个社会是由多重结构组成的大厦，有它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法律结构，一层一层，可以无穷无尽地向上伸展。但是决定整座大厦稳定的，是它深埋在地下的看不见的部分，即它的基础。社会学家说，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公平和公正的概念，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大厦的基础。虽然没有人看得见它，但一旦它受到侵蚀，全社会都能感到危机。假设有两个社会。在A社会中，多数成员认为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是公正的，而在B社会中，为数不少的成员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小腐败”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一点）。很容易想象，在A和B这两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会有什么不同，社会所不得不承受的后果又有什么不同。例如说，走到哪里都听见有人在发牢骚；人人都像憋了一肚子火；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发作；不遵守规则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了风气，而遵守规则的人实际上是吃亏的。

举个极端的例子，“小腐败”甚至会成为刺激犯罪的一个社会心理上的理由。比方说，一个进城打工的民工，身无长物，囊中羞涩，本是善良之辈。到城里一看，“小腐败”盛行：国家规定是义务教育，但他孩子上学却要交赞助；他开拖拉机已经交了养路费，可来个戴大盖帽的，就要交“买路钱”；他去趟医院，本来几块钱的感冒药，却花了几十元。出门办事，时时处处碰到不合理的收费，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跟“抢”其实没什么两样。他会产生什么想法呢？你们有权，随便立

个名堂就能捞钱，我既没权，也没本事，那就去偷，去抢。

与“大腐败”相比，“小腐败”的危害更大。没有人认为搞“大腐败”是应当的，没有人同情搞“大腐败”的人，而“小腐败”毁坏的是人心，是是非观念。它把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搞没了。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和弥补的损失。一个社会有点“大腐败”并不奇怪，“大腐败”在哪个社会都有，这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但是一个社会有了“小腐败”，那就非同小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类似“小腐败”实则“大腐败”，缘由为其普遍性危害性。而其发生机制明显地是由相互模仿而循环扩大的。这个滚大的雪球继而又会形成压力（前面说到的社会认知和社会依附的压力），使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形成从众模仿。

平心而论，由于模仿而导致的腐败有时源于本身的不情愿，是被动的，消极的。简单说，就是由于社会认知或者社会适应时的压力。我们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不得不腐败”“不敢不腐败”，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笔者曾经供职的单位是个重要部门，经常下去调研、考察干部。这就不免涉及一般性质的吃喝玩乐：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坐着一幢楼。此外，经常还有大小不等的红包。你不去吗？大家都去的，你不收吗？大家都收的，包括领导。你不去、你不收，想干吗？还想混吗？

下面是几位领导干部的“自白”。

A，国家某部处长，中共党员。说实话，下面的同志请我们吃饭、送土特产，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要我说，党风和社会风气，这些年可是越来越有问题了。例如，过去是我们出差，地方的同志才请我们；现在好了，你在北京坐着，人家就会主动上门来请你“聚一聚”。在哪里聚呢？当然是饭店。最后谁结账？是地方同志！

北京的大饭店，这几年我几乎是吃遍了。吃就吃吧，唯独这个钱，是我心中的最后防线了。可现在，我感到越来越难办了。你要是退了，别人可能会说：怎么，嫌少啊？想出风头、想露一手啊？你要是真廉洁，连部里分水果你也别要啊？你抽的烟是自己买的吗？有能耐你就一尘不染啊！

我手里确实有点权。但是项目应该在哪里上不是由请客或者送礼多少来决定的，可现在就这么个社会风气，地方的同志害怕没“烧香”就请不来“真佛”，所以他们见庙就“烧香”，见“佛”就送礼。事情办成了，他以为是送的结果，以后自然送得更勤；事情没办成，他以为是没送礼或礼送少了，以后更加来劲儿。

B，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编辑室副主任，中共党员。过去我也恨“关系

稿”，也厌恶“三包”采访（指被采访单位负责记者的往返车票机票、食费、住宿费），可是看看身边，某记者都在发“关系稿”，我一个人不发，就能改善整个报纸的形象？有时候，“关系稿”是总编辑批下来让发的，不能不发。我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也有这么一点点权力，我为什么不发？你说你坚决不发“关系稿”？那好，从总编辑开始，没一个人会喜欢你，谁能没有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亲属关系，当然也包括金钱关系。现在报纸上“广告稿”“关系稿”屡见不鲜，还不都是这种“关系”在那里开路？有的可能拿了钱，有的虽然没拿钱，但人家管吃管住，还送土特产，一点不给人家报道，你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啊。当然，这样一来，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要打折扣。

我的原则是，太违法的事我不干，可如果“世人皆醉我独醒”，大家都捞我不捞，我不是太吃亏了吗？我承认自己在一天天“学坏”，我不甘心，可又没什么办法！

C，国家某部处长，中共党员。收受礼金的不正之风刮得挺凶，不光是下面的人给上面送，我们部里也开始给同级的中央部委送“信封”了，今年春节，我们就给××部的有关司长送去了。几位司长们痛痛快快收下了。

至于我自己，给别人送钱的事我干过，但收钱的事，我没干过。碰到过几次人家送“信封”，我都坚决退回去了。但是，土特产我收，饭我也吃，你问我的“心态”，这很简单：跟着部长、司长等领导出差，领导如果收了，我也不别出心裁，随大流就是了；如果这次出差我就是最大的官，我也没法带头往回退。为什么？我要是退了，和我一起去的同志会不会骂：你是头儿，路子野，这点小东西你看不上是不是？你肯定还能拿更多更好的吧？我们当“兵”的，出差机会不多就这么点“好处”，你还忍心给卡了？

我们有位处长过去拒收礼品很坚决，推不掉就留在招待所的客房里，结果搞得地方上沸沸扬扬，好像是礼品多得连拿也拿不了了，地方的同志意见很大。后来，这位好同志也只好“入乡随俗”。

26

“反腐明星”吸毒嫖娼——矛盾人格

费氏理论：一半魔鬼一半天使

上章谈到了“小腐败”“被动腐败”。说到腐败，人们现在似乎有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心态，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如果有机会则不妨腐败。腐败在民众心目中往往是闻着臭、吃着香。

许多人都在骂当官的腐败，可是他们大多没想过自己当了官会如何。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有一次笔者去买鱼。那年月，并不是每天都有鱼可买，因此，买鱼的人在柜台前挤成一团。售货员站在鱼摊前吆五喝六，把一些好鱼专门卖给他的熟人。终于，有人提出抗议。售货员把鱼往柜台上一摔，叉着腰对人群说：“我愿意卖给他，他是我朋友。”众皆哑然。接着，售货员又说了一句让人心服口服的话：“要是你，也这样。”

笔者有一个同学是律师，大家在一起时总拿司法腐败的话开他的玩笑。他也每每反唇相讥，历数组织部门任人唯亲（有同学在组织部），工商部门欺行霸市（有同学在工商局），税务部门慷国家税之慷，谋个人之私利（有同学在税务部门）。最后，那个同学说了句大家都提不出异议的话：“咱们谁也别说谁。”

再一想，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比如，有的记者声讨起不正之风来几乎都声色俱厉，可有偿新闻在他们一些人中却屡禁不止；有的作家，他们也反对腐败，可只要给钱，给什么人写报告文学都能妙笔生花；老师该是最痛恨不正之风的，可是他们中也有人对自己送挂历和不送挂历的同学不一样对待。这些情况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于极限。

一个在观念中没有权力界限意识的“群众”，一旦当了官，能是一个有权力界限意识的干部吗？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腐败，没有权力制约意识的群众中也将会

走出搞腐败的官。如果我们不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在全社会树立一个限制权力的观念，那么腐败官员岂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亦不放过腐败的机会，这种现象属于“矛盾人格”。类似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们时时都可以从荧屏、电台、戏院的影视、戏剧、歌声中听到各种各样的“爱”，爱之心、爱之情、爱之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然而，当因地震受灾的人民需要“爱之助”的时候，某些“先富起来”的，天天唱爱、炮制爱的星儿们却没有捐助一分钱，没有表现一丝爱！这使我们想到“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的名言。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的文学艺术界的“家们”和“星们”，也无疑是人民的“教育者”，他们在灾民面前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冷漠无情，客观原因就是没有受教育或受教育太少。社会曾经批评过艺人的“双重性格”，即台上演的一套，台下做的又是一套；台上唱的是一回事，台下行的又是一回事；演的是英雄，做的是狗熊；唱的是“让世界充满爱”，做的是让自己口袋装满钱！

某市为反对借开会之机吃住宾馆、滥发物品、奢侈浪费，做出决定并发出文件，要求各大宾馆除经市政府统一规定的以外，一律不予接待。此后的3个月中，宾馆的会议接待工作却有增无减。要用宾馆开的这些会议都是市府同意的吗？不一定。更多的是拿着条子来的。批条子最多的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也有宣传部长、外办主任、经委主任、计委主任、旅游局长，这几乎囊括了市政府精简会议时必须到会或列席的人物。

一面举手赞成精简会议，少用或不用大宾馆，一面又批条子，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也有不少领导干部是患了人格分裂症。这也是近年来，政府决议没有威信，令行而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和王海一样有“打假英雄”之称的臧家平被北京海淀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臧家平以购买的“藏汴宝”为假药的名义，向陕西某保健药厂提出赔偿要求，并获得了厂家1万元的赔偿。此后，臧家平找到合法生产“藏汴宝”药厂，请求由他进行打假。双方约定，打假费用由臧家平自己负担，索赔金额对半分。获得委托后，臧家平告知陕西那家保健药厂，声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篇对陕西保健品厂不利的文章。经商定厂方表示，臧家平花18 000元买下的药，厂方赔40 000元，而那台价值13 000元的电脑，厂方出价35 000元收购，当保健药厂将75 000元钱交到臧家平手里时，警方将其抓获。

海淀法院认为，臧家平索赔不能视为敲诈勒索。但是，臧家平要求厂家购买其存有调查文章的笔记本电脑的行为，则属于敲诈。

《辽宁日报》曾发表谷满仓的文章，严厉抨击“挂羊头，卖狗肉”，“变着法

儿害国家的败家子”。他是读了一封堂而皇之的邀请信有感而发的。

文章说，这封邀请信是省内刊物和深圳某单位联合发出的，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研讨班”。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令人大感惊诧的事情发生了。

为了说明问题，现不妨将邀请信的部分内容转录如下。

×班将在充分考虑报名人员的要求的前提下，在您认为合适的时间内安排去新加坡、香港考察……我们将与新加坡和香港的有关机构以国内行之有效的的方式向您发出以适当名义的邀请函，您可以凭邀请函到当地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办理出国护照。（新加坡7天6晚，香港4天3晚）

每人交35元报名费、出国费用3 300美元，美元可按深圳市价折合人民币交付（包括在国外期间的全部食宿和交通费、预定内容的参观考察费及1 500港元的零用钱）。

至此，我们才看出一点眉目，所谓“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云云，只不过是头，而实际上，是为某些人出国观光搭桥。3 300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万元吧，怎么分配呢？大头给了境外某些旅游客商，中头给了“研讨班”的主办者们，小头（1 500港元）归观光者个人“零用”了。反正钱是国家的。

矛盾人格的集中表现应该是在官员们对待腐败问题上的不一致了，例如，贪官的“作秀”。

“作秀”是新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口语，源自英语show一词，本来指电视荧屏上的现场直播节目，常见电视节目主持人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状，叫做“脱口秀”（talk show）。由于这一节目新颖、直观，颇受观众的欢迎，如今，一些贪官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便“拿来主义”地借鉴这一电视艺术手段，在生活、工作中频频“作秀”。

如陈希同曾慷慨陈词，痛斥“官倒”、腐败，并邀请方成、丁聪等漫画家、作家大胆针砭弊，帮助市委、市政府改正工作；王宝森名头更“迷人”：曾任北京市反腐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际反贪大会筹委会副主席。二人大有“两袖清风”的味道，直到东窗事发，陈希同锒铛入狱，王宝森畏罪自杀，世人才初知陈、王二人大肆收受贿赂、挥霍公款的事实。其中，仅王宝森一座别墅就耗资1亿元人民币，原延庆县县委书记一人就送给陈希同3辆豪华轿车。

时下，这种“披着羊皮的狼”越来越多，一些贪官在“原装正版”地学习了陈、王二人的“作秀”术后，不断发扬光大，推陈出新，高招迭出，令人眼花缭乱。

自我吹嘘。原江苏邳州市市委书记邢光婴受贿31万元，可他竟敢在全市大会上

大言不惭称自己是个“三不贪”（不贪权、不贪钱、不贪色）的干部。

障眼法。原常州高新开发区主任许和平，在被检察院逮捕前3天，还向组织上交红宝石、翡翠等拒贿礼品。其实他在第一次上交礼品时，就已受贿30多万元，而那些小微薄之物，只不过掩人耳目罢了。

塑造形象。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任时，每年拨给宣传部的“攻关”经费100余万元，且下令“该报的都要给我报出去”，在各级新闻媒体上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宣传其“政绩”。

韬光养晦。受贿16万元被依法判处10年徒刑的原安阳市市长杨善修，也是一名装廉高手。他平时衣着朴素，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与农民在田间合影的大幅照片。受贿达1400万元的原海南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平时出差仅吃10元一份的快餐……

具有矛盾人格的贪官并非现在才有，历史上便有着著名的“张居正现象”。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半途而废告终。他病死不久，其官职被迫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启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教训是张居正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也在腐败。

明朝中叶后，政风腐败，张居正在隆庆年间所上著名奏疏《陈六事疏》中，极力倡导廉政。他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并将惩贪与巩固边防相结合。在他主政后，狠抓重大腐败案件。

但是，张居正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重用。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

大宦官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让其子张敬修送给冯保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幅，金3万两，银10万两，“其他珍玩尤多”。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他送给冯保那么多金银财宝从何而来？若非贪污受贿，怎能有如此家底！张居正的个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烂。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探讨矛盾人格的发生机制是饶有兴味的。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是人格。心理学所说的人格即指个性，即人的心理特征（气质、性格、能力）及心理倾向（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也指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与人的行为直接相关。如果个性结构失调，或者个性与行为失调，如态度与行为之间有互不一致的情况，则可认为矛盾人格存在。

需要说明：矛盾人格所指的失调，即不一致是针对稳定的结构而言。人的个性

（人格）本身就是较为稳定的结构，而临时性的失调包括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并非都要归于人格的改变。笔者曾经在一所美术学院对人体模特的工作动机做了调查。

虽然女性人体模特多数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不见不得人的，但在某美术学院女性人体模特儿招生时，短短几天，却有157人来报考，其中大学毕业生5名，高中毕业生占一半以上，这固然说明人们旧的思想框架正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而逐渐被冲破，但探究她们真正的动机则是很复杂的：有人是为了摆脱自己原有不喜爱的工作；有人是为求得多余的时间学习外语；有人是为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也有人是为出国深造筹集经费；还有人是为了多赚钱……但她们往往都将自己的真正动机掩蔽起来，问她们为什么要报考人体模特儿工作，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喜爱美术，愿为美术而献身。在这个案例中她们是由于情境缘故导致的临时性的“心口不一”“表里不一”，不能归结为人格问题。

矛盾人格还有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其道德评价含义。人格与个性并非同一概念，人格是指带有道德评价的个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矛盾人格这一概念。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结构，人有三个“我”：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动物的我）按快乐原则行事；超我（社会的我）按完美原则行事；自我则是本我与超我相矛盾统一的结果，按现实原则行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而到底是魔鬼抑或是天使，则是本我与超我矛盾统一的结果。

进一步对矛盾人格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矛盾人格有三种类别：实体矛盾人格、虚体矛盾人格、假体矛盾人格。实体矛盾人格亦称分裂人格（多重人格、双重人格），指具有临床意义的类精神分裂症人格，仅为个体心理障碍。属于社会心理障碍的主要是后二类，即虚体矛盾人格（情境人格）和假体矛盾人格（面具人格）。后面将分别予以说明。

看不懂的中国人

著名学者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中感叹道：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比如腐败。中国人喜欢腐败吗？当然不喜欢。提起腐败，中国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就连那些行贿受贿者，也未必当真喜欢腐败。如果不受贿即可财源滚滚，他为什么要冒丢官下狱的风险？如果不行贿就能通行无阻，他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钱送人？

多数人是喜欢腐败的，但他们又离不开腐败。事实上许多中国人一旦自己有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如果所有的官员都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不少人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自己的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所以，不反腐败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怕也不行，最好是留一条尾巴，限制在一两顿饭和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也未必。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反对、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多半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喜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别人有份自己却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份，便只好连公款吃喝一起反对。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老祖宗留下了不少遗训，这些遗训常常是会“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这你就不懂了。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的立场。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人就麻烦了，他实在想不出该用哪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人。比方说，中国人耿直却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先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白”，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非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易中天先生认为中国人“看不懂”。其实从矛盾人格的角度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两面性，这些两面性除了典型的分裂人格外，更多的是情境人格。前面说到，矛盾人格的表现主要为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为何态度与行为经常性地表现异同呢？这中间总是离不开情境的作用，一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作用，二是个人情境的诱导作用。

在社会环境压力下，人们经常会表现出其两面性，包括“角色冲突”，按说也是正常的。

为了要追求一个浪漫而有文艺素养的女孩子，在她面前就要尽量少抽烟，不提麻将，陪她一道去听音乐会、看书画展览；刚刚进入一家公司，逢人总是要加倍客气，不敢轻易拒绝别人的请托和要求，即使心下直嘀咕，仍是满口应允，怕的是留下小气和高傲的评价；面对比较权威性格的上司，除了叠声应答：“是！是！好的！”之外，还要委婉细心地收敛起自己的锋芒……

在本单位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是必要的，因为周围的同事、领导把自

己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在挤公共汽车时放肆一点是无所谓的，因为在这里大家都是陌路相逢，谁知道谁是谁啊！

在监狱里的在押罪犯，大都是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满面无辜，但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怀着恶魔一样的心思。

笔者“文革”期间曾经参加了一个“批右”的座谈会。台上的几位发言者历数了“右”的种种表现、危害，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此后，在中央提出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任务是防“左”后，笔者又参加了一个批“左”的座谈会，发言的仍然是那几位，他们仍然用同样的态势历数“左”的种种表现、危害。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评定上述人等具有矛盾人格，由于社会情境的压力作用，人们可能表现出态度与态度、行为与行为、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如前所述，那种较为稳定的涉及道德评价的才能称为人格，对矛盾人格的评定也是如此。例如，学术界、理论界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不需要什么立场观点，随风而起、闻风而动、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典型的矛盾人格。这种人格特征当然是有悖社会发展的。当然，最需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对中央决议和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的各级负责人和领导干部。

由于模仿包括模仿从众的行为机制，腐败有“小腐败”“被动腐败”等形态。而其模仿包括模仿从众的机制往往还有情境压力——腐败群体的压力作用。群体腐败可以挟裹个人腐败，致使不少人包括痛恨腐败者，“第一年风风光光有火气，第二年磕磕碰碰泄了气，第三年服服帖帖学俗气”，从而表现出习惯性的矛盾人格。

我们所说的情境不仅指社会情境，还有自己的“小情境”，包括个体的心理环境。个人情境的结构因素亦对自我产生压力作用。例如认知结构倾向于正向评价“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情感结构倾向于负向反应“改革触动了个人利益”，其意向结构及人格结构均可产生失调，致使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我们经常发现的那种对他对自己采取双重道德标准的现象一般都来源于此，其压力源主要为“私欲”。当然这种私欲有时也表现为维护亲友或“小圈子”的利益。

2006年6月7日深夜，江西省公安厅相关部门接到民众举报，在南昌市南京西路某商务酒店933房有人在吸毒和嫖娼。当警察打开933房房门时，发现一男一女正在吸毒，现场有毒品麻古以及吸毒用具。进入内间，警察又发现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大吃一惊，在内间嫖娼的男子竟是上饶市纪委监察一室主任黄东巨。

当天晚上，他和上饶一公司驻南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徐某在一歌厅唱歌后，以1500元的价格将歌厅两名卖淫女带回酒店。“溜”了麻古的黄东巨很是兴奋，在与一名卖淫女发生性关系后不久，他又与另一名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恰好被公安人

员抓个正着。

黄东巨，1959年出生，江西上饶人，大专文化，从事纪检工作近20年，案发前为上饶市纪检监察一室主任。“干纪检，就是要敢查案。”这是黄东巨常说的一句话。在上饶市纪委，黄东巨以敢于碰硬、擅长办案而出名。

有数据统计，黄东巨主持和参与查办各类违法违纪案件100余件，涉及县处级官员30余人，追缴各类违纪款及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700余万元，被人们誉为“腐败分子的克星”，先后获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就是这样一个“反腐明星”，曾经先后34次收受贿赂，共收受人民币17万元、美元4500元、欧元500元、多种物品估价2万元，并多次吸毒嫖娼。应该说，黄东巨反腐是真花了大力气的，但个人私欲作为“本我”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腐败分子绝大多数有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曾经真心学焦裕禄的大贪李真最终由于抵抗不了私欲的力量堕落，就充分展示了其矛盾人格的两面。

2004年国庆长假前后，一本“奇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在部分党员干部中传阅。李真一案，使人们对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可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乔云华却没有勇气读完自己写的《对话》，“采访很痛苦，写作很痛苦，整理很痛苦，一眨眼，李真就跳到我面前，而他其实已经走了将近一年！”李真失去自由后，没有任何朋友理他，在李真被执行死刑前，只有乔云华和他进行了十多次对话，最长9个小时，最短4个小时。在李真看来，乔记者是离他心灵最近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采访了乔云华，下面是对话。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贪官也是人，也有善良的一面，那么李真善良的一面你怎么看？

乔云华：下岗工人、无助的弱者都被他帮助过，他的善良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其实许多贪官不是没有良知，而是没有被发现，进了监狱后舆论就一边倒地攻击和指责。我们应该善于发现贪官的良知，如果他周围的人在他良知苏醒时及时劝说，他也就不会毁灭。发现贪官良知并探讨他毁灭的原因是留给我们的大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据说，李真好像很讨厌那些对他唯唯诺诺故作逢迎的官员，而很感谢那些曾经查过他的官员？

乔云华：他过去就瞧不起那些送礼的官员，而进去以后，他恨他们几乎到了极点。一些官员为了升迁，向他巴结逢迎、行贿，助长了他的贪婪，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他希望那些官员看了他的话，千万不要再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把张真、王真给

毁掉。而李真很感谢刘善祥（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一直揭他、查他，李真说，“如果当时查处我了，我怎么也不会被处死”，“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力量太小了，如果这样的力量强大起来就好了”。

《瞭望东方周刊》：李真无论是做秘书期间还是做国税局长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至少他自己是想做好事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把他往死亡路上引呢？

乔云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机制问题。有一次李真看了一幅漫画，画上有只猫，还有一只大老鼠，一只小老鼠，大老鼠对想逃跑的小老鼠说，猫是假的，别怕。在李真看来，很多制度就好像挂在墙上的猫一样，监督不到位导致他越来越贪婪。

下面是节选于乔云华著作中的几段与李真的对话。

乔云华：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

李真：做个好秘书。我在做秘书半年多后，一次看电影《焦裕禄》，曾使我泪流满面。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电影《焦裕禄》中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那时我想，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可现在……唉……

乔云华：追求权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和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它。

李真：这话说起来容易。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秘书了，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做了省国税局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有时也迷失了。

乔云华：你自己也曾反思，为什么信念还会一点点地丧失？

李真：有些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走升官发财之路，干肮脏龌龊的勾当、对我的信念产生致命动摇的除去看到个别高级干部逐渐走向堕落外，还有他们的子女，我看到个别高干子女吃、抽、穿、用极为豪奢，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是依靠父母的权力和影响，开公司、做生意牟取的暴利。我既羡慕，又不平。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

乔云华：在生活中，人们普遍看不起用欺骗手段待人的人，可为什么在升迁过程中，造假文凭、造假数字、摆假政绩等却成了个别人倍加推崇并且必用的手段？

李真：造假是一个省力、快捷获取权力的好办法。我曾去一个贫困县调研。

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号召大家要以焦裕禄、孔繁森为榜样，真抓实干，动情处几乎掉着泪说：“为了我县早日脱贫，我愿累……累死在这里。”当时，我听了很受感动。可没想到，他晚上到宾馆来看我，说：“我得想法调走。这个县太穷了，工作没法进展……老兄啊，这个忙你得帮啊！”他笑着，随手就给我送上了一个金虎……我看着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好像有种被愚弄的感觉……之后，他虽然没再说什么，但我感觉他脸上笑出来的皱纹里藏的都是谎话……

乔云华：老百姓骂贪官是不是骂到了你的疼处？

李真：我认为，他们恨的不止是我，骂的不止是我，包括所有贪官、所有做官不做事的人。许多问题并不大，也不复杂，但为什么非要等到你们记者曝光，或是老百姓反映到上面后，引起中央领导或省领导重视后才解决？关键就是有些人只知道权为己所有，不想为群众用，想回避矛盾、逃避责任、躲开困难，做和事佬！他们也清楚事情原委，就是不想管。事出了，这个批示，那个批示，实际上都是在文件上打“太极拳”。

乔云华：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李真：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能出去，我就要过一种无职无权、逍遥自在、无荣无辱的生活，归隐到那山清水秀的地方……

像李真这样由于无法控制个人私欲而蜕变的贪官可谓多矣。

据《江南时报》2000年8月1日报道，原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正厅级干部祁崇岳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祁崇岳把整个盐城的意识形态部门当成了他的家，他也几乎成了意识形态的化身。他一天不在电视上露面就不舒服、不高兴。他自封为理论权威，可在台上翻来覆去的报告几年里全是一个模板，实际上他早已无心学习，知识老化，结构陈旧，思想僵化。当省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个罪名决定对祁逮捕时，人们无法把市委大楼里那个戴着旧绒帽、常常工作到深夜的老头联系起来。

2000年7月下旬，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祁崇岳受贿近90万元，受贿对象几十人，受贿几百笔。

尤江泉是福建的一个工程老板，也是一个对祁崇岳行贿的大户。尤老板有幸结识了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祁崇岳后，立刻就财运亨通起来，不到一年，就先后接到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现盐城师范学院）和体育馆工程等7项业务。当然，“功勋卓著”的祁部长按照事先的约定拿到了一笔笔回扣。但是渐渐地，眼看着尤老板靠着自己的几个电话、几声关照就吹泡泡似地发了起来，祁部长有些不平衡了。

一个春日，尤老板进了市委大楼拜谒祁部长，闲聊间祁崇岳发现他脖子上的金

项链委实粗壮，一股不平之气又升腾起来：“小尤啊，现在盐城的治安很乱，你这个项链又太扎眼，不安全哪，我看，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保险，我帮你保管吧。”尤老板是明白人，赶忙从脖子上摘了下来给他。

到了这年的夏天，尤老板要回闽探家，到祁部长家里辞行时，顺口问了声部长要带些什么特产回来。祁崇岳轻描淡写地打了个哈哈：“福建的金器便宜，你就给我带块金砖来吧。”尤老板回盐城的时候，就真的给他带了块金砖（价值5 000余元）。祁的一个表弟因养殖对虾需要资金，就通过祁向尤江泉借资3万元。过了半年，这个表弟就把钱还到了祁手里。尤江泉明里暗里要了几次，祁崇岳都来了个“王顾左右”。再要，祁部长不高兴了，干脆直言：“小尤呀，你也太不懂事了，这个钱你还想要吗？”尤老板的3万元钱就掉进水里都没听个响。

滨海的个体老板郭某仅仅求祁崇岳将儿子从郊外进城的调动办成了，从此也就欠下了他永世难偿的债。事情办成后，郭某给了1万元，祁崇岳的女儿结婚，郭某再给1万。后来，已经升任盐城市委副书记的祁崇岳要买房子，向郭一开口就是5万。郭大年初一就捧着4万元现金送到了祁家。可是祁崇岳又对郭老板念起了苦经：“哎呀，现在物价高，日子真是不好过啊。”郭心知肚明，几天后就又给祁家送去了1万元。

诸如此类，上了船就下不来的老板们还有好些。对此，祁崇岳也直言不讳：我们当了一辈子官反倒两手空空，对他们就是要狠些。

在向祁行贿的近70人中，想升迁而送钱的有10多人，想调动而送钱的有30多人，想安排好工作的有10多人，想让孩子上好小学、好中学的有10多人。不同时期的祁部长、祁主任向这些形形色色的要求开出的价码少不低于5 000元，多达4万。

祁崇岳是一个节俭的人，一日三餐常常是稀饭馒头，身上穿的常年是一套灰色布衣，不沾烟酒，不好麻将。就是唯一的儿子在徐州上了4年大学，他总共只给了他3 600元，甚至不如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家里的电器加起来也超不过2万元。他嘴里又常念叨着物价上涨、日子不易一类苦经。

这么多钱，不吃、不穿、不花，他究竟拿来做什么用了？说来令人瞠目结舌：放高利贷！清查下来，他共计借出的钱款高达160万元，年利都为20%~30%。借款人中有个体户，有私营业主，有单位企业，也有平民百姓。放债的方式，他大多是借口帮忙从银行转借，有时干脆亲自出马，直接成为债主，在利息上讨价还价。这样以权换钱又以债生钱、利上滚利的贪官实属罕见。

看不懂的“官场面具”

矛盾人格的第三种形态称为面具人格（也称戏剧人格）。

心理学家扬格在分析一个人的自我时指出：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有三个原型，

即：内我、暗影，以及假面。内我和暗影是一个人内心里真实自我的部分，而假面则是表现在外的社会面人格。如果人生是个舞台，假面就是表演时所上的粉彩，所戴的面具。

依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说法，人际的交往确实就跟一幕幕的戏剧一样。他在他所写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里提到：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当情境不同，每一个人该扮演的角色也会不一样。不管私下的真实自我如何，每个人都会试着在每个情境中维持合宜的形象，以便赢得别人正面的评价，就如同一位演员，不管在后台的原来面目如何，一旦站到台前，就会尽力表演所扮演的角色，以便赢得观众的掌声和肯定。

戈夫曼还指出：如果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中，能够成功地表现出被人赞许的合宜形象，就是“有面子”；相反的，如果表现的形象不当，就是“失面子”。

所以，扬格所说的“假面”，其实是代表着个人和社会间的一种妥协。人们所做出来的行为，通常是以他觉得应该怎样做来表现，而不是以他想怎么样来做来表现。

表现出合宜的社会性人格，事实上就是指“形象的整饰”。依照心理学上的定义，“形象的整饰”是指：控制对我们形成各种印象的过程。在人际交往的场合，我们经常会选择合宜的言辞、表情、动作、姿势和衣着，期望在别人心目中留下良好而鲜明的印象，以便维持彼此的社会关系。

扬格与戈夫曼所描述的情况，无非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角色理论”。每一种角色（地位、身份）都有不同的角色期望，要求某种角色，即不同地位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如领导与下级、家长与子女、老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其行为模式包括言谈举止都有所不同，这也是一个人社会化所必需的。一个商人满口污言秽语，社会可以原谅；可一位教授随地小便那就是大逆不道。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不同情境条件下扮演不同的角色，也由于角色期望不同，每个人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也就可能不同，从而形成“角色冲突”。“角色冲突”经常是正常的，否则就可能“角色混淆”。

前面谈到的情境人格与这里谈到的面具人格与一般的角色冲突不同，正如前述：人格本身就涉及稳定的心理结构，也与道德评价有关。随机性的“角色冲突”不在此例。另外，面具人格也可能由于情境的压力（社会情境压力与个人情境压力）的作用产生，与情境人格并非截然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面具人格是出于更为主动的突出的行为动机以隐藏不便为人知的本来面目，简言之，其行为特征更为“戏剧化”“表演化”。

表演本是演员在银幕上等的演出技能，眼下却成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给自己“美容”的主要手段。正所谓“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2003年9月26日的中

国新闻网刊发了题为《一位“廉政局长”的双面人生》的通讯，披露了曾当过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并曾荣获“全国先进思想工作者”称号的原武汉市市政府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饶有趣味的表演故事。

明九斤在担任武汉市市政府建设管理局局长期间，有着众多廉政事迹。他平常穿着价格便宜的衣服、裤子、皮鞋，有时甚至袜子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在单位食堂吃饭；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敲打”、提醒下属“防微杜渐”；在其办公桌上，《党风廉政守则》白纸黑字格外引人注目；虽然买了新房，可他仍然住在拥挤陈旧的二室一厅里……此外，明九斤对亲朋好友也“铁面无私”。尽管他的弟弟、妹妹都是下岗职工，可他却不苟私情、不滥用手中权力，致使弟弟只得依靠人力三轮车为生；妹妹以帮人守摊为业。因此，他被单位职工誉为“廉政局长”。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查处某审计人员违纪案件时，顺藤摸瓜，致使“廉政局长”明九斤东窗事发。检查委员会调查发现，这位表面上工作兢兢业业、衣着朴素、经常给下属敲廉政警钟，甚至在被捕前夕还大谈特谈自身如何高洁的“廉政局长”，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收取“感谢费”、拜年礼金，共计47万元。

“希望在位的干部能够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接受法院宣判的明九斤依然衣着朴素，手拿稿纸，习惯性地掏出眼镜，不过他并不是在作廉政报告，而是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泣不成声地陈述自己的人生教训。

熟谙表演之道的不乏其人，类似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鲸吞了国家巨额资产、常常拥着情人进入梦乡的成克杰，在电视上所说“广西还有几百万群众没有脱贫，我这当主席的睡不着觉呵！”的一席话，说得人们心里热乎乎的，其心系百姓的公仆形象立马树了起来。

“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前面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这是安徽省阜阳市肖作新当上市长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慷慨陈词。但就在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总额近100万元。

原湖南省湘潭市副市长朱少中，曾在网上发表一篇题为《反腐倡廉，教育在先》的文章，痛斥“崇拜金钱，权力至上”，大谈反腐的经验。可是根据检察机关公布的消息，朱少中在担任湘潭县县长、县委书记，湘潭市副市长期间，涉嫌大肆受贿、滥用职权，先后收受贿赂上百万元。

被判刑13年的原江西省南昌市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曾新民，平时穿着朴素，不是着警服，就是穿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最

让老百姓感动的是，曾新民在大会小会上大讲人民警察队伍应该怎样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应该如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在南昌许多市民的眼里，他是个“廉官”。然而，他暗地里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几十万元。

原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走马上任时，第一件事就是在班段长以上干部大会上，对自己约法三章：在任职期内不购买小汽车；在兰钢以外不搞宴请；不用公款为自己树碑立传。尽管是威震一方的总经理，张斌昌上任后却一直住招待所，过着俭朴的生活，很快博得了清正廉洁的好名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然而，背地里他却拼命捞钱，长期与多名情妇淫乱。当办案人员查出他125万元贪污受贿的赃款，以及其他来历不明的巨额钱财和贵重物品，还有其与情妇淫乱活动的录像带、黄色照片时，整个“兰钢”震动了，不少人还问“是不是搞错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位勤政廉洁、艰苦朴素的“好公仆”，竟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大蛀虫”。

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桐，上任伊始就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曾锦城的沉痛教训，提出了“要让廉政在全省公路上延伸”的响亮口号。可结果是，张昆桐“腐败在全省公路上延伸”。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便是“做戏”。国人惯于把做人和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演得很卖劲。“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诚如先生所言，倘若现实生活中官员的表演、做戏成了气候，“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具有面具人格的贪官更具备欺骗性因而更具有危害性。其中，不少热衷于腐败的贪官还是立言反腐败的高手。曾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的李国富利用分管省人大基建工程的权力，大肆向包工头索取贿赂，从起初的胆战心惊到伸手索要，狮子大张口，受贿数十万，2002年底被判刑13年。这些都没有脱出贪官演变史的俗套。

所不同的是，李国富喜欢舞文弄墨，懂得为官立言至关重要。李决定出一套书，分为经政、经科、农科等分册，以示学识广博，是个全能型干部。可他真正动起笔来才知才疏学浅，无奈之下只好组织了个草台班子，拼凑了一本《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草草收场。紧接着，李又动手想出第二本书《反腐败论》，亲拟提纲写序言，后因案发出书之事就此搁浅。

原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李太银，因发表《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败小说，成为四川出名的“反腐作家”，然而，当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蚀蚀》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却从正厅级官位上栽将下来，成为四川出名的腐败局长。热衷于反腐败的“反腐官员作家”栽在腐败上，在太平盛世的“警世通言”中又增加了一

出讽刺小品。

原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百万巨贪卫建设，让人以他为原型创作上演了小剧《铁面局长》，在当地轰动了一番。原深圳南山区区长何本初爱好杂文，名篇《廉者长乐》被传媒转载，其杂文集《咏竹》着力提倡共产党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革命气节，让人难以相信他是个贪官。

贪官所以要“立言”反腐败，除了以书邀功，作为晋身之敲门砖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贪官言伪而辩。“王莽谦恭未篡时”，用谦恭的假象创造篡位的条件，一旦时机成熟，本质就赤裸裸暴露了。

27

南岳衡山的第一炷香——迷信趋向

租美国卫星看风水

“迷信趋向”，望文生义为做什么、不做什么取决于“天道鬼神”意志，这是一种中国人流行的意向障碍。如今，一些大城市预定喜宴要提前两年。为何？皆因皇历上标明的“宜嫁娶”的日子就那么几天。受“十羊九不全”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全国各地在羊年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待除夕零点钟声敲响，许多孕妇才放宽心进入产房，而猴年由此成为罕见的生育高峰。

重庆一对恩爱夫妇因属相“白马青牛”乃相书大忌，竟心生疑惑，继而忐忑不安协议离婚……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更迷信，较之上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几年流行的“相书热”，读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反之许多上辈对此却嗤之以鼻。

一位外地朋友在笔者赴杭州前说：“杭州的‘相命文化’够发达！”当时笔者付之一笑，并不在意。可细细留意一下这座文化名城的街头巷尾、大小书摊之后，笔者不由惊诧不已——人称“金三角”的武林门一带，与一大溜一字排开的算命摊相媲美的是，书摊上各种相书几乎是应有尽有。仅在靠近客运码头一家个体书店里，笔者就抄录了这样数种：《相学秘籍全编》《紫薇斗数》《问面188》《问手188》《如何改变命运》《相理衡真》《麻衣相书》《柳庄相法》《卜筮正宗》《古代占梦大全》《命运与人生》《占测人生》《择吉全书》《古代风水术》《观音一百灵签精解》等。由某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易八卦预测》一书，薄薄的书加一只棕黑色相间的倒碗形“预测仪”售价高达45元。

“这么多相命书，会有人买吗？”笔者带着一丝困惑问店主。那店主神秘一笑：“想买哪种？这些书销路都不错，每天至少可销一二十本。”店主说着，从后柜里挑出一本书扔在笔者面前：“哟，这本书挺不错的，许多年轻人都来买。”

笔者好奇地拿起一看，原来是一本某出版社出版的《命运与神相》，书不厚，还散发着阵阵油墨香，可粗粗一浏览，里面却充满了“惊人”之语，不妨摘录几句，权作“奇文共欣赏”。

如果你的面部上中下三部分都匀称，那你必然是一个万能的选手，可以八面玲珑。

假如你的耳朵过大，你的配偶会病弱早逝，纵然他身体很健康，也避免不了命运的安排。

你的眉毛又黑又长，则有好运兆；可你的鼻肉薄，舌短，难长寿。

……

绘声绘色的描述，加上一大串的实例“剖析”，无非想告诉读者一句话：你的一切吉凶祸福早已刻在你的面相上！

“金三角”如此，人称“文教区”的文二路、教工路、翠苑一带，情况也大致相仿。在位于文二路与教工路口的华青书刊店，一本由某出版社出版的《自看手相》一书，据说已经脱销好几天了，就剩下一册因印刷质量问题而放着做“样本”的书，也有不少学生模样的人争相翻阅。笔者问一位正在津津有味翻看此书的女学生：“你相信书上说的吗？到底准不准？”

该女生腼腆一笑，轻轻“嗯”了一声。此时，旁边的另一位学生则插话道：“这玩意儿神得很呢，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实在难以言传。”

笔者一时语塞。

相命书籍的大量出版，正好给阴魂不散、沉渣泛起的封建迷信活动，提供了可趁之机 and 滋生的土壤。许多读者，尤其是一些谙世不深、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极易受误导而“中毒”上瘾，难以自拔。

有一位属牛的初中生，一次在书摊上买了一本星座属相之类的书，顿时被书中的“高论”迷着了，逢人就说自己是“高贵命”，会一生顺遂。从那后，他不再用心学业，成绩一路下滑，老师、家长见状，苦口婆心地劝说。可他不仅听不进去，还捧出一大摞相命书振振有词：“你看，你看，书上说我属相好，有大运，难道会假？”对此，教师、家长徒唤奈何。

如今，中小学生热衷看相算命，考前拜佛烧香已非个别现象。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会曾进行过一项抽样调查，结果被调查的18万中小学生中，有45.5%的学生相信“人的一切乃命运决定”。这与相命书籍的泛滥密切相关，值得人们深思！

不仅如此，在堂堂高等学府中，也出现了一股相命“预测”热。某大学一位古典文学博士生，自称在《周易》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看相预测乃拿手好戏。于是，

他的斗室便成了慕名前来学生的“算命房”。他每当此时，总是拿出一本本周易八卦方面的书籍，择其“精髓”向学生们大谈看相预测的理论依据，还油印了八卦算命的小册子，向“崇拜者”高价兜售。一时间，八卦看相类书籍在校园内成了大学生们的俏手货。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相命类书籍大都有着较精美的包装，“弘扬古代神秘文化”或“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等。果真如此吗？就让我们看看书中到底宣扬了些什么？

且以面相书为例。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篇“说明”人的目、鼻、人中、耳、唇、口、齿、舌、额、下巴、胸、腹、手、足、声等与人的命运“戚戚相关”。几乎每本书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人的形貌决定了其命运。它能预测其未来的寿夭、贵贱、吉凶、福祸……反复向人“灌输”——目秀而长之人，必近君王；龙睛凤目者，必食厚禄；鼻准洪直、富贵无限等观念。有本书声称：“非但掌纹，人周身的所有皱纹都与命运有关。”还有一本书更是煞有介事地说：圆脸的人柔顺，长脸的人好斗，瘦子显得没福气……

若据相书理论，对人也用不着观其言行、察其性情，仅需观其“相”就可断定他的一切——是贤仁还是奸诈，是富贵还是穷困，是伟大还是渺小！按照“相法”，那世上所有相貌堂堂的俊男靓女们，一定是飞黄腾达、一帆风顺。可现实生活中会许多的“美髯公”锒铛入狱？又有不少“佳人”香消玉殒？相反，当今一些有成就、有名望的企业家、科学家和学者中，“鼻薄身短”“长相命贱”的人何以又不在少数？

可见“弘扬传统文化”云云，不过是“画皮”一具，不堪一剥！

神州大地流行“相书热”，如影随形，“算命热”也方兴未艾。

曾几何时，神汉、巫婆、风水先生这些“四旧”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鬼鬼祟祟，东躲西藏，提心吊胆被“打击”了。今天，在不少地方的车站码头、街头巷尾，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簇簇的算命摊，他们看相、算命、抽签、卜卦、测字，林林总总，应有尽有。甚至电脑这个20世纪科学的骄子也成了迷信的工具。一幅幅“电脑算命，保你灵验”的招牌，煞是显眼。

金钱的诱惑，使得许多早已洗手不干的神汉、巫婆重操旧业。一些人看到有利可图，也纷纷成为新一代的“迷信专业工作者”。

在绍兴，有一个姓李的神汉。他凭着一三寸不烂之舌，蒙骗了不少人，从早到晚前来问仙的人络绎不绝。过去，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如今，他在县城盖起了三层楼房，家里彩电、冰箱一应俱全，成为远近闻名的“迷信万元户”。

据报道，四川成都市出现了“算命一条街”——西城边街和“算命市场”——蜀都大道四川省图书馆的对面，算命先生每日达数十人。光顾者中，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的占2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4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5%。

在沈阳市，还出现了“算命帮”，他们流窜各处以算命为业，其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市内各大繁华地段，从业人员已发展到几百人，而且形成了明显的行帮组织，划分地盘，统一价格，固定地点。

随着“相书热”“算命热”的流行，“风水热”也披着科学的外衣粉墨登场。现在已经有大学（主要为建筑类）开设了风水课，其宗旨名曰：用科学原理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笔者先后两次听了不同大学的风水课，听了半天仍然是“左手青龙，右手白虎”之类的老套，至于科学原理则要么一语带过，要么牵强附会，要么含糊其辞。平心而论，所谓风水学问，必定有一些合理的科学的内核，就像算命先生善于察言观色、八面玲珑而取得人们的信任一样。但传统风水绝非科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目前，有关中国富豪暴发背后的风水玄机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2008年，一份题为《中国富豪风水调查》的报告结果让人有些吃惊：超过98%的富豪相信做生意是要讲究风水的。其中做生意前就相信风水的占48%，做生意后方觉得风水必须相信的占50%。另外，企业与富豪本人有专门风水顾问的占77.8%，每年要请风水顾问的则高达96%。

“我曾经利用易学理论来决定人力资源方面的调整。”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在谈到易学应用的时候说，“当时我们项目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业务人员，但她的做事风格与周围很难融入，而我通过周易的生克关系，重新进行了职位调动，最终实现团队和谐、业务快速提升。”

这位总经理是一位周易研究爱好者，他并依据所学的周易理论，将人员调配与中国五行相结合。他的做法是，“火性的人，你要他搞研发，那肯定完蛋了，不如让他去搞推广；金性的人最好让他开疆拓土，如果让他闷在家里，那就完全浪费了；水性的人，你让他做战略、做管理，这都是很好的；木性人，做事严谨，属管理型，比如说质检，就需要这种类型的人；而土性人，比较实在，做一般的员工，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依据周易五行理论，他对公司的各个部门进行了分析之后，明确公司的每个部门是什么性，要配什么人，找对了就会变得好管理。

对于公司经营方面，周易同样被重点“利用”。如今大多数房地产公司，多会通过聘请咨询顾问的方式，利用周易的衍生学科——风水术来解决选址、规划、建筑设计等问题。

据在北京小有名气的风水师王某透露，商界、政界、警界、娱乐界都有他的忠实客户，尤以企业家为主。“地产商跟风水不分家，有一块地皮，能不能要？怎么盖？如何装修？几乎每个环节，地产商都会请我们过去看看，如今地产的不景气，让地产商更加依赖风水师，他们一般会请几个风水师来看。”据悉，成都一位地产商使用7万美元租了美国卫星以察看风水。

一直在IT界做得顺风顺水的景先生，6年前经朋友介绍开始接触风水师，如今，他说自己也可以粗略地讲讲自家的风水了。而景先生身边的朋友们，但凡买房子、搬家、迁祖坟，都会请风水师帮忙，有的甚至会每年固定付给风水师一定的佣金。“现在生活中说不准的事情太多了，找风水师，无疑是希望保持好运势。坏运势通过办公布局的调整、家具布局的调整也能够有所改善。总之一句话：家庭和谐。”景先生说。

如今中国还流行“求签热”，其中一大批生力军竟然是受过科学教育和无神论教育的学生。

2007年4月1日《重庆晚报》报道，一年一度高考临近，寒窗苦读12年的学子们都希望自己能高考中榜，而一些学生为求高考成功，成群结队前往寺庙烧香拜佛。

在一排神像前，十几个青年紧闭双眼，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轮流给各尊神像一一下跪磕头，十分虔诚。“头都没有磕下去，要重磕，不然高考要倒霉哦。”一位刚磕完头起身的男青年小声地提醒身边的伙伴。

这十几位青年当时正在四川美术学院培训，准备参加高考。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在高考中交上好运。此次结队烧香是一名叫黄东东（化名）的男生所发起。黄东东高考落榜后，发誓一定要在来年考上大学，为此他决定来寺庙求好运。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学，大伙一拍即合。“我希望以后能考上摄影专业。”黄坦言，“烧了香，大家心态可以更放松，学习起来就更轻松了。”

“大伙都是临时抱佛脚，平时都复习得不好。”身处一旁，17岁的陈丽丽（化名）在功德箱内丢下五元钱，并敲响了代表“美梦成真”的大钟。她悄悄地告诉记者：“这次来寺庙，我没有告诉家长，说了就不灵了，也怕这样的特殊方式他们不接受。”

“价格越高越灵验，心头才踏实。”按照香烛的长短和材质，价格也不同，而黄东东一行人选用了寺庙里最贵的香烛，总共花了700多元。对于一个月只有几百元生活费的学生来说，这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少吃几顿饭，高考能出成绩就行。”黄东东说。

“这两天来烧香的学生特别多。”该寺庙住持告诉记者，每年高考前夕，寺庙都会接待许多学生，并且人数还在逐年增加，“他们都希望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高考前不少学生成群结伙烧香拜佛，高考后仍然成群结伙还愿，这已经成为不少寺庙道观的“风景线”。某年，自高考成绩公布后，游人原本不多的黑龙江省博物馆大成殿，连日门庭若市，前来拜孔子像的考生络绎不绝，他们多由家长陪着，有的把鲜花、水果、烧鸡等食品供奉在案上，有的则毕恭毕敬地为孔子像披上红袍，仅一个星期，孔子像就被披上红袍四五件。据该馆解说员说，一些考生在高考

前即来此许下“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心愿，以此激励自己。有个平日学习成绩一般的普通高中女生来此拜过孔子后，考上大学。家长连说真灵，知道成绩后马上来给孔子“披红”，以示感谢。

求神拜佛在中国还有一个“本土特色”，那就是把凡人也视为神佛进行礼拜。

我们当然不能把宗教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差异的重要标准就是神道的超自然力量是否仅仅为精神信仰还是物质现实，这一点把我国的封建迷信与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做一对比就知道了。在美国，信仰上帝的人特多，但不会较真，更不会因为崇拜华盛顿、林肯而烧香拜佛，乞求他们保佑。

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就精神领域来说，就大多数人而言，美国却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美国有90%的人相信宗教，分属于220多个基督教派，其中最大的教派是天主教，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新教。78%的美国人每周至少祈祷一次，50%的美国人每天祈祷一次。美国有个非常出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它每隔几年就搞一次民意调查，题目是“美国人最信赖的机构是什么”，结果常常是教会和宗教派别列在第一位。美国宗教界对社会问题比较关注，对美国所面临的暴力犯罪、吸毒贩毒、艾滋病蔓延、家庭崩溃等严重问题极为关注。宗教界各派还参与避孕、堕胎、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的讨论。尽管如此，美国人仍把宗教视为精神上的指南。

但美国又是一个在生存发展中轻迷信重实验的国家。实质上，美国的有神论，与那些宗教立国或政教合一的有神论是大不相同的。严格来说，美国只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它仅是一层外皮，唯心的外皮却包着一个唯物的核心。信仰宗教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归宿。但这种信仰却是统一在生活本身唯物辩证规律所展现的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实践信条中的。最能证实这一论点的铁石般的证据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对金钱万能的崇拜。如果没有这两个唯物，也就没有美国精神。只有当这种追求和崇拜，在遭到挫折、打击或感到失落时，他们才会跪到上帝的脚前去细语一番，说祷告也好、忏悔也好，都是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需要，不会较真的。

“缩阳症”酿成的惨剧

迷信趋向曾经被社会学家斥为社会“毒瘤”。“天道鬼神”一旦走火入魔，还会上演出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

《人人健康报》1995年第02期刊载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小安罪恶的一生。

是什么力量把小安推上了断头台？用他自己的话说：“迷信冲垮了我的理智，算命先生判了我死刑，我罪有应得，我死有余辜……”

冬季的一天，小安赶集遇到一算命先生，好奇心促使他测上一卦。算命先生见他诚心想测算绿筮（寿命），也没推辞便掐指算来，一阵装腔作势之后，突然脸色大惊，尔后“唉”了一声转身离去。小安莫名其妙忙拉住先生让他说个明白。先生装出无奈的样子说：“小伙子，你原来是白虎星转世，福大命薄，寿命只能到22岁生日那天。”小安半信半疑拿出卦钱，可算命先生又说：“活人不要死人的钱。”这时小安如雷灌顶。迷信冲倒了他不信邪的最后防线。他一路郁郁不乐。回到家后，小安一夜未眠：“我现已22岁半，离死去的日子还有6个月，如此死了岂不白来人世一趟，何不快活一番再死？”一个可怕的想法闪过之后，小安开始策划他在有生的日子里怎样“快活”。首先是吃、喝、玩、乐，没钱怎么办？偷，于是他连续盗窃他人钱物，然后大把挥霍，尽情享受。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他竟顺利作案27起。物质欲满足之后，他又把魔爪伸向女人。为了不让事情过早败露，他采取奸后灭口的残忍手段，先后奸杀7名无辜少女。距他22岁生日只有26天的时候，公安机关破获了此案。当公安人员审讯他时，他对所犯的事实供认不讳。他最后说：“反正我只有26天的命了。”可生日过后迟迟不死，此时，冥顽不化、罪大恶极的小安才大呼上当，但为时已晚！在公安机关将他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已超出他22岁生日的三月有余。迷信把他推向罪恶的深渊。

《人人健康报》还披露了这样一则新闻：中秋节这天，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刘冬香与丈夫张金桥一起，携带3岁的女儿回到娘家长塘村。上午10时许，刘冬香、刘伯清，与其父母和张金桥一起，把家门关上，将刘冬香女儿的衣服剥光按在床上“捉虫”，相信女儿是自己克星的刘冬香，先是用指甲在女儿身上疯狂地抓刺，随后不顾女儿浑身血流如注和凄厉的叫喊，在其父兄的帮助下往女儿嘴里强行灌水，当其女儿腹部被水撑得鼓胀起来后，刘冬香抓住女儿的双脚倒提起来，猛力摆抖。然后将该女放在床上，由其父抓头，丈夫提两脚，刘冬香将手从其3岁女儿肛门插入，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刘冬香一下将女儿的肛门连同大肠撕了下来，并交给其兄刘伯清。刘伯清接过来后，丧心病狂地将侄女的肠子从腹腔中拽出，像缠线团一样缠绕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打开屋门，对200多名听到喊声而赶来围观“捉鬼”的人们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太阳之神！”

封建迷信的残渣已使“伦理亲情”走火入魔，凶残而又疯狂地吞掉了与他们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3岁的女童！

某日晚8时，酒后熟睡的吉林省通化市某村民张某，突感一阵剧痛，双手本能地触摸阴部，睁眼看时，半截阴茎被已剪断，血流如注。张某撕裂人心的嚎叫，惊动了外屋看电视的儿子。10多岁的儿子看见继母手持亮铮铮的剪刀站在地上，爸爸裸露下身坐在炕上，下面漫延着一大摊殷红的鲜血……孩子连忙奔向派出所报案。

这起残忍的伤害案，是因夫妻感情不睦引起的。案发前几天，张妻曾找过一个巫婆算过一卦。巫婆说：“若想夫妻和好如初，必将他用酒灌醉，用剪刀剪断其阴茎，让它重长。这样不仅能消灾免难，以后定会发大财。”她深信不疑，终于做出了这件可笑可悲的荒唐事。

巫婆罪责难逃，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张妻法理不容，也被拘留审查；张某身心备受摧残。

某日家住大兴安岭松岭区的宋家正准备祭神。宋华（化名）让大女儿宋梅（化名）拿“龙墩”给自己坐。女儿没拿，宋当即打了她两记耳光，并暴跳如雷地打了闻讯前来劝架的女婿和邻居。吵骂声触怒了“大仙”——宋华的妻子刘香（化名），她以“神”的口吻指点说：“快，用绳子把老头捆起来，掐住脖子，否则200人也不够他杀！”“神”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在场的儿子、女儿、女婿及两位邻居，一拥而上按照“刘大仙”的吩咐，把宋华缚得结结实实。大女儿觉得还不过瘾，忙叫人卡住他脖子，捆住双手。不一会，51岁的宋华就断了气。刘香又叫大女儿把父亲的脖子砍断，并指点道：“快把尸首拽出去，往东南方向拽，越远越好！”抛尸回来后，一家人竟庆功似地大吃大喝起来。

席间，刚从外地归来的长婿对岳父的死表示异议，当即遭到众人的斥责，说他是宋华受指使回来杀全家的。长婿争辩了几句，“刘大仙”就喊来儿子、长女及另两个女儿等人操起鞭钩、大棒向长婿打去。他猛喊“救命”，并逃出门外，可是众人紧跟不舍，不一会就倒在岳母、妻子的脚下，命归黄泉。“刘大仙”还不解恨，又叫女儿把他的头砍下。

.....

类似的惨剧还在不断上演。

为何“天道神鬼”在现代中国反而俘获了不少少男少女的心？为何“迷信趋向”在现代中国不仅未绝迹反而愈演愈烈？

人类历史的早期，大自然的宰制，对于人类的力量来说，具有极大的威力。面对这种无情的压倒性力量，人类无力的心智不免产生一种无奈的崇拜。于是，人类将自身的人格向外映射，把自然力量加以变形，臆造出各种神祇，诸如中国古代的山神、河伯、龙王、土地公；西方古代的宙斯（雷电之神）、波塞冬（海神）、阿波罗（太阳神）、赫淮斯托斯（火神）等。对它们的顶礼膜拜构成了最持久的迷信活动。所谓“持久性”，一方面是指它在普通民众心中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指它直到今天在某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民族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迷信的深厚心理基础和相当的影响范围，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社会进步就会滞后，大众的精神利益、物质利益就要遭受侵害。

剖析迷信趋向的发生发展与人们的内心软弱有关，寄托于“天道鬼神”则出于

本能地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其中的软弱性则来自于无知，这种无知导致了人们对“天道鬼神”的无条件服从。海南岛曾经“流行”的“缩阳症”即是例证。

“缩阳症”取意于《黄帝内经》：“阳缩入腹者，不治。”普遍的症状是人在精神紧张之时，阳具、乳头产生往体内收缩之感，该症带有一种突发性、传染性与普遍性。

据《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8年03期《海南岛缩阳症流行的社会心理因素初探》记载，此症曾经20世纪80年代初在海南岛蔓延，规律是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当地的人坚信，揪住他们的阳具、乳头往里缩的，是那只十恶不赦、专门下到阳间来采集生殖器的鬼魂能够投胎的土狸精。当缩阳症袭击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发病率有时高达70%时，有的地方对缩阳症的恐惧，已达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如由某县人民医院刘其献揭露的陈娣莲被殴打致死的前后三天，是该县县城发病的高峰期，县上人人关门闭户，街上行人稀少，商店早早收市。人们在街道路口则设置路障，派专人把守，不准外人进入，以防土狸精乘虚而入。附近的许多村庄，自发地组织起来，抬着石狮、石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上街游行，驱邪赶妖。若是谁不幸惹上了缩阳症，亲戚和村民就会就近端起盆提起桶，猛敲猛击，企图用激烈的声音将土狸精吓跑。再不然，就是用打鱼的网，将患者团团罩住，用折来的绿树枝狠狠抽打，直到他痛醒过来。若是女性患者，会有一群妇女扑上去，用手猛挖或用口咬住她的乳头，甚至用铁线穿起来拴住；若是男性患者，会有一群男人扑上去，用铁钳猛拔、猛钳他的龟头，结果使许多男人的生殖器受损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喧闹的锣鼓，震耳欲聋的鞭炮，伴和着人们的哭泣与喊叫，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才平息。整个事件显示，“缩阳症”已远远超出了迷信的范畴，不仅与人的精神焦虑、紧张等心理有关，更跨越了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界限，与许多社会传统历史因素有关，但毋庸置疑的是，惧怕土狸精带来阳痿这种迷信的心理暗示，仍然在整个罹病的人群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各类无中生有的传闻中，恐惧的心理暗示还诱发群体性癔症。恐惧情绪的感染、互动、循环则导致了人们的疯狂举动。

迷信趋向在我国的死灰复燃甚至扩展蔓延，说明了进行无神论教育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科学普及的重要性。然而现在的领导阶层，不少长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以及党性教育的领导干部亦卷入迷信趋向的漩涡之中，不能不使人深思。

有的官员甚至在东窗事发之前曾找人看相算命。原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张新民，因受贿罪被判刑8年，他对司法机关交代：“我出国以前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犯‘天罗’，有牢狱之灾。从那一天起，我的心就像在油锅里炸。”

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赃官也相信算命呢？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对神灵的

迷信产生于对前途命运的不可知和不可抗拒的一种恐惧与惶惑。周宝法和张新民也算是高级党政干部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应该是他们春风得意的时候，还有什么担忧呢？正是因为他们以党和政府大官员的身份犯下与党和政府的宗旨相违背的罪行，所以才对自己命运有所担忧而去算命。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这些赃官都喜欢在出国前算命，有什么共同的心理基础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越在幸福的时候，越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生怕得而复失。如果这幸福是以非正当手段得来，那更是患得患失、惶恐不安。这种心理连低等动物也一样，例如家中的猫，你喂它一条鱼，它吃得心安理得，旁若无人，一边吃一边喵喵呜呜地“咏叹”。但若这条鱼是它从鱼缸里偷的，它就会东躲西藏，虎视眈眈，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安心偷吃的地方。所以，经验告诉人们，官员找人算命，大部分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

当然，官员迷信与其内心的信仰危机有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势必是心怀坦荡、无所畏惧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官员包括领导干部对“天道鬼神”顶礼膜拜呢？后面揭示的官场迷信更使人们为之不解。

升官桥·粮神殿·镇妖塔

风水本意为“藏风得水”。《葬书》释曰：“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堪”指高处，即天道，“舆”指低处，即地道。顾名思义，风水是研究天道与地道之间相互作用于生活的一门学问。

中国风水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经过唐宋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顶峰。风水的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它强调建筑与自然及周围环境的和谐。从某种意义讲，风水学中的合理因子可成为建筑生态学的参考，但这不应该成为封建迷信的一个理论依据。然而，恰恰相反，讲究风水已经成为官场时髦，众多官员讲究的不是什么建筑生态学，而是个人的官场升迁，逢凶化吉。

“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时，曾因一风水师预测他“5年内成为封疆大吏”，一高兴就给了对方8 000元。

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文超热衷于看风水、建陵园，历时3年修建一座豪华“活墓”，上书“官爵至五品”。

原湖南副厅级官员李会刚，因一“大师”预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就拿了149万元奔京城去购买官位。

原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唐见奎，因南岳衡山一小庙和尚“算准”了他升迁的几件事，就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那小庙修了条水泥大路。

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正厅级干部邹恒春，酷爱占卜算命，最崇拜

长沙开福寺的一个老尼姑。该尼姑曾“预测”他在50岁之前会遭遇一次车祸，政治上也会有一劫。2002年他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自己命该如此。

原陕西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委书记张改萍，痴迷于烧香拜佛，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外地僧侣来到商州，亲自组织并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

原山西省交口县领导班子，请风水师到县委大院看“风水”。风水师称县委大院“风水”不好，破解之道是在比县委大院低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县城里兴建牌楼，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在风水师的指点下，夜深人静之时，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于香案前，在县委大院内埋下桃木弓箭、铜镜、升官符等物。县里还以各种借口重建看守所、兴建牌楼，并在县委大院的房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墙，以高出其他建筑物一头。

从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升官桥”，到原山西省粮食局局长高志信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建起的“粮神殿”，再到引起舆论关注的湖南怀新高速公路“镇妖塔”，可以看出某些官员对风水学的痴迷崇拜。可是，官员迷信风水之风是如何兴起的？为何迷信风水之风愈刮愈烈？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程萍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表明：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文化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是只有不到50%的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中的任何一种迷信形式。而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的比例，甚至高于普通民众。

据调查，在目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官员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其规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县长、处长们，几乎全部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有不少人曾在党校进修过。

随着“风水申遗”以及某些大学开设风水课程，风水“大师”们的行为已不再遮遮掩掩。据说，风水“大师”们的客户主要是商人和官员。

一位风水师曾给沿海某省的几个地方一把手着重“看了看办公室”。其中，在某官员办公桌的东南角，这位风水师摆上了一尊铜钟，按照业内的说法，这是一个“金钟罩”，能把位于东南面的官运拿过来。

据风水师们称，官员们比较喜欢符咒。这些画着只有风水师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的纸片，通常会被放置在办公室的一些很隐秘的角落，比如说抽屉背面、挂钟后头，甚至用水泥封在地板下。

官员追逐风水，最大的心理动因是对官位和金钱的迷恋。据调查，对一些官员而言，风水最大的功能就是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在他们看来，是生活唯一的主题。于是，公共建筑就成为他们寄托对官运、财运无限憧憬的

最好载体。

胡建学从“大师”处得知自己有“入阁”成为副总理的运道，但命里还差一座“桥”，他便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工程改道，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桥虽建起来，但该书记非但未能“过桥入阁”当上副总理，反而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

2007年6月初，被中纪委通报的原山西省粮食局局长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擅自修建专用于接待的宾馆，并在宾馆附近建起了“粮神殿”，在殿中为个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并将各地粮食部门负责人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牌位上，与神像一并供奉。

官员追逐风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消弭灾祸。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其石家庄和北京的住宅内都设有佛堂，供奉佛像。其卧室被褥下面铺着一块红布，上面衬有黄绫，四周缀有铜钱。黄绫下面压着五道佛敕，枕头底下还有五道道符。这位丛副省长不光经常到各地求神拜佛，还身入空门，拜山西五台山住持为师，得赐“妙全”法号。为了表示对佛的赤诚，丛福奎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该住持一辆轿车。

据某省纪检部门统计，近几年来该省查处的厅级干部，身后大多有“大师”晃动的身影。

此外，为求心灵安顿、寻找精神寄托，也是官员追逐风水的的一个原因。调查发现，在笃信风水，并以风水因素和个人意志左右公共建筑模式的官员中，也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许升迁无资格，敛财无胆量，但他们的信仰已经失落，心中不再有对真理和人民的敬畏，也不再满怀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的崇高追求。这些官员心灵无处安顿、精神无所寄托，对于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应当如何行使，便没有了方向感和使命感。于是，一些风水界“从业人士”便乘虚而入，成为这些官员的决策“导师”。

有的风水师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皮包公司，以方便官员用公款支付“风水”费用。在他们的“引导”下，一些无谓、无聊、甚至无稽的风水理念大量融入地方公共建筑，既给公共财政造成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建设的质量与格局。

一幕幕闹剧让人啼笑皆非，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的闹剧竟然可以发生在科学文化的重镇——卫生局。

据《人民日报》1999年10月15日第3版报道，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县长蓝华兴接到群众匿名举报信。举报信称，该县卫生局领导班子在迁入新办公楼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请来“道公”念经驱邪，领导班子成员甚至“脱光上身，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圈子……”蓝县长十分重视，当即批示：卫生局领导如搞迷信，坚决处理。

当县纪委干部来到卫生局新落成的办公大楼进行走访调查时，看见贴在该局办公楼过道两端和财务室及党员活动室里的神符尚未揭掉，随后，他们到位于三楼的局长办公室，向原第一副局长覃建安提问：据群众反映，局长室里安放有神位，究竟有没有这回事？覃建安竟然点头肯定，轻描淡写地笑着说，神位就在自己办公室后面的墙上。当纪检干部揭开挂在覃建安身后墙上的交通图时，一张张写有“四季大发财”“麟临到位”“姜太公在此”等字样的红纸神符，随风飘动，赫然醒目。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得知此事后，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从严查处。据调查，当初县卫生局盖起一栋漂亮的综合办公楼。本来搬迁到新楼办公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一些干部职工担心新址邪气太重、不愿搬迁的议论，使身为“一把手”的覃建安深有同感。一番苦思冥想之后，覃建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道公”前来驱魔镇邪，祈求平安。为此，他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堂而皇之地将请“道公”驱邪列入议事日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上至两位副局长，下到各部门负责人，竟没有人对此举提出任何异议。

为了请“道公”选择黄道吉日，装修堂皇的新办公大楼，闲置了两个多月。与此同时，覃建安开始安排张罗。3月中旬的一天，他让卫生局秘书覃某负责去请“道公”。由于覃某不太熟悉这方面的行情，又找来人事股股长韦某。韦在熟人的带领下，来到流水村中屯，经“两顾茅庐”终于请来了“道公”梁怀玉。

在梁“道公”的掐算下，搬迁吉日定在了凌晨。秘书覃某在覃建安副局长的安排下，依照“道公”所列清单，一一买来了驱邪用品：两只土鸡，半边猪头肉、三碗糯米和蜡烛、鞭炮各一捆……覃建安特意交代全局干部职工，这是件大事，如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原则上大家都要来现场。

3月24日零时左右，在覃建安的主持带领下，众人纷纷解下身上所佩钥匙及手机等物，放入篮子里过油锅，祈求平安发财，并跟随“道公”屋内屋外团团转圈子……两个小时后，驱邪活动于梁怀玉的敲铃念经声中拉开序幕。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大楼内东西南北中都贴上了“太上老君及九天玄女”神符，还摆放了香火、猪头、鸡、糯米等祭品。“道公”梁怀玉手捧“庆宅书”口诵“护宅符”，部分干部职工站立两旁，静观整个驱邪过程，现场一片“肃穆”。为了加强驱邪力度，烘托仪式气氛，覃建安从有关部门请来两个人，手持两把五四手枪，各朝天鸣发8发子弹……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念经敲铃声，幽幽不绝，街坊四邻皆被惊醒，都披衣张望，惶然不知何故。梁怀玉念至高潮处，命人架起了熊熊炉火，念完那本经书，驱邪仪式结束，全局各股室职工亦将办公用品搬挪完毕。覃建安将驱邪剩下的酒菜拿到不远处自己的家里，再买些啤酒招待梁怀玉和部分干部职工。一帮人有说有笑地围坐在一起，推杯换盏地庆贺搬迁驱邪活动“圆满成功”。

大化瑶族自治县县委、县监察局分别对利用新办公楼搬迁，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该县卫生局三名领导干部，做出严厉处分：开除覃建安党籍，撤销其第一副局长职务；给予蓝军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其副局长职务；给予马月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卫生局如此，公安局、法院也如此。

2008年6月某日，在各大知名论坛出现了一个题为《法院门口巨震撼的“辟邪宝剑”》的帖子，引发了网友们对官场上这种“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现象的热烈议论。

据说，发帖者某天路过某法院门口前，发现在一个金属杆子的上端，悬挂着一副弓箭和一把宝剑，两者一同指向正南方向，他觉得很好奇，便拍起照来。而在拍了两张照片后，很快被跑出来的保安驱赶，对方称法院门口不许照相，并且说：“他们比较迷信这个，别把那剑拍下来。”还要求发帖者马上把照片删除，但并未如愿。发帖者后来打听了一下，原来该法院连出了几件法院高层领导被调查之事，现任领导便花重金请来风水先生勘察指点。风水先生看后，认为要在法院大门旁边挂一些物件“辟邪”，才能防止法院领导再“出事”。

2001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历时3年耗资上亿元建起的审判综合楼，落成后却迟迟不能入住，原因是要找到一个算得灵的风水先生来决定乔迁的黄道吉日，以驱“害”避“邪”。尽管如此，新大楼刚使用一年多，院长突然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随后3个副院长的违法犯罪问题也陆续暴露，最终院长被判处无期徒刑，3个副院长分别被判刑。

既信风水，焉能不信“天道鬼神”，焉能不烧香拜佛？各地庙观都能见到官员朝拜的盛况。每年春节前后，前往南岳衡山烧香的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炷香”已经被炒至十多万元。据悉，对于烧香拜佛活动热衷很多时候表现在官太太身上。山东某市的官太太们曾经组建一个组织，每年共同到泰山进香，光一年进香送的钱就达数十万。

李鹏翥先生作为《澳门日报》的资深总编辑，曾多次率新闻采访团到内地访问。他发现，内地一些官员“出差看黄历，办事选吉日，逢庙就磕头”。他在南方某地级市当官的一位朋友，出差前要先查看黄历，如不吉利，就改变日期，该市搞重大仪式，也要先选“好日子”。

李鹏翥说，有些官员更是带头拜庙拜祭。前些年曾有媒体披露：大年初一凌晨，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的古寺前停了不少省直机关的小轿车，甚至还有个别省领导的专车，某些官员特地前来烧新年的第一炷香。对此，李鹏翥指出，我们一些官员口头上说的是唯物论，可行动上常常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这种落后愚昧的观念与共产党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对于某些官员带头烧香、拜佛、求签的行为，媒体要大胆予以揭露。

28

民告官，天下第一难——诸侯人格

四菜一汤，曾记否？

让我们先从著名的四菜一汤说起吧。

中央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吃喝风”现象，反复下达了多次通知，其中还明确提出公款宴请四菜一汤的标准，甚至主张征收“宴席税”，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定餐费标准吗？我就把超出部分开成住宿费（吃床板）、交通费（吃车轱辘）。征收宴席税吗？我一桌开成两桌。在大宾馆、大酒家里设立监督岗吗？我低档高食，把山珍海味搬到小饭店，或者干脆去家里吃（我请客，你花钱）。河北省邯郸市有一家陶瓷厂，生产的青花瓷杯盘碗盏娇小玲珑，白润如雪，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不知何故，突然滞销了。厂方派出20多人分头到全国各地调查，发现原来是公款吃喝风被刹住了。为了弥“亏损”，美食家们便加大器皿的容量，这样就使得小盘子小碗失去了市场。厂方立刻转产特大汤盆、菜盘，大得足以盛得下两三只肥鸡和成打的乳鸽。结果各大宾馆、酒家、招待所争相订货，月销售量由4万件增加到7万件。

多年过去了，再也没人提四菜一汤了，因为，当年的“吃喝风”已经演变成了“吃喝疯”，已经成为人们接受的理所当然的正常“风气”了。那么，中央的政令呢？中央的权威何在？

政令畅通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谓“一级蒙一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日益凸显，性质越来越恶劣，危害越来越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令（本文中泛指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法规等）不畅已成为治国的一大隐患。

中央曾三令五申：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禁止借各种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

实。这是家喻户晓的。结果呢？仅公款吃喝、旅游项目，就突破了1 000亿元，可供开两次奥运会，建两座三峡大坝！

敢视政令为“白条”的，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只能是相当一级的人民公仆。因为能把政令当“白条”的，只能是手中有权的官员。几千元，乃至上万元一桌的酒席；夏游北、冬游南，起码得四位数，要出国逛逛，不到五位数就打不住。花这么多血汗钱去吃喝玩乐，没有权，能批吗？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对政令成白条还有义愤——寄希望于纠正，久而久之，如果连这点义愤也没有了，那就有导致党的宗旨、政府权威、社会主义信念也会变成“白条”的危险。到那时，其损失就不是1 000亿之类的数字所能计算得了的！

本章所论及的诸侯人格专指具备不同权力的领导及公务员的人格障碍。其突出表现为三：无视政令、各自为政、权力膨胀。这里先说说无视政令的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各种各样旨在整顿秩序、规范行为的通知、决定、规定，即“红头文件”。按理说，这种号令一出，效果毋庸置疑。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可以说，现在的难点问题，差不多都有中央的“通知”关照过，有的“通知”发过三四十次，有的被写进了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但是毋庸置疑，对“通知”不买账，或阳奉阴违，甚至顶风作案者，仍然不乏其人。

先看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政令。“通知”发了一大堆，那对付“通知”的坏主意，也有一大船。更有口出狂言，胆大包天的。某县曾组织“收款小分队”，不管农户是否养猪，一律按人头强制收取生猪税、收取公路集资款等项费用，有农民根据中央文件和省领导的讲话，要求纠正这种错误做法。结果“收款小分队”的干部则说，中央和省里领导“说的都不算数，我们区委书记、乡党委书记说的才算得了数”。

再看禁止挥霍公款。这类“通知”下发的次数大概仅次于为农民减负的“通知”，但是一些地方别说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风没有刹住，其他方面的浪费也是有增无减。

再看反对以权谋私。从绝对量看，这类“通知”数量不太多，但力度最大。这一类“通知”的集大成者，大约要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了。但是，一些部门、地方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吏治腐败乃至司法腐败却加重了，违法违纪领导干部人数不断增加和级别不断升高。

类似情况数不胜数。在改革过程中，你要求干部管理权限下放，就有人突击提干，制造官员大裂变；你要求领导知识化，就有人突击读硕读博搞不实文凭。还有许多“软对抗”。例如，中央下发文件是应该认真执行的，但有些单位接到文件后还要再“看看”。这并非是为了贯彻文件精神而要进一步加深理解，而是“等等再

说”。比如中央要求权力不要进入市场，“翻牌公司”要立即与原机关脱钩。但不少机关还是要“看看”，能拖则拖，甚至一拖到底，拒不执行。

中央曾做出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决策，基层对此有不同层次的理解，致使调控或多或少存在着变调现象，例如：

——上调下不调。某些地区对宏观调控决策“冷处理”，过去准备上的项目照上，集资热丝毫不降，开发区照建不误。有些人认为铺几个摊子是为今后地方经济发展作打算，丝毫不影响大局，也与宏观调控无碍。

有一个地方拟投资800万元建水泥厂，现在遇上调控，决定减少投资200万元，但水泥厂还是照建不误。

——内调外不调。局限于本市本县的内部调整，过去投向外县外省，甚至沿海的项目却游离于调控之外。在“借地生财”口号支撑下，在外企业得到了地方的例外保护。

有一个乡镇贷款500万元在海南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中央调控决策传达后，银行要收回笼资金。于是双方作变通处理：该镇委托银行以房地产公司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高息债券，所筹资金存入银行户头，二者相抵，以求变通，使该镇在海南仍可继续从事业务活动。

如果认为上述问题仅仅存在于省市机关及其以下基层，那就错了。近几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表明，许多单位机关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财经纪律，违纪金额居高不下。据《交通财会》1998年第12期刊文《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所说，每年查出违纪金额都超出200亿元，如果加上清查“小金库”，预算外资金和日常财政监督，规模绝对超过300亿元。其中，就存在中央部门的违纪问题。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报告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审计表明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发现参与审计的56个中央部门本级存在的问题金额达348亿元；部门所属单位存在的问题金额120亿元，其中，卫生部等违规收费5 735万元，农业部等违规收费7 950万元，发改委等25个部门挪用27亿元……

权力部门违背中央意志，依托其拥有的权力通过各种途径收费或获得好处，这并非隐私。“跑部进京”是公开的也是无须忌讳的。外商也深知其中奥妙，也有设“跑官办”的。一位在中国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经理回国后在当地媒体发表感言：“在中国，要想办成事，非得与官员打交道。有时候，官员一句话，项目就立刻通过；有的时候，哪怕一点小事，也得跑断腿。”

我国陆续撤销“驻京办”的举措非常得当。但如果没有“削藩”的长效机制，中央的权威仍然会受到严重损害，类似的“驻京办”仍然会层出不穷。

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法规可以统称为政令，也可概略为党纪、政纪、法纪。诸侯人格无视政令的特征，也包括无视国家的法律、法令及法

规，即无视法纪。

《南风窗》刊登了姜姓律师代理47起行政诉讼案的深层思考，从中反映出一些百姓在官员违法行政面前的无奈。

姜律师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已经二十几年了，很多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也不断出台。但是，根据他的了解，一般公民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率相当低。以某市烟草专卖局为例，该局一名副局长介绍说，他们每年采取查处扣押强制措施上万起，可起诉率还不到0.2%。起诉率低，直接反映了当事人存在严重的“三不”心理：不愿告、不想告、不敢告。

有的说，“小胳膊扭不过大腿，还是算了吧。”沈阳大东区一名年近80的老人，开了个杂货店，某年1月5日，该区烟草专卖局几名执法人员来到店里，老人言语稍有不合，他们即拳脚相加。老人被送到医院后，未等痊愈，执法人员就不管了。老人找到笔者，当笔者建议他拿起法律的武器，他却迟疑了……

有的说，“这回告赢了，以后他们再来找麻烦怎么办？”铁西区下岗的周女士，经营一个小烟摊。执法人员在检查时扣了她的烟，还抢走她的手机。周到该局机关理论，争吵中因心脏病复发，当场昏倒，可执法人员置之不理。出院后，她和亲属商量，告还是不告，最后还是放弃了，不情愿地接受了2000元罚款。

有的说，“人家是政府机关，有钱有势，我们哪能打赢官司？”卖小吃的个体工商户唐先生如是说。唐先生曾为一把遮阳伞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被6名执法人员打倒在执法车前，满身“挂花”。医院确诊脑震荡。

纵使克服了“三不”心理，在法院层面上也存在着四难：立案难，审理难，胜诉难，执行难。姜律师代理的几十起行政诉讼过程中，对此感触颇深。

就拿执行难来说，沈阳一家金丰超市，不到3年时间就经历了十几家行政机关500多次行政执法检查。后来，该超市把市烟草专卖局告上法庭。法院在2002年9月25日就做出判决，判令被告十日内返还扣押原告的香烟，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但被告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后经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曝光，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做了重要批示，痛斥他们“霸道作风”，可被告仍无动于衷。次年3月，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也按程序下达了强制执行通知书，限被告十日内履行判决。但通知书发出后，犹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如此轰动全国、惊动省、市领导的案件尚且不能执行，一般的行政案件执行起来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并不乐观，在许多地方，用“走入困境”来形容并不为过。全国法院一审收案总趋势下降。1990年《行政诉讼法》立法施行时，全国法院一审受理案件13 006件，比1989年上升30.92%；1991年，全国法院一审收案猛增到25 667件，增长97.35%。但从2000年始，增势猛跌，仅增长7.59%，2010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一、二审收案比1992年同期下降了5.68%。

整个社会对行政诉讼的热情下降说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行政诉讼寄予的期望值大大降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期望值本来就不高，是经过立法阶段进行的艰苦的宣传和鼓舞换取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不敢告、不想告、不愿告、“告也无用”“民不与官斗”的观念日益流行。据抽样调查，有66%的群众对法律能保障公民和政府平等表示不相信。

政府部门滥用职权、藐视法院行政审判权的现象有增无减，甚至发生被告在诉讼中拘捕原告、被告公开刁难、报复法院、约束法官行动自由的现象。一个法院审理77件治安行政案件，被告全部不予答辩。一个法院5个月中判决公安机关败诉的25件治安行政案件，被告未交一次诉讼费。一个城市规划行政案件，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开庭时坐在旁听席上指导代理人诉讼，干扰审判，公然藐视法庭。

致使有新闻报道采用了这样的标题“民告官，天下第一难”。

“无视法纪”与“权力膨胀”亦有相关联系。后文会详细分析。

虚假报告骗总理

诸侯人格的第二个特征各自为政，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传统所指的诸侯经济。

诸侯经济并不是新话题。中央与地方的制衡故事在中国就上演了几千年，改革开放后，诸侯经济重新崭露头角，在某一时点甚至上演到了极致。曾经发生的“粮食大战”“种子大战”“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生猪大战”等即是明证。

诸侯经济的显著特点是贸易的封锁和资源的争夺，一般在行政区域间发生，也在各部委之间发生。例如，为了争抢中央财金的大蛋糕，争抢经济增长点，仅2000年就演出了水利部大楼事件、卫生部检疫局大金库事件以及争彩票发行事件等。

从20世纪90年代不少省市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汽车走私活动算起，到现在仍然有类似的各自为政的名曰“发展地方经济”的活动。例如，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活动为什么屡禁不止？其中就有不少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开绿灯。

我国某省有一县有2 000多家生产低压电器的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他们靠从旧市场买来废旧产品和零件，大量生产假冒低压电器，年工业产值达4.4亿元，占了该县年工业产值的98%。当上级有关部门要查处这种假冒行为时，县工委一位负责人竟说：“如果刹住低压电器的生产，将有几万人破产，几亿元财产毁于一旦，引起社会不安。”

某县因大量制造销售冒牌五粮液酒、茅台酒闻名全国。但是，工商部门在该县办假酒的案子却总是阻力重重。一位副县长竟对外来的办案人员说：“我们县在历史上就是个穷县。这两年不少群众搞假酒致富了，县里的财政也好了，这年头，衡量一个企业，就是要看挣不挣钱。要是把能抓钱的企业和人才搞掉了，我这个县长

脸上是不会有光的。”

如今甚至连企业改制也被披上了地方保护的外衣。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 656家户，涉及贷款本息5 792亿元，经过金融债券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32 140户，占改制企业51.29%，逃废银行借款本息1 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

企业逃废金融债务，其所在地方政府配合得天衣无缝。诸如，政企联手对企业实行“假破产”，企业的沉重债务一笔抹掉，企业和政府的后顾之忧一并解决。企业分立，将有效资产划给了新企业，债务仍由老企业承担，承担债务的企业没有了资产，有资产的企业不承担债务，“金蝉脱壳”之计妙到巅峰。股份制改造更是撒手锏。借增资扩股之机，故意隐瞒资产，拒不承认债务；转移资产，或组建合资公司，或注册新公司，使银行债权被悬空。

更有甚者，先趁企业改制的机会逃掉所欠银行钞票，再搭机构改革的顺风车，将与企业关联度高的主管机构和部门先行撤并。这种先“逃票”后“逃庙”的行为，既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加了金融风险，也对社会信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诸侯经济的要害在于：（1）违背市场化规律争夺部门地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影响国家经济发展；（2）破坏国家宏观调控力度；（3）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统一化，以投机性、排他性、封闭性为特征、搞部委，地方山头，对国家构成离散力，弱化中央权威。

中央出台了调控楼市的重大举措。鉴于楼市的兴衰涉及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其中也涉及“土地财政”的收益，因而，中央的调控措施一再被“感冒”，甚至不少人放出风声称中央举措方向已变，企图混淆视听，实行软对抗。

住建部、银监会、国资委分别否认楼市调控政策松动，均称还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住建部官员更特别强调，各地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新“国十条”及相关配套政策。

在三部委未表态之前，坊间有关“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政策可能取消”“三套房贷放开”的传闻甚嚣尘上，市场对调控方向疑虑重重，无所适从。

得民心顺民意的调控新政为何一再遭遇“被感冒”？

首先，学术界频频担忧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大幅下行，种种不乐观的预期让公众认为，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不可替代，放松调控“保增长”将成为可能，尤其是在“被感冒”的两次节点上，第一次出现了“房地产绑架经济、调控将使中国经济处于崩盘境地”论，第二次出现了“经济很快将由‘过热’转向‘速冻’”论。

其次，个别官方研究人员发布不负责任的政策解读。首次“被感冒”，有“三年内免谈房产税”之论；第二次“被感冒”又有“认房又认贷四季度或取消”论。

这些言论因其官方背景，被个别地方媒体放大，引发市场混乱。这不能不说与个别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软骨症”有关。

最后，最重要的是，在调控新政策与开发商博弈过程中，上述担忧、言论被开发商利用。开发商不想放弃高房价高利润，在调控进入深度博弈期后，他们要赌政策力度到底能持续多久，赌地方政府和银行政策松动的信号，将楼市兴衰与中国经济兴衰捆绑在一起。他们希望通过利用各种舆论“唱衰”中国经济来“唱衰”调控力度，以此影响高层决策，影响市场信心。楼市调控方向两次“被感冒”，背后都有开发商的影子，甚至还有某些地方政府的影子。

诸侯人格在各自为政实行地方保护方面的特征除了诸侯经济外，有更多的内容，例如限制人才流动。曾经几何限制人才流动在某些地方已经形成既限制人才流出亦限制人才流入的矛盾局面，后者的依据是“保障当地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率”。甚至还有某些市限制了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行业和职业，允许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仅为交通运输工、仓储工、粮食工人、码头工等。

除了经济、人才方面的地方保护外，诸侯人格在法治方面也表现了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司法权力也出现了地方化的倾向。

有记者在山东、陕西、浙江、广东等地采访时发现，司法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造成的“法治割据”现象使得司法权力出现地方化倾向，损害了中央权威和国家法律的尊严。

“法治割据”现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受地方保护干扰，一些法院充当“保护伞”；法院审判活动出现“行政化”倾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法制化致使法律、法规及规章间“打架”情形屡屡出现；“红头文件”成为“准法律”，给法院审理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采访中，相当多的法院向记者反映，凡是跨区域的案例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一般都很难执结。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甚至规定本地法院不能受理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也不能协助外地法院执行本地财产。浙江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近几年辖区内一批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进行案例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基本上涉及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其他行政机关或与其有关的企业，其中涉及乡镇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占到近一半。据介绍，当前地方对法院依法审判的干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越往基层，受到的干预越大；二是，涉及企业的案件，经济管理部门的干预较大；三是，以监督司法的名义干预司法的现象增多。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普遍将法院视为下属行政部门来管理。案件经合议庭开庭后，就进入了从庭长、院长到审委会，甚至到当地政法委领导的审批或请示程序，出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情形，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频繁发生，严重损害了审判的独立性乃至公正性。对此，最高法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指出：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都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而不是“地方的法院”。改革要使法院真正成为国家的法院，而不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

1991年《人民司法》第7期报道：地方保护主义成为第二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的热门话题。

也难怪法官们对它咬牙切齿——甲地法院到乙地去执行，竟然找不到被执行人的银行账号，无功而返；丙省法官到丁省去执行，不仅两级法院同时出动，还要拉上旁证；戊地法院到己地银行准备划走账户上被冻结的巨款，却被该地法院以某种理由冻结，只能望账号兴叹……有人总结说：具体到经济审判上，地方保护主义表现为收案上卡、管辖上争、办案上拖、调节上压、判决上偏、执行上顶。地方保护主义已成为妨碍经济秩序正常运行的一大恶魔。

地方保护主义何以发展今天这种程度？院长与庭长们一致认为：财政体制上没有理顺，法制不够健全，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规定，有的地方过分强调“法院为本地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以及法院本身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是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

说到财政体制，换成通俗的话就是——“法院的‘嘴巴子’搭在当地政法的‘锅沿子’上”。

有的同志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地方保护主义不能得到克服，法院本身不能从自己做起，对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势必导致危害，经济审判将落下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名声。

对地方官员来说，既然要搞地方保护主义，那势必要维护地方的“形象”了。在这方面，诸侯人格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实行舆论封锁，包括对中央采用欺瞒的手法美化自己，“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即是写照。

政府官员报数据“掩过失夸”，政绩实际上已是公开的秘密，像鸡西市政府采用虚假报告一直骗到国务院估计也不是个别案例：

据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和《中国青年报》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因鸡西文化路改造西延等多项市政府主导的工程，多年来拖欠黑龙江省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公司数千万元工程款，导致农民工领不到工资，企业陷入困境。参与调查此事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夏家骏介绍说，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到了温家宝总理手上。总理的批示非常认真、严肃：“来信反映的这个问题要逐一核查，限期落实。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要当做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夏家骏说：“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鸡西市政府接到总理的批示以后，顶风作假。”

他们对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公司说，你不是告状吗？你告到哪，向哪要钱去，农民工要钱，我们不给钱。谁让你干的活，向谁要钱。鸡西市委、市政府对省委派

来的督办组也极不配合，既不拿出审计报告，也不拿出还款合同，使调查组无功而返。

夏家骏知道这个情况后，连续三次到哈尔滨有关单位调查，得到的结论是：鸡西市政府打了假报告。他们还把假报告打到了国务院。于是，夏家骏被迫第二次向温总理反映情况。

温总理察知报告有假后，又连续两次批示，并派出工作组督办此事。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公司拿出了政府盖有公章的审计报告、政府签订的还款合同，彻底揭穿了骗局。

舆论封锁是不少官员们的拿手好戏，其中，对上访者采取围、追、堵、截也是公开秘密，上访者成了“精神病”也不是个别案例。

《南方周末》披露：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的一个普通农妇黄某，因向当地信访部门反映其所在村的土地承包和干部腐败问题，而被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现流落北京。记者调查时发现，给黄某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委托鉴定机关，是虚构出来的“黑龙江省绥棱县四海店镇信访办”。在委托机关代表人处签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吴某，其真实身份是信访办主任；另一个是何某，其真实身份是镇党委书记。

又一个上访者成了“精神病”！公民因上访而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例子还远不止这一个。

武汉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职工段某先后多次向各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举报单位存在的一些违纪违规问题。他在向湖北省审计厅继续举报有关问题时，竟意外发现了武汉市精神病医院三位医师给自己做的“精神医学鉴定书”，称他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原来，被举报单位暗中为他做了精神病鉴定。

西安胶鞋厂（现为西安顺达胶鞋厂）职工孟某为了维护集体利益被打，孟晓霞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不断上访，却被厂里送进精神病院。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她三次逃生。时任厂长就在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医鉴定的情况下，在公众场说她精神不正常；而现任厂长认为她有精神病的推断依据竟是：“她要没有病，为什么整天告状，挡上级领导的车？”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为这些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的上访者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而感到愤怒。上访申诉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然而，由于上访申诉而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上访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上访者人格和身体受到打击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动用当地司法机关的力量，有的通过其他途径打击上访者，有的甚至用“精神病”的办法来折磨上访者。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上访者被各级领导围、追、堵、截，乃至被“精神病”不在少数，不少手段令人发指。

舆论封锁的首要环节是媒体。河北省某市的公路边、村庄里，非法食盐加工点星罗棋布。当暗访的《焦点访谈》记者身份一暴露，当地盐政局的工作人员竟开着轿车在各制贩私盐的据点来回穿梭、通风报信，其情景竟像抗战时为我抗日军民通风报信的“消息树”……

再看一事。报载，中央电视台门前，冲着《焦点访谈》节目而来的有两队人马，一队是普通百姓，他们要求播出自己的冤情；另一队是代表组织前来公关的，要求批评他们本地的节目不播出，而且通常还带来他们的上级组织甚至上上一级组织的同样要求。代表组织的人一般是不寒酸的，他们坐卧铺，乘飞机，住宾馆，再加上请人吃饭，找人说情，还有一厢情愿准备的“土特产”和“红包”。

3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经济领域和司法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一怪胎也在膨胀。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与经济及司法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异曲同工的另一现象——新闻领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目前却是为大家所忽视，或者为某些层面的人们所不愿意直接接受的事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以两个整版篇幅，集中揭露了兰州证券黑市诈骗股民的种种内幕。翌日，兰州市各报纸纷纷全文转载。其实，在此之前，证券黑市不少受害者已向兰州媒体举报数家证券公司的不法行径。但因为“上面有说法”，当地媒体不会也不敢报道，直到《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后才予以转载。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条新闻：有几家旅行社在经营出国旅游业务中因违规经营、游客投诉率高等原因被国家旅游局取消了出国旅游经营权。该新闻的结尾用字幕打出了那几家旅行社的名字。

但是，没多久，其中一家被批评并被取消了出国旅游经营权的旅行社所在城市的党报上，刊出了一篇表扬该旅行社的报道。内容大意是，该旅行社如何为游客着想，服务质量如何之高，投诉率如何之低……更令人惊讶的是，该篇报道称，该旅行社为了更好的为国内游客服务，“主动退回到国内，今后不再经营出国旅游业务”。

明明中央电视台“曝光”，该市党报却表扬有加；明明是被国家主管部门取消了出国旅游经营权，该市党报却说“主动退回到国内”。

事实上，这种大媒体批评，小媒体表扬的现象并不鲜明。譬如某一产品因质量问题被大媒体“曝光”，但是没过多久，生产该产品的厂家所在地的媒体却对该产品的质量予以肯定，甚至褒奖的现象时有所见。

之所以出现这种大媒体批评，小媒体表扬的现象，盖因地方保护主义使然。地方媒体也许认为这样能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但是此举却是以牺牲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媒体的信誉为代价的。众所周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失去真实的新闻不但毫无意义，还会对受众起到误导作用，危害极大。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新闻变成“遵令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下面这篇小品文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某报记者小许了解到S县烟草公司偷税135万元的情况后，当即前往调查。经过认真采访，连夜赶写了一篇消息：记者最近从S县国税局了解到，该县烟草公司在经营烟叶销售中，采取改变原始发票等手段，共偷税135万元。该县国税局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行动，组成调查组，认真核查，已将所失税款全部追回，并对烟草公司处以18万元的罚款……

消息写好后，小许逐字逐句斟酌，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后，才将稿件誊写清楚，准备交给部主任签发在第二天的日报头版上发表。

岂料小许刚走到门口，电话铃响了，是烟草公司经理打来的。他电话里说：“许老弟呀，听说你要给公司缴税的事曝光，你知道，咱县是连续5年的全国烟叶生产先进县，今年上级要求我们拿六连冠，如果报纸批评了我们，上边知道了六连冠就吹了。我们的压力实在太太大，求求你了，你来县里匆忙，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去见见你，望你高抬贵手。”

没一会儿就有人敲门。来人称是S县烟草公司办公室的，手里拎着两条“中华”牌香烟。对方一进屋就哭丧着脸说，经理给他下了死任务，批评稿无论如何不能发，如果发了，先敲了他的饭碗。那人说完从包里掏出一沓人民币，说：“这是公司让我转给你的稿费5 000元，请收下。”

望着可怜巴巴的来人和那沓人民币，小许心里打起了鼓！他今年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分到报社，想搞几个有分量的报道，可头一篇稿就弄成这样，于是便坚决回绝。

在小许的严厉回绝下，那人只好将钱收起，但死活要把香烟留给他，并说烟草公司不缺烟，这是全体同志的一片心意。小许无奈，只好答应将香烟收下，再拿出那篇消息，按来人要求，把偷税的词儿改成了漏欠税款；把查处一节的情节改成了主动补缴。两人都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了，那人才告辞。小许又誊写了一遍，起身往部主任的办公室去。

岂料小许刚走到门口，电话铃又响了，是S县的县长打来的。他在电话中称赞了小许敢于揭露社会矛盾的做法，说他的采访报道活动是替S县做好事，然后话锋一转说，S县是市里烟叶生产基地，报上发表漏税影响太大，请考虑考虑，最好不要发。国税局那边，县里已经做了工作，要以全县利益为重，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小许说，稿子还是要发的，如果词句不妥，可以修改。讨价还价一番后，小许又拿出了那篇消息修改起来。他删除了“改变原始发票的情节”，只简单地说，由于财务人员工作失误，造成漏税135万元，后在县国税局的协助下，主动理清了账目，补缴了全部税款。小许又誊写了一遍，起身往部主任的办公室去。

岂料小许刚走到门口，电话铃再次响起，是总编打来的。总编在电话中表扬了小许的工作精神，然后话锋一转说，对S县烟草公司偷税的稿件，刚才市里有关领导已打了招呼，认为S县是全市烟叶生产基地，也是财政的一大支柱。如果曝了光就会挫伤该县发展烟叶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原则上应以正面宣传为主，不要给市里的工作添乱。并定了调子：这个稿子不但要发，而且要发表扬稿。末了，总编让小许把稿件拿给他，两人在一起认真而细致地对稿件进行了修改，最后由小许誊写了一遍，总编直接签发到第二天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

第二天一早，市报一版便出现了一则消息：S县烟草公司把缴纳国税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仅今年8月和9月两个月，就主动缴纳国税135万元。近日，该公司经过自查，又挤出18万元的国税，由公司领导亲自送到了县国税局，从而受到了县国税局和上级部门的好评……

土皇帝亳州阅兵记

诸侯人格的第三个特征为权力膨胀，这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也可以说是最本质的特征。由于权力膨胀也才可能有各自为政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才可能有无视党纪、政纪、法纪的诸种表现。

如有人反映告行政处W处长用公款大吃大喝得太多了。领导决定找W“调查了解，严肃处理”。

领导：“这些反映是不是真的？”W：“没错，都是真的。”领导一怔：“你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吗？怎么明知故犯？”W：“为了给单位省钱。”领导一怔：“省钱？怎个省法？”

W不紧不慢，喝了口自带的茶：“那天，‘爱委会’来了3位戴胳膊箍的小脚老太太，到咱们厨房撒耗子药，一个角撒点药要30元钱。炊事员小张为省这30块钱，没让人家撒，说我们自己撒。3位老太太态度挺好，一扭一扭地鱼贯而去。第二天‘爱委会’的来检查卫生了。食堂管理员怎么只穿白大褂不戴白帽子？罚款200元。这垃圾为什么倒在门口？一会再运走？这苍蝇细菌也等你运走就不来了吗？罚款800元。瞧你们灶上这灰，怎么生熟食放得这么近？罚款……整整罚了2500元。我听说后赶紧跑去，千不是万不是地承认错误，拉他们到‘唐明皇’酒家撮了一顿，花了500元，免了罚款。你说，这饭该不该吃？”

领导皱了皱眉，没吭声，意思是让他说下去。

W：“交通安全办公室通知咱们所有司机都要去轮训1个月，每人交400元，10个司机就是4000元。我听说交通大队副大队长的儿子来报考咱们单位，跟老×商量了一下，通知这个孩子不用考了，我们要。副大队长来电话表示感谢。我赶紧趁

机请他吃了一顿。他在席间便开了个条子，把我们集训的事免了。这顿饭也花了500元。你说，该吃不该吃？”

W越说越有劲：“查水表的，没有一次不说你超标准。他说超几吨就是几吨，他大笔一挥，不是罚5 000元就是6 000元，根本不容你争辩。后来，我们学了兄弟单位的经验，每月来查表时，送他几十元劳务费。隔一月俩月的，再请他撮一顿。花钱不多，那几千的罚款，就全免了。你说，这饭该吃不该吃？”

W掰起了手指头：“绿化办公室要人去种树，规划部门抽人去挖河，联防办要人去值班，交通部门要人去维持交通，还有……”W说得气喘吁吁，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摔：“我天天晚上请客吃饭，一回家像一摊烂泥一样。你说，这饭我愿意吃吗？”

领导嘴里咕噜了一句，W没听清。他注目侧耳想听领导再说一遍，却见其缓缓起身走过他身边轻轻说了一句：“吃，吃吧！”

在中国，只要有权，不管权力大小，都容易因为私欲使这种权力膨胀。

有一农民拿根竹竿在马路上设卡，来往车辆每辆收费5元。司机很奇怪：凭什么你也能收费？农民答道：我有法律依据，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揉烂了的信纸，上面写道“为开展依法治村、依法治路，来往车辆每辆收费5块钱”。下面盖着××村委会公章。在这位农民眼里，村委会就是法律。而某些村委会主任也以地方主宰自居。

上述情景也可以归结为权力膨胀的诸侯人格，不过其载体仅是一些“小诸侯”或者“隐性诸侯”罢了。现今的诸侯人格作为一种人格障碍，更多地表现在有相当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公务员包括官员身上。

在公务员队伍中，“官升脾气长”的现象比较普通。有些人官职一升，立马飘飘然、昏昏然起来，眼空四海，睥睨一切；傲世轻人，昂首天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盛气凌人；强硬固执，刚愎不仁；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令都敢下，活显出一副“小国之君”的模样。如果官再大一点，便俨然以“封疆大吏”自居了。以原襄樊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例。此人“利用职权，在为他人提拔调升职务中受贿数额巨大，涉嫌犯罪”已被查处。他的脾气，集中在三句话：“‘两会一节’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与市委保持一致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谁砸我的锅，我端谁的碗。”这话分明是“我即中央”乃“联即天下”的翻版。

2004年，湖南省嘉禾县的政府官员的专制独裁在该县的一次拆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一，大兴土木，强征民房。领导决定，在仅有3万余人的小县城搞珠泉商贸城，搞房地产开发，于是决定拆迁居民1 100多户，动迁人员达7 000余人，拆迁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团体20余家。而对拆迁户的补偿，当然不需要协商，由县政府的干

部和开发商运行评估。

第二，“株连九族”，亲戚同罪。县里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要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否则则实行“两停”：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再不行，或开除，或到边远地区工作。于是，亲属做不通工作的，就被调到边远地区工作，后来有些亲属就只好用离婚来摆脱干系。可是“吾皇圣明”，离婚也被“暂缓”办理，只好到外地办了。于是，100多位公职人员只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做通工作，要么下放到边远地区。

第三，以言代法，高压治民。封建朝廷皇上的话就是法律，在嘉禾，什么宪法、人权、私有财产、合法权益统统都不值一谈，县委、县政府的文件就是本地的最高指示，拆迁户甚至还收到盖有县委书记、县长印章的督办卡。对于“乱民”，该县则有“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标语，类似于慈禧太后的名言“谁让我不舒服一会儿，我让他不舒服一辈子”。

再加上停水停电的措施，县法院出动200多人的强制拆迁队伍，对敢于抵制者立即拘留，“刁民”自然“望风披靡”。果然，局势稳定，“没有集体闹事，也没有集体上访”，真是清平世界，百兽率舞了。

第四，藐视上官，建“土围子”。虽然也有几个“刁民”到省会、北京上访，上级虽然也要求“依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嘉禾的拆迁工作仍然势如破竹向前推进。

当然，最能展示“诸侯”风采的当属原安徽亳州市市委书记李兴民了。

据《亳州报》报道，李兴民因善于投机取巧，官运一路亨通，曾经投靠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倒台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其关照下，他被提拔为亳州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当李兴民当上了市委书记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心腹”商定后，下决心举行一次亳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以庆贺自己荣登市委书记的宝座。

亳州市各行各业，要求统一服装，公检、法司、土地、工商、税务等执法单位一律统一制服，武警要组织方队在前，中小學生手拿花环、鲜花、红旗、彩球等迎接李兴民的检阅，场面十分壮观，犹如国庆阅兵一样。李兴民乘上一辆敞篷小汽车，模仿中央首长的姿势呼喊“同志们好！”，受检阅的人员则高呼“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闹剧持续了三个小时，全亳州市交通中断、全城戒严！为阅兵操练补助加班费，全市耗费200多万元，全部由李兴民批示报销。晚上市电视台还播放了阅兵式的全程录像。

使大小“诸侯”们展示风采的无非是人民给予的公权。公权在他们手中便是他们私有的特权，因为手中的特权，才使一些“诸侯”们平添一分暴戾之气。

据新华网报道，2004年11月，湖南省邵东县110多名干部，由原县长谢爱明、

原政协主席何有成、原县委副书记兼经委书记郑再堂等人带队，浩浩荡荡外出“考察”，一路警车开道，警笛长鸣，从长沙、珠海、东莞转到广西桂林，真可谓威风八面。然而，偏偏在广西的灵川、兴安收费站，钉头碰到了铁头，对方称不按规定缴费，就不让过卡。于是，特权就变成了蛮横：“三四十人将收费站工作人员从最西的通道推搡、追打到最东的通道……有几个人一直揪打收费人员，多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跟着猛地给收费人员的一拳或是一脚（民间谓之‘打冷拳’）。”若不是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轿车、大巴尾随，恐怕真以为碰到了一伙蛮横的流氓土匪。

其实，既然是大队人马出来考察，当然不会拿不出几十元钱的过路费，收费站前照章付费，回家报销，天经地义，为何气势汹汹拳打脚踢？唯一的原因是“居然要我停车缴费”？你让我们堂堂县长、主席、书记的面子往哪儿搁？在如此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中滋生出来的蛮横，当然不会仅表现为路途上的冲卡打人，更会表现在方方面面，譬如对舆论监督的不屑。110名干部在公路收费站大打出手，如此生动活泼的表演，自然会引来各路媒体的关注。但是，该县县委宣传部长对记者说：“怎么教育、怎么管理干部是我们内部的事儿！”舆论不能说一说，老百姓不能问一问？其蛮横之态，可谓跃然纸上。

将公权作为特权的无非是公务员。从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看，公务员一般要么是执法者，要么是司法者，理应维护法律尊严，然而，经媒体披露的一系列事实表明，我们的一些公务员，包括政府官员及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视法律为儿戏，横行无忌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2002年12月24日晚6时左右，原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派出所副所长赵志远和其他4人到刘美荣的饭店吃饭。晚9时左右，赵志远等5人喝了5瓶白酒后结账要走。在饭店一楼，赵用胳膊拐着女服务员耿某的脖子，要耿陪他出去玩“蹦蹦迪”。耿某拒绝。店主刘美荣劝说道：“服务员晚上不能出去，她还有活儿要干。”赵志远把服务员推到一边，开始骂刘美荣。十几分钟后，赵志远开车带了几个又回到饭店，揪住刘的头发，说：“你们饭店的证都办了没有？”刘回答说：“啥证都有，都在墙上挂着哩！”但赵仍以服务员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程序的情况下，连拽带打把刘美荣及女服务员耿某、许某塞进车里，带到薛店镇派出所。车到派出所，几个民警把两名服务员关在一间屋子里，赵志远把刘美荣往自己的屋子里拉。刘美荣坚持不去，赵志远大怒，边骂边打了她几个耳光，并一脚把她踢进一间屋子里，把她踢倒在水泥地上，然后用军警靴朝其头部连踩数下，还继续大骂：“我让你不听话！整不死你，我不姓赵！”当晚，赵把刘美荣多次按在水泥地上，拳打脚踢，致使其昏迷数次。刘美荣醒来后，赵让她跪在地上，用手枪指着她说：“你开饭店靠谁的势力？薛店所有大饭店没有

不认识我的，都给我面子，我领朋友到你那儿吃饭，玩一玩，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不整你整谁？”还说，“我有6发子弹，你如果告我，我把你全家都灭了……”事后，刘美荣在医院治疗了半个月，饭店也被迫关门。

据河南《城市早报》报道，2001年1月31日，原河南新乡市检察院反贪副局长吴岩因酒吧服务生提示“埋单”而“丢了面子”，竟大闹酒吧。

据酒吧副经理李新娟反映，虽然酒吧已进行优惠，但吴岩还不想付账，还把李新娟打得口鼻流血。此后李新娟又被人威胁称：是不是不想混了。酒吧工作人员刘坤等人反映，当时吴局长喝醉酒，用手机打碎吧台4盏吊灯，还声称“今天你让我拿3百，明天我让你拿3万”！混乱中还听到他大喊：“拿枪来，拿枪来！”

酒吧的投资方说，当晚吴岩想“抹平”此事，最后由吴岩赔偿3 000元钱了结。此后一个多星期内，酒吧多次接到威胁电话，扰乱了酒吧的正常营业。

“什么是法，我们就是法”，“反贪局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我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这些骇人狂言，听来令人震惊。

我们的社会正在大力倡导和谐，而法治的和谐则是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石。如果执法人员本身不能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动辄就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融洽，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又如何能够实现和谐？

和谐社会理应拒绝暴力执法，而终结暴力执法靠什么？固然，要靠法律规范，要靠制度建设，要靠舆论监督。但在作者看来，最为紧迫也最为现实的是要亮出法律之剑，对知法犯法的暴力执法行为予以严厉棒喝，对野蛮执法的行为人严厉地追究法律责任，以此来警示每一位执法者不能忘乎所以，必须敬畏法律，必须敬畏社会良知，必须敬畏公民权利。

“城管打死人”事未了，“警察打人”又成新闻，而且成为网络热点。

《南方都市报》载，2010年6月23日下午5时许，原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妻子在湖北省委门口遭6个警察围殴，“像踢足球一样”，持续了16分钟。诊断显示，她被打成脑震荡，全身遍布数十处伤痕，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

该新闻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是朗朗乾坤、省委门口，竟有6个身强力壮的警察殴打一位女子；二是被打者身份特殊，丈夫系湖北省政法委副厅级官员，妻子竟被下属派出所的警察殴打；更重要的是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称：“这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

原来是警察打错人了。但质疑由此而生：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老百姓就可以打了？这真让人不寒而栗。

信访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重要权利，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信访条例》明文规定，有关部门要维护上访者的合法权益。中央曾连发《关于违反信访工

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意见》5份文件，说明中央一直在努力改善信访制度，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但在地方，中央规定的执行却走样。在一些基层官员眼里，信访就是在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屡屡出现“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截访”等歪招。当然，上访者遭到殴打就更算不上是新闻了，此前还发生过安徽籍上访女子李蕊蕊被“截访”后被“看守”强奸、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等新闻。百姓上访之路的艰难危险，可见一斑。

地方对上访者的“围追堵截”，只能使矛盾激化，一旦上访者寻求说法无门，可能会产生绝望情绪，导致恶性循环。

以武汉为例，“乌龙拳”不仅打伤了厅官妻子，打伤了上访者的心，更打伤了公众的心、政府的形象——唇亡齿寒，自然难有置身事外者。一家网站的调查显示，对此事“感到恐惧、悲凉”的占92%。在地方看来，“截访”是为了维稳，但暴力“截访”真能达到维稳目的吗？

六警察“乌龙拳”的后果，远比厅官妻子被围殴更可怕。

“打错门”事件充分显露了某些公务员为镇一方的诸侯人格，一方面违反中央维稳规定，围追堵截甚至迫害上访者，另一方面，在省委大院便可肆无忌惮地殴打上访的老妇人，权力膨胀已到何种地步！反思诸侯人格的种种特征和表现及危害，要在中国大地上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诸侯人格是必须消除的毒瘤之一。

29

总统套房“吓”住法国总统——纵欲趋势

“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据统计，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但国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缘由一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二是我国至今仍属发展中国家，是不折不扣的穷国——人均GDP实际上连日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据美国《财富周刊》资料：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一。在超豪华的迪拜酒店入住的至少一半是中国人；在国外旅游的中国人下车后总是一窝蜂地拥进LV专卖店；劳斯莱斯等超豪华轿车在中国销量也是世界第一，等等。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有什么指责的含义，有钱人尽情享受，是很正常的，属于社会心理学的“晕眩效应”：从黑夜中来到大街上，头晕眼花是正常的。一旦暴富，见到这么多钱，当然也要头晕眼花，不显摆显摆怎么行？更何况，有些款爷实际上是最大的款——“公款”。

笔者说的未富先豪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的。毋庸讳言，我国目前存在着一种纵欲趋向，即缺乏节制地一味追求享受、追求刺激，过分讲究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简单说就是欲望横流而不思进取。这其中包括很多并不具备相应享受条件的人：有条件要享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享受，不是吗？

谁见过十个指头戴满金戒指的姑娘？

在一些大城市，恐怕很少见，然而在温州却随处可见。

笔者走进一家商店，忽觉眼前一晃，定睛一看，原来眼皮底下的柜台上摆着一双金灿灿的手，十根手指都套着硕大的金戒指，在灯光下反射出光芒。

大街小巷行走的温州女人，几乎没有不戴黄金首饰的，其数量之多、价格之

贵，恐怕都居全国首位。听说有的女人身上佩戴的黄金，重量可达一公斤以上！

爱露富，是温州人的一种心态。也许温州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穷怕了，所以当他们的翻过身来，手头有了大把的钞票后，就使劲地打扮装饰自己，使劲地挥霍享受。

可是奢华只能标明有钱，但不能彰显品位。

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到成都访问，当地政府为他在索菲特万达大饭店预订了面积为400多平方米的总统套房。希拉克感到总统套房“太豪华了”，婉拒入住，亲自挑选了一套普通豪华间，面积只有64平方米，每晚的价格为1 200元人民币。成都总统套房“吓”住了法国总统！

但可能令希拉克想不到的是，能“吓”住他的事情，却早已“吓”不住许多中国人了。据权威媒体披露，我国目前已有的五星级酒店是美国的4倍（还不包括各地建在深宅大院内、专门招待要员的豪华住所），而每座五星级酒店，都有超豪华的总统套间。曾有一位部级国企官员，仅为午休就要入住价格6万元一天的总统套间，而且还要求专门更换上他喜欢的家具、床上用品乃至抽水马桶。

人头马目前在我国销势极好，上万元一瓶的路易十三，在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时一天竟能卖出20余瓶。但是，一些法国朋友告诉记者，在法国，很少有人会去花大价钱买这些酒喝，这些名酒目前的销售是专门针对亚洲市场的，因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喜欢告诉别人“我有钱”。于是，在中国的洋酒柜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高档的洋酒清一色地被中国人买走，而外国人则只买中低档洋酒。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提高生活质量”也成为全社会认同的口号。然而，一味追求享受、追求刺激的欲望横流，不能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反而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心理障碍。从目前我国普通层面看，纵欲主要集中在物欲及人欲（即性欲）方面，即“饮食男女”。

为什么卖淫嫖娼现象屡禁不绝，反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卖淫女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卖淫者并非像旧社会的妓女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被新社会“穿金戴银、宝马香车、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高质量”生活所迫。可以说，卖淫泛滥是物欲和人欲横流的综合体现。

就物欲而言，其标的当然是金钱，但从我国普遍层面看，最为具体的、最说明问题的还是饮食——具有中国特色的“吃喝风”。老百姓动辄“请吃”，凡事离不开酒席，这就不必细说了，毕竟人家用的是自家钱。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用公款吃喝的“官家人”。

今日之中国，“吃喝风”已嬗变为“吃喝疯”，其中主要是公款消费。以至于人们将“文革”时期流行的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试看神州大地，如今处处在“请客吃饭”！很多地方，上级部门来人视察工作

要吃，下级单位来人汇报工作要吃，对口协作单位来人联系工作更要吃，一个公司开张要吃，一个单位解散也要吃，工程决定上马要吃，工程决定下马要吃，工程奠基、开工、验收、结束等更少不了吃！更别提欢迎会、欢送会、检查会、鉴定会、评比会、验收会、交流会，甚而至于学术报告会了……因此一句顺口溜也在广泛流传：“要实惠，去开会，白吃白喝加白拿，屁股一拍手一抹，心照不宣笑哈哈！”而在民间，人们也是纷纷议论：“现在叫‘上下对口’，‘横向联席’，你吃我，我吃你，反正都是国家的，吃请请吃，不请也吃。”“到处都请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谁不吃白吃！”

福建沿海某市一局长，几乎天天都有饭局，节日时往往会同时收到几份请柬。该局长实在吃不过来，便派家人分兵几路。后来家人还是不敷使用，则将朋友拉去凑数。若被拉去凑数的朋友稍有迟疑，该局长就会这样“教育”和“鼓励”说：“去！怎么不去？生是公家人，死是公家鬼，吃几餐公家酒席算什么，我从小就吃供给长大的！”既然局长“现身说法”，朋友便欣然前往，于是主客皆大欢喜，尽醉而归。因而有人叹说：“从前农民起义军是打家劫舍吃大户、吃地主，而现在干部们则是纷赴酒席吃阿公！”老百姓中间还流传着一句话：“当官的，吃阿公，大吃大喝乐无穷，咱侬想吃没得吃，因为人家属阿公！”（阿公，是福建人对于公家的时兴称呼。）（中华全民科学素质教育网，2009年3月23日）

在闽南地区，由于信佛教的人多，侨胞眷属人也多，因而在各乡村，现都设有三个委员会：党委会，侨委会，佛委会。每当农历七月十五日“鬼节”来临，或者其他什么佛祖寿辰佛教节日，即由佛委会牵头，侨委会出钱，党委会“领导”维持秩序，大摆荤、素宴席，穷吃猛喝。真是吃得个热闹非凡，昏天黑地，喝得个一佛涅槃，二佛出世，似乎不如此，就显不出“诚心”和“隆重”，对不起佛陀和鬼王。因而有人叹曰：“这些干部可真会吃！他们连神和鬼的节日也要拉过来一道吃。要是菩萨真的天上有灵，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上面说的是农村，咱们再来看看工厂。

令许多工矿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考查、评比、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论来的是部、局、委、办等上级单位，还是市、区、地、县的有关部门，甚至于那些臂套红箍的街道清洁卫生检查小组，都是“贵客”，谁也得罪不起。据某化工厂统计，仅2009年的9、10两月中，该厂共接待了20次检查，平均每3天一次，有时甚至一天有2~3起检查组下来，闹得厂长、书记只好分身接待，无暇他顾。

吃是为了活着，是否活着也是为了吃？在吃喝大军中，领军人物当然是咱们的政府官员了。革命老区广东陆丰市是个财政穷市，年地方可支配财力只有1亿元左右，省财政每年向陆丰转移支付1.5亿元。为了保工资和保运转，每半年陆丰市还

要向上级财政借5 000万元。然而，新华社记者暗访发现，当地部分官员公款吃喝成风，最高一桌竟吃了15万元。陆丰农业局一干部痛心地对记者说：“有的干部在人民大厦随便吃顿饭就花上万元，这可是农民种好几年粮食的收入呀！”

笔者扮作要在广东开高档餐馆的外地商人进入人民大厦。一位姓薛的经理和记者聊了起来。据他介绍，大厦有豪华房12套，包房的名称都很讲究，像“百万石”“天骄”“麒麟阁”“聚龙阁”等，到这里来用餐的属当官的居多。大厦内部的装修是整个粤东最豪华的，菜也上档次，当然价钱也贵一点。不仅陆丰的单位来这里接待客人，连汕尾、汕头、潮州的一些领导也来这里用餐。

笔者参观了一些豪华房间。从一个小门上到三楼，进了一个叫“百万石”的包间。门口是一座用各种石料装饰而成的假山，流水潺潺。里面是一间100平方米的大厅，再里面是3个串联的套间，配备有麻将桌和各种生活娱乐设施。“聚龙阁”又是另一番景象，雕梁画栋，龙椅一一具备，颇有气魄，可在这里的房中房休息一晚，最低消费1 980元。“天骄”最豪华，有300多平方米，卫生间比别的地方的房间还要大，在房中房休息一晚最低要5 000元。

“吃一顿得花多少钱？”

“这可没个底，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都有，这里最高的一桌吃了15万元。”

笔者表示不解，薛经理专门让服务员送来了一本轻易不外露的豪华菜谱。菜谱分为“保健汤”“山珍海味”等13个品类。其中光“保健汤”就有10多个品种。笔者找机会将一些菜价格记了下来：丽参炖血燕（每盅，下同）880元；人参炖血燕780元；花旗参炖官燕580元；乳鸽炖官燕680元；佛跳墙2 980元；鹿回头3 980元；冰糖元肉雪梨炖官燕680元；高丽参炖官燕780元；鲍鱼翅580元；神仙翅480元；参皇炖鱼翅480元。

人民大厦一楼有间不大的礼品间，售货员说，这里的東西是供客人吃完饭顺便带走的，都可以算入餐费。

在人民大厦不远处，有很多出租摩托车车手朝里面望，记者走过去和他们聊天。一个从粮食局下岗的摩托车车手说：“里面吃饭的有时要小姐陪，我们在这里等拉人。我一个月没黑没白地跑才挣800元，刚够他们点个菜。”

这里说到“小姐”即“人欲”（男女）的问题。饭余思小姐，对于某些人而言，很正常，“食色，性也”。

无须用更多的笔墨去描绘那发生在宾馆、校园、浴室、洗脚城、发廊乃至办公室等场所的一幕幕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甚至无所谓交易只是为了发泄性欲的场面了。可以说，中国人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普遍的放纵人欲，如此地开放。有位所谓的社会学家（姑且隐其名）称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是人性所必需的，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但她忘了，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属性不是动物属性，人的本质还是社

会人而不是动物人。就性而言，人作为动物所具有的性冲动是正常的，但其满足条件是有社会性的，缺乏必要的自制是不正常的，纵人欲首先冲击的就是社会的道德底线，而众多的性犯罪，包括其他方面的违法犯罪往往都与放纵人欲而缺乏有效自控有关。

如果说这与人们长久压抑的“性饥渴”有关似乎还有点依据。这也有点类似前面说到的“晕眩效应”。实然走出黑暗的房屋，眼前从影视书刊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光怪陆离的情色景象令人心惊肉跳、不能自己……但更深层次的思考，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性饥渴，除了来源于长时期的性禁锢、性神秘，还来自于新的性信息在极短时间内的大量积聚和扩散。也就是说，目前的放纵人欲不是那种具有简单的原始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附加了新的社会意义的行为趋向，是对过去时代的那种过低的性生活水平的否定和对新的更高水平的性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简单说就是对西方式的“性解放”的追求、向往，而推波助澜者主要是到处泛滥的色情文化。色情文化的泛滥是社会文化极度失衡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精神不健全的表现，更是低级思想意识畸形发展的表现。

由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不健全，色情文化才被社会受众接受，而为了经济利益，出版商、影视制作商们迎合受众嗜好，纷纷出笼色情作品，从而助长了“人欲”，这就有如前面谈到的妓女卖淫是物欲与人欲的最佳搭配一样。

大学校园里的“露水夫妻”

说到纵欲，笔者作为大学老师还想谈谈对大学生的忧思。既然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坚力量，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与20世纪特别是50、60年代的大学生相比，现在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在一项调查中（涉及近2 000名大学生），有32%的人对“人应该及时行乐”这一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持完全赞成态度；有21%的人对此持比较赞成态度；持保留态度的则占11%。令人吃惊的是，当调查结果在校园网公布出来时，竟有人提出“四个不”：大学生时代最好玩，为什么不玩，毕业以后没机会了，为什么不享受，人生短促、韶华易逝，为什么苦自己，享受没钱，为什么不借。而这“四个不”似乎在学生中还有相当市场。我们不能说，享受主义人生观已经完全占领了大学校园。问题在于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及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使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角色期望值更高，而对于出现在大学校园的“纵欲趋向”则更为担忧。

鉴于大学生本身仅为消费者，一般无钱无权，当然也不可能有普遍的奢华现象，但其消费的特点已经凸现出较为明显的物欲趋向。据锦州市对3所大学、天津市对6所大学、北京市对3所大学、重庆市对2所大学的综合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

的消费水平出现了新动态，总的说来表现出消费水平偏高、消费水平差异大、消费比例不合理三大特点。

消费水平偏高与名目日益增多的消费有关。其中，仅是聚餐的名目便与社会上聚餐的名目相差无几。不少学生已经养成“下馆子”的习惯。尽管不少学校食堂的就餐费普遍低于餐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越来越多的学生仍然选择到餐馆就餐，其中，不乏聚众吃喝的现象。除了聚餐费用，时髦的衣着、化妆品也占了较大的分量，这方面主要为女生的支出，而男生支出增加的主要为烟酒费用。

此外，各种各样的文娱生活（例如KTV）及层出不穷的节日与生日庆贺，包括相互赠送礼品等均是日前大学生消费水平增高的主要原因。根据北京市、锦州市的统计笔者还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月消费已经超过当地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了。

消费水平差异大也是明显的，家境富裕的每月花费上千很平常，甚至上万。

消费比例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生活消费的比例过大，学习资料的消费不足上。上述调查发现，书籍（包括教科书）的购买仅占总费用的7.7%，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娱乐性和业余爱好性的书籍。

物欲的刺激也助长了大学生们的赌博行为，赌博“流行”于学生宿舍，其中有不少女生亦沉迷于骰子。由于“物欲”的驱使，大学生群体也频现“大侠”身影。

距离诱人的圣诞节为期不远，某高等学府3503宿舍里，5名成员聚在一起，将他们5人分别编号为A、B、C、D、E。4年前，他们从北京、四川、湖南为学业和前途来到这所高等学府，在躁动的青春期的转折点上，他们曾深夜攻读，孜孜不倦，在人生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充分显示了奋斗拼搏的实力。于是，他们成了学生会的头儿、共青团的干部、学校的“三好”学生……

然而，此时他们却在策划一个阴谋，一个为圣诞节筹集资金的阴谋。慈祥诱人的“圣诞老人”折磨得他们跃跃欲试。他们深知，没有钱难以享受这温暖的气氛。

钱，自古以来像“芝麻开门”山洞里一块块滚烫的金子。

阴谋已经定好：抢台面。心理的饥渴和大脑对法律意识的空白使他们选择了这一自以为上计的“良策”。恰如B所言：“我们的行动是抓赌，实乃正义之举，抢了台面也有理。”

A迫不及待地说：“目标我已经选择好，郊外一幢三层楼房，那里住着江苏来的民工。他们每天晚上搓麻将。我们选定一个深夜，打它个措手不及。”

C被人视为清高傲慢，他的话往往很有分量：“捉赌就要像模像样地去捉，穿上警服，像个公安人员，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大大方方地收钞票。5套警服我已落实，向公安局的一位亲戚借的，说是文艺演出用，只不过略施小技而已。”

难以置信的是，5个高才生竟没有一人意识到此举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天以后的晚上10时许，5个大学生在校外穿戴好警服、警裤、警帽和警用风衣，由领头的A夹着公文包，提着手电筒，威风凛凛地朝目的地进发。

A早已窥测好地形，配置了楼下的房门钥匙。一切准备工作滴水不漏。他们迎着夜色，冒着北风，悄悄贴近目标。楼上隐约传出麻将牌的撞击声。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将钥匙插入锁眼，手指轻轻一转，便破门而入，旋即直冲三楼，像一群天兵天将突然出现在麻将桌旁，并形成四方包围圈。

4个民工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双双眼睛都如仰面躺在桌上的“二筒”一般圆睁着。

“把口袋里的钱都摸出来，站到墙边去。”B率先训话，那口京话拿腔拿调，韵味十足。“人赃都在，没话说吧。你们知道赌博是什么行为？你说！既然知道是犯罪，为何还要明知故犯？真不像话……”B依次对4个民工训斥了一番。

接着，他们又先后将房内搜查了一遍，再逐个对4个民工进行抄身。搜尽查遍，共计查抄现金1430元人民币。E觉得“战利品”不多，便指着屋内的另一民工说：“你提供聚赌场所，且知情不报，罚款500元。”这位房东乖乖地摸出500元。

C知道已经榨不出油水，便说：“好了，脏款赃物没收，麻将牌也充公。告诉你们，以后再赌，就要关了。今天宽容你们一次。”

5个假公安抢了台面后，大摇大摆离去。他们直奔E的亲戚家，异常快活地瓜分了现金。

于是，他们迎来了欢乐的圣诞夜。要不是E“黄毒”案发，供出“抢台面”一事，他们还将逍遥法外，而被害的民工依旧蒙着鼓里，自认倒霉。然“脓疮”一经点破，事情的发展趋势大大出乎这些大学生的意料。圣诞的余温尚未消失殆尽，5副锃亮的手铐落在他们手腕上。

纵欲趋向在圣洁的大学校园，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人欲的不加控制。

大学有道奇特的风景线，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人们总是能在路边、教室、操场、食堂等公开场合见到一对对相拥，甚至相抚相吻的情侣，他们满不在乎面不改色，反倒弄得周围同学、老师不好意思，绕道而行。

大学生为“热血”青年，异性接触，难免“力必多”迸发。然而行此等私密之事，当在私密之处进行，这是社会人应该知晓的最简单道理吧？况乎身处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笔者并非古板的“老封建”，笔者反感的是过于随便的两性关系，这种过于随便的对待两性交往的态度有时还不是缘于感性的冲动而是一种理性的认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爱情只是由于爱而并非出于婚姻”。可真正的爱情有一个核心的标志，那就是“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马克思语）。

对大学校园里的同居，只要稍一调查，就会发现这一现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实际想象。在大学，恋爱时间较长的恋人大都有过同居的经历，很难说他们仅仅是一时失控，相反他们似乎有一种默契：双方均感满意，一旦分手，并不后悔。用“露水夫妻”来形容这种状况似乎不太妥当，但笔者找不到更为妥帖的词语。

C和D的恋人均在外地，平时里，望着成双成对的情侣从眼前飘过，一种失落感冲击着他和她。也许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凄惶，他们认识了。星期天，他邀她上公园划船，她没有拒绝。又一个周末，她约他去夜市品尝小吃。随后，他们来到公园，情投意合的他俩忽然紧紧地拥抱，随之成了一双露水夫妻。从此，每个周末，他们幽会于公园、旅馆，他们不再感到寂寞。毕业时，两颗交融的心异常平静，他们愉快而无牵挂地分手了。

为何大学生群体对待两性关系反而更加随意呢？前面谈到，人欲趋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为晕眩效应，从高中时代的性压抑（甚至不准谈恋爱）一下来到大学，随处可见那种令人心惊肉跳、莫名燥热的现象，当然控制不住；二为来自新的性信息在极短时间内的数量积聚和扩散，在这方面，大学生有两个独特的优势，一是在大量接受西方社会人文理论的同时，也接触了西方所谓的“性自由”“性解放”理论，包括国内的那批自诩“前卫”的“青年导师”的理论，也就是说，大学生的人欲趋向甚至还有其理论依据呢。由于时间及条件的便利，大学生群体更易接触到网络的情色现象，这类新的性信息对于缺乏自制的大学生而言更能“立竿见影”。有材料表明，大学生已经成为网络色情的主力军。

文华东（化名）出生在豫皖鄂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在这片曾为中国革命孕育出许多“红色杜鹃花”的土地上，也同样存在着贫瘠与落后。因此，从入学第一天起，文君便走上了一条既艰辛又酸楚的求学之路。

2010年秋天，他以全县总分第4名的优异成绩被东南某省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其所学专业是时下最热门的流行专业——电子计算机。

当文华东带上家乡人为他凑出的3 000多元钱一步一回头地走出古老的大别山时，他默默地发誓：无论到何时何地他都不会忘记父老乡亲的深情厚爱和大山多年来对他的养育之恩。

刚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文华东得很刻苦也很用功。

转眼到了大学二年级，繁华的都市生活使他眼花缭乱。

2012年7月的一个周末，他在街上偶遇一位在武汉市一家中外电器厂开发合资公司工作的同乡王某。当王得知文华东学的是电子计算机后，立即邀请他到该公司共同探讨软件开发中的有关问题，并把他介绍给经理。从此，文华东成了公司的业余技术员。

一个周末的晚上，文华东找到王某的宿舍。可这时王某却把门窗关得严严的，直到华东在门外喊了几声王某才应声开门。

进了屋只见王某的桌上放着几个进口VCD光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便拿张光盘塞进机内，屏幕上出现女人的裸体画来。他以前虽听说过“电脑黄毒”这个词，却从来没见过，更没玩过。看着画面上挑逗的、淫秽的动作，他一下子竟不知所措，心跳得特别快，头脑中似有无数条小虫在爬在抓，他的手呆在键上一动不动。这时王某从背后走过来，当他看到这一情景之后，接着敲打了几下键盘，屏幕上的画面又开始晃动起来，画面更加不堪入目……

文华东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王某的宿舍的，直到走出好远，才逐渐恢复平静。回到学校，他每当想起那一幕，既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又有一种好奇与向往。

又一个周末的晚上，文华东终于在焦躁不安中再次来到王某的宿舍，王某也似乎知道他的来意，从抽屉中取出好几张VCD光盘，之后便借故到公司办事去了。整整一个晚上，文华东在既恐慌又兴奋的状态中看完了这几盘“成人电影”和“成人游戏”。

从此，黄色光盘像魔鬼一样死死地缠住他，甩也甩不掉。有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行径的丑恶，想不再涉此，但每次坐在电脑前他都不自觉地想玩几盘黄色游戏，不然便静不下心干其他的事。

王某所在的公司除了卖些电器外，还有专门负责为顾客拷贝电脑软件磁盘的秘密业务。为了招揽顾客，经理还偷偷向顾客兜售黄色软件。

为了怕公安人员发现破绽，经理指使王某在每个磁盘上进行一系列的加密处置。于是，文华东又成了他们的“特别顾问”。从此，文华东把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都用到了工作上，这不仅换回了钱和物质的援助，更换回了精神上的享乐。王某似乎了解到文华东的心理，也在每周不断地给文华东找来更加刺激的“新鲜”品。

文华东开始在生活中寻找更刺激的方式了，他这个一向不爱言语、不善交际的农村学生，开始对女性异常地热衷起来。

同系的小丁是文华东一直暗恋的女孩。小丁出生于城市，优越感很强的她，平时高傲得像个公主，从来不把文华东看在眼里，只是文华东优异的学习成绩，才使得她平时偶尔和文华东说上一两句话。一天中午，文华东终于瞅准机会，红着脸邀请小丁到微机室共同研讨一个微机问题。当他们装上磁盘盯着屏幕时，屏幕上却突然出现一幕幕不堪入目的男女污秽画面。小丁正不知所措目瞪口呆时，文华东猛地抱住她。

事发之后，小丁有好几天都没上课，文华东害怕了，他想自己也许完了。但是，事情却异常平静，之后他才听人说，小丁已转到另一个系，久悬的心终于放下了。

某日，某教授和妻子要到外地参加一项学术性活动，为了照顾自己的家和在上

小学的女儿，他们把钥匙交给了自认为信得过的学生文华东。

教授家里一套先进的电脑设备。有了这一便利条件，文华东特意又从王某那里借来好多的黄色VCD，趁教授女儿不在家关起门来偷偷地欣赏。

一天中午，正当文华东津津有味地欣赏黄色画面时，教授的女儿走进室内。当小姑娘看到文君利用爸爸的电脑设备干坏事时，竟大叫起来，这叫声使他从沉迷中惊醒过来。失去理智的他扑上前去，紧紧抱住教授女儿。谁知小姑娘边挣扎边大声叫喊，打声和叫声惊动了楼下的邻居……

文华东终于被拘留了。

当文华东被捕的消息不胫传出后，一些同学和老师都很诧异：一向品学兼优的文君，怎么会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呢？

荒唐的官场情色游戏

说到人欲，不能不提到官员群体。俗语说，十个贪官九个色。也就是说，贪官的贪欲，既包括物欲也包括人欲，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甚至互为因果。据统计，2010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拥有情人的占60%；而2007年竟达100%。

这一奇特现象，使没有情妇的贪官也成了新闻。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的辩护律师高子程曾给30多个高官做过辩护，他向媒体披露，张恩照是其代理的案件中唯一一个没有婚外情的贪官。

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案作出终审判决，刘志华被认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696万余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近700万元的受贿财物中，刘志华单独受贿的金额仅为48万余元，其他600多万元受贿款，均与其情妇王建瑞有关。

许多案件都显示，情妇是腐败利益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如在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同海、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原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案件中，官员大肆受贿的背后都有情妇的身影。

2010年3月24日，人称“三玩市长”的原湖南郴州副市长雷渊利出现在“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上。此番出场，他不再是以领导的身份训话，而是以一名服刑人员的身份去“现身说法”的。

据《检察日报》报道，这个“三玩市长”贪污受贿近千万元，但侦查机关在他家却没有搜查到赃款、赃物，其私人账户甚至处于透支状态。钱都去哪里了呢？

“三玩市长”回答说：“我是左手进右手出，这些钱都给女人了。我这个人太重情义，我要对这些女人负责。”据相关办案人员透露，雷渊利此言不虚，对于情妇他

确实表现得“重情重义”，所攫取的钱财主要都花在她们身上了。

雷渊利自己承认，他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并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据媒体披露，为博美人一笑，雷耗资2 700万元为其中一个情妇修建房子，并亲任工程指挥部部长，郴州市每个乡镇为此负担100万元。

与雷渊利包养情妇方面的“佳绩”相比，许多贪官也毫不逊色。

据媒体公开报道，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不但贪污受贿2 000余万元，还拥有情妇146位；原海南省纺织局局长李庆善则以善于总结和收藏著称，他撰写性爱淫秽日记95本，收集女性毛发、内裤236份，还自拍淫乱照片200多张，自拍淫秽录影带、光碟一批；原山东省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与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兼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则“颇具合作精神”，拥有一名共同的情人；原安徽省宣城市市委副书记杨枫则长于管理，运用MBA知识管理7名情妇……

“含泪索贿”成为官场情色故事的新看点，而该词的发明人是原广东省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邱伙胜。据媒体报道，邱伙胜被控受贿105万元，在庭审中，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被“二奶”逼的。他表示，其受贿的98万元赃款全部送给了情妇。数名行贿人在证词上也提到，邱伙胜在要钱时泪流满面，说如果没有钱就会“家破人亡”或者“两公婆要一起跳楼”。原广东省盐务局局长、原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志强也有类似的经历，自辩是为情妇“被迫”受贿。

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先后耗费1 200多万元，包养了5个情妇。和很多贪官一样，王守业最后“栽”在了情妇身上。身为某军区文工团演员的蒋某与王守业“交往”后生有一子。王守业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后，打算与蒋某分手，并要求获得对儿子的监护权。二人因此决裂，蒋某担心被王灭口，不仅单独到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而且串联了王守业的另外两名情妇，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举报信，终于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立案展开调查。

原安徽省宣城市市委副书记杨枫，多年来不是养了一个情人，而是养着一个“情妇团队”。“首席情妇”邹某失宠后“反戈一击”，将杨枫拉下马来。

一次，杨枫的两个情妇争风吃醋，让杨枫很头疼，他便和邹某把几个情妇的性格特点做了分析，运用所学过的MBA理论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制定了周详的管理方案。他们把情妇分为四种类型：爱钱型、爱帅哥型、爱权力型、爱吃醋型。邹某提出，安排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有的主攻上级领导圈子，有的经营公司\共享利益……

在列举了众多官场的情色游戏后，不难得出结论：官员的上述“私生活”实际上就是一种钱色交易或者权色交易，这种交易在纵欲的行为意向的驱使下会上演一幕幕疯狂的闹剧。平心而论，贪官的贪欲也是有发展过程的。有的领导最初能抵挡“糖弹”的袭击，却抵挡不住“肉弹”的进攻，其蜕变的过程值得深思。下面是一

位“公关”的广州商人的叙述：

一笔业务，该谈的都谈了，可最后到底成不成，对方领导一直不表态。我回到广州，过了些日子，直接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点困难，还得想想。我即邀他到广州来看看：“我们公司以商务考察的名义，发个邀请给你。”正式发了个电传邀请函过去没几天，这老头就过来了。

一行三个人，住了两天，仍未表态。他将另两个打发到深圳、珠海去了，自己虽形单影只，却不提卡拉OK或小姐，一天到晚在房间里，看我们给他搞的几个港台出版的政治方面的书，好像兴趣挺浓。

我自己憋不住了。这人当了15年的副厅级干部，离休后留任，手上仍握有实权。人很瘦，精神也不太好，可一头白发下一脸不怒自威的官相，给人的感觉是，如果在此人身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定是天方夜谭。

一天晚上，我说：“喜不喜欢唱歌？”“不喜欢。”“喜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这样吧，天天泡在宾馆里也没意思，我们还是去歌厅坐坐，看看广州的夜生活，这也算是考察商业文化嘛。”安排好的两个小姐，邀请他跳舞，事先给她们下了任务，“你们能把此人的心里话套出来，每人给2 000元。”上半场没跳，小姐陪他听歌，喝啤酒。下半场，两个小姐轮着陪他跳，跳着跳着，他说：“小姐，你们跳得我来了劲了……”他还不时用大腿去蹭对方，信息反馈给我了，第一夜到此为止。

第二夜，我又找了两个小姐来陪他吃饭。

在业务交往中，这些三陪小姐，一是有个子，起码1.6米以上；二是有气质，乍看像个读了书的，显得有涵养；三是有职业手段，会吊胃口，将对方的胃口吊得足足的。

小姐们为其倒酒、喂酒、喂菜，他嬉嬉笑笑，蹭蹭摸摸……自己又点了一盅炖牛鞭吃。我说：“这几天，您辛苦了，这两个小姐原来是学医做护士的，会搞按摩，给你松松骨吧。”

“那就试试看吧，看看你们的手艺怎样？”

是夜，他就按捺不住了，开始动手动脚……

次日中午，他自己提出来：“来了一星期了，南国的夜生活比较丰富，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搞不清楚……”话说得有几分委婉，脸上却一脸焦灼的表情。

当晚，我再叫了两个小姐，他一手牵一个小姐进了里屋，我在客厅看电视，喝啤酒。近两个小时，小姐先出来领钱走了。十几分钟后，他出来了，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星期前脸上熬得像是霉干菜，这时红光满面，看似浑身舒畅，他一边用手捋顺头发，一边道：“小赵啊，我6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的官，今天才算是做

了一回人哪！”

他提出要去吃消夜，由他埋单，他喝了两瓶啤酒，却不失清醒。他说，这事，做了就做了。但第一点，你们不要以此来要挟我，当然这笔生意是可以做的。第二点，今天晚上这个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彼此心里都明白，都是男人嘛。你们从此成了我的小兄弟。第三点，以后你们与我们的业务关系，能不找我，最好不要找我，在我下面最好找一个代理人，或者我安排一个代理人，由他开口，我点头就行了。有什么事情，不要老打电话到办公室来，可以打到家里。

次日，那两个人从深圳、珠海回来了，双方便签了合同。

做了七八十单业务，我接待过的内地干部，有一百多人了，我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是，色就像一层纸，我们两个再不熟，你再大的官，我再没有地位，可只要这一层纸捅破了，话就好说多了，生意就好做多了……

二是，有那么一些干部，给他再多的钱，他不皱眉头，前面提到的那位副厅级干部，他像批文件一样地坦然悠然，从信封里抽出钱来，沾着口水一张张翻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他认为，他关照了我们，我们赚了钱，就应该让他享受一番。

上述这位广州商人的描绘可以描绘出许多官员最初被“肉弹”击中的场景，不可谓不生动。“肉弹”的威力可以使江苏县的一位“养鳊大王”撂倒几十位银行工作人员；“肉弹”也使某县得到启发，成立了名正言顺的“女子招商队”……

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实施以来，中央已经开始重拳出击介入官员私生活，其中除了“阳光举措”的提出外，也拟将“性贿赂”列入刑法规范。“官场的情色游戏”可以休矣！

后 记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时隔一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指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重要性。此后，《人民日报》刊登多篇文章阐述心理疏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书作者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疏导系统”并获得批准（批准号10xks007）。社会心理疏导的对象主要为相应的社会心理障碍者。我国目前尚未对社会心理障碍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本书作为项目研究的前期素材具有前沿性、独创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成熟性，切盼指正。

本书第7、8、9、12、21、22章由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何苗撰写。重庆邮电大学教师刘裔负责资料编制、调研分析并撰写第13、14章。重庆工商大学教师刘懿负责全书案例分析。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刘宗粤负责其余各章并统稿，是以记。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9

SS□ ⇒ 13682035

DX□ =

□ □ □ □ ⇒ 2015. 01

□ □ □ ⇒ □ □ □ □ □ □ □ □